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近代粤港客商  
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

黄 滨 著

27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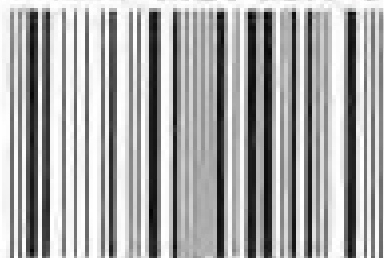
黄汉同志《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一书，不仅是中国地方商帮史、城镇工商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填补了中国近代地方经济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而且在以研究商帮史、城镇史为切入口，探索中国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方面也有较大的突破。

——谭双泉

这是一部广西地方经济史专著，但作者的视野远超出广西，力求从粤港澳乃至环珠江流域各省区、东南亚各国家和地区这样的巨大地理范围来探究两广的地域分工体系和广西“无东不成市”格局的成因；这是一部近代经济史专著，但作者考察时间远起晚清民国，而上至宋元下至当代800多年的长时段，扫描广西经济发展布局结构的演变轨迹，捕捉广西“无东不成市”格局成形的基因；这是一部研究在广西的粤港商帮之作，但作者同时注视广西本土的桂商、人桂的湘、赣、闽等诸省商帮，对各省商帮业务、人桂的线路、能量、地理分布等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是一部逐行业研究商业史和城镇经济的专著，但作者始终注重揭示处在不同行业的粤商相互间的分工配置关系，特别是还跨行业地研究了粤港商人与广西农村大量分布的广东农业移民（如客家人、土白话人等）的城乡分工配置关系；这是一部研究历史的专著，却又远超出历史范围，运用从历史归纳出来的规律，对当代广西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钟文典

ISBN 7-5004-5016-8



9 787500 450160 >

ISBN 7-5004-5016-8

定价：27.00元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 近代粤港客商 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

—广东、香港对广西市场辐射的历史探源

黄 滨 著

导师 谭双泉

审稿 李茂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广东、香港对广西市场辐射的历史探源/黄滨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ISBN 7-5004-5016-8

I. 近… II. 黄… III. 商人-关系-城镇经济-经济发展-研究-广西 IV. F299.2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6690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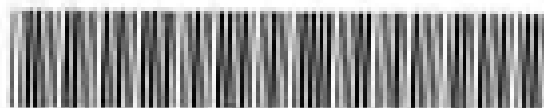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易小放  
特约编辑 何力  
责任校对 李小冰  
技术编辑 李健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 (邮购)	010-64031534 (总编室)
网址	<a href="http://www.csspw.cn">http://www.csspw.cn</a>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中华装订厂
版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306 千字	
定价	27.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郑州大学 \*04010173357V\*



## 作者简介

**黄滨** 广西桂林市灵川县人。先后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桂林）历史系本科、广西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点、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1996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伦理学研究所哲学博士后。先后任广西师范学院（南宁）政教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讲师，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广西党刊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现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当代广西杂志社编委会委员、副编审、副研究员、广告经营部主任。兼任广西思维科学学会副会长，广西秘书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

长年研究珠江流域等区域的经济史、商帮史，并由此延贯现实，探索珠江流域等区域贯通古今的经济规律，志以资政，并致力于伦理学与道德生活史、中外科技史与哲学史研究。已出版《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合著）等，发表学术论文、各种文论160多篇。独立承担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青年基金项目“从明清到民国：广东商人与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本著作作为其中主要成果。

## 内 容 提 要

本书分四章论述，在逻辑上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一、二、三章）考察和论述了晚清民国阶段存在的反映入桂粤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关系的“无东不成市”格局。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粤商入桂没有终止反而倍增，人口规模不断繁衍、扩大；粤商在广西城镇经济中始终保持着主导地位，始终是城镇经济基本行业的主要创建者和经营者，这些行业在整个广西城镇经济行业中具有核心的地位；粤商由东而西递进和东稠西疏的分布规律，规定着广西城镇经济向东倾斜并以东端城市为总中心，呈现出“无市不趋东”的布局结构——综上，作者认为，粤商是广西城镇经济的主要缔造力量。

第二部分（第四章）探讨了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商人与广西城镇经济关系的根源。作者认为，在这一时期，是粤港商品辐射源的形成成为粤港商人的源源入桂奠定了物质基础，而粤港城镇经济行业的充分发展构成了粤商入桂缔造城镇经济基本行业发源的依托；是粤港商品经济巨大的辐射圈规定了广西经济“无东不成市”的格局。总之，粤港商人造就的广西城镇经济所有的市场要素的发育，都是受粤港相应的要素发展支配的——这正是以“无东不成市”为突出特征的粤港商人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关系形成的根源。

本书作者采集和运用大量的原始资料，采取区域经济学研究方法，试图科学地描述探讨晚清民国期间粤港商人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关系并揭示其形成的根源，进而探讨21世纪广西经济发展布局的趋向问题。作者的研究对广西在新时期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铁映

**副主任：**汝 信 江蓝生 陈佳贵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洛林	王家福	王缉思
冯广裕	任继愈	江蓝生
汝 信	刘庆柱	刘树成
李茂生	李铁映	杨 义
何秉孟	邹东涛	余永定
沈家煊	张树相	陈佳贵
陈祖武	武 寅	郝时远
信春鹰	黄宝生	黄浩涛

**总 编 辑：**李茂生

**学术秘书：**冯广裕

# 总 序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已持续了12年。这12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很有意义。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支持文库的出版。新旧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希望包括博士在内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密切关



注、深入研究 21 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离开了时代性,脱离了社会潮流,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就要受到影响。我是鼓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这是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名呢?名,就是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如果没有得到社会、人民的承认,他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价值就在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一旦回答了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你也因此而实现了你的价值。在这方面年轻的博士有很大的优势: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但青年学者要多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博士尤其要很好地向导师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发挥自己的优势,研究重大问题,就有可能出好的成果,实现自己的价值。过去 12 年入选文库的论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什么是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呢?纵观当今世界,无外乎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理论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两大制度的基本看法。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都有很多的研究和论述;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也有过很多研究和论述。面对这些众说纷纭的思潮和学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从基本倾向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治家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当然要向世界、向社会讲清楚,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定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全面的振兴。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

论来解决,让外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但是,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化了以后才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是不行的,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什么教条都不行。把学问、理论当教条,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在21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仍然是两大制度问题:这两大制度的前途、命运如何?资本主义会如何变化?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学者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还是研究社会主义,最终总是要落脚到解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问题。我看中国的未来就是如何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只要能长期稳定,就能长期发展;只要能长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能实现。

什么是21世纪的重大理论问题?我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我们的理论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决不是相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不发展的、僵化的东西都是坚持不住的,也不可能坚持住。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随着实践,随着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也没有包揽一切答案。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更多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是立场,是方法。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科学的

世界观来认识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年轻的社会科学博士们要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在这方面多出精品力作。我们将优先出版这种成果。

李锐性

2001年8月8日于北戴河

## 序 一

中国商人的产生有着数千年甚至更为久远的历史,但是,中国出现以省为地理单元,跨省乃至跨国经营的同籍商帮,则起始于宋代,普遍于明清,盛于晚清民国。这一地理空间性很强的人文现象,意义非同寻常,它标识着中国全国范围并与海内外相关地带相互连动、分工合作的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标识着中国区域市场特有的动力源点、辐射轴心、定型范围、成长节律和发育轴线的形成和发展。深入研究这一现象,具有重大的区域经济规律的发现与认识价值:省域商帮的形成,本身标志着中国封建自然经济进入小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并昭示着商品经济辐射源点形成之所在;商帮的线路,勾勒着相对发达省域各自的经济辐射方向、轴线和大致定型范围等。而把握上述这些规律性元素,并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加以逻辑统合,就可以从一个纵长的时段,清晰地凸显出中国区域经济从各局部到全局的若干客观规律的轨迹和坐标。

我认为,黄滨同志《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一书,不仅是中国地方商帮史、城镇工商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填补了中国近代地方经济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而且在以研究商帮史、城镇史为切入口,探索中国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方面也有较大的突破。该书全面实证了近代粤港商帮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关系及其原因,进而揭示了广西区域经济发育的一个重要规律——“无东不成市”,即没有粤港澳的辐射带动,广西经济就难以较快

地发育成长。地处珠江流域中游和南海西半区的广西,是地处该域中下游和南海东半区的粤港澳区域市场的自然延伸,后者是前者成长、运行的带动主轴。粤港澳辐射因素构成了广西市场发育成长的域外基因。

全书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一,以严格实证探求规律。全书是一个规律推导体系。每一个章节、每个小标题乃至自然段的设置,都在对近代广西“无东不成市”规律进行网络式推导。然而,全书首先是一个恪守史学规范的严格实证体系。作者在撰述过程中,广泛运用晚清民国时期各类旧志、年鉴、期刊、报刊、统计资料和各城镇工商业登记册档案资料、田野考察的口碑、石碑、族谱等原始资料,逐一对广西城镇每个行业、每个市县乃至许多重要圩镇粤港客商的状况、其他商帮状况、城镇经济状况等展开了尽可能详细的考证,每提出一个判断,每作出一个结论,都坚持以充分的、经过证定的科学事实作为支撑,并标明确切的引据出处。实证细密如梳辫子,令人叹服,亦可窥见作者搜集、占有资料付出的巨大工夫。作者对广西“无东不成市”规律的推导,尽量避免过多使用抽象的思辨语言进行逻辑推理,而主要通过实证,一层层还原相关的真实历史场景,从这些场景的客观趋向以及相互间客观存在的自然理序中,逐步推演出广西“无东不成市”规律。

第二,以理论思维驾驭规律实证。严格实证并不意味着作者轻视理论思维工具。通观全书,以理论思维驾驭规律实证恰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首先,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核心观点——广西城镇经济的“无东不成市”,就是运用毛泽东关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性的理论,结合两广实际而提出的。其次,作者大胆运用区域经济学的梯度论、经济地理学、市场学等学科的不少重要的观点和方法,注入课题思维,驾驭浩瀚的史料,如作者运用区域经济学的梯度推移理论、增长极带动理论、点轴发

展理论等,诠释从粤港澳至广西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变化关系,诠释近代广西域内东中西部城镇经济网络“无市不趋东”布局结构的原因;运用经济地理学视角,从海内外相关地带分析广西“无东不成市”格局形成的原因;运用商业经济学知识,阐述对城镇经济行业进行合理分类和经济职能价值分析;运用市场学知识,确定城镇经济中各商帮集团的市场份额及不同地位、作用等等。复次,作者十分注重全书结构的逻辑关系构建。第一章概说人桂粤商并提出广西“无东不成市”这一核心观点;第二章则分七节从城镇主要七大类行业论证粤商与广西城镇经济“无东不成市”的关系;第三章从地理布局上论证“无东不成市”在广西全域的覆盖面对广西城镇网络结构乃至广西经济发展的影响;第四章从海内外相关地理范围对应前三章四个逻辑角度、四个层面,探讨“无东不成市”格局在广西的成因。全书逻辑严谨,环环相扣,层层相因,实证详尽而不陷于烦琐,因素纷繁而归于有序,现象流变面透见本质,从而对广西“无东不成市”规律的阐述达到一定的理性深度。

第三,运用规律,冲破时界,研究当代区域经济问题。以往史学工作者往往止步于历史研究,而不问津于当代事务。作者则始终抱有服务当代、服务决策的强烈意识。总论中,作者用较长篇幅,根据“无东不成市”规律,探讨了当前和今后广西生产力区域布局战略问题,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度割裂了广东、广西之间市场经济联系,以致广西经济发展一度出现重南轻东、重西轻东的偏颇。这些因素,造成了广西有违“无东不成市”规律的区域经济病,本该比较发达的桂东区域反而变得发展滞后,本可以被发达的粤港澳直接带动而获较快发展的广西,仍长期处于全国比较落后的水平。作者据此提出了优先加快东部发展,全速打通粤港澳通道,主动融入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广西发展思路。在这里,史学学术价值转化为现实科学决策的一个重要

参考。

毋庸讳言,作者有些观点还可以进一步商榷,有的问题论述仍显单薄,探究视野还可进一步打开。譬如,可以把广西粤商执掌市场牛耳的“无东不成市”现象与国内同期的长江三角洲商人、与16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商人、与17世纪英国伦敦商人支配许多外地城镇现象等进行适当的比较,这可能会从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对区域经济规律有更好的把握和更令人信服的阐述。当然,任何研究都是不断拓宽的。可喜的是,课题研究已结硕果,新的突破初步实现,新的方法初见成效,新的视角已蔚为大观。相信作者沿此思路深入研究下去,一定会给学术界和决策界带来新的喜悦。我对他充满信心,并寄予厚望。

是为序。

**谭双泉**

2004年10月5日于长沙岳麓山

## 序 二

黄滨同志的《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出版了,这是他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课题的研究成果(结项通知号是00787),该研究拓宽并深化了广西地方史研究乃至珠江流域经济史的研究,是广西地方史研究的一大收获,是作者个人学术生涯中一件标志性的喜事。

面对着厚重的书稿,令我忆起十多年前的往事:那时,作者在广西师范大学就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我让他沿着太平天国起义军在广西进军的路线进行社会历史调查。他回到桂林后的第二天就来到我家,向我诉说他此行的许多兴奋与疑惑——广东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于广西与西江水道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在沿江县份如桂平、贵县、平南、藤县等,过去开商店做生意的几乎全是逆水而上的广东人,而不是本地人?在广西,究竟有多少县份是这种情况?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我为他的敏学深思感到高兴。从那以后,他把广东商人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关系和珠江流域经济史作为主攻方向,从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直至国家课题完成。

这一选题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市场经济重新起步阶段,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重新迈步时期,这样一个涉及对相关地域市场特殊规律作深度研究的选题,不仅对于地方经济史、经济地理史的研究具有拓荒与突破意义,而且对



于规划地方经济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广西区情历史信息价值。然而,资料的零散与匮乏是完成这个选题的最大难点。明清与民国的官修史书、官方统计及文人杂记、学人专著,对商帮问题罕有详载,完成选题所需要的粤商状况的历史细节资料、案例资料,大量的散存于各地方上的工商登记册旧档案、会馆庙宇的石碑、有关人士直接或间接的口述、笔忆和经济专题调研资料中。这就意味着,同样完成一个选题,黄滨同志要完成的工作量要大得多。本着坚定的学术信念,他毅然选择了这一难题。这些年来,为了克服困难,他不仅遍览近代广西、广东等地方史志、期刊、报刊、时人各类经济调研专著及文章,而且不辞辛劳,游历了广西、广东、香港、澳门、湖南、海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尤其跑遍了广西大多数县市。许多时候,他深入到乡镇街圩,寻访古迹,遍查史志,采访老人和文物工作者,采集石碑和口碑,实地勘察地形,通过社会调查方式,终于掌握了大量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细节资料。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部专著不仅是在书斋里爬格子“爬”出来的,更是踏破铁鞋、深入社会“踏”出来的,是黄滨同志不畏艰苦、执著求真的精神写照。

全书的难能可贵之处,更在于作者的思维创新。在整个撰述过程中,作者的思路始终相当缜密、立体交叉而又十分开阔。这是一部广西地方经济史专著,但作者的视野远超出广西,力求从粤港澳乃至环珠江流域各省区、东南亚各国家和地区这样的巨大地理范围来探究两广的地域分工体系和广西“无东不成市”格局的成因;这是一部近代经济史专著,但作者考察时间远超晚清民国,而从上至宋元下至当代800多年的长时段,扫描广西经济发展布局结构的演变轨迹,捕捉广西“无东不成市”格局成形的基因;这是一部研究在广西的粤港商帮之作,但作者同时注视广西本土的桂商,入桂的湘、赣、闽等诸省商帮,对各省商帮业务、入桂的线路、能量、地理分布等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是一部逐行业研究商业

史和城镇经济的专著,但作者始终注重揭示处在不同行业的粤商相互间的分工配置关系,特别是还跨行业地研究了粤港商人与广西农村大量分布的广东农业移民(如客家人、土白话人等)的城乡分工配置关系;这是一部研究历史的专著,却又远超出历史范围,运用从历史归纳出来的规律,对当代广西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正因为全书既是一个严密封闭、有序循环的逻辑系统,又是一个无框无界、多维外张的立体思维空间,作者对许多重要问题的论见,也开辟了新的视角,发掘了新的深度,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如明清时期广西经济布局变构论(经济重心从桂北移到桂东),两广市场地域分工体系形成论,广东粮食基地移转广西论;晚清、民国广西城镇粤港商帮主位论,广西市场货流走向粤港论,广西行业粤港支配论,广西城镇网络广州香港总轴论,广西农村“无东(广东来民)不成农”论,广西侨乡“无东不成侨”论(广西华侨华人主要是广东农业移民向国外的二次转移),广西沿海崛起粤港动力论,海内外“无东不成市”布局的月牙带论(从粤港澳至广西至东南亚),中国区域经济港、沪二元中心论,当代广西“无东不成市”区域经济基本规律论,等等。不管我们是否完全同意这些观点,沿着作者这些论见或者所提出的问题再进一步讨论下去,我们对广西乃至更广泛区域的经济史的学术理解,将会达到一个新的深度。

当然,我认为,本书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一些提法也还值得商榷。譬如,课题研究对象是粤港客商,但在全书中,读者主要看到的还是广东商人的事例,而香港商人、澳门商人的事例虽有但不多,因而书中对香港、澳门与广西区域经济关系的揭示仍显苍白,这可能是作者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对香港、澳门在桂商人资料占有不多,然而,从课题完整的逻辑角度来审视,这毕竟是一个缺憾,也值得作者今后有条件做进一步的弥补工作。毕竟,瑕不掩

瑜,而且对于一项竭诚求真的学术成果而言,其不足本身对科学研究也是一种贡献。

我乐为本书作序。

**钟文典**

2004年10月5日于桂林独秀峰下

# 目 录

序一 .....	谭双泉(1)
序二 .....	钟文典(5)
序论 .....	(1)
<b>第一章 晚清民国时期入桂粤港客商概说</b>	
——“无东不成市”格局总体概观 .....	(8)
第一节 粤港客商入桂的历史起源、近代规模的扩大及其地域、身份来源 .....	(8)
第二节 入桂粤商的基本商业路线回环和业务范围 .....	(14)
第三节 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工商经济中各籍商帮比较概观 .....	(25)
<b>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主要行业的发育</b>	
——“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微观剖证 .....	(43)
第一节 入桂粤商与广西城镇进出口行、经纪行的发育 .....	(43)
第二节 入桂粤商与广西城镇百货行、专项洋货批零行、土洋杂货行的发育 .....	(54)

第三节	入桂粤商与广西城镇农林土特产收购行的发育 .....	(65)
第四节	入桂粤商与广西城镇私营金融行业的发育 .....	(82)
第五节	入桂粤商与广西城镇民族资本主义新式工 矿业的发育 .....	(99)
第六节	入桂粤商与广西城镇商品性手工业的发育 ...	(117)
第七节	入桂粤商与广西城镇新式交通运输行业及 其他行业的发育 .....	(130)

### 第三章 晚清民国时期“无东不成市”格局与广西城镇经济网络“无市不趋东”等级分布体系

#### ——“无东不成市”格局的结构透析 .....

第一节	“无东不成市”在广西的分布面及其梯度 差异 .....	(147)
第二节	“无东不成市”的梯度差异与广西城镇经 济网络“无市不趋东”的等级分布体系 .....	(177)
第三节	城镇经济的等级分布体系的“无市不趋东” 特征对广西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影响 .....	(192)

### 第四章 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关系探源

#### ——海内外相关地域的经济发展梯度推移的 宏观比较环视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时期环广西地区中粤港商品经济 辐射的最强大与粤商商务在桂的主位地位 ...	(206)
第二节	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地区城镇经济行业的相 对充分发展与粤商对广西城镇经济主干行 业的营造 .....	(225)

<b>第三节</b>	<b>粤港轴心辐射的海内外巨大环圈与广西全省性“无东不成市”格局形成的经济地理原因</b>	..... (250)
<b>第四节</b>	<b>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城镇广州—香港在粤港城镇经济网络中的总中心地位与粤商对广西城镇经济“无市不趋东”等级分布体系的铸造</b>	..... (277)
<b>总    论</b>		
	<b>——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历史评价及当代思考</b>	..... (293)
<b>参考文献</b>	.....	(327)
<b>附  作者完成本课题的相关成果索引</b>	.....	(357)
<b>后记</b>	.....	(361)
<b>英文目录</b>	.....	(367)

## 序 论

晚清民国时期（1842—1949）是我国城镇经济发育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在明清封建小商品经济<sup>①</sup> 500 年发展基础上，初步发生从军政型城镇向市场型城镇转化的我国城镇，又在世界近代大工业经济及近代型国际市场的强烈辐射下，显著地加速了城镇经济的发育进程。其最明显的表征为：这一时期，中国广大城镇尽管仍然在经济主体上保持着古典的、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内涵，却也或多或少地兼具了大工业社会和早期现代城市的若干特征和某些气息，缓缓地开始了向现代化城镇转化的行程。广西省区虽然地处边陲，为壮、瑶、苗等少数民族原始聚居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镇聚落规模狭小，甚至 15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都没有出现，但城镇经济的这种进化发育却也没有例外。

不过，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过程确实有着自身的特点。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广西历来属于开发较晚、经济发展梯度较低的区域，自然经济原始，市场的自我发育力微

---

<sup>①</sup> 对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表述，学术界有几种观点：（1）封建自然经济说；（2）封建小农经济说；（3）封建小农商品经济说；（4）封建小商品经济说。笔者采纳第四种说法。笔者认为，此说既反映了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既未脱离封建自然经济母体，又揭示了此前未有的我国商品经济新的突破发展状态；既描述了农村商品经济成分的明显增长，也涵括了城镇工商业资本主义萌芽成分的发育。

弱，城镇经济发育过程的启动并不起自于广西内部，而是来自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经济发展梯度较高的邻近地区广东、香港、澳门（简称粤港——以下同）、湖南、江西的辐射带动，其中又以经济发展梯度水平最高、同时有江海航道与广西直接贯通的粤港地区的辐射带动为主。

宋元以前，广东省也曾是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随着两宋时期开始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宋元时期广东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至明清时期，广东凭借着珠江、韩江三角洲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与中国传统的贸易对象——东南亚各国家和地区最为邻近的区位优势，一跃而崛起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区之一。晚清民国时期，广东与香港、澳门则又凭借其在全国率先开放的口岸地区的优越区位和优越机遇，继续保持着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梯度最高的序位，从而成为环广西的省区中对广西商品经济辐射最为强烈的一个区域。此外，湖南省虽然有灵渠连通广西北部，江西省虽也距广西不远，从江西省稍越湖南省，即可达广西（历史上朝廷影响和中原汉人南移，也多由此路即湘桂走廊进入广西），以至于宋元以前，广西北部一直是全省与外界联系最密切的地区，汉族移民的迁人量最大，人口密度也一直高居于其他地区之上<sup>①</sup>，但是，就地理的天然联系而言，广东与广西才是最为密切的。湘赣两省与广西交通主要依靠灵渠，通过灵渠陡门节节蓄水，一只只浮行小木船进入广西。此外所能依靠的只是一些绕行山间、崎岖不平的狭小旱道，如桂岭古道（潇水—萌诸

---

<sup>①</sup> 参见黄贤林、莫大同主编《广西人口》第二章“历史人口状况”（稿本）。作者对从东汉永和五年（140）到民国34年（1945）广西各地平均人口密度作了比较全面的统计，表明东汉永和五年（140）直至明朝天顺、隆庆年间（1464—1571）的1400年间，广西各地平均人口密度分布规律都是：最大是桂北区，其次或为桂东桂东南或为桂中桂南区，最小是桂西和桂西北区。此后的清代民国时期，广西人口最密集区才转移至桂东南和桂南。



岭—贺水)和龙虎关古道(道县—江永县—龙虎关—恭城河)<sup>①</sup>,它们对广西的渗透一般只限于桂北、桂西北地区。据统计,湘桂铁路通车以前灵渠航运繁盛时,每日也不过来往40只载重量为5吨至7吨的木船,日货运量不过300吨。<sup>②</sup>而从广东进入广西,则有全国第二大航运河西江作为主要通道,而且西江水系渗透了广西绝大部分地区,流域面积在30平方公里以上、具有航道意义的河流有937条,纳入广东西半区巨川西江的就有748条,占广西河流总数的83%以上,其中除了49条汇入贺江经广东封开汇入西江外,其余753条均汇东端城市梧州注入广东西江,进珠江而出南海。<sup>③</sup>而民国17年(1928)梧州关进出广西的船舶每日平均吨数是3566吨<sup>④</sup>,相当于灵渠运输量的12倍。同时,广东还可自广州、香港、澳门诸口岸沿南海岸西行抵今已属广西南部沿海的钦州、廉州、北海等市县。可以说,两广本来就是同一地理单元。

宋元以及在此以前,两广联系反不如湘桂联系密切,其主要原因是在全国封建小商品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广西与外界的联系,主要是北向对中原王朝的行政隶属和经济贡赋的关系,而非地域间的市场联系,两广间西江水路的巨大经济价值尚没能够体现出来。可是,明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全国封建小商品经济较普遍的发展,加之晚清以来世界工业化经济和现代化国际市场对中国强烈辐射的发生,商品经济辐射源地和经济发展高梯度区域在广西东邻的广东省和港澳地区陡然凸成,两广

---

① 覃光荣:《桂岭古道新探》,《贺县修志通讯》1986年第3、4期;龙虎关材料则为笔者1988年2月在平乐、恭城两县访得。

② 引自李炳臻《灵渠的航运》,见广西水利厅主办《广西水利水电科技——水利史志专刊》1986年第3期。

③ 《广西风物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④ 民国22年《广西年鉴》第一回,第528页。

上述同一地理单元的水路网络，遂迅速发展成为广西与外界最主要的商路。这也使明清直至晚清民国时期，广东省区以及整个粤港澳区域成为对广西的经济辐射最为强劲、最为便捷的一个区域。诚如 20 世纪 40 年代张先辰先生在《广西经济地理》中指出的：“广西过去（指 1938 年湘桂铁路通车以前——笔者注）在商业上属于珠江系统，不啻粤港二地之附庸。与长江流域（自然含湘赣二省——笔者注）及中原之隔膜，无殊异国。故广西之商业以及重心，乃在于粤港接近之梧州一带。”<sup>①</sup>这就决定了：明代以后直到晚清民国，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主要是在发达的封建小商品经济和近代大工业经济有所发展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粤港城镇经济突破行政区划界线、向西推移发展的结果。这个过程自然主要是由广东省和港澳的市场媒介人群即粤商移民主动入桂完成的。于是，粤港商人（以下常简称为粤商）与该时期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广西大部分地方，粤商抵达之时，即城镇经济发育之时；粤商推进之处，即城镇经济发展之处；粤商较集中的地方，即城镇经济较发达的地方；而粤商少往之区，即为城镇经济发育微弱之区。粤港客商竟成为实现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主要商人集团力量。以至于晚清民国时期广西民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无东不成市”，意思是没有广东和港澳商人，广西就成不了买卖和市场，当然也就没有城镇经济的发育。

从广西范围观之，广西“无东不成市”的历史进程，是邻近发达省区对广西城镇经济发育总促进过程最主要、最典型的部分。粤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关系问题，是关系到五六百年间广西的城镇经济乃至整个市场经济发育过程总特点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从珠江流域范围观之，则“无东不城市”局面深含着该

---

<sup>①</sup> 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桂林文化供应社民国 30 年版本。

域作为同一地理单元，古而有之并延贯至今的诸多重要的区域经济规律；而从全国范围瞰视，两广地区位处祖国雄鸡状版图的腹地地带，在最小、最集中的地域内浓缩了中国东部沿海、中部沿江、西部山地或高原三大经济梯度地带的所有特征，无论是汉族经济区向少数民族经济区自东而西的空间演变，或是经济发展、城镇发育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自东而西的空间推移，以香港、广州为龙头的“无东不成市”格局，其所内涵的经济发展的梯度转移规律，在全国范围也具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因此，笔者深信，对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商人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关系作系统、翔实、全方位的探索，对其组合的历史场面进行全景式的还原，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

本选题本体上是一个史学命题，但是，经济性移民历来是生产力流动的载体，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商人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经济发展高梯度区域港澳广东的较先进的生产力向着经济发展低梯度省区广西的空间推移问题。问题的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本题研究在必须坚持尽可能严格的史学实证方法的同时，还需要借鉴区域经济学，尤其该学科体系中的梯度发展理论等有价值的视角廓清思路，对核心观点予以理论的阐释。

区域经济学又叫“空间经济学”，它是20世纪50年代，适应国际与各国内部地区分工的深化，并针对当时国家间、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从西方经济学、生产布局学、经济地理学中脱胎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sup>①</sup>经济发展的梯度推移理论是该学科中描述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别以及由低水平地区向高水平地区过渡的空间变化历程，并揭示其基本规律的理论。梯度论的创始人是德国经济地理学家杜能。他提出了著名的“杜能环”论，阐明了农业经济集约化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四周农牧业区逐步

---

<sup>①</sup> 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下降经历多个梯度达到荒野的过程。<sup>①</sup> 德国另一位经济地理学家韦伯则利用等成本线，探究了各类工厂的生产成本在地区间的变化梯度。20世纪5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学者又将美国学者弗农的“工业产生生命四阶段（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循环理论和英国经济地理学家埃斯塔尔的“工业部门的兴旺——停滞——衰退循环”说引入了区域经济学，并与梯度论结合，形成了区域经济学的梯度转移学说，即认为，新兴产业部门大都发源于高梯度地区，高梯度区为了确保自身有限地理空间内产业结构的始终优化和产业部门的创新领先，总是不断地将本域中已趋成熟并呈停滞饱和状或衰退状的产业部门有序地向低梯度地区部分地扩散转移出去，在新域形成新的生产力。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梯度推移论被引入我国总体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其基本点在我国被表述为：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已形成一种经济技术梯度。有梯度就有空间推移。生产力的空间推移，一般是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创造或引进掌握先进的经济、技术，然后逐步依次向处于二级梯度、三级梯度的地区推移，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sup>②</sup>

梯度推移论提出以后，也引起了理论界的争论，主要不同观点有：（1）反梯度推移论。认为低梯度区也可以直接引进采用世界最新经济技术，发挥本地优势，实现超越发展，对高梯度区实现反推移。日本的成功是该论的范例，这对梯度推移论提出了挑战。（2）并存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不会单一地采取某一种形式，而是纯梯度式、纯跳跃式二者混合或三种情形并存。该论试图在梯度论与反梯度论间寻求兼容调和，但是这种均匀的三分

---

① 参见杨吾扬《产业和城市区位导论》（河南大学地理系1985年1月铅印本）。

② 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151页。

图式在现实中仍显然难以解释实际。(3) 梯度推移主导论。该论吸收了并存论的观点,又鲜明地坚持梯度推移主导的立场。指出,第一次产业革命的200年以来,真正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跳跃发展,后来居上的,只有英国、美国、德国、苏联、日本等少数几个国家,从全球范围看,梯度推移还是主要的,反梯度推移现象仅属特例。<sup>①</sup>笔者认为,梯度推移主导论是比较辩证和公正的,它反映了大多数区域经济学者的基本共识:梯度推移理论虽然并非绝对正确,但在总体意义或一般意义上说是正确的。

本书正是从上述理论视角出发,提出近代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主要是粤商推进完成这一基本观点的。本文也将在全文中贯透经济梯度推移发展思路,将广西区内各方位地区和环广西的省区和一些国家,都统一纳入一个相关的经济发展的梯度推移传动序列中,在广东和港澳对桂辐射与湘赣闽诸省对桂辐射的强弱比较中,在粤港商品经济及其商帮对其他省区和国家地区的辐射与对桂辐射的强弱比较中,考察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商人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关系。

本书还涉及市场学、经济地理学、地理学、商业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若干理论范畴和观点思路,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作专门的介绍,待论及具体问题再略作说明。

晚清民国时期,今钦州市、防城港市、北海市属广东省管辖,而不属于广西的范围。但是,从区域经济关系上看,钦、防、北海与广西的一体关系更为密切;从现实来看,这些地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已划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范围。因此,笔者在本书中使用的“广西”概念,指现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的全部地域。书中在首次使用具体地名时,一般采用今名,附注旧名,以方便学术圈内外广大读者。

---

<sup>①</sup> 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

## 第一章

# 晚清民国时期人桂粤港客商概说

### ——“无东不成市”格局总体概观

本章从粤港商人人桂的历史起源、规模扩大、地域来源、基本商路、主要商务及其在广西工商经济中的地位诸方面，探讨晚清民国时期粤商在广西的基本状况。

#### 第一节 粤港客商入桂的历史起源、近代规模的扩大及其地域、身份来源

粤商是明代以后中国最著名的商帮之一。粤商人桂经商，最早可溯至宋代。南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已有关于广东富商人桂购谷米运销广东番禺“以罔市利”<sup>①</sup>的记载。明清时期，粤商人桂达到一个高峰。有材料表明，明代已有粤商成批抵达的县份，有苍梧、藤县、平南、桂平、武宣、贵港市城区（旧称贵县）、北流、横县、南宁、宾阳、崇左市江州区（旧称崇左县）、宁明、龙州、大新、百色、来宾市迁江镇（时称迁江县）、融水、融安县、平乐等。其中，在平乐府城，粤商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创立的粤东会馆<sup>②</sup>，是广西最早的

①（宋）周去非：《岭外代答·风土门·常平》。

② 乾隆三十五年《重修粤东会馆天后官并鼎建戏台碑房》，碑立平乐县文物管理所（粤东会馆旧址）。

粵商同乡会组织。它的出现，标志着粵商人桂定居人口已经形成规模。清代粵商人桂更盛。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来看，广西确有粵东会馆的县份有 60 多个。在稍微繁华和规模稍大一些的圩镇，入桂粵商一般都建有粵东会馆，全广西曾经建的粵馆至少有 100 余座，大多为清代所建立。<sup>①</sup>

到晚清民国时期，随着以世界大工业经济为基础的国际市场辐射的不断增强和西江、南海航运轮电化的逐渐实现，粵商更以前代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涌入广西。典型如广西门户城市梧州，该市 1899 年开埠以后第二年即 1900 年，旅客出入口数为 61716 人次，平均每日 160 人次，比 1899 年增长了 60%。其原因是“今年新开内江，而各江可于各处搭客”，且“于贸易有益”。开埠第十一年（1910），该数又增加到 198534 人次，尤以广州、三水客来梧最多<sup>②</sup>，为刚开埠的 1899 年 37030 人次的 5.36 倍。以梧州作为粵商进出广西的内河总出入口地位，这可以理解为，至晚清，粵商人桂的规模较之明清时期至少扩大了 5.36 倍。广西其他城镇同样出现上述情形。例如：在桂平，“广东商人到桂平来，光绪以后就更多了”；在贵港市，“民国以后广东来贵县经商和贵县人去广东跑生意的越来越多”。抗战后，由于广州、香港相继失守，贵县商业大受影响，粵商商号势力大减，但是抗战胜利后，又还复常态，商业经济规模复归庞大，手工业也有所发展，“广东旅居人口也大大增多了”<sup>③</sup>。在桂中的象州，晚清民国“近数十年年来”，粤、湘及广西浔梧玉各地“移入象境者”，“日见增多，其由广东来者，大都经营商业”<sup>④</sup>。在桂西南边关重

① 综合各旧志、各县文史资料、采访资料小计和推估。

② 司政宗：《梧州开埠前后的经济贸易》，《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11 辑。

③ 贵港市政协编：《贵港文史资料》第 18 辑，第 189 页（本书引用文史资料类均由当地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编印发行，以下均省略编者）。

④ 民国 37 年《象县志》第二编，社会。

镇龙州，光绪中叶，粤商随清政府抗法大军“衔尾而来”，至1889年龙州开埠，“粤商遂争相投资”，使龙州“始成巨埠”。<sup>①</sup>在桂北区的融水镇，虽然粤商的渗入始于明清，但为数众多地涌人，则是在同治、光绪年（1862—1908）以后。<sup>②</sup>地处极边、形势险要、交通多阻的桂西山区，粤商更是在近代以后才较多进入的，如“都安之纱纸起源甚早，然粤港商人来此设庄收买者则为清季事”<sup>③</sup>。位于沿海南部的广西最早开放的城市北海，1876年被辟为口岸后，首先大量吸引入驻的客商，绝大多数就是广（州）府商人。<sup>④</sup>可以说，北海在近代迅速崛起为广西仅次于梧州的第二大城市，就是粤商人桂规模扩大的产物。由上可证，近代广西大部分地区的城镇之中，粤商继明清人桂高峰之后仍继续涌入，人数规模不断扩大、倍增，是十分普遍的情形。

近代人桂粤商的地域来源大致有五。（1）广东珠江三角洲（以下简称珠三角）地带各市县。笔者目前掌握数以千计的人桂粤商事例，其绝大多数籍贯都是珠三角各市县的，其具体地理范围包括：广州市及属下的番禺、花县、从化、增城等县；佛山市及属下的中山、三水、顺德、高明等县；江门市及属下的新会、恩平、开平、台山、鹤山等县；今珠海市及属下的斗门县；惠州地区的惠州市及东莞、博罗、惠阳等县；肇庆地区肇庆市、高要、四会等县；今深圳市属的宝安县、韶关市属的清远县，共29个县市，幅员35700平方公里的区域，即所谓“大珠三角”地带。<sup>⑤</sup>如1941—1949年，苍梧县西药、经纪、采运、食糖业

① 民国16年《龙州县志》舆地志（下）“实业”，民国25年铅印本。

② 《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③ 刘炳新：《都隆那纱纸工业》，（民国）广西统计局《统计月报》第1—8期合订本。

④ 光绪八年《北海杂录》商务。

⑤ 参阅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圩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同业公会注册会员 137 名，明确登记籍贯属上述 29 县市的有 102 名，占总会员人数的 74%。<sup>①</sup> 其他各区的粤商也多是珠江三角洲商人，如合浦廉州的粤商多为广州府籍<sup>②</sup>；百色粤商许多为新会、南海籍<sup>③</sup>；龙州粤商许多为顺德、三水籍<sup>④</sup>。很显然，珠江三角洲商人构成了入桂粤商中的主要帮系。（2）香港、澳门地区。港、澳实际上也属珠江三角洲精华地带，两埠商人实际上也多是珠三角各县人，但两埠分别为英国、葡萄牙殖民主义国家所直接控制的国际港市，港澳华商多有洋行势力作为直接背景，其运作与内地珠江三角洲商人有所不同，因而单列为一系。广西许多城镇圩市都有港、澳商号或联号。如 1815—1895 年间，垄断了北海和港澳之间海运业的大型头镗船队，就是澳门航商组织经营的。<sup>⑤</sup> 又如港商还在百色设有牛皮收购庄。<sup>⑥</sup> 贺县锡矿也颇多港商投资开掘。<sup>⑦</sup> 20 世纪 30 年代，都安最著名的纱纸庄就是香港庄主黄益诚、广和祥、宁泰、裕泰等商号。<sup>⑧</sup> 港澳商人在桂绝对人数虽然不多，但其经济能量格外突出，往往是粤帮商人中的佼佼者。（3）广东梅县、兴宁等粤东北、粤东客家人聚居区。在珠三角商人的强力垄断下，虽然客家商人在桂东、桂东南势力

---

① 民国 30—38 年《苍梧县西药、经纪、采运、食糖同业公会会员注册登记表》。

② 北海市合浦县西场镇咸丰年间建有广州会馆，馆址尚存，笔者 1992 年 10 月实地访得。

③ 百色市志办纂修：《百色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79—881 页。

④ 民国 35 年《龙津县志》第九编，文化，1960 年广西档案馆铅印本。

⑤ 黄铮主编：《广西对外开放港口》，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5—46 页。

⑥ 《百色县志》（初稿）上册，第四章“交通和城镇”。（1960 年油印本）

⑦ 八步镇志办纂修《八步镇志》第八章，商业，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⑧ 刘炳新：《都隆那纱纸工业》，（民国）广西统计局《统计月报》第 1—8 期合订本。

不显，但是在广西一些珠商势力递减的边远区城镇仍特显活跃，如清末的思陵、思乐土州（今属宁明县），自嘉应州（今梅县一带）等地抵居的客家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移家到此，经营工商农业”<sup>①</sup>。又如，客家人黄氏于同治年间（1862—1874）从广东嘉应州迁移到广西宜山怀远镇经商，后来人丁兴旺，子孙脉分到柳城、忻城经商。<sup>②</sup>（4）邻近广西的粤西地区如罗定、封川、高州等县。“罗定客”在广西是颇负名气的百货商帮，据民国24年（1925）《罗定县志》记载：该县“计在广西各埠营工商者约四万人”。高州人亦颇多人桂营生，如贵县石卡镇颇多高州客经商，该镇人因此有“高州仔”的绰号。<sup>③</sup>近代崛起的北海市，也有高州会馆之设。当然，粤西毕竟属广东省开发较晚的落后地区，限于经济实力，该域人桂商人数量和能量远不能与珠三角商人相比。（5）潮汕地区和粤商颇多侨居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如1942年成立的柳州光裕银行和华侨联合银行，就分别由潮州商人黄氏和新加坡粤籍侨商所开设经营。<sup>④</sup>虽然潮汕商帮、粤籍侨商经济实力很强，但由于原居地与广西地理距离远，其人桂规模、能量也不能与前述四个帮系的粤商相比。综上考究，人桂粤商大致有包括广东南部、东北部、西部、东部及海外辐射圈地区的五个帮系。从广东范围看，其人桂势力的强弱与广东港澳地区经济发展的梯度分布相应：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珠三角和港澳二系的商帮辐射力最强，因而构成了人桂粤商中主要的或核心的帮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其他地区四系粤商，则一般都居于从属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商人补充和附从的地位，他们之间人桂势力的强弱对比，一般由原籍所在地点与广西交通距离而定。

① 民国37年《思乐县志》卷4，社会篇。

② 黄嘉猷主编：《江夏黄姓族谱》，1993年5月修。

③ 林天勇：《关于家乡石卡乡福龙村的经济史调查》（手稿）。

④ 《柳州市金融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人桂粤商的人员来源大致有以下四种。(1) 明清人桂粤商的后裔。明清时期粤商人桂定居，抽资返乡情况是不多的，大都在广西生息繁衍，世袭营生，并始终鲜明地保持和强调自身的粤省祖籍，例如晚清贵县四大富商之一林氏家族。祖先林仕经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携长子林世昌，从广东省番禺县五凤乡抵达贵县的，后来昌世娶当地李氏为妻，生大桢、大杼、大昌三子，其后代又有十余人之多，其中大杼生有八子，这些子孙继续经营林宝昌号，直到咸丰初年。其中“大杼的儿子分家时都各得七八间铺子”<sup>①</sup>，继续营业，137年间林家人口增长了七八倍。由此可推知到近代，明清人桂的粤商按人口基数，以10倍增长不成问题。(2) 晚清以来在广东、香港、澳门事商事工有年的粤商。他们沿明清粤商人桂的商路，以更大规模，继续推进，源源涌入，纷纷定居，为数众多，情形如前文对近代粤商人桂规模扩大的引证。(3) 粤籍商业从业人员。人桂粤商商店或企业的老板一般都乐于援用同族、同乡为商店或企业的经理、掌柜、伙计、学徒，这些从业人员在历经数年，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储蓄、经营经验和社交关系之后，往往在东家的关照下独立开业，由从业人员转化为新的广东老板。如南海人易发生，18岁那年抵达贵县，先在粤商平码行店号当学徒，干杂活，三年满师，就与侯姓老板同做水面行，后来又独立开设“新昌隆百货店”。<sup>②</sup>这种从业人员转化为老板的情形，在广西粤商中相当普遍，所占比例很高。(4) 广东各县农民。近代广东部分农业人口流入广西，转业从事贩运，成为专业商人。如梧州著名粤商梁颂塘，原为广东鹤山县一贫苦农民，光绪年间来梧州先入某号打杂，后搭帮走

---

<sup>①</sup> 饶任坤、陈仁华主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8、41页。

<sup>②</sup> 广西通志馆档案，卷965。

私鸦片，获取暴利，以后又投资银行、经纪、航运等业，逐渐发展成为当时梧州最大的资本家。<sup>①</sup> 该部分人在入桂粤商中为数颇多。

粤商人桂的悠久历史起源，反映了粤港商人近代入桂具有深厚的历史累积基础和强大的历史连贯性；其近代入桂规模的扩大，则反映了晚清民国粤港商品经济对广西空间推移力度较之前代又显著加大的发展趋势；入桂粤商以珠三角为核心、以港穗澳为轴心的广布全省的地域来源，体现了广东经济对桂辐射呈全省性放射而又以珠三角港穗澳门口岸为总中心的总体格局；而粤商人员身份的多种来源，既反映了粤港对桂辐射进程的历史衔接，也反映了这一辐射源点广泛、因素多元、立体连动的态势。所有这些情形，都蕴含着这样一个预示，晚清民国粤港商人对广西的辐射推进虽然迢迢千里，离乡背井，却将是高能量、全方位和多层次的，他们必然是推动近代广西市场整体发育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 第二节 入桂粤商的基本商业路线回环和业务内容

### 一 入桂粤商的基本商业线路回环

晚清民国时期入桂粤商的基本商业线路是一个以江海航道为纽带，以由东而西为走向，连贯两广地域的回环系统。

商路的起点是以香港、广州、澳门为起端的珠江三角洲地带，这也正是入桂粤商以珠江三角洲商人为主要帮系并颇多港澳客商的基本原因。粤西商帮出发点内含在从珠三角至广西区的中段，其入桂商路自然包含在以珠三角为起点抵广西的商路网络之

---

<sup>①</sup> 侯雅云：《从“四大富商”盛衰看梧州的资产阶级》，《梧州史志》1986年经济资料专辑。

中。粤东、粤东北客家区和潮汕地区，并不位于由粤入桂商路的起点和中经地区，这些地区对广西的经济辐射，需要借助或中经珠三角与广西间的商业孔道，因此，入桂的客家和潮汕商人，在商业上主要是通过挤人和附着珠三角商人的业务行列渗入广西的，他们从商业上入桂的地理起点实际上也是珠江三角洲地带，起点的城镇口岸标志同样也是香港和广州。

人桂粤商商路在广西范围内的终端点，一直顶推至广西省界地带城镇。试看几处代表点：——在桂东北的桂湘边界带，宣统年间粤商在灌阳县文市建立粤东会馆<sup>①</sup>；在桂北的桂湘边界带，三江的古宜市<sup>②</sup>、龙胜的瓢里镇<sup>③</sup>，大商人多为粤商；在桂西北的桂黔边界带，南丹县的月里街民国时期有较固定的商家26户，其中有3户粤商<sup>④</sup>；在滇黔桂三省交界的广西“省尾”地带，西林县那劳街民国年间时（1911—1949）有粤商深入贩运；<sup>⑤</sup>在与云南省和越南国交界的桂西城镇那坡县平孟街，汉人尽操粤语<sup>⑥</sup>，商人当多为粤商；在桂西南与越南国交界的龙州，中法战争期间，“出现一些大商家，多半从广东来”<sup>⑦</sup>；在广西沿海西端与越南国交界的东兴镇，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广州客商颇多前往购物。<sup>⑧</sup>以上七个城镇的连线，正是广西省界的西半弧和北半弧，这说明，入桂粤商的商路，从珠三角一直延绵贯透广西全境

① 陆世旭：《家乡灌阳县社会经济史调查》（手稿）。

② 民国35年《三江县志》卷4，经济。

③ 1988年2月笔者到龙胜县瓢里镇调查，据解放前曾任街长、时年78岁的李韬口述笔录。

④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

⑤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页。

⑥ 编辑组整理：《那坡县民族的来源》，《那坡县文史资料》第1辑。

⑦ 广西通志馆编：《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6页。

⑧ 《东兴县地方百年史》，引自庞智声《广西商业史料》（广西商业厅铅印本）。

几乎所有城镇，直至省界地带为终端。

粤商入桂几乎全部是走江海水路的。根据两广间水道网况，分别将广州、香港与上述七个具有粤商入桂商路终端标志意义的广西城镇之间的商路一程程接起来，加以总体俯视，我们就可以大致勾勒出桂粤商商业线路回环的基本图景——

从穗港（广州、香港）抵文市：从穗港溯西江掠肇庆上梧州，由梧州溯桂江掠平乐、阳朔等县上桂林，再由桂林溯漓江掠灵川、兴安，折灌阳而入抵文市。

从穗港抵三江、龙胜：从穗港溯西江掠肇庆上梧州，由梧州溯浔江黔江柳江，掠藤县、平南、桂平、象州等四县抵柳州，由柳江溯融江北上掠柳城、融水、融安抵三江，再折溯寻江到达龙胜县瓢里街及县城。

从穗港抵南丹县月里街：从穗港出发溯西江掠肇庆上梧州，由梧州溯浔江、黔江、柳江掠藤县、平南、桂平、象州抵柳州，由柳州经龙江掠宜山抵河池，由河池朝西北向陆行到达南丹及月里街。

从穗港抵西林县那劳街：从穗港溯西江掠肇庆上梧州，由梧州溯浔江、郁江、邕江掠藤县、平南、桂平、贵港市城区、横县、邕宁抵南宁，从南宁溯右江掠隆安、平果、田东、田阳抵百色，由百色溯右江进田林县定安圩，再由定安溯驮娘江孔道入西林县那劳街。

从穗港抵那坡县平孟街：从穗港溯西江掠肇庆上梧州，由梧州溯浔、郁、邕诸江掠藤县、平南、桂平、贵港市城区、横县、邕宁县抵南宁，从南宁溯左江掠扶绥、崇左市江州、大新、靖西等县入平孟河抵那坡平孟街。

从穗港抵龙州县：从穗港出发溯西江掠肇庆上梧州，由梧州溯浔、郁、邕诸江掠藤县、平南、桂平、贵港市城区、横县、邕宁抵南宁，再由南宁溯左江掠扶绥、崇左等县抵龙州；另一路则

为海路，从穗港航海西行抵湛江湾，环雷州半岛航行，过琼州海峡抵广西北海，再经上思的平福，从明江抵达龙州。<sup>①</sup>

从穗港抵防城县东兴：从穗港航海西行抵湛江湾，环雷州半岛航行，过琼州海峡抵广西北海，再沿钦州湾海岸西行抵达东兴。

总观从穗港到七个广西边界城镇的商路，我们可知：入桂粤商商路总发于广州、香港，分支终于西、北弧广西省界，其覆盖面包括广东西半个省区和广西整个省区，西江水系水网和南海沿岸带状海路（可以简称为“一江一带”）是商路的市场传动主轴或主神经。在这一地域的商业业务伸缩范围内，粤商从穗港及珠三角区出发，一程程接力式地推进广西边地城镇，然后又一程程接力式地逆向回流，返归穗港。东往西复，不断穿梭，组成入桂粤商特有的、相对稳定的商业线路回环。

当然，就粤商本身商路而言，西北向边际带不仅限于广西地界西、北弧，而实际上依托在桂商路又一直可达滇南、黔东南。如民国时期昆明市形成了一条长约一华里以广州骑楼为建筑物特征的“广东街”<sup>②</sup>，现列为昆明市的文物保护单位。但是，这已不属于入桂粤商商路的范围，笔者在本书第四章探究粤商总辐射圈时将讨论这个问题。

## 二 入桂粤商的基本商务内容

晚清民国时期，入桂粤商的基本商务内容是在上述的商路系统内，推销从广东、香港等进口的欧美日本等国家、地区的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产品，沪穗等地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

---

<sup>①</sup> 广西通志馆编：《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6页。

<sup>②</sup> 1992年8月笔者在云南省昆明市实地考察所得，现广东骑楼一条街风格尚保持完好。

品，广东的渔盐产品和仍然相当广泛存在的传统手工业产品，收购并向广东省内、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推销广西的或由湘滇黔省中经广西的农副林特矿等诸业产品。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大类：

第一，输入商品业务类。它包括国内外来货的预订、进购、批发、门市或走贩零售等环节。这是粤商人桂具有先导地位的业务。粤商进入广西，首先要凭这项业务，开拓立足的市场空间，赢取和积累进一步扩大业务的发展资金，树立广西当地人民认可并乐于长期与之交易的社会形象。就其商品输入内容看也可以分为三类：（1）输入外国大工业产品。明清时期入桂粤商向广西输入的，主要是当时广东发达的手工业、盐业、渔业的产品。<sup>①</sup>近代以来，在外国工业品潮水般涌入中国国门的情势下，粤商向广西输出的主要商品自然很快变为外国工业品，诸如棉纱、棉布、燃料、面粉、白糖、纸烟、火柴、剪口铁、汽车等<sup>②</sup>，俗称“洋货”。尤其是广州成为中国最早开放的五口之一，香港迅速崛起为中国最大的国际转口贸易口岸，更使粤商较之中国任何一地商帮与“洋货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外国工业品是粤商在桂推进的最主要的拳头产品。在民国元年至20年（1911—1931）实际上主要由粤商完成的梧州、南宁、龙州三关的进口贸易中，洋货始终占总货值的绝大多数比重。例如1919年三关进口货值为15755866海关两，洋货值为12479179海关两，占总货值的79%强。<sup>③</sup>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先生曾在20世纪30年代指出这种情形：“广东为华洋通商之发祥地。五口通商以前，华洋贸易仅限于广州一口，五口通商以后，华洋贸易仍大部分掌握于

---

① 参见拙作《明清时期粤商入桂与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1期。

② 民国22年《广西年鉴》第一回，第383—394页。

③ 同上书，第383—384页。



粤商手……故凡洋货势力到达之处，亦即广东商业资本发展之地。广西以地理关系，近水楼台，更为粤人商业势力所深入。粤商因此而得洋广商的绰号。”<sup>①</sup>（2）输入国货。大约从19世纪90年代起，在粤商输桂的工业品中也有了一小部分是沿海地区如上海、广州等地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品，通称为国货。如民国22年贵港市（贵县）几家粤商经营的最大纱布店德丰号、恒昌号等经销的棉纱布匹都是上海国产货，布料以国产的大灰布、大成布最好销，除在县内销售以外，还远销横县、永淳、宾阳等地，棉纱、布匹分别年销毫银120万元和70万元。<sup>②</sup>有时，国货输入比重还超过洋货，如陈济棠主粤的1929—1936年间，北海市以粤商为主营的洋货输入仅1496万元（洋银），而国货输入则多达2085万元（洋银）。<sup>③</sup>（3）广东等省若干传统的手工业、农副业产品和渔盐产品。明清时期，该类商品曾为粤商营运入桂的主要商品，近代以降，洋货取代了其主商品地位之后，它却始终仍是粤商输桂的重要商品。例如，手工业产品佛山土布一直到1938年以前，在广西经济较发达的贵县（今贵港市城区）仍然很有市场，1938年以后才被上海、无锡机绢布逐渐取代。广东的海域、渔盐产品历为明清时期粤商输桂的大宗商品之一，至近代，此类商品也具有外国工业品的不可替代性，随着广西、云南、贵州、湖南的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逐渐提高，此类商品经粤商运销入桂、过桂总量有增无减，始终为日用品大宗，也为粤商势力推进的拳头产品之一。如1933年，主要由粤商控制的重要盐埠梧州，向广西各地年销海盐70万担<sup>④</sup>，计7000万

① 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第21、239页。

② 梁澜贵：《贵县棉布销售史话》，《贵港文史资料》第17辑，第159页。

③ 李志金：《陈济棠主粤时期北海外贸统计表》（1929—1936年），《北海文史资料》第5辑。

④ 庞智声：《广西商业史料》（广西商业厅铅印本），第277页。

斤之巨。又如海味，民国 21 年，粤商输桂的海产品价值达 80.09 万元，占大宗货物进口总值的 2.1%。<sup>①</sup>

第二，商品收购、输出业务类。该类业务包括预订、组织生产、收购、转手、外销乃至出口诸环节。这也是粤商人桂的主要商务之一，属人桂粤商的返归型业务，与前述输入商品类业务共同组合成走向对流、前后连贯、不断循环的完整的商业回环。就人桂粤商收购、组织输出的商品内容而言，大体上可分为六类：（1）谷米粮食。明清时期广西即已形成商品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最重要的商品粮供应基地。据吴承明先生研究，清代广西向广东输出谷米每年多达 180 万石至 200 万石。占各省资粵米粮之最。<sup>②</sup>晚清民国时期，虽然暹罗（泰国）、安南（越南）诸国“洋米”大量涌粤而使桂米济粵总量不断减小，但是，直到 1920 年以前，广西各县每年经粤商收购向广东都城、德庆、禅城、禄步、广利、三水、西南、鹤山、九江、江门、佛山、广州、顺德和香港等地销出的大米，仍然多达三四百万石。<sup>③</sup>而且，一部分湘米也过桂入粤。（2）农副业种养产品。一是农村经济作物种植及加工产品。如苧麻，除各县农民用来织纱纺线、织造蚊帐夏布等消耗之外，“每年输往广东香港等地万余担，以平乐为最大集散地，由（省港）麻商定购打捆转销梧州出口”<sup>④</sup>。又如糖和花生油。广西历为油、糖产区，明清时期粤商即已开始广西桂平收购油糖，大宗销往广东。<sup>⑤</sup>近代以来，这类商品经粤商营销

---

① 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 1946 年印行，第 239 页。

② 引自罗宜新《清代前期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学术研究》（广州）1991 年第 2 期。

③ 孔繁琨：《广西谷米运销》，广西省政府 1936 年印行。

④ 国民政府财政部贸委会湘桂办：《广西外销农产》，《农报》1943 年 4 月 8 卷 7—12 期。

⑤ 饶任坤、陈仁华主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1 页。

出口和转口的数量更大，如 1933 年主要由粤商营销的“糖多集中梧州运港粤，转销华北各地，计销天津、宁波、上海、青岛等处年约三百五十万斤，销粤约一百万斤”<sup>①</sup>。二是牲畜及禽副产品，即牛、猪、鸡、鸭及副产品和牛皮、猪鬃等之属。以生猪为例，上个世纪 30 年代，粤港商人在贵县各城墟多设猪庄，收购生猪。<sup>②</sup> 玉林五属的生猪则在粤商营销下，过船埠顺南流江出海抵北海出口，上个世纪 30 年代以前一度多达年 1 万余头，一部分经北流经藤江往梧州向粤港出口。<sup>③</sup> 1942 年全广西向广州、香港出口生猪 30 多万头<sup>④</sup>，在广东市场上地位特殊，“广州、香港盛制腊味装包外埠者，则多用西江猪只，因其较肥，故也”。广西外销的生鸡、生鸭及牛皮、猪鬃等副产品也主要由港粤客商扯销。<sup>⑤</sup>（3）林业及林地产品。木材：如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粤商大量进入桂北林区县份融水、三江一带，组织生产和收购杉木，经柳州、梧州销出广东。<sup>⑥</sup> 在民国 22 年的梧州，“出香港之木多由客商来梧自办”<sup>⑦</sup>。八角及茴油：广西为世界“八角之乡”，尤其田阳、凭祥、德保、龙州、宁明盛产八角。道光年以前，土著居民所生产或采集的八角是全部“售于粤商”<sup>⑧</sup>的，至近代，海内外对八角的需求量增大，居于贸易中转地位的粤商当然仍是广西八角最重要的收购商和外销商。桂皮、桂油：广西浔江流域苍梧、岑溪、容县、平南、桂平是世界上肉桂的主要产区，桂东南的粤商自然也将该类产品的收购与外

① 潘载生：《广西大宗出口贸易调查》，民国 22 年 12 月。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民国 22 年《广西年鉴》第三回。

⑤ 潘载生：《广西大宗出口贸易调查》，民国 22 年 12 月。

⑥ 《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 页。

⑦ 潘载生：《广西大宗出口贸易调查》，民国 22 年 12 月。

⑧ 同上。

销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商业业务之一。因此，以粤商人桂营销为主，广西1933年向省港出口的桂皮、桂油3万市担和500市担，均占总产量的绝大部分。桂皮供应省港转国内各地作为中药材，桂油则供应香港转欧美作为制造香水和香粉的原料。<sup>①</sup>其他林业林地特产，粤商也多参与收购和外销。如1937年约占广西出口总值23.5%的桐油<sup>②</sup>，产区广布70余县的茶油<sup>③</sup>，名贵药材特产田七、五倍子、云耳<sup>④</sup>等，在广西出口货中颇为大宗的柴炭<sup>⑤</sup>等，也都走粤商商路。这类商品，或者集中梧州销往香港和广东各埠，进而转销国际市场；或者南下北海，直销国际市场，从海路销往广州、香港再转销国内外市场。（4）矿业产品。20世纪30年代中叶，“锡都”八步的纯锡，几乎全是由粤、港、侨商包揽运输香港的。<sup>⑥</sup>可以说，广西主要物产只要是广东和香港线的，其购运活动都无不有粤商的卷入，他们完成了桂产销粤的过程，并利用地区悬殊差价，获取了高额的商业利润。

第三，上述两类业务的伴生、派生业务类。晚清民国时期，由于上述两大类主要商务是在人桂粤商商路跨距数千里的巨大的地理范围中对流进行的，于是，创造条件使这种对流的地理阻隔系数最小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本身又成为了十分有利可图的经济行为和商务经营活动。因此，这类伴生和派生的商务，构成了人桂粤商商务的第三部分内容，大致又可作出以下的划分：

---

① 潘载生：《广西大宗出口贸易调查》，民国22年12月。

② 国民政府财政部贸委会湘桂办：《广西外销农产》，《农报》1943年4月8卷7—12期。

③ 陈正祥：《广西地理》，正中书局1946年版，第77—79页。

④ 民国27年《田阳县志》（稿本），经济。

⑤ 国民政府财政部贸委会湘桂办：《广西外销农产》，《农报》1943年4月8卷7—12期。

⑥ 八步镇志办纂修《八步镇志》。

(1) 经纪商。<sup>①</sup> 经纪商是代理中间商的一种类型。经纪人并不拥有商品的所有权而只替买方或卖方洽谈、拢交易，价格和销售条件由委托人自己规定。经纪人在达成交易后获取一定的佣金。许多人桂粤商十分热衷于经营这种中介生意，如清末民国的柳州，广东帮的经纪商就包揽了从长安至广州这一柳州主商脉的所有客路生意<sup>②</sup>，业务量巨大。(2) 资金融通业务。各种商务开展以及消费者、生产者为维持生活、生产的顺畅周转，需要在不同地域之间尤其两广之间不断进行资金上的融通、调剂、流动，于是，从事资金的储蓄、贷放、汇兑、结算、典质，也成为十分有利可图而粤商乐而为之的重要业务。因此，晚清民国的广西，粤商开银号、典当、银楼、银行的例子屡见不鲜。(3) 交通运输业务。货流与人流的空间转移需要通过交通运输业务才能得以实现。为购销活动组织交通服务，同样是业务量巨大、利润稳定、粤商乐而为之的生意，还在明清时期，粤商就组织木质货船入桂平江口等城镇大宗扯运花生油<sup>③</sup>，到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粤商则纷纷购置轮船、电船、汽船投入江海的客货运输。如1908年，梧州粤商梁颂唐等人发起组建“西江航业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中型水筏两座，置有客货电轮七艘，从事西江航道水运。<sup>④</sup> 随着公路事业的发展，部分粤商还购置汽车投入陆地运输。(4) 加工服务和加工进出口业务。购销两大类业务的发展，还刺激了加工业务的出现。粤商纷纷投资该业，通过以传统手工业或者新式的机器工业形式对进出口的原料性产品进行加工，减少进出口商品无用附带物从中分取前述两大类商务对流过程中的部分利润。例如民

---

① 许凤岐主编：《市场学词典》，江西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第18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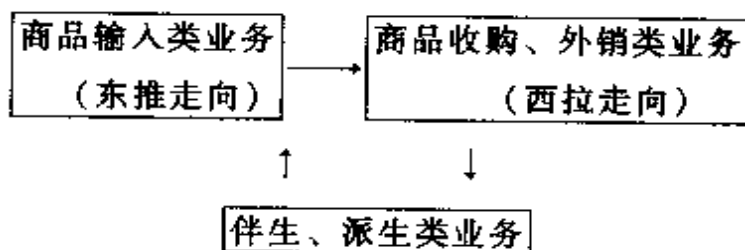
② 柳州市人民政府：《调查研究》第二期（工商调查专辑），1950年7月。

③ 参阅饶任坤、陈仁华主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④ 张子良：《西江航运替史沿革资料》（油印本）。

国时期，贵港市城区有不少原先是专事收购、运销谷米的粤商，如朱其辉、罗尔康、马光达等，他们看到该地传统的人工碾米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粮米大宗输粤的需求，经营机器碾米有利可图，于是纷纷从广州购进新式机器碾米设备，开设机器碾米厂，既促进了贵县大米的输出，又获取了丰厚的利润。<sup>①</sup>（5）其他业务，即前述两大类业务伴生和派生的饮食餐旅、文化娱乐、房地产和建筑等诸多业务。许多粤商投入此类业务的经营，如民国时梧州、北海、南宁、贵港市城区（时称贵县）等地较大的茶楼酒家多是广东人所开办、经营。由于这里的来客多属粤客，粤港风味的酒家饭店生意十分红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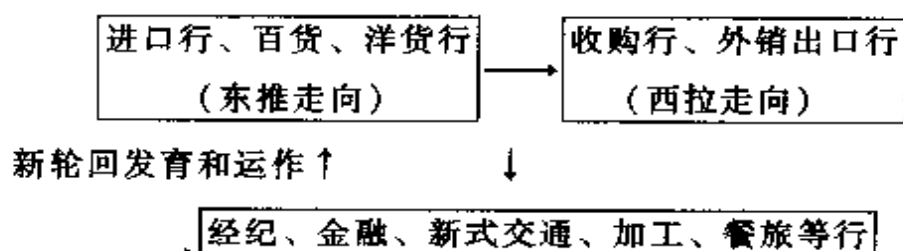
人桂粤商上述三大类商务内容，构成了一组有序循环的、完整的商业动态回环：粤港商品输入是第一程序业务，方向是东西推进的；桂产购运输粤则是第二程序业务，方向是西东拉出的；经纪金融运输加工餐旅等则为第三程序业务，既是前两程序业务伴生或派生的业务，又促进着下一轮次第一、第二程序业务的发展，周而复始，依序循环，以至无穷。人桂粤商商务动态链条简如图示：



正是在这样的商务循环动态中，粤商在广西城镇建立起了自己的经济行业系统：第一程序业务形成了进口行、百货行、专项洋货批发零售行；第二程序业务形成了农副林土特产收购和出口行业；第三程序业务则形成了中介经纪行（又称平码行）、金融

<sup>①</sup> 区础超：《贵县米机行业话沧桑》，《贵县文史资料》第7辑。

行系的银号行、典当行、新式银行、新式交通运输行、新老式加工采掘的工矿业以及餐旅服务、文化娱乐、房地产建筑等行业。而与前述业务程序动态循环序列相一致，粤商在广西建立起的经济行业发育和运作的链条是：进口行和百货、洋货批零行率先发育和启动运转，紧接着是桂产收购行和外销出口行的次第发育和承接运作，再接着是经纪、金融、运输、加工、餐旅等行业的相伴发育及配置运作。在地理上呈现的总方向也是：自东而西、东推西拉，在完成一个链圈后，又循环进入下一轮的发育和运作。晚清民国人桂粤商在城镇的行业系统动态简图示意如下：



综上探微，晚清民国时期，人桂粤商在自身特定的商业线路中回环，在自身特定的商务动态中循环，在自身客居的广西城镇，营造起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属于自身的、由诸多行业组合成的经济行业系统。这一系统，作为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经济行业总系统中的一部分，具有特别突出的重要地位。

### 第三节 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工商 经济中各籍商帮比较概观

在晚清民国时期，组成广西城镇工商经济系统商帮群体的，有粤港商帮、广西本地商帮、湖南省商帮、江西省商帮、福建省商帮，云南省商帮等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次要的还有湖北省商帮、浙江省商帮等。各帮的商业线路回环，商务、行业系统各有自

身相对不同的种类和地理伸缩范围。但是，从总体上看，以商路范围之广、经营商品的种类之多和数量之巨、所营造行业发育之齐全，各帮系统都无一可与粤港商帮相比。粤港商帮系统在广西主要集中于城镇的工商经济系统中，显然具有无可争议的主干地位。

## 一 粤商

### 1. 入桂粤商商路构成了广西全境的主要商路

鸟瞰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全境主要商路，它完全与人桂粤商商路吻合。人桂粤商商路的市场传动主轴是“一江（西江）一带（沿海带）”，这也正是广西商路的市场传动主轴。晚清民国时期，广西主要交通孔道仍然是东西走向的江、海水路。多元走向的公路交通虽然有所发展，但由于当时汽车运输载重小、成本大，“不堪运用于大规模之货运”<sup>①</sup>，公路远未能具有主要商道的功能。南北走向的湘桂铁路虽然于1939年贯通衡阳、桂林、柳州，但毕竟建成时间晚至近代史上最末10年，又受抗日战争的影响，其重要的商路作用尚难充分和正常发挥出来。所以，20世纪40年代经济地理学家张先辰笔下的广西内陆商路，简直是一幅人桂粤商商路的线路图。张先辰指出：“过去广西交通之重心在水运，水运之枢纽在东南，故……省内各县农林工业产品，以受交通之限制，不能北运长江流域，只能以粤港为尾闾。因广西江河，除湘江而外，大抵（东）南流，货物运输，顺流则易，逆水则难，而灵渠水水浅流急，不适于较大规模之货运。广西与其他较北各省，几完全为两个漠不相关之体系。是以广西农村工业产品销路有限，与长江流域之广大市场，殆相隔绝，各业盛衰，几全为粤港市场所左右。结果所及，如生猪、鱼花、纱纸、木材等业以粤港市况萧条而衰落，硫酸、酒精、砂糖等物以在广

---

<sup>①</sup> 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桂林文化供应社民国30年版本。



州销售失败而致省内新式工业之发展遭受阻碍。”<sup>①</sup>

广西沿海商路同样如此。据陈锦光先生的《北海交通志》  
综计，从1879—1937年，以北海港为中转站和终点站定期或不  
定期的基本轮运航线共八条，全部启程或中经香港、广州，其中  
六条航线启程于广州和省港。<sup>②</sup>

既然广西主商路与入桂粤商商路如此同位一体，我们可以  
说，入桂粤商商路构成了广西的主要商路，在广西商路系统中具  
有主干地位。

## 2. 入桂粤商商务构成了广西工商经济的主要业务

既然运作于广西的主位商路之中，粤商商务也自然构成了广  
西工商经济业务的最主要的部分。从广西环省区的商品的输入业  
务来看，湘、赣、滇、黔诸省份额很小，相合通常也不会超过总  
输入量的20%，而主要经由粤商之手从广东、香港输入广西的  
货品，则通常占总数的80%以上。在近代，一直构成广西主要  
进口商品的洋货即国外工业品，可以说几乎全部是由粤港地区输  
入的，湘、赣、滇、黔诸省则几无货源。如1932年，仅香港一  
埠直接向广西输入的工业制造品货值有16821000国币元，占当  
年广西进口总值的35.45%。<sup>③</sup> 据笔者逐一统计，1911—1931年  
间，洋货始终占广西梧州、龙州、南宁三关入口货主要份额，如  
1914年，三关进口洋货为105100061海关两，占当年进口货值  
的86%。<sup>④</sup> 另外，即使是土货向桂输入，也多为粤商从广东输  
入。如1932年广西“来自粤省货物约占入口土货总额半数，即  
千五百万元左右”<sup>⑤</sup>。从商品的输出业务看，经其他商帮之手输

① 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桂林文化供应社民国30年版本。

② 陈锦光：《北海交通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③ 潘载生：《广西进出口贸易》，《广西经济》第2号，民国23年8月。

④ 民国22年《广西年鉴》第一回，第384—385页。

⑤ 潘载生：《广西进出口贸易》，《广西经济》第2号，民国23年8月。

往湘、赣、滇、黔诸省的份额很小，而绝大部分都经粤商营销输往省港，如前文已举的粤商收购外销的桂产如谷米、畜牧家禽、麻、糖、生油、木材、八角、桐油、柴炭、矿产等，都是广西出口最为大宗的商品。<sup>①</sup> 潘载生先生 1933 年估计：“本省（广西）运粤货物绝占出口值 9575000 元总额五分四（80%）即七八百万左右。”<sup>②</sup>

粤商的商品输入、输出类业务在广西的主干地位，又连环地伴生了粤商的经纪、金融、新式交通运输、进出口加工等业务，这些业务在广西也一一取得主干地位，使入桂粤商该诸项业务构成广西该诸项业务内容的主要部分。典型如民国时期柳州的经纪行业务情形颇为典型：与湘商规模有限、呈南北走向的沙豆入口和糖油出口的业务相配置，湘帮经纪商仅据有柳州经湘桂走廊入湖南一线、业务量较小的经纪业务；与广西长安商人主要经营的当地短距小额贸易业务相配置，长安帮经纪商业务仅限于“柳江上游”一带，份量额小；而与占柳州进出口业务份额过半的粤商进出口业务相配置，柳州粤商的经纪商业务则包揽“从广州到长安整条线”，“关系最广、最活跃，营业方面最大”<sup>③</sup>，实际上构成了柳州经纪业务的主干。其他诸项业务情形亦同：与粤商商品输入输出业务在广西的主干地位相应，发生在两广之间又以粤港为归依的粤商资金流动组织业务、轮电汽船运输业务、原料加工进出口业务等，也在广西全省占有最大的和主要的份额。

由上鸟瞰可见，晚清民国时期，入桂粤商商务在广西工商经济全局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具有主位地位。

---

① 潘载生：《广西大宗出口贸易调查》，民国 22 年 12 月。

② 潘载生：《广西进出口贸易》，《广西经济》第 2 号，民国 23 年 8 月。

③ 柳州市人民政府：《调查研究》第二期（工商调查专辑），1950 年 7 月。

## 二 桂商

广西也有本地发源的商人，但是在近代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没有取得广西商路中主位商帮的地位。

首先，土著的少数民族商贩罕见。广西生活着许多土著少数民族，主要有壮、瑶、苗、侗、仫佬、彝、京族等。自清代以后，这些少数民族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桂西半区、山岭区和边疆区。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原始、落后，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市场发育微弱，当时，他们当中很少甚至几乎不能产生自己的商人。如壮族是广西人数最多、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大、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土著少数民族，但是，由于千百年来土司制度在近代残余的束缚，壮族地区的商品经济难以发展。如田东县擅东乡的黄氏土官规定不允人民穿袍、绸布衣等，这对外来的商品流人就造成很大障碍。<sup>①</sup>又由于壮族中很少识字会算的文化人，“经济生活壮族很明显的特别的，就是自古以来，不论何处，都是务农，不事商贾”<sup>②</sup>。近代以来，特别是桂西地区鸦片盛产区于19世纪下半叶形成以后，壮族地区一些土官发现商业有利可图，纷纷利用土司特权及势力，无偿占用领主制下的农奴，兼事走贩和零售商业，甚至在地盘内垄断商业，劫杀客商<sup>③</sup>，但仍然不成气候。毕竟商业优势的确立，主要要依据大范围的地域市场发展基础，相应的社会关系和符合市场要求的进取动机，而不是仍带野蛮特性的“土皇帝”式的一方特权。也有一些壮族农民开始入城经商，

---

① 参见《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5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该书记载：土官规定只有土官和其眷属才能穿绫罗绸缎、白衣、三透鞋，若一般百姓违反，则处以重责、游街等惩罚。

② 黄现璠：《广西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页。

③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页。

但是所营商业一般都属兼业经济，以农为主的状态并未根本改观。如晚清民国的凌云县县城，“本地商户中，农业经济收入也占总收入一半以上，所营商业也多属服务性的，如出借马驮运输等”。大新县一些到街上开户经商的壮民，由于缺乏经营管理技巧和商业上的社会关系而亏本倒闭，退回农村的事例时有发生。<sup>①</sup> 总之，至少在近代，广西最主要的少数民族壮族尚未能产生出自己稍具规模的商入群体，零星产生的一些壮族小商贩没有也不可能构成当地城镇的主要商帮。苗瑶等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人口基数方面又远逊于广西壮族，大部分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水平，他们当中更难有商人产生，有“苗不经商，狗不耙田”的民谚。<sup>②</sup> 苗族如此，瑶族等其他少数民族情形自然类同。

另外，构成广西本地商人主体的广西本地化汉族商人，也是作为以粤商为主的外省商帮支配下的附从或派生出现的，他们始终未在全广西范围内取得主位商帮的地位。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原始聚居地区。但明清时期，汉族人民大量涌入广西，广西汉民确切地说都属于外省移民，这类人群在一定条件下同样会分泌出众多商人。大致在清代中叶，广西已逐步改变了“土著恒多”的居民结构<sup>③</sup>，从少数民族人口居多的省区演变为汉民居民人数过大半的省区。至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农村汉族人群大致可分为广东福建汉族移民民系（内含土白话、客家人、闽南、潮汕人）、湖南江西汉族移民民系、山东及中原其他省汉民民系，其中又以粤闽民系为最大一系，民国时仅该系人口数就肯定已占

---

①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

② 《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③ 参阅拙作《历史上珠江流域人口移动的主流变迁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地理》1995年第7期。

广西总人口数的一半以上。<sup>①</sup>因为这些农业性移民已在广西农村定居五六百年，生息繁衍，从事农业，与当地少数民族尤其壮族率先大面积融合，在广大农村早已形成了牢固的房产土地基业和跨乡连村的宗族势力，很少再像客商那样进行强烈的祖籍认同，人们已习惯地将他们列入“本地人”之列。相对于少数民族居民，他们在经济技术、社会、文教、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这也正是他们能够将原属少数民族原居地的广西沿江沿海平原地区，逐步变成自身聚居繁衍的家园，而将少数民族居民聚居区推挤至桂西半区或其他区的山岭地带，并使自身人口从清代中叶开始，超过少数民族人口的重要原因。他们当然能比少数民族居民产生出多得多的商人，并构成广西本地人商帮的主体。但是，相对于粤、湘、赣等省迁入的专业化商帮，尽管广西农村本地化汉民也同为这些先进省区商品经济辐射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拥有人口数上的绝对优势，但他们中产生的商人，却也只能是在业务上受各省商帮支配的附从性的小商人帮系。作为这些商品经济较发达导致的耕地紧张所推移入桂的过密农业人口，他们服从着原籍省区内既定的基本社会分工，即专事农业开发，将原籍区商品粮和其他商品货源的基地垦辟、扩大到“大率土广民稀”，少数民族竞争力较弱的<sup>②</sup>广西地区，为把持广西与原籍地间商路的人桂同籍商人提供回输粮源和货源。由于当地少数民族在市场上几无竞争实力，他们与原籍商人配置分工，即为在桂谋生致利的最佳途径。他们“勤力胜于土民”<sup>③</sup>，往往

---

① 参阅薛暮桥《广西农村经济状况调查报告》，民国23年版（广西师范大学馆藏）。据该书统计，广西操白话、客家话的居民占广西总人口的80%以上，按照保守原则，在广西的广东移民及后裔的比重，至少可断定为广西当时总人口的50%以上。另据民国38年《广西通志稿·民族二》关于广西各县族姓来源记载，确实最多是广东迁来的。

② 雍正十一年《广西通志》。

③ 民国24年《崇善县志》第二编社会风俗略。

“每至一地，率多致富”<sup>①</sup>，身份往往“由雇农而自耕农”，不少人还成为田连阡陌、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一地“经济权亦渐为该族所操”<sup>②</sup>。颇为可观而风险较小的土地收入不亚于奔劳的商人的商业利润，这使他们在近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固守着农业分工，“尽力南亩”，较少有人转化为职业商人。直至民国初年以后，人口增长的过密化也开始较明显地在广西汉民聚集区出现，他们才开始较大批地分泌、产生商业人员，并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凭借人口基数的优势和就近贸易的便利，开始赶上以粤商为主的外省商帮人口数量。例如，1933年广西梧州、南宁、柳州、桂林、贺县（八步）、百色、龙州八个重要城市登记人册店东的可知籍贯分布是：广西各县的2012人，广东各县的1412人，湖南、江西等省各县的219（其中湘省75，赣省70，闽省19，滇省4，黔省3，其他省48）人。<sup>③</sup>虽然广西籍店东绝对人数超过广东等外省店东人数，但是，这也没有改变前述的地域分工规定给他们的、相对于粤湘等省商帮低一梯度的依从地位。

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的广西商人（桂帮），他们在广西城镇所主要营销，都是当地农产品之间小范围的调剂转输，如北流，“境内各种贸易之重大者皆操诸广东人之手，惟土货之权，尚为邑人所左右耳”<sup>④</sup>。这些米、麦、油、豆、糖等土货，最终也是售予粤商运销梧州、广州、香港的。

桂帮也经营百货、洋杂的销售，但主要是从粤商商号那里承接批发，分散地小额零售。1933年，广西梧州、南宁、柳州、玉林市桂商店东超过粤商数的482家商店中，杂货店

① 民国35年《三江县志》卷2社会民族篇。

② 民国29年《柳城县志》卷4。

③ 民国22年《广西年鉴》第一回，第425—436、423—435页。

④ 民国年间稿本《北流县乡土志》第三编人为篇。

多达 328 家，占总数的 68%。<sup>①</sup> 实为粤商洋货、百货业务的延长。

近代大部分时间，广西商路的空间系统中，桂帮处于最底层。其商业路线是短距的，“近在百里，无远涉”<sup>②</sup>，更难以跨越省区。一个典型的情形是：同为比邻省区，粤商、湘商在广西遍设粤东会馆、湘楚会馆，而桂商在粤、湘、赣诸省则极少建有广西会馆。如清代，广州、湘潭均无一家广西会馆。广州的广西会馆迟至 20 世纪 30 年代才建立。值得注意的是，广州的广西会馆与粤湘等省在广西建立会馆的商帮组织性质不同。广西人在穗主要是求学、打工、供军职公职，而非经商。据民国 23 年，《广州广西会馆二十三年年份馆务报告书》记录，该会会员共 1005 人，其中商人、小贩总计仅有 28 人，仅为总人数的 0.27%。可见，广州的广西会馆并非桂商长距跨省辐射的标志。桂帮商路在广西范围虽是遍在的，但却是割裂的、不连绵的，它侧重于各地城乡之间或小范围的城镇之间的贸迁往复活动；所留下的业务断裂，是由以粤商为主的外省商帮长距离跨越埠市串接起来的，广西各隔一方的地方商路因而才得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商路系统。近代以来尤其民国以后，广西商人确实在广西域内有明显后起之势，最突出的是玉林五属帮、钦州廉州帮、宾阳帮。<sup>③</sup> 但即使从这些后起商帮本身看，他们也远未改变广西“无东不成市”的格局。从旧志、族谱统计资料看，玉林五属帮、钦廉帮、灵山帮以及宾阳帮部分人，本身就属于明清广东人桂农业移民后裔（包括土白语人、客家话人、闽南潮汕

---

① 民国 22 年《广西年鉴》第一回，第 425—436、423—435 页。

② 道光九年《庆远府志》卷 3，地理志下，风俗。

③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南宁、柳州以西的左右江、红水河沿河县份城镇中，颇多玉林五属（北流、陆川、博白、玉林、兴业）、钦州、廉州、灵山、浦北、宾阳籍商贩。

话人)<sup>①</sup>，属广西本地化农业性汉民中与广东天然联系最密切、受人桂粤商带动影响最大的几支，如玉林即有“广东人教会了玉林人做生意”<sup>②</sup>的流行说法。从一定程度上说玉林帮、钦廉帮和宾阳帮商人是次生形态的人桂粤商亦无不可。也正因如此，新近崛起的玉林钦廉诸商帮的商业辐射，既以粤商的对桂辐射为依托，又遵循着这种辐射规定的地域分工——主要是向着经济发展条件较差、距离较远的桂西半区推进，填充粤商锋势减弱而留下的商业空间，通过以桂东南牵带桂西的形式协助粤商在边远的桂西完成粤港辐射的市场传动。所以，他们在广西的分布主要在柳州、南宁一线以西，如在武鸣、百色<sup>③</sup>、龙州<sup>④</sup>、宜山<sup>⑤</sup>、忻城<sup>⑥</sup>等许多城镇，都建有玉林五属会馆、灵州会馆或同乡会组织。而在粤商稠密的桂东半区，几乎没上述商帮的踪迹。这也反映了即使近代具有明显的后起趋势，广西商人在本省商路内也始终竞争不过粤商，处于低于粤商帮系的位序上。

### 三 湘商

湖南商人又称洞庭商帮，是中国有名的商帮之一，也是在广

---

① 参阅民国38年《广西通志稿·氏族二》（油印本）中关于玉林五属诸县、宾阳县的族源记载和民国36年《钦县县志》、民国34年《防城县志》民族和缘起部分。

② 周贱谟：《民国时期玉林商业和各行业摆卖的散布情况》，玉林政协编《玉林文史资料》第13辑（以下引用的各种文史资料，均由各地市县政协编辑发行，略）。

③ 1994年2月笔者在百色市城区实地考察，找到晚清玉林五属会馆、灵州（灵山）会馆遗址。

④ 谢金言：《梧玉会馆概况》，《龙州文史资料》第3辑。

⑤ 黄光毅：《清末及民国年间有关宜山商业的民间组织》，《宜山文史》1987年第1期。

⑥ 樊韬：《解放前忻城县宁江壮族社会经济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



西城镇中影响较大的商帮。凭借湖南与广西毗邻的地缘关系，凭借封建时代即已形成的“两湖熟，天下足”的小商品经济辐射优势，凭借着晚清以来长江轮运和铁路运输在两湖地区的发展对这一辐射的加强，湖南商人也在广西许多地方的工商经济系统中取得了重要地位。但是，他们仍远无法与粤商相比。

首先，湘商人桂商路无法与粤商相比。人桂湘商主要属于湖南商人（或洞庭商帮）中的楚南帮系。其来源地域主要是北纬28度以南、湘江上游的湖南南半区，大致可以长沙、湘潭为商路起点城市，如恭城湘商许多属衡阳人，同治年间在恭城成立有衡胜会，捐资人会者有115人。<sup>①</sup>又如平乐沙子墟，湘商以邵阳（宝庆）帮和衡胜（阳）帮为多数。<sup>②</sup>常见的湘商原籍还有零陵、溆浦、新化、湘乡、祁东、东安、武冈、靖县、城步等。湘商人桂主要沿着以灵渠为纽带的湘桂走廊和由桂林—柳州—南宁陆路为干道的广西官道，由北而南推进，并在沿途区作一定幅度的东、西横展，其重心则在桂林为中心城市的桂北地区。人桂湘南商路的边际圈也很广，西北至南丹月里街<sup>③</sup>，西南至百色<sup>④</sup>、龙州<sup>⑤</sup>，南至南宁<sup>⑥</sup>，东南至梧州<sup>⑦</sup>。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以上是广西境内有湘商踪迹或湖南会馆的终端市镇，将它们连成线可理解为湘商人桂活动范围边际线。可见，人桂湘商商路是一个起于长沙、湘潭，以湘江、灵渠、广西官道三者组合为纽带，以由北而南为启动走向，连接楚南及广西大部地区的回环系统。但是，

① 同治六年《衡胜会记》碑立恭城县县城湖南会馆旧址。

② 陈基仁：《建国前的沙子》，《平乐方志通讯》1988年第1期。

③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

④ 参阅1960年百色镇志办《百色镇志》（稿本）。

⑤ 民国16年《龙州县志》，第92页。

⑥ 民国26年《邕宁县志》卷8，建置二，街市。

⑦ 民国30年《苍梧县志》和同治十三年《苍梧县志》都有关于湘楚商人的记载。同时还记载梧州赣帮商人与他省帮共同合建三江两浙会馆。

这一商路无论交通路径还是覆盖面积，都比入桂粤商商路少得多。湘桂漫长的省界线均由高耸的山脉地带构成，横亘着苗儿山、越城岭、海洋山、都庞岭、萌诸岭、九万大山、大南山、天平山。当时汽车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远未取得主要交通方式的地位，湘商来往主要依靠运量很小的灵渠水路和其他山间狭小崎岖的旱道，阻隔重重，跋涉艰难，这一商路显然远不如入桂粤商“一江一带”的商路丰富、畅达。如前文所举，以灵渠与西江相比，运量仅为其十二分之一。<sup>①</sup> 这可以理解为湘商商路容量至多仅为粤商商路的十二分之一。若参入赣商与湘商共有商路、挤占商路容量以及粤商人桂还有另一巨大的海路诸因素进行估计，入桂湘商商路容量甚至还应该远远低于入桂粤商商路容量的十二分之一。也正因如此，湘商人桂商路边际圈仅掠及广西大部分地区，而不像粤商商路那样覆盖和渗透广西大部分地区。

其次，商务量远不如粤商巨大。湘商向广西输入的商品全部是湖南省区传统的手工业、农副业产品，如民国时期桂林湘商蒋要发号，主要代客输入湖南东安、白牙等地的官堆纸、湘纸、土纸和靖县的白腊、川腊，湘商金城行则专门经营武冈、邵阳的各种纸类。<sup>②</sup> 在近代土货市场日益萎缩、外国工业品市场日益扩展的情势下，这当然不敌素有“洋广商”绰号的粤商的洋货输桂商务。例如清代中叶融安县（时为融县一部分）长安镇，湘商经营的布庄一向火红，湖南洪江大布十分畅销。然而，时至清朝末年，粤商携洋纱洋布入融倾销，经营此项生意的苏杭铺在县城、长安分别从两家、四家增至十余家和二十余家，湘商洪江布庄遂纷纷歇业，一蹶不振。<sup>③</sup> 与前文所举相比照，很显然，湘商

① 引自李炳臻《灵渠的航运》，见广西水利厅主办《广西水利水电科技——水利史志专刊》1986年第3期。

② 田子永：《桂林经纪业简史》，《桂林文史资料》第11辑。

③ 民国25年《融县志》第三节，实业。

输入货物，在主要由粤商组织的通常占外省输桂货物 80% 以上的输桂洋货和 50% 的输桂土货的份额之下，充其量也只能占据输桂货物总量的 10%。湘商营运出湘的广西产品，也远不及具有强烈的出口外销导向的粤商输出粤港的广西产品数量巨大。如 30 年代，桂省桐油仅兴安、全州、灌阳、资源数县一部分产品经湘商之手“经湖南往汉口”，其量不足桐油桂货出口总额的 10%，而经粤商之手“集中于梧州再运香港转销外国者殆占 90% 以上”<sup>①</sup>。桂货出湘稀少的情形，在钟山县的新华、盘莲两个墟镇情形同样，湖南人运来牛、豆腐、酒、蔬菜，但“出卖货物后，很少换货回去，主要是带钱回去，这是因为湖南地区农产品丰富，它并不缺少本地市场上所售的货物”<sup>②</sup>。

再次，工商业资本的追加积累机能也不如粤商。粤商在赢利后，一般又都投资到工商业的扩大发展中去，目前尚未发现一个粤商将生意的利润汇回广东老家购置田地的事例。但是这种情形在湘商中却颇为普遍。如桂林著名湘商张永发，1919—1949 年间，在湖南零陵、冷水滩、蔡家铺、广西全州购买田地 1600 多亩。<sup>③</sup> 在阳朔县，湖南手工业者和商人，生意不大，但一般都购买田地，而“广东人尽管钱多，不用在买土地上”，而是用以追加工商业资本，扩大业务发展。<sup>④</sup> 在钟山县，湘商的习惯是，“在此开 5—8 年铺子，就回去买田买地，长期在这里经营的也是不多的”<sup>⑤</sup>，这也使湘商不可能在工商资本积累的规模扩展方面赶超粤商。

---

① 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第 3 章“农产”。桂林文化供应社民国 30 年版本。

②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 3 册，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7 页。

③ 刘开泰：《张永发的发家史》，《桂林文史资料》第 7 辑。

④ 陈文：《家乡阳朔县经济史调查》（手稿）。

⑤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 3 册，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72 页。

#### 四 赣商

江西商人，又称江右商帮，也是中国有名商帮，对广西城镇经济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江西省虽然与广西省不直接相邻，但也相隔不远，稍略越湖南，即可入桂。从明清至民国，几乎与湘商渗桂势力形影不离，与湘商分掌北货南进和桂货北出贸易的牛耳。

入桂赣商一般属于江西商帮中的赣南帮系。他们的地域来源一般是北纬20度纬线以南江西地区，最多的是素有“江西粮仓”之誉的吉泰平原、赣抚平原诸县份。在广西，赣商建立的同乡会组织最多的是吉安会馆，如清代桂林赣馆系列中还有庐陵会馆，而庐陵属吉安府地。笔者在南宁市卫国街也发现有“吉安会馆”房产界碑。据平乐赣商后裔黄正光先生追溯，他祖父即是民国八九年从吉安迁来平乐桐坪的。“到广西经商的江西佬多吉安、吉水、泰和人，他们是过湖南江永县人桂的，一路做生意来”<sup>①</sup>。因此，入桂赣商商路的起点，当在赣南吉安市一带，然后西折湖南南部，从湘桂走廊南入广西。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赣商人桂后商业线路分布与湘商大体相同，亦以灵渠、广西官道为纽带，由北往南推进，并沿线作一定幅度的东、西横展，其重心也在以桂林为中心的桂东北地区。大致可以说，凡湘商较众的地区也即赣商较众的地区。西南至龙州<sup>②</sup>、百色<sup>③</sup>，南至南宁，东南至梧州<sup>④</sup>，也都发现有江西同乡会组织的遗址。

应该指出，赣商在近代中国地方商帮系统中，在经济实力和

---

① 1986年2月笔者采访江西商人后裔、平乐县爱国卫生运动办公室主任黄正光。

② 民国16年《龙州县志》，第92页。

③ 参阅1960年百色镇志办《百色镇志》（稿本）。

④ 同治十三年《苍梧县志》记载梧州的赣帮商人与他省商帮共建三江两浙会馆。

能量上都是稍高于洞庭商帮的帮系，甚至在湘帮故乡湖南省内，赣帮也大有与湘商分庭抗礼之势。如在清咸丰、同治年间，长沙商业竟“以江西人居多”<sup>①</sup>。赣商人桂以后，对湘商在经济能量上的优势也经常保持，如辛亥时期桂林商业中，赣湘商帮分别为第二、三大商帮。<sup>②</sup>又如宜山，以江西会馆财力较充裕，以湖南会馆人数最多。<sup>③</sup>不过，由于地理距离较长，江西与广西仍存在地域上的阻隔，其入桂人数显然少于湘商，尽管在广西北半区许多较重要的城镇、圩市中或重要的行业中具有对湘商的优势，其在广西工商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当总体上与湘商不相上下。

既然赣商在商路和经济能量上大致与湘商同处一个水平，他们同样也不能动摇人桂粤商在广西工商经济中的主位地位。首先，他们在商路上不可与粤商相比。他们是借道湘商路人桂的，前面所列的珠江水系与湘江水系的诸多分水岭，同样是赣帮人桂的天然障碍，使他们人桂的速率也无法赶上以“一江一带”为通途的人桂粤商。另外，赣商的商务也远不及粤商的商务繁兴。赣商从赣湘输入广西的也全部是传统的手工业制品，如赣省的夏布、文房四宝、药材和湘省的大小湘纸、官堆纸等<sup>④</sup>，这类商品在广西当然会始终会保持着一定的市场，但仍不如粤商营销的外国工业品、粤省手工业、渔盐产品所占领的市场空间大。赣帮也从广西向湘赣输出农副、手工业产品，如光绪至民国年间，桂林两江六峒茶“全赖湘赣诸省茶商远销”，“盛时除湘南一带以外，运至赣省吉安鄂省汉口”<sup>⑤</sup>。但是与湘商一样，赣商输出的桂产

① 李行之：《长沙旧事——行帮丛话》，《长沙史志通讯》1988年第1期。

② 宋维桢：《辛亥革命前后桂林商业概况》，《桂林文史资料》第2辑。

③ 黄光毅：《清末及民国年间有关宜山商业的民间组织》，《宜山文史》1987年第1期。

④ 田子永：《桂林土产业简史》，《桂林文史资料》第13辑。

⑤ 《桂林两江茶叶调查报告》，民国26年《建设汇刊》第1期。

主要是满足国内有限的市场需求，而不似粤商那样，以广阔的国际市场为导向，因而输出量也是十分有限，远不及粤商。

同处于广西这一地理空间中，桂、湘、赣以及势力更小的闽、鄂、滇、黔等省商帮的商路与粤商商路商务，当然常常是相互叠加交织的。通常的情形是，其他诸帮尽可能插足粤商商路，经营与粤商同类的业务，与粤商之间形成一种合作与竞争的关系。但根据以上论述可知，无论如何，这些商帮在广西总体上只能处于粤商的依从商帮的地位，粤商商务在整个广西工商经济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主位地位。

市场学指出，在有若干竞争者的情况下，一个企业的相对市场份额若高于 100%，就表明该企业是这一市场的领袖。<sup>①</sup> 由于每个省籍的商帮实际上都是拥有共同的地域利益、相携参与市场的同一经济实体，或者说是同一的企业群集团。我们对入桂粤商在广西市场上相对于湘赣桂诸帮的份额估量，同样可以沿用这个原理。显然，在广西市场上，粤商的相对市场份额远超过 100% 的比例（参见表 1-1）。

表 1-1 民国 22 年（1933）广西八个主要城市粤商资本份额统计表

城 镇	商业资本总额（元）	粤商资本所占比重（%）	粤商资本额估算（元）
梧 州	2782293	80 <sup>[1]</sup>	2225834
南 宁	895269	28 <sup>[2]</sup>	251611.5
柳 州	282895	31	87687.5
玉 林	257153	10	25715.3
贺 县	179690	59.6	107095.2
百 色	158465	41.4	65604.5
全（州）县	62830	0	0
桂 林	440739	27 <sup>[3]</sup>	118999.5

① 许凤岐主编：《市场学词典》，江西科技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9 页。

续表

城 镇	商业资本总额 (元)	粤商资本所占比重 (%)	粤商资本额估算 (元)
龙 州	105745	24	118999.5
总 体	5165079	56.3	2907939.4
备 注	<p>各市商业资本数据均引自民国 22 年 (1933) 《广西年鉴》第一回。标注之外的各市粤商资本份额，都是依据同书所提供的当年各市粤商在商家户数中的比例来确定的，这样算出的粤商资本所占比重、粤商资本额，只能是一个推断值，未必准确。但实际生活中，广西粤商的资本在各地商业总资本中的比例，一般远远大于绝对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由此来看，这个关于粤商资本额及比重的推断值，肯定大大低于实际数额。换言之，当时粤商资本在广西八市商业资本总额中，至少占 56.3%。</p>		

注：[1] 另外，笔者在梧州工商档案室据该市《民国末年履业、百货、新货、国药、西药、经纪、采运、食糖、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会员登记表册》逐一按业主籍贯进行统计。表中粤商总资本确切数额为当时货币单位 1452776.3 万元，占全市诸行业资本总额 1771678.4 万元的 82%；为保守起见扣除 2%，可确定粤商通常资本比重为总数的 80%。

[2] 南宁的粤商资本比重的确定，由于缺乏确切的各籍商家资本数额记载，只能以所知的各籍商家中粤商家数所占比例来确定，民国 22 年，南宁此项数为 28%，以此为粤商资本比重。其他如此类情况的还有柳州、玉林、贺县、百色、龙州、全州县。以上述方法估量粤资比重虽不准确，却是十分稳妥的，绝对不会高于实际情况。因为通常情况是，粤商的资本额所占比例，一般都远高于粤商绝对人数在当地商户总人数中的比例。

[3] 在桂林，粤资比重 27% 比例是这样确定的：据宋维楨回忆，辛亥年 (1911) 前后，桂林各商帮资本和营业额位次是：第一是粤帮，次而为赣、湘、本地及他省商帮。按许凤岐主编的《市场学词典》提供的参数，在市场上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基本市场份额至少是 25%，按桂林的历史实际，粤、赣、湘帮其市场份额起点比例至少是 25%（因为公认具有一定实力），因此，桂帮与他省商帮份额之和只能在 25% 以下。而粤赣湘商不仅有实力，而且又都比下一个位次商帮拥有更大优势，因此，我们保持整数而又遵行最保守原则，所得出的各商帮资本在总资本中比重大致应是：粤帮 27%；赣帮 26%；湘帮 25%；桂帮、其他省帮 22%。

按照市场学计算企业相对市场份额的公式<sup>①</sup>：

某企业相对市场份额 = 某企业市场份额 ÷ 其他企业市场份额之和。

那么，广西八市中粤商相对市场份额应是：

$$\frac{29079939.4}{5165079 \text{ 元}} \div \frac{(5165079 \text{ 元} - 2907939.4 \text{ 元})}{5165079 \text{ 元}}$$
$$= 0.56 \div 0.44 = 1.27 = 127\%$$

以上按最保守原则估算，粤商在八市中相对市场份额已高达127%，远超过100%的比例。粤商显然是广西八市中的市场领袖。而八市实为广西商业资本（未含钦州、北海市、防城）主要集中地所在，资本额占当年广西全省各市各县总商业资本额8075863元的64%。<sup>②</sup>粤商在广西最重要的八个城市中，相对市场份额高达127%，还超出标志市场领袖地位（100%）27个百分点。所以这一比重，完全可以理解为粤港商帮在整个广西城镇工商经济中的相对市场份额。由此我们可以确信，晚清民国时期，粤商无可争议地是近代广西城镇经济中执掌牛耳的领袖商帮，整个广西城镇经济的近代发育是由他们主导实现的，他们本身经济的发育构成了广西城镇经济近代发育的主干部分。

---

① 许凤岐主编：《市场学词典》，江西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② 民国24年《广西年鉴》第二回，第474页。



## 第二章

# 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 经济主要行业的发育

——“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微观剖证

城镇经济行业是城镇工商业务运转的专业分类实体。实际上，城镇经济的发育内涵就是由城镇经济行业的发育组成的。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经济主要行业大致可以分成进出口行、经纪行、百货行、洋货专售行、农林土特产收购行、私营金融行、传统手工业行、私营新式工业行、新式交通运输行及其他行业共 11 类行业。本章分七节探讨入桂粤港商人与广西城镇 11 类行业发育的关系，从各个具体行业的层面剖证广西域内的“无东不成市”格局。

### 第一节 入桂粤商与广西城镇进出口行、 经纪行的发育

#### 一 进出口行

进出口行是城镇直接与外国商人发生业务关系、开展直接外贸的专业行口。<sup>①</sup>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济逐步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出口贸易日益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形成主导

<sup>①</sup> 许凤岐主编：《市场学词典》，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8 页。

地位。而地处沿海、沿边、比邻省港的广西，大致从19世纪70年代中叶北海开埠起，城镇进出口行业日益成为广西与国际市场直接接轨的重要纽带和国际市场牵带广西经济发展的龙头行业。然而，在近代条件下，进出口商人的充任首先是在国际范围内所处经济发展水平梯度最高，掌握着世界贸易主动权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市场抉择的结果。按照市场学的营业地域广度理论(Geographical coverage)，在选择批发商时，总是先选择市场销售覆盖地域最广阔的批发商。<sup>①</sup> 既然如此如前所探，广西诸商帮中，以粤港商帮拥有的营业地域广度最大，到广西的外国的商家和资本家自然首先将人桂粤商作为直接打交道的主要贸易伙伴。以这种业务联系为基础，近代广西城镇进出口行业自然主要由人桂粤商创建、经营。

#### 1. 在口岸埠市，进出口行业几乎全部由粤商创建、经营

北海。广西的进出口行业在清代中叶萌芽于合浦县廉州关市，当时“外国商贾多以华人居间”<sup>②</sup>。它的正式形成以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北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为标志。北海是广西第一个通商口岸，它开埠以后，外国洋行纷纷入驻。如光绪年间，德商森宝洋行、捷成洋行，法商仔地洋行，美商的美孚洋行等欧美发达国家的洋行势力蜂拥北海，较大规模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北海逐渐兴起。终晚清民国，进出口行业始终是北海的第一大行业<sup>③</sup>，而这些行业“都是广府商人所经营”<sup>④</sup>，如光绪年间著名进出口商的怡兴隆号、合和兴号就是广府商人所创办、经

---

① 许凤岐主编：《市场学词典》，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页。

② 参阅黄家蕃《闭则死，开则活——北海（合浦）地区口岸贸易史》（下），《北海文史》第8辑。

③ 陈仲桐：《北海市医药业发展史略》，《北海文史》第3辑。

④ 参阅黄家蕃《闭则死，开则活——北海（合浦）地区口岸贸易史》（下），《北海文史》第8辑。

营的。

龙州。1889年中法战争中国失败后，《续订中法商条专条》签订，龙州被迫开埠。“及条约缔造，辟龙州为通商口岸，粤商遂争相投资”。首先是进出口行业的各个经济行业，使龙州凭其日益重要的直接外贸地位，从桂西南一个平常的边镇，“始成巨埠”。粤商主要经营的进出口行业构成了龙州埠市的命脉行业，直接连通越南沿海沿边国际商路，辐射桂西南一方偌大地区，其“出口货以糖豆、八角、茴油为大宗，黄茸、蛤、牛皮、木棉、花等次之，进口货多而畅销者为洋纱布尺煤油食盐……及寻常用品之洋货”<sup>①</sup>。

梧州（当时为苍梧县管辖）。梧州于1898年由清政府自动宣布开埠。梧州开埠后，成为广西内河航道进出口贸易的总埠市。而具有广西进出口贸易总枢纽地位的梧州的进出口行业，几乎完全是由粤商创建、经营的。据笔者对1948年9月25日登记的《苍梧县进出口行商业同业公会会员调查表》逐一统计，梧州进出口商号68家，注册资本总数为1377986万（国币）圆，其中广东帮商号48家，注册资本总数为1190666万（国币）圆，其所占总数比重分别高达70.59%和86.45%（参见表2-1）。

表2-1 20世纪40年代末梧州进出口行业粤商企业概况示例表

商号	商号籍贯	主要进口商品	主要出口商品	来往商行及厂商	类型
北发行 (1941年 1月创 立)	新会	美国的橡胶 制品、脚踏 车及配件、 汽车零件		香港利兴行、美国摩 士洋行华南总代理公 利行	交易往 来型

<sup>①</sup> 民国16年《龙州县志》舆地志（下），实业。

续表

商号	商号籍贯	主要进口商品	主要出口商品	来往商行及厂商	类型
百和祥 (1921年1月成立)	南海	英美的染料、煤、白药、佛青、铲粉、梳打粉、漆油		民国16—22年(1927—1933)曾代理德国嘉色喇颜料厂货品,后与香港中华、恒光等洋行往来	代理型
锡安行 (1946年7月创办)	台山	英国的工业原料、胶类产品、化工产品	向香港并转欧美出口桐、苘、桂、茶、菜诸油和纯锡	总行为香港太子行,往来商行厂家有 up-jonh. co 等	分号型
志诚行 (1946年10月成立)	江门	从香港进口法国的西药、胶脂、颜料和英国的液体燃料	向香港出口桐、桂、茶、苘诸油及八角、皮革等	店东甘生裘原即为香港均易、新志利洋行高级职员,自立门户后业务上也仍主要与该两家洋行来往,兼与德国同兴行交往	衍生型
备注		资料出处:民国37年(1948)9月25日《苍梧县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会员调查表》,所有“往来行商厂家”一栏,全是驻香港的外国洋行、厂商或代理机构			

南宁。南宁于1899年开埠,为广西内河的第二大通常商口岸。自清代的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至民国26年,南宁“独执商场牛耳者,厥为广帮”<sup>①</sup>,进出口行业自然由广东商人独掌。

2. 非口岸城镇圩市进出口行的业务点、代理点,也多为粤商建立和经营

虽然广西进出口业主要丛集于能够自由、便捷、直接与外商

<sup>①</sup> 民国26年《邕宁县志》社会二。

打交道的通商口岸城市，但其行业的业务网点也扩散往广西腹地非口岸的若干大镇名圩。而这一网点的扩散，也主要是由粤商的推进完成的。如1932年以前，桂林进出口行业中粤商势力显著，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在桂林的代理商安兴行的经理即是顺德籍富商骆善初。1932年以后，粤商陈秀明的桂昌行，则成为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在桂林的最大代理商。<sup>①</sup>在20世纪20年代间，田东县平马镇粤商人和号，先与香港的英商亚细亚火油分公司签订合同，由两家香港商户作担保并交付押金，押金数约为年销售额的30%，然后由英商陆续把火油交船到平马镇点收。人和号既垄断着平马镇的油出售，又批发给小贩在各山区乡、圩出售，组成了庞大的销售网点，获取高额利润。另外，每年的年终，人和号老板则把在平马收购的土特产和山货用船运往香港，按港价与英商结账。<sup>②</sup>

综上事例，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进出口行业确实主要是粤港商人创建和经营的。粤港商人进出口行业的发育，构成了广西城镇进出口行业发育的主体部分。

## 二 经纪行

至晚清中叶，广西城镇经纪行已经形成，旧时曾称牙行，又称平码行或水面行。这个行业在广西较普遍地出现，是在晚清民国时期。它的主要业务是：根据进出口行业的业务指向，组织各客商之间的营销活动，业务内容是代客买卖，提供中介服务，从双方各抽2%佣金。它本身对商品没有所有权，但可以利用熟悉土客各业务人士关系网络的优势，从中撮合，迅速实现买卖双方

---

① 尹炳章：《英、美火油公司在桂林与桂昌行概况》，《桂林文史资料》第6辑。

② 苏寿彭：《平马工商业概述》，《田东史志》1987年第4期。

的交易，加快商品贸易过程，程序往往是“从货物入口老客投入行里之后，就负责代交入口税，填写货物进单，完税、搬运、保管、招待、订货、找客、验货、过秤、开票、扣佣金、搬运出行”等。<sup>①</sup>

随着近代以来进出口行在城镇行业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货流密度的增大、客商流量的剧增，经纪行发展成为近代广西城镇经济具有“巨擘”地位的最大行业之一。如在辛亥年间（1911），梧州经纪行为全市第二大行业。<sup>②</sup> 在南宁最早开设平码行者，为粤商于1970年开设的仁盛行，不久，粤商孔德记、建荣号、孔怡记、均兴号等接踵而至。至1993年，“以资本合，平码业当称巨擘，占全市商业资本36%”<sup>③</sup>。在柳州，平码行具有“领导地位”，“它对货物进出动态最敏感、与货物来源出入的大商号亦最密切，使得市场的行情首先由经纪行决定”，“所有入口出口货物经柳州手续都由经纪行一手包办”<sup>④</sup>。在贵港市城区（贵县），全市经营规模最大的行业是水面行。<sup>⑤</sup> 在平乐，所谓的大行业商家全为经纪行。<sup>⑥</sup> 而这一在广西城镇中地位极为重要的行业，也主要是由粤港商人创办、经营的。以下我们从全广西范围进行详证。

梧州。梧州的经纪行最早由粤商创立于苍梧县戎圩。1897年梧州开埠以前，广西土特产多以戎圩为集散地，邻省广东的西南、南海、佛山、鹤山等地客商都到戎圩贸易，并在此建立经纪行店，1885年时已多达17家。1897年梧州辟为通商口岸，该行

① 柳州市人民政府：《调查研究》第二期（工商调查专辑），1950年7月。

② 侯雅云：《辛亥革命时期的梧州资产阶级》，《梧州文史》1986年第6期。

③ 民国22年《广西年鉴》第一回，第268—365页。

④ 柳州市人民政府：《调查研究》第二期（工商调查专辑），1950年7月。

⑤ 郑开基：《贵县工商业史概况》，《贵县文史资料》第14辑。

⑥ 何锦钧：《解放前的平乐商业》，《平乐方志通讯》1984年第4期。

业则聚集在梧州成长，广西省内西江、桂江两河各地土产到梧州，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平码行，输入港澳和广东各地的，土产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广东办庄、洋庄（洋行和港庄）。由港澳输入的洋货，除各店就地销售外，有一部分是通过平码行内的办庄或行口，代理收购、代理人桂手续，输往桂林、南宁、百色、庆远等地销售的。1925年平码行已多达40家，资本规模小者3000两白银左右，中者10000两白银左右，较大者30000两白银左右，每年的营业额巨大，一般都有50、60万两白银左右。<sup>①</sup>梧州经纪绝大多数是粤商经营，至民国22年（1933），梧州已知籍贯的平码行店中，广西仅两家，湘、闽籍无有，赣籍1家，粤籍最多，有13家。<sup>②</sup>据民国38年（1949）9月《苍梧经纪商会会员登记册》（现存梧州工商联）统计，梧州共有经纪商会会员75家，其中粤籍43家，桂籍31家，其他籍贯者仅1家。这说明，梧州具有城镇经济中最大行业地位的经纪行业的发育，主要是由粤商的经营活动实施完成的。

贵港市城区（贵县）。民国年间，此地经纪行通常的规模约在30—40家之间，大多数都是粤商经营的，本行业最大一家商号是粤商恒昌号，它的靠山有禅庄（即佛山庄口）、穗庄、港庄，信息比别的商号敏捷灵通，进货一单可从覃塘圩客商那里进货青豆、糯米或白米11万斤。恒昌还兼营杂货酱料的批发，掌握充足的出入口货源。对各大船户的船只，恒昌号拥有优先使用和支配权。它在贵县市场上可谓举足轻重。<sup>③</sup>

南宁。1870年，粤商仁盛行投资开设第一家经纪号，其后，粤商来邕开行者不断增加。至1905年，南宁纪经商人分为广东、

① 陆冠芝：《平码行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② 民国22年《广西年鉴》第一回、商业。

③ 郑开基：《贵县工商史概况》，《贵港市文史资料》第14辑。

广西两帮，1927年发展到120家，以粤帮为主。1928年，随着香港的崛起，南宁市面上又增加了一个“香港帮”，直接开设经纪行栈或通过经纪业户倾销工业品，收购山货、土特产和工业原料。规模较大的有港商陆瑶池等开设的航泰公司、合记公司，主要业务是代售英美煤油，代购牛皮、鸭毛、纱纸、八角、云耳、木油、茴油、锑矿并运销香港。广东经纪业户在南宁市场上始终占着绝大比重。1941年日寇占领广州，两广商路一度中断，粤帮经纪业纷纷倒闭，南宁该业竟从100多家剧减至20余家。抗战胜利以后，粤帮复归，南宁该业又迅速增至192家。<sup>①</sup>据民国22年《广西年鉴》第一回商业篇统计（本书以下该年份各地店东籍贯统计数据出处均同，不再作注），平码行已知籍贯者55家，粤帮有21家，赣、湘、黔、闽各1家，桂帮30家。

百色。1933年惟一的一家经纪行，是由粤商开设经营的。

在柳江以北城镇的经纪行业中，湘、赣商帮势力相对增大，但粤帮势力始终仍是重要的一帮。

柳州。1933年，柳州市经纪行店12家，粤籍8家，湘、赣籍均无，桂籍4家。这里对湘、赣商人的统计可能失真，但也反映了粤商在经纪行业中确实仍有不小的优势。据柳州市人民政府在1950年对柳州市城镇行业一次全面调查，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历史最悠久、资本最雄厚的要算江西帮，如生发祥、恒泰、益得等”，但是，“关系最广交际最活跃，营业方面最大的是广东帮，如均泰、仁泰、仁昌、广华、万丰等，他们的营业，占据由广州到长安的整条线。此外，资本较小的长安帮则专营柳江上游的货物出口……湖南帮则主要经营沙豆的入口和糖油

---

<sup>①</sup> 谭津：《南宁经纪行的兴衰及其内幕》，《南宁市文史资料》第6辑，第11、38—39页。



的出口”<sup>①</sup>。

融安县长安镇。民国年间当地的四大经纪行中，永昌得和陈利丰两号为湘商所开设，“客人多为湖南商人，代客买卖过程中卖出的货物有桐油、生猪等，买进的货物主要是片糖、生盐和杂货”。但是，粤商的华泰行也很有能量，控制着黔桂一线的业务，它的客商多为贵州黎平、榕江一带以及广西三江富禄一带的广东商人，运来的货物有生猪、谷米，买进的货物是杂货、棉布、片糖、生猪等。<sup>②</sup>

平乐。解放前，平乐城先后至少有 43 家水面行，其中只有两三家为湖南昭阳、益阳人经营，其余全为广东商人经营。<sup>③</sup>

桂林：解放前，桂林经纪业中粤、湘、赣三帮是三足鼎立的。江西帮以经营大小湘纸、宫堆纸等为主，广东帮以经营粮、油、糖、纱布为主，湖南帮兼而营之。粤商泰兴来与梧州粤商联手经营，上下河的大小船只多达七八十艘，经常贮存油脂数百桶，食盐十余万斤，米一二十万斤，其资金雄厚，生意巨大，在桂林蔚为可观。<sup>④</sup>

粤商在经纪业中也有势力几减至零的局部地区，如民国 22 年，桂北门户全州经纪业 12 家，湘籍 8 家，赣籍 3 家，桂籍 1 家，粤籍全无。<sup>⑤</sup>

综上考证，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商人在经纪行业上的推进网络，东起梧州，西至百色、长安，北抵桂林，覆盖了广西大部分的面积。大体可以柳江为分界线，在该线以南占广西大部分面积

---

① 柳州市人民政府：《调查研究》第二期（工商调查专辑），1950 年 7 月。

② 潘兴桂、韦国光：《解放前长安镇工商业概况》，《融安县文史资料》第 2 辑。

③ 何锦钧：《解放前的平乐商业》，《平乐方志通讯》1984 年第 4 期。

④ 田子永《桂林市土产业简史》，《桂林文史资料》第 13 辑。

⑤ 参见民国 22 年《广西年鉴》第一回，商业。该书记载全州商家粤籍 8 家，湘籍全无。结合县志材料考证，此说当为笔误，8 家粤商当为 8 家湘商。

的重要城镇中，粤港商人是经纪行业发育的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在该线以北的广西许多重要城镇中，粤港商人也与湘赣商人共同构成经纪行业发育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仅有少数城镇，粤商势力几近于零。总体来说，近代广西城镇经纪行业基本格局是“无东不成市”的，即由粤商执掌着经济牛耳。

进出口行含合着商务行业循环链圈中第一程序业务的启动点和第二程序业务的终结点，它对整个城镇经济行业系统具有带动性和规定性；而进出口行又是内地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和现代化国际市场直接接轨的前沿行业。粤商在广西建立进出口行业，并逐步将它确立为广西城镇行业系统的主导，这使整个广西城镇经济开始发生具有现代化意义的第一轮转型。在明清时期，广西城镇经济以进出口行业的缺乏为标志，基本上仍属于封建小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内贸型经济。尽管广西也具有沿海、沿边的地位，但是贸易伸缩主要是限于国内相邻省份之间，对外贸易仅限于通过设在合浦县廉州的海关，或借道广州十三行，有限、小额、间接地进行。至晚清民国，经粤商之手，进出口行业在广西口岸城市终于诞生，打破了广西城镇行业系统千百年的封闭局面，使之开始向着世界经济体系呈结构性的开放。从此，广西城镇经济网络有了与西方商人及其代理机构乃至整个国际市场直接连接的行业环节，产生、形成了将整个广西社会经济加以统摄，直接纳入环球国际市场的崭新功能，外贸规模迅速扩大，商品过程得以简化，海外市场信息传递加速，准确度和有效性开始明显提高，从而也为广西地区赢得了当时历史条件规定下的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外贸利益。此外，粤商对广西城镇进出口行业的营造，还使广西城镇经济的区位地位较之明清时期有明显提高，使原先潜在的或发挥有限的沿江、沿海、沿边及背靠大西南、面对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开始较为明显地在现实中凸显出来。最典型的表现是，由于进出口行业率先在北海形成，北海市在晚清以来异军突起，虽

然终至整个近代，北海始终未超过梧州的广西总中心城市的地位，但确实在短时间内，凭借着进出口优势，达到了与原属广西第二大城市南宁市不相上下的经济规模水平，<sup>①</sup> 并作为广西城镇发展的一个新轴心，开始改变了明清时期经梧州戎圩抵广州并连通海外的东西发展的单一走向，使广西出现了一个以北南走向为特征，以北部湾沿海为出口的城镇经济发展的新链带。这是广西城镇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意蕴无穷的新突破。

经纪行是一个封建时代即出现的传统的中介商业行业。在资本主义近代化市场辐射的影响下，这一行业在近代的继续发展，也标志着城镇商业的社会化程度和分工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晚清民国时期，粤商对广西城镇经纪行业的营造意义正在于此。明清时期，广西已经出现经纪行业。经粤商之手创办，广西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稀疏地出现了经纪行业，时称牙行。但是就广西大多数重要城镇而言，这种中介商业行业仍未普遍出现，广西商业总体上仍处于“生产—购销商—消费者”简单环节的初级商业水平。晚清民国时期粤商在桂对经纪行的广为营造，则在广西部分地区、城镇的商业中完善了这一商业环节，使原来简单的行业三环节演变成“生产者—中介代理商—购销商—中介代理商—消费者”五环节。这一环节的添入，大大增强了广西城镇的经济功能，有效地克服了地理上漫长距离所导致的反馈迟缓和区位偏僻所构成的信息闭塞，为生产者、消费者及时准确找到买主和卖主，也为购销商及时提供了卖主和买主，从而加强了广西

---

<sup>①</sup> 据《东方杂志》第9卷第6号《内外时报》公布的数字：清代宣统三年（1911），广西海关收入关平银，梧州为115392783两，北海为21654134两，南宁为21326171两；民国元年（1912），梧州为140768489两，北海为27433729两，南宁为25054258两。这样，在该两年广西海关总收入351620564两（关平银）中，梧州占有73%份额，高居首位；北海占有14%份额，位居第二；南宁占有13%，与北海相差不多，但位居第三。

城镇市场运作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避免货物无意义地滞留和盲目流动。诚如马克思所言，“它组织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流通”，“它是一种机器，它能减少无意义的耗损，或有助于腾出生产时间”<sup>①</sup>。这是近代广西城镇经济功能一种重要的新增长。

## 第二节 入桂粤商与广西城镇百货行、专项洋货批零行、土洋杂货行的发育

百货行、洋货土货销售行是城镇商品输入业务的专业行口，组成了城镇商务行业链的第一程序行业的主干，构成城镇经济的门市销售部门。晚清民国时期，粤商的商品输入业务构成广西该类业务主要份额的局面，规定了广西的该类行业的主要营造者必然是粤商。粤商在桂经营的百货行、洋货批零行、土洋杂货行构成了近代广西城镇同类行业发育的主要部分。兹分行种考证。

### 一 百货批零行业

百货业旧时又称洋杂百货业，是销售商通过门市的综合经营，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外国和国内制造的各种生活日用百货品的专业行口。从以下覆盖广西大部分地区的城镇代表点情形来看，广西的百货批零行业主要是由粤商开设和经营的。

#### 1. 桂东区

梧州。民国22年，梧州洋杂百货业商店已知籍贯者56家，其中粤籍37家，桂籍（尤以苍梧县为多）15家，赣籍、闽籍及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5页；第24卷，第148页。

其他籍贯者分别为 2 家、1 家、1 家。又据另一则材料记载：“梧州市百货业的兴起，历史悠久，其中以广东籍人办的为多，约占 70%；广西人次之，约占 26%；江浙等籍人亦有，约为 4%。”梧州最早一家百货店，即为顺德人甘树棠于 1853 年开创，后由其子孙承袭经营，持续了 103 年之久。<sup>①</sup>可见，作为当时广西最大的商业中心，梧州的百货行业，主要是由粤商营造的。

贺州市八步区（时称贺县）。1933 年，洋杂业店 24 家，其中粤籍 16 家，占总数的 66%；桂籍 7 家；湘籍仅 1 家。

## 2. 桂东南区

贵港市城区（贵县）。据南海商人易发生先生回忆，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他所亲见的贵县城厢百货店共 7 家，新贸龙、广泰、联昌、新安泰等都是广东人开的，每家有资金 2000 元东毫左右，伙计 5—6 人。<sup>②</sup>

玉州城区。1933 年，洋杂业共 19 家，玉林本地人后来居上，拥有 12 家，在商号数上超过了粤商，但粤商家数，也仍有 7 家之多。

## 3. 桂南沿海、内陆区

横县百合街。近代以来该镇上形成的“百货街”，就是以百货业为主的顺德帮，从广州运来丝绸、火油、洋货，广开店铺而逐渐连成的。顺德人占据着街上最好、最热闹的地段，他们执掌的百货业是百合圩最主要的行业，故街圩取名百货的谐音“百合”。当地人资金微少，难以与顺德帮竞争，只能到粤籍商店中去从业，往往被聘为管账、掌柜等，才逐渐学会经商套路。<sup>③</sup>

南宁。1926—1939 年及 1945 年以后，南宁共大约出现有百

① 邓锡芹等：《百货业的兴衰变化》，《梧州文史资料》第 2 辑。

② 广西通志馆档案卷 961。

③ 赵博精：《家乡横县百合社会历史调查》。

货批发商店 109 间，其中广东罗定人开设的至少有 100 间，其资本“一般数额大的较多”<sup>①</sup>。如罗定籍的昆昌行老板黄奕，拥有 30 万元资本，是当时邕城百货业的大商户。

#### 4. 桂西南及桂西区

大新县太平土州昌平街。民国 5 年成墟时，“布匹洋杂是由广东罗定来的行商经营的”<sup>②</sup>。

百色市城区。光绪八年（1882），“厢外市肆喧闹，舟载马驮，百货去集，类皆来自东粤”<sup>③</sup>。经营此业者当多数为粤人，据民国 22 年统计，百色城洋杂百货店 35 家，粤籍 15 家，桂籍 15 家，闽籍 3 家，赣籍 1 家，不明籍贯 1 家。

#### 5. 桂南沿海区

上思县的平福圩。光绪初年，即有洋布、洋货从北海运来，经上思平福，从明江运到龙州各地去，至光绪十几年，外国棉纱、棉布、洋油和日用品全部由广东商人大量运来，广东三水客商在圩上专门开设铺头，专做转运生意，规模颇大。<sup>④</sup>

#### 6. 桂中及桂北区

柳州。民国 22 年，洋杂店 52 家。其中，粤籍 26 家，桂籍 17 家，湘籍 5 家，赣籍 1 家，3 家不明籍贯。

融安县长安镇。该镇洋杂业与土产业混合而成，通称土产杂货业，是长安镇上最大的行业。晚清民国时期，该镇这一行业先后出现了 17 家较大的商号，其中至少有 13 家为粤商开设经营的，尤其是粤商的广隆兴、建成、建生、德江隆四家，有“长安四大天王”之称。至抗日战争以前，已经卓有声名。四家商

---

① 陈培沅、谭津：《抗战前后的南宁百货业》，《南宁文史资料》1988 年第 2 辑。

②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 4 册，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5 页。

③ 光绪八年《百色厅志》卷 2，輿地，物产。

④ 《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86 页。

号在柳州、梧州、广州都有联号，由长安运输桐油、茶油、香信、生猪等土产前往销售，又从柳州、梧州、广州等城市购回生盐、棉纱、棉布、水火油、百货、京菜、京果、海味运回长安批发和零售。长安镇仅有四家为本地人经营。<sup>①</sup>

融水县融水镇。百货业的情形类似于长安镇，“融水镇解放前，经营杂货即小百货约有十余家……经营杂货店的以广东人为多，他们从柳州来此。并多与柳州的广东商人有密切联系”<sup>②</sup>。

平乐。据实地调查，民国时期的平乐百货业属于中小行业，批发业为中行业，零售业为小行业。中行业是经营人们日常生活用商品如绸缎、布匹、百货、金银首饰、药材、五金的批发（也兼零售），大多从梧州、广州进货，由平乐再批发零售出去。中行业约有三十几间商号，首先是以广东帮为势力最大，其次才是江西省的吉安等县人（又称西帮）。平乐小行业，即百货日杂小店，零售为主有几十间之多，虽大多数为本地人经营，但其中力量较大、能在梧州直接进货的仍是广东帮的裕隆、龙聚、裕昌、梁记等号。由此可见，平乐百货业主要由粤商创办和经营。<sup>③</sup>

桂林。百货业中虽然湘赣商人也颇具势力，如招牌老、声誉高的，要算光绪年间赣商的翰芳斋号，但就一般而论，百货业执牛耳者仍主要是粤商。如民国初年广东商人在桂林正阳门开设的顺泰来，“当时在资金和销路都可算是桂林第一家”。该店以百货批发为主，兼营零售，批发范围东南至阳朔、荔浦、蒙山，西南到柳州宜山、南丹，直至贵州，北到湖南。据当事人回忆，抗

① 潘兴桂、韦国光：《解放前长安镇工商业概况》，《融安文史资料》第2辑。

② 《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3页。

③ 何锦钧：《解放前的平乐商业》，《平乐方志通讯》1984年第4期。

战时期在桂林百货批发生意中最活跃的是广东罗定人，“以罗定人为主力”。罗定批发商从广东至桂林沿途均有特别的落脚点，他们采百货溯西江经抚河而上，沿途不断中转批发，以桂林为终点站。由于他们垄断货源大宗，零售商一般受他们的控制，所以在桂林，一旦听说一批罗定商新近来货，全市各家零售商和外县客户就会涌往罗定商的批发店看货、议价、选货，行栈常人流如织，热闹非凡。<sup>①</sup>

## 二 专项洋货销售行——苏杭匹头（洋布、洋纱行）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洋货是由粤人桂的主要商品。洋货店构成了近代广西城镇经济的主要门市销售部门之一。而素有“洋厂商”绰号的粤商，当然是该业的营造主力。根据洋货产品的市场细分，洋货行店又派生出各类专项的洋货产品销售行店，如洋布洋纱布、洋油行、西药行等，其中又以洋布洋纱行——“苏杭匹头行”的发展最为普遍，规模最大。在近代仍保留“苏杭匹头”名称（明清时绸缎布匹行的旧称）的洋布销售行指大致在光绪年间，随着外国工业布纱产品的倾入，苏杭铺逐渐演变为此类产品的销售行业，并成为广西大小城镇圩市与城乡民居关系最密切、规模发展位列前茅的大行业之一。这一过程中，粤商始终是主力商帮。

### 1. 桂东及桂东南区

梧州。1933年，苏杭匹头业59家，已知籍贯者33家，其中粤籍就有30家，本地人仅3家；洋纱行2家，全为粤籍。

桂平。最早和最大的一家洋布店是光绪十五年（1889）南海人开设的衡昌号。

平南。辛亥革命前后，“大安大街所有的花纱布匹，海味杂

---

<sup>①</sup> 李常光：《桂林百货业简史》，《桂林文史资料》第13辑。



货都是广东巨商经营”，粤商故有“咸虾”之称（绰号）。<sup>①</sup>

玉林市玉州区。19世纪五六十年代，粤商已在玉林县城开设了洋纱匹头批发商号，当时较大的有锦兴、安发、黄均利号。民国初年，玉林城苏杭绸缎店如经昌、万昌、公泰、又隆、雷致昌、恰合等号多是广东人经营。直到1933年时，粤商在该业的地位才被本地商帮取代。<sup>②</sup>

贵港市城区（贵县）。该行又称为花纱布匹行，广西通志馆60年代对贵县该行业历史情况曾进行过一次调查，老人们能回忆起来的全是粤商。最大一间商号是粤商德丰号，它所销售的布匹是上海货，在上海设有店口，进货从海路到广州，又经广州运到贵县，分销都安、陆川、博白、玉林等地。又据广西通志馆档案卷953记载，民国时，贵县花纱布匹业最大的商号是粤商经营的五兴、悦兴、大兴、联兴、信兴，这五家商号互相“维内”，合股经营。如忠兴号从光绪中叶开始设立，从广州、香港进购花纱布匹，再批发给附近的桥圩、兴业、迁江、宾州、横州、永淳等地客串仔。悦兴号为佛山人光绪初年开办的，从广州佛山上来的客商都在他处开设庄口。又如在贵县最大的圩镇桥圩，最大的花纱布匹店是粤商的德成号，拥资80万元之巨。<sup>③</sup> 总之，贵县各圩市花纱布匹行完全由粤商垄断。

贺州八步区（时称贺县）：1933年，该业12家，粤籍9家，贺县籍仅有3家。

## 2. 桂南内陆、沿海区

南宁。1933年，该行29家，其中粤籍19家，桂籍10家。洋纱行共7家，粤籍4家，南宁籍3家。

① 林树棠：《辛亥革命在平南》（打印稿）。

② 周践谟：《民国时期玉林商业和各行业摆卖的散布情况》，《玉林市文史资料》第13辑。

③ 广西通志馆档案卷961。

在横县的横州城。清代咸丰年间统计，经营苏杭什货业的尽是粤东会馆和新天圣宫成员。<sup>①</sup>

北海、合浦：清末明初，“南部沿海的苏杭业均荟萃于廉州、北海，尤以北海为多，北海苏杭业以批发为主，资金雄厚，货源充足，销路除廉州外，远达钦州、灵山、防城及桂南等地”，“经营者以广府人为多，较大的商号有孔怡记、昆仑、广记等”。廉州之苏杭业以零售为主，兼有批发，亦属少量分售给各乡镇摊贩行商，较大的商号也是广（州）府人开设经营。<sup>②</sup>

### 3. 桂西区

凌云县城。民国初年最大一家苏杭店是罗定籍商人开设的苏义记号，苏义记初来凌云时，开始做走街串巷的洋杂推销生意，五年后积累了300多银元，转开苏杭铺，兼营八角、洋烟的贩运生意。不到十年，就发展到5000银元以上的资本。此外的百如记、彭瑞记、陈贞记等几家最大的苏杭铺，也全都是粤商所经营的。<sup>③</sup>

那坡县城。清末，那坡县为镇安土司之地，“19世纪80至90年代，广西樟南司（音译）有五六家广东商人经营的洋货匹头行”<sup>④</sup>。

### 4. 桂中区

柳州。柳州绸布业俗称苏杭铺，专事贩卖上海、广州、苏州、杭州、湖南等地运来的各种绸缎布匹、洋纱洋布。府绸多来自上海，纺织品多来自苏州、杭州、宁波、广州、长沙等地。在柳州，苏杭铺明清时已出现，专售江南丝绸布缎，光绪以后逐渐

---

① 饶任坤、陈仁华等：《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② 邓敦衍：《清末民国年间合浦商场简况》，《合浦文史资料》第6辑。

③ 覃兆伯：《解放前凌云县城的工商业》，《凌云文史资料》第4辑。

④ 姚贤镐：《中国近代贸易史资料》引外文记载。

向以销售洋布产品为主兼营绸布演变。粤商显然是该业的主角。在清末光绪年间，柳州沙街“该处商业以粤人所开左仁昌为巨擘”<sup>①</sup>。至民国初年，左仁昌仍为柳州最大的苏杭铺，并派生出左季昌、左安昌两家大铺，号称“三昌”，其营业每天卖出1000多匹布，其营业额竟占当时柳州市全行业（共八家苏杭铺）的90%，每家存货都在两万匹布以上，存货都放在河中趸船上，货源从香港、佛山、广州入口，转销远至贵州，近至附近各县乡。1928年柳州河北发生大火，梧州绸布商六七家又涌往柳州的河南开业。<sup>②</sup>到1949年，柳州丝绸业最大商家是香港商人所开的友成隆号，总店设在广州，后来它将布匹廉价抛售，换取黄金返回香港，竟成为柳州绸布业衰落的标志性事件之一。<sup>③</sup>

#### 5. 桂北区

桂林。辛亥革命前后，苏杭业为桂林市第二大行业，共20多家，年售洋纱一二十万扎，大的苏杭店全部是粤商开设经营的，如黄汇昌、黄聪记、顺泰来、西就、广珍等等，专营苏杭绸缎、各种布匹。其中黄汇昌、西就还凭借着雄厚的实力和良好的信誉，走多角化经营的路子，兼营汇兑和发行凭票。<sup>④</sup>

三江。“客家人（广东来）来历多因经营木材及苏杭杂货等商店留居其地”<sup>⑤</sup>。

融水县城。“解放前布店有经昌（粤）、信昌（粤）和新华（粤商叶长发开办）、印昌（粤）、新安祥、新诚、利兴昌（粤）、诚昌（粤）、仁发祥（粤）、同维新（叶长发的儿媳开

---

① 光绪三十年（1904）4月至三十一年（1905）12月《广东日报中广西资料摘抄》（抄本原件）。

② 吴宏：《民国期间柳州绸布业的兴衰》，《鱼峰文史》第8辑。

③ 同上。

④ 宋维楨：《辛亥革命前后桂林商业的概况》，《桂林文史资料》第2辑。

⑤ 广西农林局主办：《广西农林专刊》附载第2期，1934年。

的)等十多家”,大多为广东人经营。<sup>①</sup>粤商经营的布业每店资本都在四五千元以上,他们从柳州行口进货,到融水镇,一方面在融水镇开店营售,同时又向融水、三江、金峒、龙岸等地方小商贩批发。<sup>②</sup>湖南商人在该业也有活动,甚至人数最多,但是主要是从事手提肩挑的小商小贩活动,他们从广东人手中批发打货布匹、洋纱、食盐等,以货郎担的方式到各处农村、山区转卖。主要活跃于城乡之间,而不长驻城镇。<sup>③</sup>

全州。全州是广西粤商势力几无的惟一的县镇,1933年该业店号22家,以湘商为主,湘籍19家,赣籍2家,不明籍贯1家,粤籍无。

### 三 其他各土洋货品专售行

#### 1. 西药业(又称新药业)

晚清民国时期,西方现代工业制药产品也越来越多地被国人接受,城镇西药业由此而兴。运输西药、在广西各城镇开设西药店的商人也多属粤籍。据1933年统计,已知籍贯的西药店中,梧州总数为5家,其中粤籍2家,桂籍2家,闽籍1家;玉林总数2家,全为粤商开设;百色惟有1家,由粤商开设;柳州总数为10家,桂商7家,粤商也有3家。在经亲者回忆当中,粤商在渔业中的比重要比残缺不全的统计高得多。解放初政府一次采集调查记载,20本世纪50年代前,柳州的西药业,即经营“注射剂、鱼肝油、维他命及一些科学制成的药品”的商号,“80%是广东人,因为新药80%来源于广州,20%来源于上海”。湖南人也是经营新药业的重要力量之一,开有新药业也有数十家,但

---

① 《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3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是在总体上仍属于很小的比例。<sup>①</sup> 在桂北的修仁、荔浦城圩，解放前先后有 115 家中西药房，60% 是粤商开设的。<sup>②</sup>

## 2. 火油专售业

洋油代理行业已在前文列入进出口行业中论举，这里所指的是火油的零星专售业。1933 年，已知籍贯的商家中梧州火油行店 6 家，全为粤商经营；南宁 2 家，粤商、本地各 1 家；玉林 2 家，粤商、本地各 1 家；柳州 4 家，全为粤商经营。

## 3. 盐行

广西及湘南、滇东南、黔南地区历史上一直行销广东海盐。<sup>③</sup> 明清时期，广西城镇已出现盐行，而且多为粤商经营。明朝时曹学佺在桂林有诗云：“广南商贩到，盐场雪盈堆。”<sup>④</sup> 晚清民国时期此局未变，广西食盐流通分三路：一是玉林、南宁等地直接向北海和雷州半岛盐场配运；二是贺江沿河县乡向广东都城购运；三是桂、柳、浔、迁各江属以及柳州以上黔桂边地，桂林以上湘桂边地向梧州购进广东海盐，此一路为广西最大盐路。以上三线的盐业行业枢纽，大部分都掌握在粤商手中。例如 1930 年时，在年销食盐六七十万担的梧州，整个盐行“实际上是为广州盐商扩大销售服务的，所以全部都是广州盐商结成合作的联号关系，有些行店更是广州盐商占过半以上资本额的‘支店’关系”<sup>⑤</sup>。梧州当时两家最大的食盐批发店，是粤商的时利和号与兆生号。抗日战争时间，两家商号批销的盐量，竟占当时梧州总销盐量的十分之四左右；后来兆生一家销盐量，竟一度占梧州盐行总销量的三分之一。两号的后台老板分别是广州市和泰

① 柳州市人民政府：《调查研究》第二期（工商调查专辑），1950 年 7 月。

② 荔浦县志办：《荔浦县药物志》（初稿）。

③ 《清高宗实录》卷 235。

④ 嘉庆七年《临桂县志》卷 8。

⑤ 庞智声：《广西商业史料》，第 227 页（广西商业厅铅印本）。

盐馆和广州兆基堂盐馆，广州兆基堂盐馆额占兆生号资本的70%，兆生号实际上为其分店。<sup>①</sup> 广西其他城镇的盐行也大多为粤商所掌，尽管优势不断递减。如民国22年，梧州两家盐店，全为粤商；其他城镇同年情况为：南宁粤籍3，桂籍9；百色粤籍2，桂籍3。广西地区惟有钦州（时属广东）沿海一带的盐行为当地商帮主要执掌。钦州为广西海盐主要产地之一，由于海盐在商品流通中的天然重要地位，使广西沿海本地商人得以因盐而兴。因此，钦盐的运销生意中，执牛耳者不是广府商人，而多是钦州一带本地商人。从钦州到陆屋—沙坪—桂平，即而上销柳桂，转销湘、赣、滇、黔各省的水陆联运盐路，盐行客商多由钦州、防城联合灵山、沙坪商人组成；从钦州陆运至南宁，继而西人桂西、滇、黔，北上桂林、湖南，此一陆路“当时以钦州人为主体的”<sup>②</sup>。可以说，有盐业作为支柱，是广西钦廉及玉林五属商帮得以在晚清民国突出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广西盐行总体上的“无东不成市”格局。

此外，据1933年统计，梧州的鞋料店、钟表店、眼镜店、颜料店、食油店、酒米店、茶叶、粉食、海味、火柴、木器、陶瓷、电器、代理报纸、书籍文具、生果、燃料、纸料、玉桂19种行店；南宁的钟表、颜料、甜食、烟草、镜器、藤竹、燃料、电器、洋灯、单车、机件等12种货物专售店；玉林的茶叶、罐头、机件；贺县的新衣、布估衣、钟表、杂货、糖饼、烟草、酒庄、屠宰、缸瓦、木料；百色的糖饼、烟草、酱料、缸瓦、香烛；柳州的估衣、工布、镜器、机件、钢铁、镶牙、影相等——以上这些各土洋杂货专售店，至少有50%以上是粤商开设经营的。

综上三部分的实证，晚清民国时期，以粤商为主创建和经营

---

① 庞智声：《广西商业史料》，第227页（广西商业厅铅印本）。

② 杨武桓：《解放前钦州盐业的产销概况》，《钦州文史资料》第2辑。

的商品输入类行业的分布，至少是一个东起梧州、贺州八步，南起钦州、北海，北至桂林、三江，西至凌云、那坡、百色，覆盖广西大部分面积和大多数城镇的，连绵不断的推进网络。由此我们可以断论，近代广西城镇整个商品输入类行业，都主要是由粤商创造和经营的，其行业的发育，主要是由粤商推进完成的。

晚清民国时期粤商对商品输入类行业的营造，对广西城镇经济近代发育全局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实际上构筑了近代广西城镇经济的主要门市销售部门。明清时期广西城镇门市销售部门主要只有百货、苏杭布匹、海咸、京果等十数种，只具备数量不大的国内手工农副渔盐货品的输入功能，而近代粤商入桂建成上述行业，则实现了广西城镇门市销售部门的重要转变：行种从十余种衍生发展为至少六十余种；输入功能从仅能输入国内商品进化到逐步能够组织输入国际资本主义大工业产品，并以此作为自身的主要功能，形成了与近代崛起并逐步形成主导地位的粤桂进出口行业互相呼应配置、连体运作的机制。这从一个方面，标志着广西城镇经济开始向外贸型、开放型、国际市场主导型的经济形态发生转化。

### 第三节 入桂粤商与广西城镇农林土特产收购行的发育

农林土特产收购行是城镇直接与广大乡村农林牧副渔矿诸业生产发生业务关系、收购并转销城乡出产商品（即商品输入类业务）的专业行口，组成城镇商务行业链条中第二程序的主干，构成了城镇经济的门市收购部门。前章已述，近代粤商收购业务在广西城镇工商经济的输出业务中占有主要份额，这也决定了：粤港商人在桂收购行业构成了广西城镇收购行业的主体部分，粤港商人是推进广西城镇收购类行业发育的主要商帮集团。

## 一 农林土特产专项产品收购行业

### 1. 谷米收购行

近代广西谷米收购行主要集中在广西的粮食运销区域城镇，即桂林、柳州、南宁三市连线以东的广西东半区，包括桂江、柳江、浔江三大流域系统的沿河各县城墟，以梧州为总汇。<sup>①</sup> 粤商是该行业中的主角。在梧州，清末光绪年间，鹤山商人梁颂唐开设的西栈、同昌两号，每日可向粤港运销从各水路收购来的谷米50万斤之巨，竟占当时梧州谷米日销量的50%。仅此两家粮号，销粮量即已占全市过半的份额，而以当时梧州的情形，还有许多粤商商家经营粮食。由此可知，梧州谷米收购行几乎全由粤商创建和经营。<sup>②</sup> 至抗日战争以后，在粤商势力已衰的情形下，1946年，梧州粮食业公会人员共85人，其中粤籍仍占38人，本地籍47人，虽略有超越之势，但在资本上仍然无法与粤商相比。<sup>③</sup> 在贵县城圩，“县城粮食大户多为粤人”<sup>④</sup>，而县城是宾阳、黎塘、横县、兴业等县谷米的收购和运销中心城市。<sup>⑤</sup> 又如贵县覃塘墟，与县城粤商大商家恒昌号有“圈内”关系的墟客如昆记、有德、合记等，可一批一单向恒昌号销出青豆、糯米或白米十余万斤。<sup>⑥</sup> 在桂平市（县）江口镇，经营粮食收购者“多数是广东人”<sup>⑦</sup>，粤商常常在青黄不接的荒年以囤积的谷米借予农民，到秋收时收取一石还一石七斗的高利率，以高利贷的形式控制农民

① 张培刚：《广西粮食问题》，民国27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第52页。

② 侯雅云：《从“四大富商”的盛衰看梧州的资产阶级》，1986年《梧州经济选辑》。

③ 《梧州解放前粮食业公会会员名册》（存梧州市工商联）。

④ 郑开基：《贵县工商史概况》，《贵港市文史资料》第14辑。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饶任坤、陈仁华等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商品粮的生产。在鹿寨县，谷米购运行业始终掌握在粤商手中，因而一旦出现粮荒岁饥，当地拨粮调米“悉由粤商”，如“前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柳州岁饥，粤东广仁善堂发出帐米数千石，运至大湟江口，适值鹿寨米谷腾贵，人心惶惶，鹿寨县商会遂清广仁善堂经理拨米六百石运至鹿寨，以资救”，使“当时鹿寨人民不致流离失所”<sup>①</sup>。在横县横州城，清代咸丰至同治年间，经营糯米、豆、谷米、粮食产品者全为粤东会馆和新天后宫成员。<sup>②</sup>在柳州，晚清民国“本市食米大部分往梧州出广东”<sup>③</sup>，米行数十家，粤商定占相当比重。据调查，聚集着柳州大部分谷米收购任务的谷埠街，就是民国十几年间，广东人首先在谷埠中路收购米粮、豆类等而逐渐繁荣起来，“而这是资本主义商业在谷埠兴起之始”<sup>④</sup>。以上诸城镇都是全广西谷米收购行业核心城镇所在，由此可知，广西城镇谷米收购行业的主干部分乃是由粤商直接创立和经营的。

## 2. 柴炭收购行

广西柴炭收购行业的发生地主要限于“桂东南一隅以苍梧为中心之一带地方”，这里“柴林丰富县水运方便，多与人口稠密需柴甚多的广东为邻，故乃成为广西柴炭输出之区”<sup>⑤</sup>。这一行业大致于19世纪50年代由广东惠州客商在梧州建立，当时惠州客商的柴炭行、店号即有十余间。<sup>⑥</sup>光绪年间，梧州开埠以

① 民国22年《榴江县志》第二编，社会。

② 饶任坤、陈仁华等：《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③ 柳州市人民政府：《调查研究》第二期（工商调查专辑），1950年7月。

④ 1987年4月23日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83级学生陈欢华等在柳州各街区调查笔录。

⑤ 潘载生等：《广西大宗出口贸易调查报告》，民国22年12月。

⑥ 饶任坤、陈仁华等：《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后，粤商经营的柴炭行则以更大的规模发展，如惠州商人江腾宵在光绪年间在梧州开设饮食店，后来发现藤县、岑溪、苍梧县一带农民常常载柴炭来梧州贩卖，船只如织，小饮食店渐形成了柴炭代销店，取名“江和兴号”。初始，柴炭只内销广东，江和兴号还在广东容奇设江万兴号。两年以后，柴炭转为以出口香港、澳门为主，与港商直接挂钩，代为运销，并在香港自设批发商号，业务大为扩展。至1921年以后，港梧之间客货轮增多，每天四五艘，香港、澳门柴商更是径直抵梧州办货。抗战期间中经一段衰落，而抗战胜利以后，港澳市场又出现了求过于供的局面，粤港商人如潮涌梧设立办庄，仅港商就有南和、和发、合兴、西泰、启兴祥等多家，广州办庄也有陈斌、梁振等十数家。港澳轮船公司还在梧州设立分公司，专为出口柴炭商运货。<sup>①</sup>桂平县江口圩在太平天国起义前，还有许多粤商开设的柴炭栏，收购大宣、紫荆的木炭，销往梧州。<sup>②</sup>

### 3. 木柴购销行

木柴购销行可分三路考察。（1）第一路是融县—柳州—梧州路。梧州为广西内陆地区木材收购行总汇，而据民国35年5月1日登记的《苍梧县板木商业同业公会会员表》统计，粤籍28家，占全行业56%；桂籍24家；其他籍1家。<sup>③</sup>柳州为黔南、桂西北地区木材收购行总汇，素有“吃在广州，死在柳州”的笑话。在柳州购木行业是由粤、桂、湘、黔、闽等省商帮共同创建经营的，各帮都形成了自己的交易机构，如联安堂为当时黔、湘、桂、闽五省帮的交易机构，安庆堂和永庆堂则为本地人的购

① 陈铁：《柴炭出口业琐纪》，《梧州文史资料》第3辑。

② 饶任坤、陈仁华等：《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7页。

③ 参见《苍梧县板木商业同业公会会员表》（民国35年5月1日），该表原件保存在梧州市工商联。

木交易机构。但是，由于杉木商品“销售梧州出广州、香港者……平时占柳市木料的70%强”，所以诸帮之中仍以粤帮为主位。如在清末，柳州有一个桂中乃至广西甚至全国同行行业中都“首屈一指”的大型木材商集团，拥有资本600万两白银，总部设于柳州，集团主角就是粤商。他们的组合情况是：桂林粤商黄汇昌，柳州粤商广和祥、亿兴祥，长安粤商广兴昌、广和昌，贵州榕江县古州厅粤商怡升恒、吴泰祥、启利祥、隆安和，赣商仅有桂林赣商汇裕丰一家。该集团在龙胜厅、全州、西延分州、怀远县（今属三江）、融县和贵州、古州等处都各自办山场，每年代客购木扎排，顺五排河、桑河、融河放排至柳州转梧州出粤港。<sup>①</sup>由柳州而上至融安、融水两县城墟，杉木行是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粤商抵达后才形成的。当时杉木商号多达百余家，<sup>②</sup>而“融江杉木多由广东木客收买”<sup>③</sup>，粤商还发展到买山植杉，在融水“经营这一行需要大量资本，且资本的周转较慢，所以，专门经营木材生意的多数是粤籍大商人，大约有十多二十家”<sup>④</sup>。其中新会人叶长发是当地头号木材大商家和大山主，仅他一家的山林约有百万株之多，约占大苗山全部杉木林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左右，每年砍伐的杉木不下10万株，占有了杉木生意从生产到运销全过程的所有利润。叶长发还在柳州设有屯积木材的总站，在南宁、桂林均设有分站，叶家杉木可直销梧州。<sup>⑤</sup>此外，其他粤商吴正元、曾冠华、宋安成、梁国权等，也各拥有杉木十几万株以上。很显然，粤商垄断了这一县的杉木商路。融江杉木商路是广西杉路主要的一路。在黔、桂

① 梁志强：《一起官甚于匪的强抢豪夺案》，《柳州文史资料》第6辑。

② 《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3页。

③ 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第四章，桂林文化供应社民国30年印行。

④ 参阅《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⑤ 同上。

邻接的大洋河一带出产的杉木，质量高，“约占桂省出口量的50%左右”<sup>①</sup>。仅此一路，粤商已控制了广西城镇杉木收购行业的主要部分。（2）其他两路。广西内陆杉路还有两路，即“恭城河运杉木顺恭城河至抚河，在梧州恭城平乐各埠均有销售，然大多运至梧州，渐销广东各埠，此区杉木出口约占桂省杉木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另外，又有贺江杉木“多产于粤桂边境之都江、川塌、大宁、桂岭各区……此区杉木之集中地为桂洲村，于此扎排后，约至广东开建，再行销粤省各埠”<sup>②</sup>。该两路地近广东，粤商人抵较之融安、融水更众，该两县城的购木行当然也多由粤商经营。（3）沿海海路。如合浦枕木收购行，也为粤商营造。20世纪20年代，侨商的新宁铁路公司兴建了广东省新宁铁路，建路初期（1906—1927）用的都是来自加拿大及菲律宾的枕木，成本昂贵，手续周折。当时，该公司董事之一香港益泰靛庄的老板陈宝琛在经营合浦蓝靛的转口、出口业务中，得悉合浦及附近各县盛产松木，河流畅通，海运顺利，松价低廉，于是提议公司全部改用合浦枕木。为此，1927年底，香港的益泰号与北海的合益号、廉州的庞福来号在廉州合资创办铁枕“福安公司”，在新宁铁路斗山站、合浦县木寨江口、钦州长墩设收发站，与新宁铁路公司签订合同，形成了固定的市场供应关系。1927—1937年间，合浦共运销枕木20万条，为新宁铁路公司节约枕木成本费用几十万元。<sup>③</sup> 综上，广西城镇大部分地区收购行业可以说主要都是粤商创建经营的。但广西也有局部地区例外，如富川、富阳街开设木行或者入山购木的都是湖南人，但是他们的收购量有限，不是为了出口港粤，而主要是就近供应贺县

① 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第四章，桂林文化供应社民国30年印行。

② 同上。

③ 庞松辉：《抗战前十年合浦铁路枕木产销概况》，《合浦文史资料》第2辑。

平桂矿场的建设用料，远不足以改变收购行业总体上的“无东不成市”格局。<sup>①</sup>

#### 4. 蓝靛收购行

广西蓝靛行业主要集中在桂东南和南部沿海城镇，蓝靛商品的广东走向决定了这一行业主要由粤商营造。在桂南沿海的合浦：该行“为清末民初廉州最大行业”，商店多荟萃下街，向有靛行之称。主要收购乐民（今属浦北县）石康、南康、福成等圩镇农民种植加工的蓝靛，从海路运销省（指广州）、港、沪及内地各染织厂，而经营者“以广府人为多……且属执掌牛耳者”<sup>②</sup>。在桂东南的桂平县新圩：直至太平天国前夕，桂平县紫荆山花雷一带，蓝农还没有东主，多是自种自卖，上市很不正常。广东蓝行商人在新圩创立收购行后，到光绪年间，紫荆山区蓝农剧增。另外，该区蓝农多为广东移民，有许多蓝农转化为蓝商，这也是粤商创建蓝行相当普遍的情形。例如，道光年间，黄珠川先生的祖父，由广东到紫荆山蒙冲种蓝，后来又转而为商，在新圩开设耀和蓝靛行，纯粹做蓝靛生意。种蓝人将种出的蓝制成靛，便挑到新墟由耀和行代卖，收回3%佣金。<sup>③</sup> 在平南、贵县、玉林、北流等县区，“种蓝人多是广东上来寻食、没有地方落业的客人”<sup>④</sup>，其中，当然有不少耀和行那样的成功经营者，转化为蓝商，成为当地蓝商的基本来源。广西蓝靛以兴业县出产最良，19世纪末，以兴业蓝为主的玉林蓝（含北流、陆川、兴业的蓝靛）经粤商之手“俱经北流江，贩运广东，苏杭人通谓

---

① 参阅《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3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② 邓敦衍：《清末民国年间合浦商场简况》，《合浦文史资料》第6辑。

③ 饶任坤、陈仁华等：《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④ 同上书，第34页。

北流靛”<sup>①</sup>。在兴业，清末民初，由粤商包揽经营的蓝靛收购行，竟成为兴业城镇行业中的核心行业。从光绪初年起，由于粤商在兴业开设许多蓝行，每年都有从广东向兴业汇入的巨额毫银，兴业因此而称“银瓮之区”，资金流量巨大，经济十分活跃，这就为粤商资本向蓝靛手工业大面积渗透奠定了前提。<sup>②</sup>

#### 5. 玉桂收购行

玉桂又称肉桂。玉桂产区主要集中于桂东南地区，玉桂主销省港的走向，规定了粤商是广西玉桂收购业的经营主体。在梧州，1923年，与港庄联合经营的粤商桂皮商号计有20余家，运销香港的桂皮成品总额达800万斤。<sup>③</sup>至1926—1927年香港海员罢工以后，粤商收手，该行业即呈萎缩，营业者仅剩两家。到1933年，参与桂皮收购业商户，仅三家，但全为粤商。在平南县，还在光绪八年（1882）时，平南桂皮就全赖“东商贩运”。在玉桂主产区圩镇六陈，1942—1948年间，有名的桂庄先后有11间，粤商开有华强、和兴、新记、成发、均昌、和盛、妙和安共七家，“垄断了平南玉桂的出口”<sup>④</sup>。六陈的粤商桂庄主要是收购容县石头、桂平的罗秀、中和、油麻、麻垌、勒竹的桂品；在另一个圩镇大安，桂庄四家全为粤商，主要收购藤县和平南大州、大坡、富藏一带的桂品。<sup>⑤</sup>可以说，玉桂收购行全由粤商所垄断。

#### 6. 油糖类收购行

广西油行各县均有，而糖行则主要集中在贵县、柳城、宜山、邕宁、武鸣、桂平、藤县、贺县、富川、恭城。油糖行也主要为粤商经营。在梧州，1933年，食油行已知籍贯商家13家，

① 光绪三十年《玉林州志》卷4，特产。

② 覃义炯等：《清末民初的兴业蓝靛》，《玉林县文史资料》第4辑。

③ 潘载生等：《广西大宗出口贸易调查报告》，民国22年12月。

④ 林树棠：《辛亥革命在平南》（打印稿）。

⑤ 莫柄楨：《六陈玉桂》，《平南文史资料》第4辑，第41页。

全为粤商。在桂平江口，太平天国起义前期，经营油糖的“多数是广东人”，所收购的大量花生油，全是转售于广东客商来船，“鹤山船每年有十几二十艘船到此运油，每船可装油二三十万斤，多可达五、六十万斤”<sup>①</sup>。在玉林，光绪年间，广东为首的邑人，“以蓝取靛，花生取油，甘蔗取糖，三者为大宗，岁得厚利”<sup>②</sup>。在邕宁县蒲庙、那莲，所盛产的白糖“贡尖糖”，经粤商设蒲庙的片糖行收购，运销港澳等地。<sup>③</sup> 湘商也时有来蒲庙扯销。在精品重要产区柳城乡大浦镇和龙头街，榨油、贩糖者都是广东商人，如龙头街的张氏、大浦镇的杨家颇为典型。<sup>④</sup> 在贵港市（旧贵县）城关，同治十二年（1873），南海商人正泰号拥有十几万两资本白银，是城关最大的油行之一，常在宾阳、黎塘收购花生，就地榨油运回贵县，转售柳州、广州，后来又向榨油手工业渗透，在黎塘、宾阳开有三间榨坊。<sup>⑤</sup> 只是在柳江以北的广西地区，油糖行才较多的被湘商、赣商所操纵。如在柳州，湖南帮商人也经营糖油向湘鄂出口<sup>⑥</sup>；又如融安县长安片糖每年都由湖南、湖北各商贩运，名扬湖广，百余年不衰。另外，在恭城种植甘蔗榨产黄糖，向外运销的又多是福建商人。<sup>⑦</sup> 但这些局部情形，改变不了糖油行总体上的“无东不成市”格局。

## 7. 茶丝收购行

### （1）天蚕丝收购行：广西蚕丝产区主要集中在桂东、桂东

---

① 饶任坤、陈仁华等：《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② 同上。

③ 农浩：《县城蒲庙镇往昔概貌》，《邕宁文史资料》第1辑。

④ 刘道超：《广西柳城县大埔镇友头乡客家历史经济》（打印本）。

⑤ 饶任坤、陈仁华等：《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⑥ 柳州市人民政府：《调查研究》第二期（工商调查专辑），1950年7月。

⑦ 梁凡夫：《恭城黄糖发展史话》，《恭城文史资料》1988年第1期。

南和桂北地区。首先是由粤商在光绪年间分别在桂林和玉林所创设。光绪年间，玉林“樟林枫木有蚕”，剥蚕抽丝，经醋浸加工，丝可长达一丈或八尺，其成品主要由“粤东客争售”<sup>①</sup>。在桂林，当地居民原来一向不知天蚕可制丝。至光绪末年，广东客商来到桂林开设店铺，每天清晨携带竹竿，到处采集蚕虫，回店抽取蚕丝，一年可分三造。计头造蚕丝一百条，可得蚕丝一两；第二造天蚕约80条，可得丝一两；三造70条，可得丝一两。丝品出后，运销广州，无本而获利。<sup>②</sup>光绪年间，“广西东北部兴安、全县、融县之樟或柳林中，盛产天蚕丝，每年例有粤商至桂林收买”<sup>③</sup>。民国11—17年，在粤商的影响下，广西的蚕丝主产区在苍梧、藤县、平南一带形成，“当时粤之顺德、南海人，前来三县各产蚕市场，开设庄口，收买蚕茧者，异常踊跃”<sup>④</sup>。

(2) 茶叶收购行：在盛产白毛茶的横县，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在横州城收购茶叶的都是粤东会馆的人。<sup>⑤</sup>容县盛产“珠茶”，光绪年间，“春来山人摘其茶，鬲人市”，由“东商（即广东商人）复拣研之，焙炒成珠，转运出洋，业此者数家”<sup>⑥</sup>。在桂北地区，才出现粤商优势不明显的情况。因为茶叶颇多走往湘赣，专项购运茶品的商人主要由湘鄂赣商帮构成。如桂林两江茶垌区盛产六垌茶，“全区毛茶历来全赖湘赣鄂商运销，光绪年间（1875—1908）最盛，其销路盛时，除湘南一带以外运至赣省吉

① 光绪三十年《玉林州志》卷4，特产。

② 郑家度：《广西金融史稿》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③ 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第三章，农产。桂林文化供应社民国30年印行。

④ 民国24年《广西年鉴》第二回，渔牧蚕蜂。

⑤ 饶任坤、陈仁华等：《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⑥ 光绪二十三年《容县志》，特产下。



安鄂省汉口”<sup>①</sup>。

## 8. 药材行

近代广西各个城镇城市药材行也主要是由粤商经营的。(1) 北海市。自 1876 年开埠以后，中药进出口行在商业中是第四大行业。1925—1937 年以前，云贵药材由北海集散，转销各地。而北海的中药材行，批发商都是广州、香港客商，他们经济后盾强，能量大，至抗战开始以后，这一行业也大多掌握在广州高州籍人手中。<sup>②</sup> (2) 玉林城区。国药批发商店，全是粤商，其中重要的业务即输出南药。南药（指广西、贵州药材）从南宁购来者居多，集散于玉林，然后经粤商转输出各地。<sup>③</sup> (3) 宜山城区。药材五倍子多由粤商购销。<sup>④</sup> (4) 桂西。田阳的“八角……生殖繁盛，粤东商贩运之，八角油分市泰西诸国，其资颇昂”<sup>⑤</sup>。(5) 桂北地区。尤其是圩镇这一级的聚落点上，粤商势力进入边际状况，药材收购商常常是湘赣商人，如民国时期在素有“白果之乡”之誉的海洋圩，经营白果收购的半数以上来自兴安、全州、湖南、江西，其中又以湖南江西人为多。<sup>⑥</sup> 但这并没有改变广西这一行业粤商主营的总局面，因为湘赣商人只能在百果的次要商路即北进湘赣方而将生意包揽到底，而在其南下广州的主要商路上，他们也只能包揽到平乐，再以下能够形成主要利润的路段，只得让给控制商业命脉的粤商去经营。

## 9. 桐油购行

广西桐油产区分两片：第一是桂东北、桂中、桂西北片，以

① 《桂林两江茶叶调查报告》，民国 26 年《建设汇刊》第 1 期。

② 陈仲桐：《北海市医药业发展史》，《北海文史》第 3 辑。

③ 玉林市医药志办：《玉林市医药志》第九节（1991 年打印稿）。

④ 参见宜山市志办存《庆远药志》（稿本，打印稿）。

⑤ 光绪八年《百色厅志》卷 2，舆地。

⑥ 灵川县志办：《灵川县工商管理志·墟镇》（手稿）。

梧州为总汇；第二是南部沿海片，集中在廉州、灵山、桥圩，以北海为总汇，而桐油销往粤港的主向决定了该业主要由粤商经营。如龙胜县“广东人主要是经营桐油发财致富的”<sup>①</sup>；三江县虽然有湘商参与桐油的生意，但是经营收购该项产品的大商人仍然多为粤商。<sup>②</sup>

#### 10. 家禽牲畜及副产品收购行

广西各区尤其是桂东南区城镇盛产生鸡鸭猪牛及副产品毛、角皮毛之类，收购行业堪称发达，粤商同样为该业经营的主要商帮。还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在横县城关，粤商即已建立了生猪收购行，大量运销生猪。<sup>③</sup> 贵县石卡镇在清代已形成著名的牛市，广东高州商人多到石卡购运牛只，人数之众，至今人们仍把石卡人称为“高州仔”<sup>④</sup>。民国以后，随着粤港市场对广西该类产品的需求增多，该行业不断发展，而这一发展也主要是由广东商人在扩大经营中付诸实现的。由于出口的生鸡生鸭“泰半运销港梧诸地”，由香港经纪行商（时称栏）支付经费，于20世纪20年代在梧州设立牲口行行口服务组织“大牲堂”，专为桂平江口、平南、大安、藤县、梧州等埠以粤商为主的鸡鸭行商人服务，“举凡行商贩运鸡鸭至梧时，必先至大牲堂着人依次指导过关，及代为定租港梧轮船舱位，使其妥为安置转载，不致紊乱纷争，凡此皆大牲堂之任务”<sup>⑤</sup>。桂平至贵县一带的猪庄，也尽由粤商开办经营。<sup>⑥</sup> 据当事人梁源先生回忆，40年代中期在贵县收购生猪的全部是驻桂广州猪庄（即穗庄），穗庄商号有公兴、

① 笔者1988年2月龙胜县调查笔录，并参阅《龙胜县外贸志》（初稿）。

② 广西农林局主办：《广西农林专刊》附载第2期，1934年。

③ 饶任坤、陈仁华等：《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④ 林天原：《关于家乡石卡乡福龙村的经济史调查》。

⑤ 潘载生等：《广西大宗出口贸易调查报告》，民国22年12月。

⑥ 广西通志馆档案卷1058。

华兴、合和兴、永兴、永泰等多家。<sup>①</sup> 梁源是 1947 年在贵县开猪庄的，直至 1950 年。据他估计，从贵港市城关收购生猪平均每天 300—400 头，多时上千头，每月上万头，每年十几万头；牛每月 100—200 头，每年 3000—5000 头。到 40 年代，贵县猪庄通常有 18 家，最大的五六家，多为广州猪栏。粤商梁源一人即设有裕兴祥、裕生、华安、大兴、永泰祥等多个庄口，资本靠入单、汇款周转。到 1946 年以后，贵县猪庄十余家，经营者 20—30 人，“类由广州、梧州来”<sup>②</sup>。在平南县武林镇，晚清民国时期，总揽南河各乡村牛群运销粤港澳生意的“盛世堂牛埠，即为粤商开设”的。<sup>③</sup> 在桂西的百色，民国时期共有两家牛皮收购部，均为香港客商派人开设，专门收购百色的牛皮运港销售。<sup>④</sup>

#### 11. 纸庄

广西纸料收购行主要集中在桂西的都安、马山、隆安<sup>⑤</sup>（马山县在民国时分为那马、隆山二县）。在相当长时间内，该业可说为粤商独占。光绪年间，纱纸收购行首先是由粤商到这三县开设的。民国 10 年以前，三县城圩都有粤港纸庄七八家。民国 13、14 年以前，都安八九家纸庄，恩隆至丁当圩两家纸庄，隆山县七家纸庄，那马七八家纸庄，全部是广庄。<sup>⑥</sup> 后来，两粤军兴，粤商收手，本地人仿而设庄，但是粤商所遗庄口，始终仍然是三县该行业的主干，掌握着当地纱纸贸易的最大宗。如民国 26 年，都安粤商纸庄虽然只有大祥、广安泰、赖万茂三家，比

① 广西通志馆档案卷 1058。

② 同上。

③ 林树棠：《辛亥革命在平南》（打印稿）。

④ 《百色县志》（初稿）第四章，交通和城镇（1960 年油印本）。

⑤ 刘炳新：《都隆那纱纸工业》，广西统计局《统计月报》民国 30 年，第 1—8 期合订本。

⑥ 《调查都隆那纱纸工业报告》，《建设汇刊》民国 26 年第 1 期。

本地纸庄还少三家，年营业额却仍占总产量 14580 担的 58%。在那马粤商纸庄七家，比本地人纸庄还少四家，年营业额却占当地纱纸总产量 10242 担的 89%。<sup>①</sup>

## 12. 鱼苗收购行

苍梧县、戎圩镇、长洲鱼苗行和鱼苗收购行，可以说全部掌握在粤商和粤籍作坊主手中。1857—1949 年，长洲鱼苗装捞小业主从 20 多户发展到 123 户，他们是从南海、顺德等地陆续迁往长洲定居的，最早的约有 10 代。大约在清代咸丰年间，建立了维护本行业利益的行会组织。长洲的鱼苗收购行也全部由广东鱼苗商组成，1921—1937 年间，长洲鱼苗贸易颇旺，每年鱼汛期，广东鱼苗商商号在长洲购运鱼苗，80% 往广东运销，其余往广西省内和湖南运销。他们有雄厚的资金，控制水运和广东鱼苗市场，拥有七八艘汽轮和二三十艘木船。这两行业既是互相直接关联的行业，其人员又实为同乡关系，关系十分密切。据亲历者潘水德先生回忆：“长洲富裕的装捞户约有 20 户，与广东鱼苗商有紧密的经济联系，他们每户和三个以上的鱼苗商有联系，他们出面兼营鱼苗经纪，或与广商合资经营。此外，大多数的中等装捞户，每逢资金缺乏，于今冬明春之际，到南海等县的鱼苗商（关系户）取定金，约得该户常年鱼产值十分之二的贷款，该户就在当年鱼汛期还（以鱼苗或现款还），不收利息。……广东鱼苗商又兼营渔具商店，向长洲装捞业推销各种渔具，……广东鱼苗商控制长洲装捞业。”<sup>②</sup> 又据笔者实地考察，平南县武林镇做鱼花生意的都是广东九江一带人。广东九江人把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经营方式带人武林镇，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武村镇

<sup>①</sup> 《调查都隆那纱纸工业报告》，《建设汇刊》民国 26 年第 1 期。

<sup>②</sup> 黎超良：《解放前长洲的鱼苗装捞业》，《梧州文史资料》第 6 辑。

农村“桑基鱼塘”仍是集体经济的重要内容。<sup>①</sup>

### 13. 矿产收购行

如贺州市八步（旧贺县），“纯锡之运销，向为八步粤商所垄断。缘各收砂厂或矿业公司，皆因资本无多，未及出货，即须向粤商预领贷款，定期交货，故粤商乘机操纵”<sup>②</sup>。

### 14. 果菜收购行

在民国年间，南宁近郊白沙村是有名的产果园地，最驰名的有枇杷、黄皮、沙梨、蜜柚、甘蔗。每当成熟季节，广东果商前来收购，运销港穗。<sup>③</sup> 南宁的正菜（即大头菜）也多由粤商包揽销售。<sup>④</sup> 在三江县，特产金橘由“粤商倍价争购”<sup>⑤</sup>。

### 15. 麻布收购行

桂林六塘的麻布收购行业，商帮甚众，但是此地粤商势力已很微弱，计有长安、柳州、庆远、芦圩、平乐、阳朔六帮<sup>⑥</sup>，显然以广西帮为主，但其麻布商路主要运销省内农村，而不走港粤，这当然决定了收购商帮以桂帮为主，而不是以粤帮为主。

主要由粤商开设和经营的，还有许多细分的收购行，这里不再一一罗列。

## 二 综合类土产收购行

除了上述专项收购行以外，广西各城镇还普遍设有综合经营的土产收购行，有时称为山货行或者土产行，主要也是由粤商开设经营的。（1）在桂东区的梧州，土产收购行又称为土产采运

① 据1991年7月平南县武林镇务站粤商后裔卢中平等口述。

② 吴尊任：《粤西矿产纪要》篇四，锡矿，民国25年梧州文化印刷局印行。

③ 雷正兆：《忆白沙旧事》，《南宁文史资料》1987年第3辑。

④ 周孝光：《南宁土特产九种》，《南宁文史资料》第13辑。

⑤ 民国35年《三江县志》卷4，经济。

⑥ 《桂林六塘麻布业的调查报告》，民国26年《建设汇刊》第1期。

业。梧州采办业专到下河如肇庆、佛山、广州江门等地采办广西土特产，该业全为粤商包揽。由于靠近广东，业务以广东各路直接分流，所以粤商又可细分为各个帮口，有广州帮、江门帮、肇庆帮、鹤山帮，各按自己的销路情况向市面购进，该业与粤帮操纵的经纪行关系特别密切。<sup>①</sup>（2）在百色，山货土产收购行多为粤商经营。清末民初，百色该业最大的商人之一即粤商黎弼臣。光绪年间，他开始经营八角、云耳等土产山货，设立三益行、年记等商号，牟利数万，成为百色镇新崛起的富商。由于他的收购业在百色举足轻重，1920年商会成立，他被推为第一任会长，有“商界绅士”之称。（3）在桂西北的融安县（时为融县一部分），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粤人黄和胜从百寿（今属永福县）迁到雅瑶村开店经商，卖杂货，收土产，生意渐旺，竟使当地逐渐从一个小自然村形成一座小圩，故当地民歌曰：“先赶黄和胜，后赶瓦窑圩。”<sup>②</sup>融安县该业也多由粤商经营。在板栏圩，商人收购茶油、桐油、香信、竹木土产等，“以广东最多”。该墟盛产茶油、木材、有“油海”之称。在大坡、龙妙等圩，情形亦同。<sup>③</sup>（4）在桂北区的桂林市，山货业有百多年的历史。据1948年《桂林年鉴》统计，山货同业公会会员有72人，可惜未记载籍贯，但是可以推断，粤商在其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20世纪40年代的桂林商人褚新俸，当时就与广东客商合股开设谦和泰山货行。依托广州客商的能量，谦和行发展很快，该行大量收购香菇、罗汉果及其他药材。罗汉果加工运广州出口外销，在广州、上海也设有分庄。由于他信誉好，桂林有很多经营百货布匹、往广州购物者都愿与之兑换银毫，15、20天后到

---

① 黎奉梧：《解放前梧州的经纪行和跑街经纪》，《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② 莫宗秉：《融安县农村墟场调查》，《橘乡今昔》1988年第1期。

③ 同上。

广州该行的庄口换取港币，采购货物。这说明，即使在桂商的企业中，粤商因素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能量。<sup>①</sup>

以上所枚举，已多达 39 个城镇圩市点，分布面广达桂东、桂东南、桂中、桂西、桂东北等几乎所有广西地区。行业内的细种多达 15 种，包括了当时广西所有外销大宗产品的收购行业。除了有个别地区少数行种的收购业由湘桂等商帮执牛耳外，全部是由粤港客商创建和经营的。因此，近代广西城镇经济收购行业的发育，确实主要是由入桂粤港客商收购行业的发育构建其内涵的。

晚清民国时期粤商对广西城镇收购行业的营造，与粤商营造的出口行业相互配置，组成了崭新的城镇商品输出类行业序列，带动了明清时期广西已出现的收购行业，发生以下重大的变化：它使广西收购行业适应输出货品种类剧增的要求，在行种上进一步衍化细分；它也使广西收购行不断随着商品货源点在广西各地的增辟，将其分布网络不断蔓延扩张，推入到最基层的圩镇，特别是推向素有“土特产仓库”之称的桂西地区；它还使广西收购行配置于近代出口行业的突出发展和以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为基础的世界市场拉力的陡增，在类型上，从国内市场导向型或者省际内销型向着国际市场导向型或者国际出口型转变。例如：明清时期，广西桐油行是以广东市场为导向的，桐油主要销往广东，用于“油饰木器、用具、油布、雨伞、船艇”。但是，晚清以后，则转变为以国际市场为导向，民国 26 年，广西桐油 70% 销往美国，余则至香港、英国、法国、德国等。它满足的是国际市场的需要，即“自世界大战以还……因桐油除具速干不透水及防腐之化学特性外更有不传电流之作用，故近年电机电线海底线及一切电器之制造多用桐

<sup>①</sup> 李常光：《桂林山货简史》，《桂林文史资料》第 11 辑。

油……至如飞机、气球气管、汽车之轮制部分、肥皂胶布、雨衣等制造，其赖于桐油者亦有多”<sup>①</sup>。上述诸端变化，使广西城镇收购行业的发育开始逐渐摆脱古典的形态，迈上了城镇经济早期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梯。

不过，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粤商也有一些收购活动是不利于甚至危害广西城镇经济收购行业的健康发育的。最典型的是粤商十分热中并作为主要商帮开设和经营的滇黔鸦片收购行（又称烟土行或特货行），而该行业在当地竟成为广西许多城镇的最大行业之一。<sup>②</sup> 粤商经营开设的烟土行，所致的后果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它使鸦片走私猖獗，烟毒成灾，民生涂炭，巨额资金不正当耗流，从而严重阻碍了工农商业经济应有的、正常的发育和成长。当然，这不能全部归罪于粤商，从根本上看，这是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必然导致的恶果，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一点，全盘否定粤商在广西城镇收购行业方面的建树。

#### 第四节 入桂粤商与广西城镇私营金融行业的发育

私营金融行是指民间围绕着工商经济、平民生产和生活的资金流通需要而在城镇举办的资金融通和信用部门。晚清民国时期，港桂、粤桂之间金融业务在广西金融总业务中的主要地位，也决定了近代广西城镇该行业的主干是由粤商营造的。粤商金融行号的起源，形成，规模扩大，功能的不断多元、完善的过程，也构成了近代广西城镇私营金融行业发育的主要过程。本节拟分两个大类和五个小类分别加以申论。

<sup>①</sup> 民国 25 年《广西桐油种植压榨及贸易调查报告》。

<sup>②</sup> 参见拙作《近代滇黔鸦片与广西烟土商路》，《学术论坛》1992 年第 5 期。



## 一 银钱找换业和银号业

### 1. 银钱业

该行业本属我国封建社会小商品经济时代旧式的原始的金融机关，其主要功能在于不同货币之间的互相找换，兼营汇兑、买卖有价证券等业务。广西该业中较大的商号多为粤商开设，但是，为数众多的小商号则多为广西本地商人开设。例如，1934年，南宁银钱找换业有52家，其中40家为广西商家，12家较大者则为粤商商家，粤商仍不失为该业的重要商帮。<sup>①</sup>但毕竟由于该行业的原始古老，利润有限，在近代已经不再是粤商主要投资的行种。

### 2. 银号业

银号业是从传统的银钱业脱颖而出、单独成行，具有近代工商银行萌芽性质的新兴的金融行业，它是近代商品和货币流通量大为增加新形势下的行业产物。它起源于银钱业，以至在解放前工商业中往往将其同划于银钱业的范围，但就其性质及功能确实已与银钱业有了根本上的转变。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学家吴半农、韩德彰、千家驹先生就给银号的概念划定了这样的范围：“所指的银号乃指公开设立营业做存（储存）放（揭放）及汇兑业务者，而银钱找换处或不以存款及汇兑为专业之商号，则不计入。”<sup>②</sup>1935年12月11日广西省政府制定的《广西省经营银钱业商号暂行章程》作了明确规定：“凡资金在十万元以上者，称为银号，得经营上述六项（按揭、存放款、汇兑、票据贴现、买卖有价证券、钞票、铜元转换，从中收入利息或贴水——笔者

<sup>①</sup> 南宁市金融志办：《南宁市金融志》（1840—1988）（铅印本），第49、51、69页。

<sup>②</sup> 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第196页。

注) 业务即银行委托代办银钱事项。”<sup>①</sup> 它的主要业务与只能满足一般银钱找换的银钱业不同，也与主要为官府调拨银两服务的山西票号有异，有着鲜明的工商服务目的。它的汇款业务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地点的商家之间的货款交易、生意往来的需要，如民国 23 年，梧州银号全年向广东省商人汇出约 2000 余万元。存款业务则主要是为方便工商资本家储蓄利得，积累资本，如梧州银号“存款之最大存户为广州、香港及梧州之特货行、花纱行与盐业行，约占存款总额百分之七十左右”<sup>②</sup>。放款则是利用社会游资，向工商者提供周转资金，以利其顺利完成经济运转，扩大经营规模，1934 年南宁银号对平码、花纱、苏杭杂货几个大行业放款就占总额 70% 以上。<sup>③</sup> 它是近代广西民间资金市场形成的主要的行业标志。这种与银钱业不同的独特性，使之形成了自身独立、不包括银钱找换业的行会组织，如梧州的昭信堂组织，只接纳梧州 24 家具有存汇兑能力的银号为会员。<sup>④</sup>

银号业首先由粤商在光绪 25 年创立于梧州。1897 年梧州开埠，两年以后，鹤山人梁颂唐以 3 万元白银开设了均隆银号，后来又先后开设福隆、慎隆银号，号称“梧州银号大王”。他的银号加上当时梧州其他五家银号，总共资本额约为白银 50 万元。<sup>⑤</sup> 1905—1915 年，主要由粤商创办的银号业增至 20 家，总共资金有白银 100 万元，构成了梧州市四大经济行业之一。人民国以后，此种情形更典型。因为银钱的收与放直接左右着梧州乃

---

① 民国 36 年 12 月 11 日广西省政府《广西省营银钱业商号暂行章程》。

② 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广西省经济概况》金融部分，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印行。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至广西的整个市场，梧州工商各行业每日都要从银号入揭大量现金，以资周转，西江中上游即上河各埠，广西大部分地区的当铺，也主要要从梧州银号大量入揭现金，入揭现金额多达一次白银10万、8万元之多。据吴半农等人调查，民国22年梧州有银号22家，其中顺德籍9家，南海籍8家，大浦、番禺、鹤山、新会各1家，广东其他地方的2家，总计粤商共有23家，比例高达95.83%。<sup>①</sup> 而此行业资本相合多达200万元左右。梧州银号中粤商比例如此之高，可谓全部包揽了银号业的经营。其原因在于梧州地踞两粤，以粤港为轴心的两广资金长距流动，梧州位置最为适中，既能最方便地吸收大量的港粤资金存款，形成最雄厚的揭放能力，又拥有在该城聚居最密集、经营行业最多的粤商人口作为最可能有利可图的放贷对象；既是港粤资本汇桂投资和粤商在桂所致利润返汇广东、香港的总汇处，又是粤商作为广西商人和银号债权人在桂督债的总監站。资本的利润是市场经营利益的集中表现，经营资金通融的行业，必须树立良好的信用形象，这在当时经济运作尚未充分现代化，宗族和地域认同在商业信用中仍起着重要作用的中国乃至广西，势必无形地规定了专营此业的银号悉由粤港商帮构成。因此，参与上述资金流通业务各环节上的商人，主要都是粤港商人。

在粤商势力稍逊、广西地方商人和省会行政机关团体较多参与资金流通各环节的南宁，粤商在银号业中比重已明显递减，但毕竟南宁仍处于粤商人桂商路的要津，故而粤商仍基本保持着在银号业中的主营商帮地位。据吴半农等罗列的南宁银号业，籍贯、资本情形如下表：

---

<sup>①</sup> 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广西省经济概况》金融部分，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

表 2-2

1934 年登记的南宁银号概况一览表

名称	店东籍贯	设店年月	经营业务	店号人数	资本数额
裕利	广西	1932. 1	存放汇兑	10	115383
南丰	广东	1928. 9	同上	3	19231
南生	广东	1932. 5	同上	6	16000
怡隆	广东	1933	同上	6	
顺兴	广东	1933	同上	5	
德祥	不详	1933	同上		
良资	广西	1931. 3	同上	7	12000
德恒	广东	1931. 10	同上	7	3077
达和	广西	1922	同上	9	12308
天丰	不详		同上		
信祥	广东	1933	同上	3	
元记	广西	道光三年 (1823)	同上	6	

资料来源：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印行，第 204 页。

从上表可见，南宁银号业共 12 家，粤商肯定有 6 家，占 50%。南宁银号业是南宁以粤商为主的花纱行、土货行、特货行、平码行的突出发展刺激<sup>①</sup>和作为省会城市的位势相叠合的产物。一方面，南宁位处梧州至桂西南的适中点和北海入内陆的第一内陆口岸，为粤商人桂商路主路的要津城镇，以粤商为主经营的花纱内销、烟土外运、经纪中介，其为重要枢纽；另一方面，南宁虽不似梧州比邻港粤，可直接吸收港粤游资，但是地位处于广西政治中心，军政机关团体聚集，集中着大量的军政性资金。于是，在南宁便出现了以商路优势为背景的粤商和以桂系军阀地方实力派为背景的桂商共同经营银号业的局面。粤商银号业在经

<sup>①</sup> 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广西省经济概况》金融部分，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印行。

济上要比桂商银号业拥有更大的业务伸展空间，而桂商则可将政治特权转化巨额的行业资金，开设像裕利号那样的资本特巨的银号业，但是从市场常规发展来看，该业仍是以粤商为主导地位的。

柳州银号的全而情况缺乏统计，但是可以肯定，粤商为银号业中举足轻重的商帮。如1920年从典当业转换而来的忠安银号，为广东顺德人陈敬堂开设，经营金银钱币找换、汇兑业务和信用放款业务，在香港、广州、佛山、梧州等城市均设有联号，信息灵通，柳州民间异地结算多在该号汇兑。对本地熟识可靠，信誉好的商号也做信用放款业务，“该号在柳州银号业中地位重要，为第二大银号”<sup>①</sup>。

桂林惟一的一家银号裕益号也为粤商开设，是民国24年4月广东裕国号开设的分号，以存放汇兑为主业务，虽然仅有一家，但在桂林是与广西银行桂林汇兑所同为周转桂林金融的两大中心之一。<sup>②</sup>

在其他城镇，还有一些零星的银号，也多为粤商开设经营。在龙州，自龙州商会1904年成立以后，以粤商为主的众商合股开设兴隆银号，“仿造外国银行例，至微之款，亦得贮藏生意”，又利用与家乡广东的关系，“于广东又设新龙分银号，期渐与各埠交通”<sup>③</sup>。在桂北区融水县的长安镇，“清光绪初元，长安有营业之银号，约新生昌、新泰龙两家，为粤人开设”，其目的带有明显的同籍商帮服务目的，“便于粤商之汇总存放”<sup>④</sup>。

限于目前掌握的资料，广西全境的银号业未能逐家考察。不

① 《柳州金融志》第二章，金融机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南宁市金融志办：《南宁市金融志》（1840—1988）（铅印本），第49、51、69页。

③ 光绪甲辰年七月二十四日《广东日报》，第1页。

④ 民国25年《融县志》卷2，第四编，经济。

过，从以上考察，我们可以推断：东起梧州，北至融县、桂林，西南至龙州这一覆盖广西大部的区间，城镇银号业当大部分为粤商所创设和经营的，粤商的银号业构成了广西银号业的主要部分，其发展和扩大构成了广西银号业近代发育的主要过程。对于这个局面，民国 22 年《广西年鉴》第一回作了这样的概括：“广东帮在桂经营银钱业为最早，而省内各地之银号和银庄，也以广东帮所开设者为多，尤以南宁、梧州为最多，且其资本雄厚，势力稳固，广西帮虽有数家资本雄厚者，然实寡不敌众，亦难与之抗衡。”<sup>①</sup>

### 3. 20 世纪 40 年代的银楼业、私营银行业和兼营金融业

柳州在 1937 年以后，随着湘桂铁路的通车以及国民党政府移至重庆，工商业纷纷前来落业。柳州进入向广西首位工商业城市过渡的时期（这种趋势一直延贯至 20 世纪 50 年代，柳州正式取代梧州，成为广西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在柳州，粤港商人始终是金融行业中主要的经营商帮之一。

（1）银楼业。银楼业是专门从事黄金白银买卖的金融行业。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由于战局接踵，偏安一隅的柳州人口激增，当时经济动荡，物价不稳，法币贬值，这种贵金属的买卖在金融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这一行业首先是从素善经营金银首饰加工的赣帮金铺转化而来的。1940 年，赣商毛祥云设老凤祥金号，柳州始有以金号正式经营的商店。1946—1949 年间，赣帮金号至少 13 家。赣帮虽然是柳州金号行业的创造者和经营商帮之一，但是粤籍商帮即广帮仍不失为柳州金号行业与江西帮分庭抗礼的又一主要商帮，在总势头上甚至还略占上风。<sup>②</sup> 广帮金铺资本额较小者与江西金号一样，大多是购进黄金，加工金手镯、

<sup>①</sup> 民国 22 年《广西年鉴》第一回，金融部。

<sup>②</sup> 刘郁卿：《抗日战争前后的柳州银楼业》，《柳州文史资料》第 5 辑。

戒指、耳环等，赚取加工费和成色费，以门市为主，做代换金银外币的生意，偶尔也在柳江路踏足炒卖黄金、白银。如1943年，香港商号永隆金号正式在柳江路开办，专营黄金汇兑业务。<sup>①</sup> 资本较大者虽也兼营门市，但主要业务还是在柳江路炒卖黄金、白银，同时兼投机日息，追求高利，吸收纯金。当时，柳州的金银外币毕竟主要来源于广东、香港或者粤商具有优势的地区和地区。其来源总况如下：黄金外币多由港穗富商巨室疏散柳州时携带而来；或向港穗等沿海出口物资、购回黄金外币；沙金银毫则自粤商把持商路的藤县、梧州、桂平运来；金条先后从东兴、越南河内、西贡、泰国、港澳运来，而此金条来源区多属粤商把持商路，或商业中枢地区。当时，在柳州只有光洋一项是从赣商把持商路的湖南而来，这种局面当然造成了粤商在银楼行业中较之赣商有更大的业务优势。所以，如同亲历人所回忆的那样：“‘广帮’因占地利和人和，业务一般较江西帮活跃。”<sup>②</sup> 显然，尽管与赣商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粤商仍然是柳州银楼业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首位商帮。

(2) 私营银行业。广西最早的现代信用机构是1917年成立的官办广西银行。私营银行指的是由民间举办的现代信用机构，在1939—1942年间，开始成为西南贸易中心并向广西首位经济城市过渡的柳州，现代银行制度也开始在私营金融民间信用领域中出现，当时即出现有八家私营银行。<sup>③</sup> 银行信用是信用发展的高级阶段，它除了传统的存、放、汇形式，还有国际结算、国家信用货币、国库、国债、信托和联行往来等信用形式。柳州私营银行的兴起在当时的广西具有私营银行先河初开的地位，而粤港

① 刘郁卿：《抗日战争前后的柳州银楼业》，《柳州文史资料》第5辑。

② 同上。

③ 《柳州金融志》第二章，金融机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商人在该行业的创建、经营过程中，又始终是最主要的经营商帮之一。柳州当时有八家私营银行，可知创办者籍贯的五家，其中粤籍两家，即1942年2月潮州商人黄氏创办的光裕银行和1942年由粤籍新马泰华侨为主联合创办的华侨联合银行，其他三行则为四川省商人凭借重庆陪都政治上的地位，将触角伸向柳州而创办的亚西银行和聚兴成银行，以及浙商创办的实业银行。<sup>①</sup>

(3) 广西各地兼营民间工商信用行业。20世纪40年代末期，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商业萎缩，货币贬值。广西城镇一些较大的行号，如经纪等商业各大号为了减少财产贬值的损失，都纷纷转向或兼营金融投资，发放行票“本单”，办理日息，即工商的短期借贷，往往五日为一期，同时还兼营汇兑和经营买卖。这一经济行为的主角，也以粤港商人为主。在南宁，粤商为主力的经纪行业“原以经营代客买卖收取佣金为主要业务，这时大都转到经营‘地单’，最盛时一百多家集中在仁爱路段，经营此项投机业务”<sup>②</sup>。典型的如港商在邕设置的友盛隆经纪行，“在资金松余时就炒‘地单’兼做汇拨，销货后就地收取款项；如遇银根紧缩，即用汽车运送钞票应市。因此，‘地单’人价便宜，汇拨收入比别人高，赢利惊人，颇能左右南宁金融市场”<sup>③</sup>。在梧州，以粤商为主构成的经纪行业，纷纷兼营从商号及个人手中吸收寻求保值的大量游资，大做贷放日息的生意。他们日息发放对象也主要是粤籍商帮中经纪行的殷实大户和港澳客商为老板的出口行商。<sup>④</sup> 在柳州也有同类情形。典型如1946年港商在柳州开设的友成隆，该号原先经营花纱、布

① 《柳州金融志》第二章，金融机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南宁市金融志办：《南宁市金融志》（1840—1988）（铅印本），第49、51、69页。

③ 同上。

④ 桐声：《解放前梧州市的日息与“理会”》，《梧州文史资料》第13辑。



匹和绸缎，从1948年下半年起，兼营货币存放业务和金银买卖。该号为香港友成洋行分号，由顺德籍香港资本家邓氏承包，总店设在广州。在邕梧柳沪渝也设有分店，邓氏总资本有200万元港币，在柳州的分店友成隆号拥有20万元港币资本。该店发行的本单有港币、大洋、东毫、黄金、国币五种，日息每百元3—5角，存放款期限3—7天，最长半个月。该店拥有一流的交通通讯设施，各联号互通长途电话，置有运输汽车，随时掌握四省七地金融信息脉搏，以港币为本位，低进高出，总店核算平衡。“由于信息灵、资本大、调度灵活，成为柳州金融市场的执牛耳者。其他经纪行都以该店经营的动向定进出。至解放前夕，柳州友成隆的资本由20万港元增至60万港元，高峰时达到70万港元”<sup>①</sup>。

综上，近代广西城镇经济生活中，主要面向工商业的民间信用行业的发育，无论是哪类系种还是在哪一段时期，都主要是由粤港客商推进完成的。

## 二 典押行业

典押行又称典当行，它是以实物为抵押，按照一定折扣，贷放现金到期收回本息的一种短期融资行业，其业务性质相当于银行中的抵押贷款。它与银号业、私营银行业的不同点，在于它所发放的贷款对象主要是一般的城乡平民，而不是工商客户。典当业在我国起源于南北朝，至清代前期在广西已经颇多出现。嘉庆六年（1801），广西约有177间。<sup>②</sup>此数显然不全面，而且未包括钦州、防城港、北海等当时属于广东省区的南部沿海地市。入近代以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天地会的焚劫典当的斗争，曾一

<sup>①</sup> 《柳州金融志》第二章，金融机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sup>②</sup> 嘉庆六年《广西通志》卷1，经政略，统计。

度给广西作为高利贷剥削的符号的当铺以摧毁性的打击。<sup>①</sup> 但是不久以后，典当又作为城镇经济一种不可缺少的民间信用行业，次第恢复并有所发展。据广西工商局 20 世纪 30 年代统计调查，共有典当 182 家。通常情况下，广西典物月息为 3 分，这从清代中叶始直至民国中期大致未有变动。如 19 世纪 50 年代贵县、象州、桂平等地城圩典息都是月息 3 分。1934 年，千家驹等统计广西 27 家典当业中，有 25 家为 3 分月息<sup>②</sup>，典当期限分别为 3 年、2 年、1 年，最通常为 1 年期。<sup>③</sup> 典物以衣服最多，1933 年占典物总数的 60% 左右，此外还有被帐、绸缎、金银首饰、农具等等。<sup>④</sup>

由于粤商是最容易从富庶的家乡广东或者广西各埠生意获利获得闲置资金的商帮群体，他们是广西闲置资金最大的拥有者和掌握者。当粤商入桂站稳脚跟以后，便会纷纷投资典当这种风险较小而又稳取高利的民间信用贷款经营中去。实际上，这一行业在明清即已形成“无东不成市”局面。虽然广西当地地主官僚也颇乐于投资经营这一行业中，特别是民国以后，他们的上升势头还颇有直追粤商之势，但就其总体而言，他们还远不如粤商活跃，粤商始终是近代广西城镇典当行业的营造主体，他们经营的典当行店构成了广西近代典当行业的主干，粤商典当业发展的过程构成了广西典当业发育的主要过程，以下分区详证。

### 1. 桂东区

在苍梧县戎圩，从道光年间（1821—1850）起，即有当铺

---

① 参阅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马冠武教授关于近代广西典当问题的论述，载钟文典主编《近代广西社会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元吉、公信、恒益三间，月息3分，均为粤商开设。<sup>①</sup>在民国时期，梧州有昭信押、大德押两间，均为粤商开设。民国时期贺县有当押六间，全为粤商开设，他们是：三水人开设的公昌押，资本2.1万元，职工15人，年营业额9万元；新会人开设的广安押，资本2万元，职工12人，年营业额6.73万元；八步镇的谦吉押和阜昌押，老板黄叶吉和利鸿图都是南海人，资本分别为东毫银1.3万两和2.7万元，年营业额每家都超过7万元<sup>②</sup>；信都镇有当押两间，经理崔氏和徐氏都是粤商。<sup>③</sup>

## 2. 桂东南区

在玉林，“当押业一项，亦以粤商最早，民国以后才逐渐转由本地富户学会经营”<sup>④</sup>。在贵县，情形类于玉林，清代嘉庆二十年（1815）直至咸丰年间（1851—1861），贵县各城圩各有当铺36间，都有粤商林宝昌的股份。按当时贵县的习惯，“广东人开当铺与开铺头，都不与本地人合股……只与广东人合股”<sup>⑤</sup>，可以推断，36家典当全为粤经营。据梁崇鼎纂修的《贵县志》卷七记载：“当押皆商人合资开设，独资经营者罕见，清代业此者，多为粤商。”<sup>⑥</sup>直到19世纪30年代，粤商典当业在贵县的势力才明显缩减，反被模仿开当的本地官僚地主赶超。当时，贵县22间典当，“除一间是港商，一间是侨商投资外，还有少数几间是粤商来此地开业，多为本地巨股首富经营”<sup>⑦</sup>。在桂平县麻垌圩，民国初年最大的当铺福生小押即为广州人阮福生

① 梁天谷：《解放前苍梧县私人信贷活动》，《广西金融史志资料》第5期。

② 民国23年《贺县志》卷4，第四编，经济。

③ 民国25年《信都县志》第四编，经济当押。

④ 周肇天：《粤商在玉林与粤东会馆的建立》，《玉林文史资料》第15辑。

⑤ 饶任坤、陈仁华等：《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3页。

⑥ 民国24年《贵县志》卷7。

⑦ 梁元薰：《旧贵县的典当业》《贵港文史资料》第1辑。

开设。当铺 100 股，每股有 1 万银毫，共计拥有股本 100 万元银毫。<sup>①</sup>

### 3. 桂南沿海区

在清末民初，合浦县内各大乡镇均有典当行业，“以广府人经营为多，且执牛耳者”。廉州最大之当铺大生当，即系广府何姓人经营”<sup>②</sup>。

### 4. 桂中区

在湘赣商人较多渗人的桂中、桂北、桂东北区城镇，典当业中湘赣商人却很少涉足，而多由粤商充当主营商帮。在清季民初，柳州有 13 家典当，其中已知籍贯的为联安当铺，即为粤商陈敬堂开设，其典当规模仅次于柳州首富安顺当，估计未知籍贯者中粤商也颇多。<sup>③</sup> 19 世纪 50、60 年代，“象州县城内有不少当铺，都是广东人开的，大押为期三年，年息三分，小押为期一年，利息是‘九出十三归’”<sup>④</sup>。武宜县城的典当行业，从光绪年到民国 4 年间，先后有福昌押和忠信押，全由粤商周熊徽创办经营。在晚清民国时期柳城县浦镇，先后有两家典当，其中开设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家是同盛当铺，老板李耀南系广东人氏，资本多达 50 万至 60 万银元<sup>⑤</sup>。而又据广西师大刘道超先生实地考察，“该当铺大楼高达七层，为大浦之最”<sup>⑥</sup>。在融水县城，“清光绪八年（1882），广东商人在县城外桥头街开设了福昌押，并与长安分设接当，一直持续二十年之久”<sup>⑦</sup>。

① 据 1974 年广西师院历史系师生在桂平历史调查笔录。

② 邓敦衍：《清末民国年间合浦商场简况》，《合浦文史资料》第 6 辑。

③ 《柳州金融志》第二章，金融机构，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④ 饶任坤、陈仁华等：《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2—23 页。

⑤ 同上。

⑥ 刘道超：《广西柳城县大埔镇龙头乡客家历史经济调查》（打印本）。

⑦ 民国 25 年《融县志》第五节，实业。

## 5. 桂北、桂东北区

在平东县，典当业全由粤商包揽，平乐帮、江西帮、湖南帮都未有涉足典当业者。民国 22 年，县城有谦益当铺，由南海人利展鹏开设，资金 3 万银元，每年营业额 5 万元，源头圩也有南海人刘佐良开设的一间当铺，资金 2 万银元，年营业额也为 3 万银元。在平乐沙子圩，解放前典当行业系“广东客商以沙子富户合资开设，资金为各行之冠，先后有仁义押、益安押、治安押。主持者……均系广东人”<sup>①</sup>。在荔浦县，县城和修仁镇，解放前先后有六家典当铺，其中五家是由粤商开设的。<sup>②</sup>在桂林，辛亥时期，桂林饷押计有鸿昌、广生、鸿记、遂生、广济、粤昌、裕生、宝生等八家，名为八桂堂。这八家饷押完全是广东籍大资本家英裕隆的老板英辅臣和桂籍官僚资本周寿丰的店主合资开设的（按当时清政府的规定，每年每当押须缴纳饷银 300 银元给当地政府，解缴藩库，充做军饷，称为饷押）。甚至在桂北门户、湘赣商帮优势区的全州、灌阳，粤商在典当业中也曾为主营商帮，在清季到民国 10 年间，全州有当押两家，福裕号由粤人设立，另一家则由闽人设立，两家当铺都“资本钜大”，直至民国 10 年时才歇业。<sup>③</sup>在灌阳，从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 1914 年，“其典当开行者，皆湘粤客民”<sup>④</sup>。

## 6. 桂西区

在田东县平马镇，口碑所传的惟一典当“人和当铺，为粤商梁氏开设”<sup>⑤</sup>。在大新县桃城，从光绪十四年（1888）到民国初年，先后有三家当铺，其中粤籍一家，闽籍两家。但是当铺的

① 赵国靖：《平乐典当业》，《平乐方志通讯》1985 年第 2 期。

② 《荔浦县金融史志稿》（手稿），荔浦县志办提供。

③ 民国 31 年《全县志》第七编、经济。

④ 民国 3 年《灌阳县志》卷 4，风俗。

⑤ 苏寿彭：《解放前平马工商业概述》，《田东史志》1987 年第 4 期。

资本规模以粤商为最巨，为光洋 1000 元，闽人两家分别为 500 元和 800 元光洋。<sup>①</sup> 在龙州，清季民初直到 1926 年以前，龙州惟一的典当铺“瑞丰祥”就是南海人梁兆生所开，该当铺为深宅大院（1930 年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龙州起义的指挥部，现列为广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sup>②</sup> 在宜山，清末民初，有当铺三间，资金最雄厚的是粤商李镜泉独资的大生当押。该押还同时兼做囤收生意，囤积大批食油、煤油等，待涨价时抛售，牟取暴利，该号对宜城市场影响很大。<sup>③</sup>

综上考察，虽然桂籍典当商在某些地区、城镇颇有后来居上的态势，在湘桂交界的县份，湘商经营典当业也颇具优势，但这些仍不过是局部情形，无法改变在近代百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广西大部分城镇典当行业的“无东不成市”总体格局。粤商主掌典当业，成局并非偶然。典当行业作为城镇主行业之一，也要遵从着粤商居桂主位商帮所隐含的区域经济客观机制的规定，遵循着与粤商相关行业延伸发展规律。比如，面对社会上人数众多的平民典贷需求，典当业仅靠本身资本往往是不够周转的，需要不断地从银号业“每日揭借大量现金”<sup>④</sup>，而这种揭借又是在不同埠市之间进行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之下，其信用关系首先和主要靠同为粤籍的商人“圈内”关系来保障。这里有一个在同籍圈中行业优先链接发展的关系，前文已论，广西银号业是粤商主营的，那么在典当业中，当然只有粤商经营的典当才最有“面子”和信用，可以及时地、源源不断地从银号业中摄取最大数额的周转资金，这造就着粤籍典当商在该业中任何其他商帮都无法比拟的巨大经营优势。

---

①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 4 册，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01 页。

② 陆汉邦：《瑞丰祥小考》，《龙州文史资料》第 3 辑。

③ 《宜山的当铺与典当高利贷的情况》，《宜山文史》1987 年第 1 期。

④ 陆冠芝：《梧州工商业史料》（稿本）。

近代以粤商为主力营造的广西私营金融行业，在广西城镇经济近代发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它建立起、并不断扩大广西重要的融资渠道。无论是银号业、银楼业、银行业抑或是典当业，它们的建立和发展，都使广西城镇具备并不断壮大了明清时期所没有的这样一种崭新的经济功能：它能够不断地将社会闲散资金实行必要集中，及时而最有效益地将资金组织、投资到社会经济发展最急需资金周转的行业和项目中去。粤商为主营造的银号业和私营银行业的出现，尤其是广西金融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它与1917年成立的官办现代银行——广西银行一道，共同组成了近代广西城镇前所未有的融资部门，使明清时期不直接发生联系的广西工商业与金融业开始衔接起来，形成了明清所没有的、能够直接促使工商业扩大发展的崭新的金融经济功能，从而促进了当时广西城镇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增长。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以粤商为主创建和经营的典当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在市场法制规范发育尚很幼稚的历史局限中，确实明显地带着对广大劳苦平民苛重的高利贷盘剥性质。20世纪30年代，吴半农、韩德章、千家驹先生也曾指出，这是“我国最普遍之高利贷机构”<sup>①</sup>。然而，我们在对此给予必要的社会批判的同时，却也仍应总体肯定它作为城镇经济不可缺少的行业，对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所具有的合理地位和积极作用。从前文所论的3分月息典利来看，它并不是任意性的，而是广西债务市场长期运作自然形成、贷典双方彼此可以接受的比率。因此，从清代中叶直至民国中期，典息大致稳定保持在这一水平上，桂林典息甚至仅为二分五厘。过去，我们在研究中常把“断当”（即客户逾期无钱赎回自己的

---

<sup>①</sup> 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广西省经济概况》金融部分，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

当物，按约定当物充归铺主）作为商人对平民无情剥夺的现象加以抨击，<sup>①</sup> 其实，从典当业的运作看，典当商最不希望看到的即是断当的发生。因为“满当之货，当店虽得以变卖，然此实非当业所素愿，因典当营业之收入，全在取利，取利之道，必须出本速而取赎快，如是则资金之流转易而生息倍，否则资金呆滞，必须其待至押品满期，将货售出，资金始得回收”，故“售卖实非典当业营业之本旨”<sup>②</sup>。当多于赎，只能导致典当的倒闭。实际上，因平民逾期无钱还息导致典物断当的情况也并不多，一般还是能按期赎回典物的。据统计，1933年广西当业中“满当不赎票数”平均仅约占当出总数的一成五，即15%，85%的客户是能够在借用贷款之后渡过难关归还清贷款的。<sup>③</sup> 从典当本身的生存发展角度看，它面临着同业之间的竞争，典当商为了争取客户，就必须塑造良好的铺面形象，如保持和蔼可亲的态度，切忌冷漠待人，严声厉色；正确估价来货，尤其避免因低估面赶走来客；同时，还要保守顾客秘密等。<sup>④</sup> 从其社会功用来看，积极一面是主要的。典当业从它一诞生起，即是顺应广大平民周转资金的社会需要的产物。有了典当业，平民可将闲置一时的财物抵押换取贷款，质物贷金，或应时急，或维系生活和生产及扩大再生产的运转，从而不断提高自身参与市场循环的能力。因此，典当业总体上于商于民都是“便利良多”的。<sup>⑤</sup> “事实上，典当业中在典当物品的交

---

① 参阅拙作《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广东商人与广西的典当业》，《广西地方志通讯》1998年第2期。

② 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广西省经济概况》金融部分，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

③ 同上。

④ 叶子贤等：《南宁典当业》，《南宁文史资料》1990年第2期。

⑤ 光绪二十三年《容县志》卷之10，经政志，税务。



收上，几十年来从未发生过纠纷”<sup>①</sup>，这说明典当业中主客关系总体是协调的。而一旦典当业歇业，平民百姓就往往会告贷无门，生活、生产链条就会出现中断，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与失控。正是基于对典当业地位的合理性和作用积极性的这种肯定，笔者以为，对以粤商为主的广西典当业的营造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视其为近代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事件。

## 第五节 入桂粤商与广西城镇民族资本主义 新式工矿业的发展

广西新式工矿业是广西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采取现代资本组合形式，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使用大工业的机器设备，进行社会化生产的全新的经济行种，是广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在商务行业链条中，它属于第三程序业务的加工服务生产部门，主要集中在城镇。由于近代粤商的工业业务在广西城镇的工业业务中占有主要份额，粤港商人在桂的工矿企业也就构成了广西城镇该经济行业的主体部分，粤港商人也就构成了推进广西城镇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发育的主要商帮力量。

### 一 粤商与梧州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起源和发展

梧州是近代广西民族资本主义新式工业的最大中心城市，在广西梧州，通常聚集着广西全省民族工业的绝大部分。据统计，1933年在广西八大城市梧州、南宁、柳州、玉林、贺县、桂林、百色、龙州中，梧州工厂资本就占八市总资本的

<sup>①</sup> 叶子贤等：《南宁典当业》，《南宁文史资料》1990年第2期。

58.69%，机器马力占八市工业总动力的55.45%。<sup>①</sup>梧州在广西城镇体系中的地位，有如上海之于中国。梧州之所以在近代能成为广西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最大的集中发展地，重要的原因，恰在于梧州是广西距离粤港最近、粤商汇聚最集中的城市。笔者将收集的梧州近代工业企业编制成一览表，很显然，梧州的民族工矿业主要是由粤港籍民族资本家所创立和经营的。

表2-3 晚清民国时期梧州市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览表

类别	时间	投资人及其籍贯	工厂名称	概况	资料出处
电力厂类	宣统年间	梧州商人林德昭	梧州电力厂(筹办)		黎仁武：《梧州市电厂发展简史》，《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1915	余瑞初集合华侨与广州商人合办	梧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购置100匹、200匹发电机共2台，发电量供13000只电灯使用	
轮船修理类	解放前	籍贯不详	恒安船坞	皆木头浮坞，维修过往轮船、电船	钟杰生：《梧州工业史料片断》(续二)，《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广东人	志诚船坞		
		籍贯不详	广益船坞		
玻璃厂类	1919—1945	广东人黎竹林	化纱玻璃厂	1921年转为梧州火柴厂	钟杰生：《梧州火柴厂》，《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籍贯不详	共有9家玻璃厂	公私合营时，并为梧州市玻璃厂	

① 民国24年《广西年鉴》第二回，工业篇。

续表

类别	时 间	投资人及其籍贯	工厂名称	概 况	资料出处
碾米厂类	解放前	籍贯不详 玉林人  苍梧人	裕生碾米厂 富民碾米厂 永业碾米厂 西江碾米厂 泰康碾米厂 益生碾米厂	每厂职工 10—40 人，后合并为梧州国营大米厂	同上
化工 电池 厂类	1877	官设，1910 年宝大公司承办	梧州炼锡厂，后改名为梧州硫酸厂		谭汝南：《梧州工业史漫谈》，《梧州史志》1986 年经济资料选辑
	1937.9	广州兴华电池厂分厂，负责人潘鹤民（粤）	梧州兴华电池厂	职工 34 名，抗战期间日产电池 1000 打，产品远销桂滇黔川诸省	钟杰生：《梧州工业史料片断》（续二），《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5 辑
	1942	南海人麦年	利群化工厂	生产红箭牌电池，1947 年拥有资本国币 2.4 亿元，产品销西南各省	民国 35 年 8 月 22 日《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广西省分会会员调查表》

续表

类别	时 间	投资人及其籍贯	工厂名称	概 况	资料出处
火 柴 厂 类	1921— 1949	粤商黎竹林和 日本粤籍侨商 麦氏合资	梧州火柴厂	生产梧州牌火柴， 员工 100 人，从 日本购进火柴原 料、白药、赤磷、 白腊、牛胶等， 排印机 3 台，齐 梗机 1 台，还有 刨片机、切纸 机等	《梧州火柴厂 史》，《梧州文 史资料选辑》 第 1 辑
	30 年代	粤商黎竹林	还先后办有怡 和丰火柴厂， 振兴火柴厂	180 名工人	
	1934— 1939	粤商陈吉甫	东山火柴厂， 后改名为广西 火柴厂	此系大型火柴厂， 员工 600 多人， 生产舞龙牌火柴， 排印机 26 台，刨 片机 6 台，切片 机 3 台，划路机 2 台，立式蒸汽机 (0.8r/时) 1 台， 日产火柴 300— 400 件	
	1936	容县人陈氏	永光火柴公司	员工 134 人，生 产飞虎牌火柴， 1949 年拥资 4 亿 元国币	

续表

类别	时间	投资人及其籍贯	工厂名称	概 况	资料出处
印 染 类	1924 年前	顺德人梅绍衡	振东染厂	染布主销桂滇黔。这些染厂都是使用进口染料和半机械化生产，但手工操作也仍占很大比重。万盛隆在同业中资金规模较大，精华号资金雄厚、营业鼎盛，也为同行业中佼佼者。又据《广西年鉴》第二回记载，20世纪30年代，梧州染厂13家，平均每家雇工13.85人，有染锅2.5个，碾石2台，年均消耗原料31643匹布，颜料73457斤，染成品有蓝斜布、黑斜布、灰斜布等	黎萃梧：《梧州染布业概况》，《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佛山人邓氏	大成染厂		
		沪商、粤商吴伯衡等合开	远生隆染厂		
	1924 年后	粤商邓炳、梁钊	新世纪染厂		
		广州万盛隆联号	梧州万盛隆染厂		
		台山陈树田	和盛祥染厂		
		顺德华侨陈炎基	精华染厂		
		南海人周秀轩	泰生染厂		
		吕煥堂	冠华染厂		
		鹤山人吕辑堂	利贞染厂		
		赣商吉安布店设	泰盛染厂		
		新会人谦发颜料店开设	振发染厂		
		顺德人赖心恒	正东染厂		

续表

类别	时 间	投资人及其籍贯	工厂名称	概 况	资料出处
印刷类	解放前	顺德人左镜明与广州商人合办	利文印刷厂 梧州先后还有十多间印刷厂	员工 50—60 人，主要业务是印刷税票、商标、包装装潢、花样。该厂资本较雄厚，拥有机器多台，如切纸机、开墨机、照相机	钟杰生：《工业史料片断》，《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4 辑。
酒厂类	1937  1945	顺德人陈寿彭 顺德人梅俭生 未明籍贯者 顺德人尹盈轩	梧州双龙山酒厂 长春酒厂 西昌等 8 家酒厂 龙山酒厂	这些酒厂酿制蛤蚧酒最出名，另外有虎骨酒、蛇酒，销路最大的是香港，厂家往往借助与香港客商的朋友关系，迅速打开国际市场	侯雅云：《梧州市龙山酒厂简介》，《梧州市地方志通讯》1986 年第 2 期
机器厂类	1910 1912 1920 1923 1921 1926 1928 1922	香港英商天和洋行粤籍代理号 粤商梁子超、梁伯谦 粤籍陈康等合资 粤人梁伯谦与利和号合资 粤人利和等合资 籍贯不详 粤人陈卓帮 粤人罗林	天和机器厂 广成兴机器厂 艺兴昌机器厂 安兴机器厂 广安机器厂 艺通机器厂 艺生机器厂 合和雅机器厂	这些机器厂员工一般在 10—30 人之间，业务与近代新式轮电运输业发展有密切关系，厂家一般是维修、制造和装配轮电船上的发动机，少数厂家也有铸造设备的能力，主要收入是加工费和修理费	邓端、利京、利桂生：《清末以来各个时期开办的机器厂》，《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其中籍贯情况由利建生先生 1986 年 6 月向笔者提供，利建生本人也是老粤商

续表

类别	时 间	投资人及其籍贯	工厂名称	概 况	资料出处
机 器 厂 类	1928	粤人易联	合安机器厂		
	1930	粤人郭坤等人 合资	××机器厂		
	1927	黎玉山	广艺新机器厂		
	1924	梁伯昌投资	联兴机器厂		
	1932	潘安保	愚工机器厂		
	1930	粤人梁伯谦、利 安发等	广泰隆机器厂		
	1930	陈尧	广利发机器厂		
	1930	冼妹	元享机器厂		
	1936	粤人马泗川	西南机器厂		
	1944	梁佳	大兴机器厂		
	1946	粤人钱达生	桥生机器厂		
	1937	粤人利和	天和祥机器厂		
	1945	粤人邓端	端记机器厂		
	1949	郭坤等合资(粤)	百行机器厂		
机 器 厂 类	1947	陈国劳等合资	同兴机器厂		
	1949	粤人陈庆卓投资 粤人徐公	艺华机器厂		
	1949	粤人冯胜	徐六记机器厂		
	1949	粤人夏运生	永昌铸造厂		
	1947	粤人黄志鹏等	夏生记机器厂		
	1949	粤人聚干才等	永胜机器厂		
铸 造 厂	1949	罗荃岩(粤) 等设	公联铸造厂		同机器厂类
	1948	利佳(粤)	伟兴铸造厂		
锅 炉 厂	1949	肖满(粤)	满记锅炉厂		
	1949	赖珠江(粤)	赖珠江锅炉厂		

续表

类别	时 间	投资人及其籍贯	工厂名称	概 况	资料出处
糖 烟 厂 类	1946	南洋（粤企业公司梧州分公司）	梧州糖厂	技术员从广州请来，榨机1台，40千瓦发电机1台，分泌机1台，雇工280名，日榨白砂糖30吨。在当时贵县糖厂被日军炸毁情况下，此为广西唯一一家较大的现代化糖厂	钟杰生：《梧州糖厂简史》，《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1928—1937	不详	梧州纸烟卷烟厂约七、八家		谭汝南：《梧州工业史漫谈》，《梧州史志》1986年经济资料选辑
板 厂 类	民初至1950年	先由粤商陈汉池开设，后由香港志诚号拨款经营	志诚板厂	固定员工120名；135匹马力发动机1台，另设有排锯、圆锯多台；松木料来源苍梧、藤县、昭平。板木产品出口香港，由香港志诚联号加工为木箱料运往新加坡。1950年时资本为人民币4.5亿元	同上
	1920	陈安开办，为广州大成厂联号	大成板厂	工人70名，产品白松板运销香港，1950年时资本为人民币4.4亿元。	
	民 初	姚乃初（籍贯不详）	德成板厂	员工60—70人，使用蒸汽机动力	



续表

类别	时 间	投资人及其籍贯	工厂名称	概 况	资料出处
肥皂厂类	1946	顺德人左镜明等合资	利成皂药厂	资本额为国币5亿元	《中国工业协会广西分会会员调查登记表》(民国38年)
	1937	新会人黄佐庭兄弟	广西视厂	生产雪犁视(肥皂)兼化妆品,抗战期间日产几十箱肥皂	
	1941	同上	广西制视织造厂	主要生产毛巾“西华巾”,主销桂西滇黔,供少数民族同胞使用	
煤油厂类	1923	郑德等合股	生光火水油厂	运光厂有40余工人,从香港购进油渣提炼成煤油,以星塔牌为商标	《梧州土制煤油简史》,《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1930	粤商陈汉池等合股	运光火油厂		
	1931	梧州同人林卓臣	兴光煤油厂	从香港购柴油回梧州炼成煤油,在农村极为畅销,平均每家员工十余人,每年平均资本1万元白银。在发展过程中曾与英国亚细亚、美国德士古、美孚三大煤油公司展开激烈竞争	
	1932	广东、苍梧人合办	荣光煤油厂		
	民国初年	苍梧人合办	光明煤油厂		
	1933		煤油厂多达26家		

续表

类别	时 间	投资人及其籍贯	工厂名称	概 况	资料出处
桂皮厂类	民初		梧州始出现桂皮厂		骆鉴清：《工业史料片段》，《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1921	粤商陈汉池等	公栈桂皮厂	该厂在广东禄步和香港、澳门都有分支机构	
缫丝厂类	1909	藤县苏树翰	梧州缫丝厂		谭汝南：《梧州工业史漫谈》，《梧州史志》1986年经济资料专辑
	民国初年	南海顺德籍迁人苍梧长州的移民	在长州开办20多间缫丝厂		

据上表所列，从清末到1949年间，梧州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总计至少约165家，大致可分为21类，应该说这已经粗略反映了近代民族工业诞生的50余年来，梧州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梗概。而在表中已确知籍贯的84个厂家中，厂主可以肯定为粤商的有77家，占总数的91.67%。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在集中了近代广西民族工业大部分企业的梧州市，这些企业绝大多数是由粤港商人开办和经营的。或者说，广西工业经济的总中心城市，主要是由粤港商人营造出来的。

## 二 粤商与其他城市圩镇的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的发育

### 1. 贵港市城区（贵县）

(1) 矿业。1896年，粤商谭日章、陈庆良集资40万元银元，开采三岔银矿和平天山银矿。次年，银矿由广东大埔籍南洋华侨叶恩接办，增加资本数十万元，“矿机及冶炼锅悉购置外

国，其他附属机器无不完备”，矿区规模宏大，冶炼炉漫山遍野，矿工多达二三千人，矿产运销港澳，名为华兴公司。<sup>①</sup> 这是广西机器工矿业的开端，也是近代广西民族资本最大规模的工矿企业之一。（2）粮食加工业。民国时贵县唯一的面条加工厂民生面条厂，为1929年粤商朱其辉经营，厂内置柴油机一部，另外配设面条制作的全套设备，日产量3500斤，供不应求，这被视称为当时贵县机器工业一个创举。顺应着大米外销的大宗业务需求，贵县机器碾米工业也始终主要由粤商垄断。民国时期，贵县先后有10家机器碾米厂，可以肯定为粤商的至少5家。如民生碾米厂，1936年朱其辉投资银币3万元，租用粤东会馆房产，购发动机、柴油机和附属设备，在广州协同和机器厂的帮助下开张经营，岁有盈余，被县人称之为“实业界的先河”。正基碾米厂，为粤商罗尔康1936年开设。华丰隆碾米厂，为广东台山籍泰国华侨马光达开设于1945年，该厂置有大型汽车发动机及2号横磨各一台，用木炭、瓦斯做能源，专门承担零担朴米的加工业务，连年赢利，被誉为同行业中的佼佼者。又如大生碾米厂，为南海人欧础超所经营。广丰碾米厂于1948年由粤商关氏兄弟集资经营，自置汽车头发动机及横磨各一套，用木炭、瓦斯做能源，以承接零担朴米加工业务为主。<sup>②</sup> 钜业碾米厂则是桂平粤商钜益碾米厂的分支米厂，雇员10人，发动机和横磨及配套设施齐全，代客碾谷收加工费，同时自己也购谷加工成米，统付梧州粤商联号和经纪行出售。<sup>③</sup>（3）其他行业。如织造工业，贵县的民生织造厂也是粤商朱其辉所开设，该厂被誉为“贵县创办工

---

① 民国25年《贵县志》卷11；又参见《贵县文史资料》第5辑，第42—43页。

② 欧础超：《贵县米机行业话沧桑》，《贵县文史资料》第7辑。

③ 同上。

业的开端”<sup>①</sup>。

## 2. 平南

在大安镇有两家县内最大的工厂即粤商邓氏和吕氏分别开设的铸镜厂（制铁锅）。民国初年平南最早的印刷工业仲元记书局，也为南海人钟氏在县城开设，其子继续经营，至1936年时还不断从广东添购日本生产的印刷机、手擎机、石印机，扩大生产。<sup>②</sup>

## 3. 贺州市八步区（贺县）

民国时期，贺县县城八步镇素有“锡都”之称。民国23年，广西年产锡200万斤，仅八步锡即占77.4万斤，为广西锡总产的三分之一强。<sup>③</sup>依照当时的物价，八步镇当年可得锡矿利润152710.2万元，可见锡矿开掘业是近代贺县一大支柱产业。这一行业在当时已经较普遍地采用了资本主义的公司经营方式，颇多使用机器，如风钻机、砂泵机，效率比原先的土法采掘提高了百倍。<sup>④</sup>当时，除了桂系军阀的官办势力以外，粤港商人特别是南洋粤籍华侨港澳客商始终是主要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桂系军阀白崇禧在20世纪30年代一次考察之后，曾说当时“各方投资（矿业）很踊跃……现计有1100万元，广东籍占一半”<sup>⑤</sup>。举办新式矿产采掘工业的粤商典型如梁祥海，他曾任孙中山担任大总统时民国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行长，1925年携眷来八步定居，经营锡矿开采业。<sup>⑥</sup>还有广东梅县人黄铁真，1941年到八步之后经营矿业，1944年还任北达矿业公司董事长。又如，新会人伍

① 欧础超：《贵县米机行业话沧桑》，《贵县文史资料》第7辑。

② 《平南县志》工业篇（初稿），又参见林树章《辛亥革命在平南》。

③ 按民国24年统计，元月每吨锡价3920元，成本为1947元，每吨锡矿可得到利润1973元，当年可获利润152710.2万元。参引《八步镇志》第八章，商业，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④ 民国《广西锡矿概况》。

⑤ 《白崇禧言论集》之五，《三自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⑥ 八步镇志办：《八步镇志》，第97、292页。

容山 1936 年到八步定居，从事矿山开采业，他与人合资开办普益、施仁、仲宝、兴有、海华等众多的锡矿公司。其中普益公司在当时八步为规模最大的锡矿公司，员工多达 1509 人，竟占当时八步数十家锡矿公司从业人员 2 万人的 7.5%。<sup>①</sup> 另外，他还经办南乡丽水金矿，在信都的群安水晶矿等企业担任董事长，为八步乃至贺县最大的矿业资本家之一。<sup>②</sup> 笔者曾到贺县实地考察，解放前，富川、贺县、钟山县属 15 个主要锡矿公司中，有 11 个是粤商创办和经营的，尤其以水岩坝矿区为甚。锡矿的开掘又带动了贺县其他诸多种类的新式工业的产生发展，当时的贺县成为传诵一时的广西小工业区，粤商在其中也始终扮演初开先河和主要经营的角色。例如 1933 年，广州艺坚机器厂的何佩石与何谦等集资 5 万元，建成大成机器厂。厂房面积 30 亩，机械设备有车床、刨床、钻床、化铁炉和发电机组，主要生产砂泵、水泵、鼓风机和承接矿场安装和维修业务。1934 年，广州协同和机器厂股东代表和富源锡矿西股（广西）合股投资 15 万元，在八步镇建立西兴和铁工厂，次年竣工投产，职工 270 人，厂房占地面积 20 亩，有铸造、金工、锻工等车间和发电机房一座，安装发电机组 12 千瓦的 1 台，拥有车床 6 台、刨床 2 台，主要生产砂泵、水泵和承接矿场机器的维修业务。<sup>③</sup>

#### 4. 南宁

抗战以前，南宁一直是广西工业的第二大城市。南宁的民族工业也主要由粤商创办，以碾米业为最典型。解放前，南宁先后有 11 间机器碾米厂，可以确断为粤商举办的有 5 家。其中粤商梁子超创办于民国元年的广元享碾米厂，是南宁碾米业的鼻祖，

① 八步镇志办：《八步镇志》，第 97、292 页。

② 同上。

③ 《略谈建国前的八步矿产》，《贺县县志通讯》1986 年 3、4 月合刊。

名牌最老，并一直持续到1949年。1949年时该厂雇工15人，拥有煤气机、碾米机、各号谷磨、汽车头、发电机、柴油机、车床及其他设备，每天碾出白米3万多斤<sup>①</sup>，在南宁米市上声誉卓著。

#### 5. 柳州

柳州原为桂中商业重埠，抗战以前，它的工业地位在广西并不突出。抗日战争以后，湘桂和黔桂铁路相继竣工通车，同时，抗战时期中原厂家大量南迁，加之柳州石山溶洞多，便于战时防空，在1937年以后，柳州的工业地位明显提高，颇有直追梧州之势。柳州地接湘桂走廊，连通陪都重庆，粤商在柳州民营工业中的优势，远不如在梧州、贺州市、贵港市等那样绝对，但也却始终是该地现代工业起步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当时民营工业，柳州主要有几类：第一，中原各省南迁至柳州的各类工厂。但是，其中许多工厂是属于战时避难的“过路工厂”，而不是地域经济自然发育的产物，如1938年汉口迁来的日华电焊厂等。<sup>②</sup>第二，湘赣商人举办的现代性生产企业。如1932年湖南衡山人戴世先创办的建华翻胎厂，该厂开创了柳州翻新轮胎的新纪元。<sup>③</sup>第三，广东、香港迁柳开办的各类工厂。无论是市场渗人或是战时逃难，粤港自然有众多资本家或商人迁抵柳州开工，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柳州卷烟业（包括机器卷烟工厂），“多数是广东、江苏、江西、湖南等外省人”经营的，广东人排在第一位。又如1938年国民党广西政府迁至柳州，城市建筑工程随兴。“由广州、梧州、湖南等地营造商（即建筑厂）十多家，视为本地正式有营造厂之始”；1941年，营造厂又增至

① 梁铭桑：《南宁机器碾米业》，《南宁文史资料》第1辑。

② 吴宏：《柳州市水轮机厂的前身》，《鱼峰文史》第8辑。

③ 韦建章：《柳州橡胶工业发展概况》，《柳州文史资料》第3辑。

30多间，“所增各家多来自广州”；自1943年又继续增至50余家，厂家来源还是“多自广州来”。粤商在柳州的营造厂规模颇大，最大型的一家约有工人2000余人，它的业务包括制作有关新型规格的建筑材料，承包各项建筑工程。柳州从一座桂中小镇，迅速成为桂中工商业的重镇，与广东建筑资本家的设施建设、经营有着最密切的关系。<sup>①</sup>其他工业也是如此，如机械工业：1937年，由梧州疏散来的粤商广成兴机器厂，在朱福等20余人合股下，改名工联电焊厂开业，这是柳州较早的商办民用机械企业，主要修理私营汽车配件，轮船发动机等。<sup>②</sup>化工业：抗战后，陆续兴起了一些肥皂厂，如广州肥皂厂、天成视厂等，这些工厂“多是广东人所办，各厂人数一般十人左右”<sup>③</sup>。广东人还办了两家玻璃厂，其中一家大明玻璃厂雇工20人，制造玻璃缸、酒瓶、糖缸，行销各个圩场。<sup>④</sup>现在属于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柳州市水轮机厂前身之一的也即香港商人开办的捷和电焊翻砂厂。<sup>⑤</sup>

综上考察，在柳州工业中粤商势力虽不如在桂东、桂东南那样绝对，但却也是最重要的主要营造力量，时人是这样评价广州资本家对柳州工商业后来居上的特殊作用的：“1937年，柳州成抗战大后方，跟着湘桂铁路的出现……上海各大城市及重庆昆明商人向柳州集中，尤以上海广州的更多，造成柳州工商业的黄金时代。”<sup>⑥</sup>

---

① 柳州市人民政府：《调查研究》第二期（工商调查专辑），1950年7月。

② 唐天禄：《解放前柳州工业概况》，《柳州市文史资料》第3辑。

③ 同上。

④ 《鱼峰文史》第7辑，第74页；同时参看1950年12月柳州人民政府《调查研究》。

⑤ 吴宏：《柳州市水轮机厂的前身》，《鱼峰文史》第8辑。

⑥ 《鱼峰文史》第7辑，第74页；同时参看1950年12月柳州人民政府《调查研究》。

## 6. 其他城镇

广西其他各区域凡有出现新式工矿业城镇中，一般也都是由粤商充当主营商帮。如在桂西南的龙州响水圩，其邻近的银矿，在光绪初年“由粤商在该处开采”。发电工业是民国时期广西分布较广的新式工业，20世纪30年代初，广西有平乐、玉林、北流、宜山、南宁、百色、恩阳、那坡七个电力公司<sup>①</sup>，加上龙州电灯局，共八家，其中至少有四家为粤商主办，另外四家也肯定有粤商参与。1919年开设的平乐电灯公司，为广东富商合股经营开设，该公司置有德国发电机组1台，安装2.5公里长的输电线，每夜5点到12点供应桂剧院、酒楼、商行照明，按电表收费。在玉林，1920年粤商霭庭、伍绍周等合资经营玉林振华电力公司，资本额达6.5万元，向广州厂商购150马力煤气机、盖式100瓦三相交流发动机各一台，向商业区、机关、部队、影剧院、大旅馆、碾米厂、大型修理厂供电，被当地称为“吾邑现代化的起点”<sup>②</sup>。南宁电力公司由南宁商会组织集资，于1914年成立，粤商作为会员多有参加。<sup>③</sup>又如百色日光电灯有限公司成立于1919年，1937年组办公司的商人是粤商黎弼臣。<sup>④</sup>龙州电灯局成立于1919年，也是由粤商陈崇禧兄弟为执事，组织绅商集资，在粤东会馆后园开设的。<sup>⑤</sup>这些电力工业为当地的工业用电、居民照明提供了可贵的电源。

综本节所论，无论是近代广西新式工业的总中心城市梧州，

① 民国32年《新工商》第2期，第258页。

② 周擎天等：《玉林电业鼻祖——振华电力公司》，《玉林文史资料》第14辑，第51页。

③ 谭津等：《南宁电灯局的创办》，《南宁文史资料》第4辑。

④ 赵扬：《百色城市建设》，《百色史志》第4辑。

⑤ 韦克斌：《解放前后的龙州水电事业》，《龙州文史资料》第9辑，第91页。



还是在广西其他地区，凡有资本主义新式工矿业诞生的大部分城镇中，粤商企业都构成了新式工矿业的主干。可见，从全广西范围来看，粤商确实是城镇经济新式工矿业主要的植人者和经营者，广东、香港的工业资本家构成了广西民族工业资本家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他们充当主力，推进了广西城镇民族资本主义新式工矿业的发育。当然，广西也有一些城镇，新式工矿业中粤商的比重不高，如桂林。抗战爆发后，内地工厂大量内迁桂林，1941年桂林民营工厂88家，其中由江浙湘鄂迁来或是总厂在沪、湘、渝各地而在此设分厂者，即有45家，已占总数的51.13%；本地商人举办者20家，占总数的22.73%<sup>①</sup>；粤商厂家至多也不会超过26.14%，即23家左右。从当时技工籍贯比例也可看出：“技工十分之八九为外省，以江浙为第一位，湘鄂次之，广东又次之，本省籍技工则为数甚少。”<sup>②</sup>按通例，各省籍技工多由各省籍厂主雇请，所以这大致反映了粤商在桂林工业中势力较弱的情形。不过，如果我们将战时避居桂林为主的江浙厂家忽略不计（因为这不属于常态），我们仍可以看出，粤商仍是桂林工业中最重要的商帮之一。桂林一例，不足改变近代广西城镇私营工矿业总体上的“无东不成市”格局。

近代以来，由在商业上执牛耳的粤商充当广西新式工矿业的营造主力，不是偶然的。资本主义工矿业是生产过程社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而生产社会化本身即是通过市场扩展来完成的。入桂粤商作为广西的主要商帮，在广西具有最强的社会组织能力，他们深入内陆原料基地和商品最终销售地，外联广大国际市场，最能满足新式工矿业生产过程社会化的要求，因此，粤商在广西

---

<sup>①</sup> 秦柳芳：《抗日战争时期桂林市工业调查》，民国30年10月《广西省银行特刊》第5期。

<sup>②</sup> 同上。

当然成为这一行业最主要的创建者和经营者。同时，新式工矿业是需要大额资金、运转周期较长、市场风险较大的行业，粤商在明清时已成全国著名商帮，在桂经商数百年之久，积累了最为巨大的商业资本，是广西民间财势最为雄厚的地域集团。清末民初以后，经营新式工矿业的致利环境在广西已初步形成，当然也是粤商最有条件向工矿业领域投放资本，并凭借充足的资本，度过较长的赢利周期，不断将市场风险化解为出奇制胜的良好机会。另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工矿业诞生的主要模式不同于西欧，它主要不是从本民族原有的手工业内部孕育而成的，而是为欧美诸国现代大工业运销商品、收购原料的国内商业行业在国际市场和新式大工业的催化下，逐渐向工矿领域延伸而发育出来的。举凡中国民族工业资本家，一般都有先商后工的经历。中国新式工业在整个近代一般都是作为商业资本的附属物而出现的，是购销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广西也不例外。广西的民营工业实际上分三大类别：其一，桂产加工出口类，如本节所举锯木、碾米等；其二，洋货产品加工、使用维修类，如火柴、颜料、造药、煤油、机器等；其三，城市服务设施类，如电力厂等。第一类工业实为经纪、出口、收购诸行业在运转中，新添入机器，加工过程而延伸出来的工业；第二类工业实为城镇进口行、洋货批零行，新添入机器加工制作过程而延伸出来的工业；第三类工业也是环绕着城镇各种经贸行业业务的需要，添入现代化手段的制作过程而延伸出来的工业。既然广西城镇经济的经贸行业如前节所探，多由粤商营造，这些行业的外延发育出来的新式工矿业，也自然多由粤商营造并执掌着经济支配权。

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广西，新式工矿业是一种崭新的现代化的生产力，它相对于千百年来传统的手工操作是一次质的飞跃和革命。因而，以粤商为主力营造的广西新式工矿业，是广西城镇经济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一个根本的标志。这开始了晚清民国时

期广西城镇经济发展史上继进出口行业诞生之后的第二轮转型，即从被动地接受国际市场货流状态，开始转化为在本地营造现代化的生产轴心，主动地适应和尽可能地调控国际市场，创造主导优势的态势。尽管可以粤商为主营造的广西工矿业在整个广西的经济中比例微弱，但是这毕竟标志着广西城镇开始从前工业化时期进入雏形的工业化时期；标志着 17 世纪以来的世界范围的工业革命浪潮向着广西这一偏僻落后、开发相对较晚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并驻足落户，扎下根系。

## 第六节 入桂粤商与广西城镇商品性手工业的发育

晚清民国时期，外国工业品的倾入使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呈不断萎缩之势，但是，这种手工业在整个近代仍始终是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行业，特别是能够适应进出口贸易的城镇商品性手工业，总的来说还有不断扩大发展之势，广西也不例外。前文已论的粤商业务在广西工商业务中的主位地位，也决定了广西城镇的这一部分手工业在近代发展中，由粤商充当主要的推动商帮之一。以下分区、分行详探。

### 1. 桂东区

苍梧县戎圩。清代咸丰年间，较大的面条加工作坊邝同记、黄汇昌等共十多间，“大部分是广东人经营”，最大的作坊有十五六个工人，这些作坊从桂林、全州、阳朔、柳州运来麦子，加工制面，运销百色、南宁、桂北及广州，最盛时的光绪末年及民国 10 年，粤商为主经营的面坊多达一百二十几间。<sup>①</sup>

梧州。(1) 染布手工业。目前可溯源最早的是 1840 年开设

<sup>①</sup> 饶任坤、陈仁华：《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8 页。

的聚纶染房，由顺德人黄氏开设，该坊采用北流兴业的蓝靛，制染加工棉布出售，批零兼营，另外还代客来布加工，前店后场，雇工数十，直至1939年才停业。<sup>①</sup>（2）砖瓦窑手工业。该业最旺的1939—1943年间，许多瓦砖窑就是广东石湾、四会等地来梧州的业主和工人开办的，如胜兴窑为粤人陈兰生开设，有工人百余，产品有缸瓦、陶瓷（包括电器用具），技师来自清远，陶器师傅来自石湾，各窑的原料多取自市郊，但部分也有从广东石湾、清远购来。<sup>②</sup>（3）篱竹出口加工业。该行业务包括向产地贺县、平乐、容县、苍梧等县订货、采运、运输到梧州，进行初步加工，经过挑选、整理、分齐、锯齐、取直等工序，使原料产品达到英国委托的洋行订单的规格要求，运销佛山、香港。而经营该业者多为粤商，如1925年南海人卢宗和开设的协安竹庄，1945年以后南海人高世明开设的义安竹庄，南海人何海天的平安竹庄，南海人梁干天的均安竹庄，这些南海竹庄在香港还多派有“卖手”（推销员）。<sup>③</sup>（4）纺织手工业。该业一般采用木质机和纺纱机，以同乡合资为经营方式，也开始使用马达作为辅助动力；劳动力则使用数名雇工和家庭成年劳力相结合；棉布和纱布原料主要来自外国和上海；布匹、毛巾等产品主要在梧州销售。该业也主要是由广东业主经营，据梧州1951年部分《手工业登记申请书》填表情况统计，填表者38家，其中广东业主19家，占总数的50%；广西业主12家；湖南业主1家。<sup>④</sup>这三个行业已经代表了粤商在梧州手工业界作为主要业主的一般情形。

① 黎肇梧：《梧州染布业概况》，《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② 骆鉴清等：《工业史料片断》，《梧州文史资料》第3辑。

③ 黎肇梧：《梧州染布业概况》，《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④ 1951年《梧州手工业登记申请书》（纺织、布遮、牙刷、纽扣、染布、制造）。

## 2. 桂东南区

玉林。玉林是广西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中较大的手工业主要是由粤商经营的。（1）京果酱园业。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该业主要的商家又珍、裕聚、常兴均是有名的粤商。<sup>①</sup> 该业制作生晒的桂圆肉（龙眼肉干）最为有名，师傅全用粤人，产品为玉林三大特产之一，远销海内外。<sup>②</sup>（2）纺织染织业。20世纪30年代，吴半农、千家驹等先生曾把玉林纺织业列为广西主要纺织业之一。<sup>③</sup> 当时的该业经营者已经许多为玉林本地人，但是究其源头仍是由粤商开端并支配经济命脉的。民国初年，广东人从佛山带来了一套生产各种花布的织布机，包括织布高机、擎布机床、梳布机、经纬纱车等，并在城中设立艺徒学堂，传授纺织技术，附城的张十八师等人纷纷投师求学。后来，“各学徒依样依照各种工具进行织造各色花布，其产品和佛山色布一样，遍销广西全省，成为广西织布行业的先驱”<sup>④</sup>。粤商本身经营的织染手工工场也成为当地最著名的手工纺织企业，如大成染织厂、德样染织厂等等。（3）蓝靛业。兴业县最为典型。1845年，草木青蓝从海南岛、琼崖引种到兴业，自此，本地农民分散经营的制蓝手工业开始出现。但是，将这种手工业集聚在城镇，使之逐渐走上有一定水平的规模经营和商品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以及通过资本控制，将分散各地的农村制蓝手工业在经济上组合起来的，还是广东商人。至晚在清光绪初年，就有粤商在兴业县城和平山圩设立大型手工业蓝靛厂。民国时期，兴业城街上居民竟有40%的户数是广东人，而且大都从事经营蓝靛

① 周践谟：《民国时期玉林商业和各行业摆卖的散布情形》，《玉林文史资料》第13辑。

② 周擎天：《粤商在玉林与粤东会馆的建立》，《玉林文史资料》第15辑。

③ 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1946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第110页。

④ 谭伯琪：《玉林纺织工业史略》，《玉林文史资料》第12辑。

业。据1915年兴业发表统计，大中小靛厂共计380余家，遍布全乡，厂主、厂里的司事、财务绝大多数是广东人，技术工人则为兴业本地人。<sup>①</sup> 玉林城、太平山圩制蓝业也同此情形。粤商主营的蓝业在当地具有支柱产业的地位，如兴业镇、太平山镇各行业营业额都以该业最大。<sup>②</sup> 据粤商统计，自光绪初起，每年都有由粤商家乡汇入兴业的巨额银豪作为蓝靛贷款、雇主工资及购运的开支。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粤商造就和刺激了玉林一带手工业的高度发达，构成了近代后半时期玉林商帮崛起在本域甚至赶超粤商，西向辐射桂西、滇、黔的重要经济基础之一。据老粤商回忆，玉林的烟丝业、牛皮加工业，制箱、打铜业也都是广东业主经营的。<sup>③</sup>

平南。平南情形类似于玉林。如从清末到民国27年，是平南蚕桑业的全盛期。这一时期平南县颇为发达的私营手工业丝坊，大部分是由粤商开设的。最大的一家粤商丝坊是顺德人开设的广兴纶丝坊，它采用传统技术，辅以各种新式的五金器具，集中生产、分工协作，拥有女工120人，纺车50台，在1921—1928年间，产丝超过3万斤。其他还有许多间粤商丝坊，其中超过10台纺车的有同永、广兴祥等三家。在粤商带动下，当地农户也有十多户转人城镇专营丝坊，但规模无法与粤商比，每户均不超过10台纺车。又如桂油蒸制手工业，“道光间，东商在平南以蒸薄荷油法制为桂油，贩卖得值”，后来还将此技法传至容县。<sup>④</sup>

贵县。(1) 如中药制作业。解放前贵县最有名的中药厂是1912年从广东佛山迁贵县开业的年寿阁中药厂。1923年，该厂

① 谭义桐等：《清末民初的兴业蓝靛》，《玉林文史资料》第4辑。

② 周贤鉴：《解放前玉林的手工业概况》（上），《玉林文史资料》第6辑。

③ 同上。

④ 光绪二十三年《容县志》卷之5，舆地志，物产上。

转为南海商人欧氏独资经营，雇工十余人，生产益母丸等中成药十多种，全用手工操作，产品销往南宁、芦圩、横县及玉林五属。<sup>①</sup>（2）酱园手工业。解放前，贵县最有名的和源酱园是三位广东高要县商人梁、赵、李民合资创建的，主要经营酱料，同时兼营中秋月饼、饼食、婚嫁礼饼、酱菜等，从清末直至1948年，历数十年而不衰。<sup>②</sup>

综上，桂东南区的商品性手工业，主要都是由粤商开设经营的。

### 3. 桂南内际区、桂西南区

从南宁市至左、右江沿河城镇，比较大型和具有名气的手工业店号和作坊也多为粤商经营，这在酱园手工业中表现最为典型。从清末咸丰同治年间至1941年，南宁仅有的两家大型手工业酱料作坊分别是佛山人开设的大盛酱园和万利酱园，该两酱园主要产品是广西式的酱料，如老抽、元元鼓、七醋、杂酱、酸味等七类，兼营海味杂货、笔墨纸张。万利酱园不仅在南宁而且在全广西都堪称最大一家资本主义手工业企业，为佛山人邓庭光兄弟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建立，承传数代，历经近百年。它以白银30两起家，不断创立名牌产品，扩大企业业务。到民国中期，臻于鼎盛，拥有正店、支店机构及工厂数十间，雇请职工300余人，拥有资本共150万元以上。产品远销广西各地，尤其右江地区销货最多。它在百色、平马镇设有支店。万利酱园的百色支店在当地城镇经济中也是最大规模的手工业店号，约有资本40万元，兼营烟丝手工业，产品销往桂西乃至云贵一带。<sup>③</sup>万利酱园还凭借自己的实力、业务网和信誉，以酱园手工业为主业，大力

① 欧础超：《历尽沧桑的年寿阁中药厂》，《贵港市文史资料》第12辑。

② 郑开基：《贵县工商业史概况》，《贵港文史资料》第14辑。

③ 邓德建、谭津等：《南宁百年老店——万利酱园》，《南宁文史资料选辑》（一）。

进行多角化经营，向商贸伸展触角。一方面充分吸收社会游资入股，扩大经营规模，同时还兼营代销英商火油，这对万利资本的加速周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万利酱园虽然采取传统的经营形式，技术上也还没有向机器生产转化，但就其规模和社会化程度并不亚于当时广西一般的新式工厂，实际上也呈现出向资本主义工业化靠拢的趋势。<sup>①</sup>

宾阳。宾阳也为民国时期广西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区之一，尤以该县各乡的手工业专业村为突出特色，当时该县在新桥、芦圩、大罗等许多乡镇都先后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专业村。这些专业村以农业为主，又以某一专项手工业生产为辅（其收入常常超过农业），如新桥务本的科甲牛皮村、芦圩的成衣村（杨村）、大罗的小五金村、大罗的毛笔村、新桥的鞭炮村（黄村），此外还有缸窑村、镜画村、鱼钩镰刀村等。各村农民在农业生产闲隙都分别生产一项和若干项特定手工业产品，生产颇具规模，产量颇丰。尤其是以手工业的方式，对大工业产品的仿照能力特强，产品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和独立生长能力。宾阳的手工业品由于在广大农村市场显得价廉物实，品种丰富，因有“宾阳货”笑谚。这也是宾阳商帮在民国时期得以崛起，成为广西颇具名气的地方商帮的重要原因。虽然粤商在宾阳商场上可以执掌经济牛耳，但是在宾阳手工业行业中却难以插足，没有优势。仔细考究，宾阳手工业产品是以内销邻近县乡、桂西地区为主的，而不与进出口贸易关系有密切关系，这当然不能吸引粤商涌往投资。<sup>②</sup>

在田东县平马镇，情形也类似于南宁，佛山人梁氏兄弟开设

---

<sup>①</sup> 邓德建、谭津等：《南宁百年老店——万利酱园》，《南宁文史资料选辑》（一）。

<sup>②</sup> 参阅《宾阳县手工业专业村调查资料专辑》（文本存广西师范学院政治系资料室。笔者1989年11月率学生参加这一调研）。



经营的万利酱园在酱料生产、销售方面垄断了整个平马市场，该园在南宁、梧州、广州都设有机构，同时还兼营山货的收购和外销，雇工 20 余人，在当地是各业中资金最为雄厚的店号。<sup>①</sup>

在隆安县雁江镇，加工制酱手工业作坊共有三家，复盛号、怡聚号、振兴祥号，均为粤商开设经营，本地人偶有附股，所制的豉油王和大红辣椒酱颇具名气。<sup>②</sup>

百色最大的手工业行是烟丝加工业，而该业最大的店号是新会人关宝臣开设的大利烟林，其熟烟制品运销云贵。以该业为轴心，该号还兼营米粮囤积，鸦片购销，成为控制整个百色商界的“五霸”之一。<sup>③</sup>

在南宁及左、右江沿河城镇，与梧州、玉林两地不同，附近四乡均为壮族土著人民聚居。当地居民手工业尽管原始，但是也有部分地主富户进入城区，经营与当地物产关系密切的手工业加工行业。典型如壮族资本家黄恒栈。他在那坡镇开设的烟丝工业作坊，规模很大，在南宁等地都设有行口，如南宁的永华行。但是，这种情况比较特殊，特别是该行实际上是到了曾经到外地念大学、受到外界影响较大的二儿子手上，才真正发达起来的。此类特殊情况也不足以改变该地区内较大型的商品性手工业由粤商主营的局面。

#### 4. 桂南沿海区

在该区包括北海、防港、钦州、合浦诸市县城镇，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格局是：与大宗出口关系密切的较大型手工业多为粤商经营，而与就地内销关系密切的较大型手工业为本地商人经营。如北海市牛皮加工行业有名的店号——福源牛皮塘，即为广州人

① 苏寿彭：《解放前平马镇工商业概述》，《田东史志》1987年第4期。

② 曾祥兴：《下颜豉油王》，《隆安文史》第1辑。

③ 《百色镇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1页。

在光绪年间前来设置的，其工序为将生牛皮泡、剔、烘、晒，制成干牛皮后，运销港澳各地出口。<sup>①</sup> 在防城，有 150 年历史、产品名扬东南亚的李进记酸椒店，即为广东梅州人氏开设的，所腌制的酸椒产品，晶莹透亮，香脆爽口，常有粤籍华侨前来批量采购，运往侨居各国。<sup>②</sup> 由于地处沿海，商品经济诱因较强，沿海城镇中整个手工业都相对广西内地发达，本地人经营的就地内销型手工业也颇具规模，如合浦赤江的陶瓷手工业。清代同治年间，由合浦县南昌镇垌乡坡村吴正仁三兄弟到赤江创建，开初以缸、甕、瓮、钵、碗为主，设号义和祥，销路以本县和钦州为主。后来窑号不断增多，年产 20 多万件陶品，工人多达 200 余人，大多是廉江、博白人。<sup>③</sup> 至少可以说，在该区手工业中，粤帮和本地帮是各领风骚。

#### 5. 柳江河以北地区

在广西，柳江可以说是手工业中广东人与湖南人、江西人优势地区的地理分界线，如前已论，柳江河以南基本上是粤商优势区，柳江河以北则基本上是湘赣商人优势区，谓之“无湘赣不成市”也无不可。但是相较而言，粤商在柳江以北区域的渗入势力又比湘赣商人对柳江以南区域的渗入势头大，甚至在某些城镇某些手工业行业中粤商还处于优势地位。

在桂林，较大的商品性手工业大都由湖南业主、其次由江西北主执掌牛耳，纺织业最为典型。桂林是广西仅次于玉林的第二大纺织中心，纺织业形成于晚清。20 世纪 20 年代，织工户数多达 2000 户，至 1944 年手工纺织业衰落之后，仍有 134 户，主要是采用湖南土纱、广东来的洋纱为原料，生产各种土布，业主和

---

① 劳瑞梅：《北海市志通讯》1988 年第 1 期。

② 李仙城：《李进记酸椒史话》，《防城文史资料》第 4 辑。

③ 赖洲等：《合浦赤江华侨陶器厂史》，《合浦文史资料》第 4 辑。

织工“全为湘籍”<sup>①</sup>。该业以及整个桂林工商界最大的商号之一张永发号，即是湖南零陵人创建、经营，其创始人是张海清。先从开染坊起家，而后又购机织布。该号鼎盛时有染缸40个，织机近百台，工人100余，店员30余人，商号多处。至40年代，该号几乎直接、间接地控制了桂林市一户一机的织户数百户，这些织户固定地为张家加工生产布匹，而这些织户已占桂林市织户的绝大多数。<sup>②</sup> 据1951年统计，张永发的营业额和所控制的工人数都约占当时全市私营工商业总数的三分之一。<sup>③</sup> 在桂林市众多的各省会馆中，以湖南会馆中分门别类的各种手工业行业组织的分化最多最细，如大木会、皮箱会、琢肩会、小驳船会、桐壳船会等，这说明桂林的木工、皮箱制造、小驳船制造及维修手工业也主要是由湖南业主来创建经营的。桂林毛笔业也以湖南业主黄昌典为最出名，从光绪初年开业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sup>④</sup> 驰名全国的桂林豆腐乳、辣椒酱，则是在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江西吉安府商人阳天一在桂林开设的天一栈店号所创立出来的名牌产品。<sup>⑤</sup> 而桂林著名的六塘麻布手工业，则是由江西人到六塘开设经营的。<sup>⑥</sup> 粤商在桂林的手工业中，几乎没有踪影。

在荔浦县，解放前各个城圩共有295家纺织作坊，全是湖南人经营。<sup>⑦</sup>

---

① 广西省政府统计室：《桂林市织布工业调查报告》，《广西统计季报》第2—4期合刊，1946年1月。

② 刘开泰：《张永发的发家史》，《桂林文史资料》第7辑。

③ 同上。

④ 曾度洪等：《桂林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 刘毅：《桂林天一栈豆腐乳》，《桂林文史资料》第9辑。

⑥ 广西省政府统计室：《桂林市织布工业调查报告》，《广西统计季报》第2—4期合刊，1946年1月；邓时和：《桂林的土布业》，《桂林文史资料》第7辑。

⑦ 《荔浦县解放初期的行业登记》。

柳城县东泉镇，1914年前后形成的布行街，又称为湖南街，其缘故是在这条街上，用高机织布的业主、织工全都是湖南人。<sup>①</sup>

在金秀县桐木镇，“来自江西的大部分从事手工技艺，来自湖南的除部分从事手工技艺外，大多是出卖苦力”<sup>②</sup>。

资源县城圩，“土民以农为业，习艺事者少，往往江右楚南客民，执其技来此游食”<sup>③</sup>。

在桂北门户全州县，“至木工、石工、冶工则土著几无人”，“全县手工业者多来自湖南或江西”，“湘省工人之来全者，几遍市镇乡村矣”<sup>④</sup>。

在灌阳县，“民性朴拙，只守耕凿，而不娴手艺，凡有兴作，其土工、金工、石工，皆召江右湖南客民为之”<sup>⑤</sup>。

在恭城县城圩，光绪十五年（1889）年，“来自东粤者多设商肆，来自三楚者多操工业”<sup>⑥</sup>。

据笔者实地调查，龙胜县、灵川县、平乐县的城镇圩市中，手工业也大都是由湘赣业主创立且经营的。在工业领域，桂东北区呈典型的“无湘无赣不成市”格局。

## 6. 桂西北区

桂西北区情形也类似于桂东北区，它是桂东北区在手工业领域“无湘赣不成市”局面的西向延伸，虽然这里的手工业规模种类较之桂东北区已呈大减趋势，最重要的手工业行种也由纺织演变成打铁、制瓷之类，但是手工业由湘赣业主经营的局面情形

① 盘廉美：《东泉镇纺织业的兴衰》，《柳城文史资料》第4辑。

② 金秀县桐木镇志编修组：《桐木镇志》第二章，汉族，1988年10月稿本。

③ 道光二十年《西延县志》卷2，风俗。

④ 民国31年《全县志》第二编，社会。

⑤ 民国3年《灌阳县志》卷4，风俗，士农工商。

⑥ 光绪十五年《恭城县志》卷4，风俗。

依然。如在桂西壮乡宜州市（时为宜山县）城圩，从光绪年间到整个民国时期（1875—1949），旧圩屯、洛东街、三岔街的打铁手工业（铁铺），全部由湖南工匠经营，每年春冬之间，湖南工匠前来三岔等圩铸造犁头，农忙时就赶回湖南务农。来宜山打铁的专门工匠也往往就地兼事农业，如黄万利，来到洛东街专营打铁20余年，有十多年时间还曾租种当地地主蒙少泉的三亩土地。本地壮族居民虽也能铸犁头，但笨重易损，不及湖南把式经久耐用，故而销路很少。湖南人还围绕着自身执掌牛耳的打铁业，开展商业活动，每值洛东街日，就有许多湖南人在街上售卖剪头、柴刀、镰刀等铁器。湖南业主、工匠包揽的打铁业，对当地生活影响至关重要，以至于到解放以后相当长时间里，国营的洛东商店和贸易公司每年还要与湖南铸犁工匠订立合同，要他们每年11月份组织工匠从湖南到洛东铸造犁头。在南丹月里街，1912年时，手工业户四家，贵州铁工两家，湖南车衣两家，湖南两家的资本是黔省铺户资本的一倍。<sup>①</sup>

#### 7. 桂中区、桂东北南半区

该域指广西以柳江河为界的南半区和北半区两夹之间的中间地带，即大体以柳江水系为中端，以贺州柳州连线的沿线地带城镇。该地带城镇手工业发育兼有桂南北区和桂北半区的特征，呈现出粤湘赣籍业主交叉互错，共同创立和营造手工业主行业的局面。就业主户数而言，湘赣略超过粤省；就集约程度、经济能力和资本实力而言，粤商则强于湘赣商帮。典型的城市是柳州。（1）纺织手工业方面。柳州除了部分是本地人办的纺织业以外，大部分以织布为生的人都是湖南祁阳、衡阳、邵阳人，粤商也参与行业的活动，粤湘两帮都是该业主要的经营者。但是，粤商主

---

<sup>①</sup>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3辑，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辑，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要是作为投资人，以资本渗透和控制纺织生产过程，进行手工纺织业经营的，本身一般并不直接从事工艺操作。人数最多但缺乏资金和不直接掌握洋纱货源的湖南业主，则往往在粤商资本组织下或做雇员，或作为受委托业户进行生产，即使是以家庭形式独立开业经营，也往往历经这样的过程：“湖南工人省吃俭用，积蓄了三、四股纱之后，就离开了他们的股东老板，自己独立经营起来。”<sup>①</sup> 他们独立以后，则又以分散的家庭经营为主。总之，粤商以资金启动支配着这一行业经济的运转，而湖南人则包揽了该业的大部分工艺和劳务流程。

(2) 打铁业方面。1932年以前，经营该业的全为湖南、桂林人（实也为湖南移民），经营主要是打制家庭用具和农具。但是1932年以后，柳州现代化建筑工程兴旺，与此相关的新型铁器需求刺激了新式打铁业发展，而新式打铁业经营者则“多是上海、广东人”，“与湖南帮经营范围的差别，就是他们不做日常用品”。随着湘桂铁路通车，柳州市工商业在广西的地位迅速提高，柳州的城市建设步伐加快，更适应近代建筑需求的广东人在手工打铁业中势力大有超过湘人之势。

(3) 酱园业和中西药制造业方面。在此方面，湖南人则少有涉足，而为广东人的一统天下。酱料手工业：在清代中叶至晚清之间，由广东帮移植入柳州，20世纪二三十年代柳州的和源华等七家酱园全是粤商经营。1937年出现的柳州惟一的一家中西药厂——黄家和药厂（后改为黄宝善药厂），即为粤商厂家。该厂初以家庭生产起步，始终沿用传统的制药工艺出产退热散、止痛散、止咳散、胃痛散等成药，销往柳州、滇、川、黔诸省。<sup>②</sup>

(4) 漆皮箱手工业：清季至民国10年以前，该业全为广东和湖南业主经营，民国10年以后渐有本地人仿面经营。民国初年，

<sup>①</sup> 柳州市人民政府：《调查研究》（工商专辑），1950年12月。

<sup>②</sup> 刘郁卿：《记制药业老行尊黄斗才先生》，《柳州文史资料》第8辑。

柳州市该业制作工有六七十人，粤湘籍贯者占90%，而其中又以粤籍者最多，最有名气的制箱商号——粤商的柯茂昌、李荣昌、永合三家，就拥有制作工多达36人，占柳州该业总工人数的50%以上，肯定超过湘帮。<sup>①</sup> 综上，柳州手工业表面上是粤湘商帮平分秋色，但实际上，凭借着优越的商业和商路优势，粤商仍是柳州手工业行业中的首位商帮。

武宣。“民国纪元前二十年，微艺如裁缝木匠尤雇粤工，近年邑人始学……然粗而不精”<sup>②</sup>。手工业中粤商的势力开始明显化。

融水县。融水县虽然邻近湖南，但在手工业行业中，粤湘业主势力平分秋色。满足当地日常需用的手工业，如铁器、犁头、瓦器、木器，多由湖南人制作<sup>③</sup>，而满足外销或出口需要的商品性手工业，则多由粤商来制作经营。如解放前融水县香粉、雨卜、古都及三江县贝江流域地带，共有造纸工厂四五十个之多，纸槽约100个，年产纸3000担左右，产品除少部分内销外，大部分外销到融县、三江、柳城、罗城、柳州、南宁、桂林、梧州、香港、东南亚等地，而这些工场“均系广东商人经营”<sup>④</sup>。

综上所述，粤商在广西城镇手工业中不如他们在商业和新式工矿业中的优势那样绝对，在内销型的商品性手工业中，他们较少涉足，在柳江以北广西地区城镇中他们的势力也几乎被湘赣商帮所覆盖。但是，在柳江以南覆盖面包括广西大部面积的地区城镇中，在经济能量较之就地内销型手工业大得多的外销出口型和进口内销型的商品性手工业中，粤商仍然拥有显著的优势。我们仍然完全可以说，粤商是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商品性手工业的

---

① 刘郁卿：《柳州的漆皮箱》，《柳州文史资料》第6辑，第129页。

② 民国20年《武宣县志》第三十八章，阶级政策。

③ 《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④ 同上书，第13页。

营造主体之一，他们作为一支最有力的商帮业主力量，推动了近代广西城镇商品性手工业的发展，他们的手工业企业发展本身构成了广西城镇商品手工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 第七节 入桂粤商与广西城镇新式交通运输行业及其他行业的发育

新式交通运输业是指近代以来兴起的采用现代交通工具进行海陆运输的专业行口，它包括采用轮船、电船、汽船的江海水路运输业和采用汽车的公路运输业。文中的其他行业，指城镇的旅栈、饮食、文化、娱乐等服务类行业。晚清民国时期，粤商商路以及商务在广西工商经济全局中的主位地位，也决定了近代广西这些行业的主干主要是由粤商营造的。以下分行业探讨。

### 一 交通运输业

#### 1. 新式的内河航运业、汽车运输业

前文已论，西江水路是入桂粤商商路之一，这当然促使粤商倾资举办水上各种交通运输事业。而粤商的水路，恰又是广西主要的交通孔道，这就决定了他们所举办的水上交通行业，必然构成近代广西城镇水上交通行业的主干。还在木帆时代的明清时期，粤商已创建了广西城镇以木船为工具的船运行，如嘉庆年间（1796—1820），平乐即有粤商创组的东昌船行，是当时该埠资金雄厚的大行业。<sup>①</sup>晚清民国时期，随着新式轮、电、汽船运输技术从西方传入，粤商又转而集中将资本投入新式的船运业以及水路延长交通的公路汽车交通运输业当中去，并创建了广西各城市内陆新式交通行业的主要部分，我们以民国 22 年广西最重要

<sup>①</sup> 嘉庆年间平乐《重修粤东会馆碑记》。



的三大城市航业和汽车业为例（参见表2-4）。

表2-4 民国22年梧、邕、柳三市已知籍贯航业、汽车行店东统计表

城市	航 业			汽 车 业		
	已知籍贯总店数	桂籍	粤籍	已知籍贯总店数	桂籍	粤籍
梧州	15	2	11	2	0	2
南宁	6	2	4	14	9	5
柳州				7	0	7
总计	21	4	15	23	9	14
备注	尚有未详籍贯的航业店号7家					

资料来源：民国22年《广西年鉴》第一回，商业统计。

由上表可知，广西以上三个主要城市航运业、汽车业已知籍贯的行号中，粤商占有航业总行号数的71.43%，汽车业总数的60.87%。表中柳州的航业统计虽然缺漏，但不能说明该市没有航运业行号，更不能说明粤商在柳州没有举办航运业。据一则材料记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柳州的第二大富商、粤商陈敬堂，“自己拥有‘利国’‘利富’‘利民’‘利强’四艘电船，航行于梧柳线上。除自己装运货物外，还为其他商号载运”<sup>①</sup>。

梧州是广西水运业的总枢纽，也是近代广西城镇新式航运业的最大发源地，而粤港商人对梧州新式航运业的营造情形，也最为典型。广西近代轮船运输业最早是由英国、葡萄牙、美国、法国等航商来梧州投资经营的。1902—1908年，该业全由外国公司垄断。1908年，梧州著名粤商梁颂唐等集资、筹建了广西第一家民族资本的新式轮运公司——西江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中国人乘中国船，中国货搭中国船”的口号，建有中型水筏两座，置有广泰、广威轮船，后又添客轮、电轮五艘，同英商“天和”、“洋和”激烈竞争。其后，其他粤商纷纷仿效，短时间

<sup>①</sup> 《柳州金融志》第二章，金融机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内又出现 11 个民族轮船运输公司，如广州资本家刘远锋的西兴公司，粤商黎祝林的广兴公司等，从而打破了外国人的垄断，收回了西江航线的利权，迫使外国轮船在一段时间退出西江航线。<sup>①</sup>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梧州投资新式航运业者不仅有本埠定居立业已久的粤商，而且更多的是总公司或者总行号仍设在港粤的航运商，尤其是香港华商。笔者据梧州航运界张子良先生等老航运商回忆资料《西江航运兴替史沿革资料》所述事例<sup>②</sup>，兹列一表，以对其细情作一全面的考察（参见表 2-5）。

表 2-5 1909—1949 年梧州主要航商（下河）概况示例表

类别	行号公司名称	时间 (年)	总部地	投资人	业务概况	主要航线
水 筏 业	西兴航业筏	1909	梧州	粤商梁颂唐	供西江航运公司各县客货轮停泊、起卸、堆栈	梧港、梧穗线
	西江航业筏		广州	广州刘远锋		(即梧州—香港，梧州—广东线，下同)
	宝泰航业筏	1916	香港	港商梁耀南		
	信孚洋行筏	1918	广州	广州谭礼庭	湾泊广州兴业实业公司轮船，运输煤炭，代理其他轮电船湾泊	
	济乐船业筏			港商罗宝臣		
	裕生航业筏	1924		港商陈耀龙	代理湾泊	
	北安航业筏	1916		许镜地	自制船泊，兼营西江上下游各轮船，代理接运中转物资等	
	利通航业筏	1922	香港	香港四轮航运公司		

① 参见张子良《西江航运兴替史沿革资料》（现存梧州市工商联档案室）。

② 同上。

续表

类别	行号公司名称	时间(年)	总部地	投资人	业务概况	主要航线
船 运 输 行	西江航业公司	1908	梧州	粤商梁颂唐等	置有两货轮 代理船泊为主	梧港线 梧港、 梧穗线 梧穗线
	宝泰洋行	1916	香港	港商梁耀南		
	广兴航业公司		梧州	粤商黎竹林等		
	泰安航运公司	1921	梧州	粤商崔泽培	有客货轮两艘	
		1924				
	香港洪安公司		香港	港商洪国梁等		梧港线
	耀安航业公司	1925		陈庆耀	置两艘客货轮	梧穗、 梧港线
		1926				
	高州客货轮			港商陈振帮等	挂美国旗营运	梧港线
	台山客货轮		香港	港商 华人买办大资本家		梧港线
	大兴货轮		香港	罗氏		
	广意货轮			烟土商人陈氏	以走私烟土为主	梧港线
	华南慎安轮船公司		梧州	张子良等合资		梧港线
	祥安轮船公司	1927	香港	港商李高荣	有2艘轮船	梧港线
	界易客货轮		香港	港商罗宝成等		梧港线
	南平和平货轮		香港	港商罗宝成等		梧穗线
	天成客货轮	1925		黄天泽		梧港线
	广隆新世界货轮	1930		麦氏		
	梧南安货轮轮船公司			许镜地	置有3艘轮船	梧港线
	兴宁客货轮					梧港线
富日货轮			香港黄辅兴轮船公司		梧港线	

续表

类别	行号公司名称	时间 (年)	总部地	投资人	业务概况	主要航线
轮 船 运 输 行	东合船务行	1921	香港	四轮船业公司	挂英国旗, 汽轮 1 艘, 铁壳趸 2 艘	梧港线
	瑞兴轮拖趸公司	1926	香港	覃美贤	有 2 艘趸船, 抗战停业, 1945 年恢复	
			梧州	港商袁瑞庭	租同业汽轮拖引	
	华南福其船行	1925	香港			梧港线
			香港	港商冯亦民		
	粤东汽轮	1945	香港		拖引 2 艘趸船	梧港线
	易兴船务行		香港	港商黄流独资	汽轮 1 艘, 拖 4 艘趸船	梧港、梧穗
	同商轮船公司	1945		港商朱氏兄弟		梧港线
	联益船务行	1946	香港	梁碧尔	汽轮 2 艘, 拖趸船	梧港线
	利边船务行	1925   1945	香港	港商梁光何等	有 3 艘汽轮, 引 3 艘趸船	梧港线
	江泰船务行					梧港线
	广基汽轮	1947	梧州	粤商潘以侃等	拖引其代理的趸船	梧港线
	广亨船务行	1948	梧州	粤商潘以侃与港商合资		梧港线
	福安船务行		香港	港商林蓄独资	1 艘汽轮拖趸船	
	永成船业公司	1912   1927	肇庆		初期在两广之间经营	梧港线
			广州	粤商苏耀裘	短途乡渡, 后又自置趸船航行梧穗线	梧穗线
大生运输公司		梧州	粤商潘月樵			
粤桂航业股份有限公司	1946	梧州	粤商潘月樵			
两广航业公司	1946	广州	粤商苏耀辰		梧穗线	
合江航业公司	1946	广州	粤商潘月樵		梧穗线	

续表

类别	行号公司名称	时间(年)	总部地	投资人	业务概况	主要航线		
轮 船 运 输 行	珠江航业股份有限公司	1945	广州	粤商	一直经营梧穗及桂江等县不定期航运,接拖各江柴竹杉木,1937年向官府承运南宁至贵、浔、柳、邕等地粮食。1938年广州失陷,该公司将汽船集中梧州,与各行联营,上至南宁、贵县、桂林、柳州、武宣、平南、藤县,下至梧州、都城、肇庆、封川、江门,为当时最大的独资航商	梧穗线		
	和兴船务行	1945				梧穗梧江(江门,下同)线等		
	培英船务行	1945	梧州					
	利源航业公司	1936	广州	广州航商谢炳南独资				
	福安祥船务行	1945	广州	粤商陈林等				
	祥兴船务行	1946	广州	粤商				
	利昌船务行	1946	广州	粤商陈某合资			梧穗线	
	三昌船务行	1947	广州	粤商陈某合资			梧穗线	
	顺昌花尾渡	1947					梧穗线	
	宝昌船务行	1947	广州	粤商黄某等人合资			梧穗线	
	捷捷船务行	1947	广州	粤商人黄某			梧穗线	
	兴业实业公司	1912	广州	广州大资本家杨礼庭			1912年开辟梧—西(南)线;梧都线,拖渡业务	梧穗、梧江线
	鸿创航业公司	1920	梧州				租同业汽轮拖渡	

续表

类别	行号公司名称	时间(年)	总部地	投资人	业务概况	主要航线
轮船 运 输 行	福荣航业公司	1945	琼州	梧州资本家梁荣德		梧江线
	全安拖轮船	1946	琼州	顺德商人		梧江线
	联兴汽轮拖	1946	梧州	粤商邓胜材	自置汽轮租乡渡拖引	兼梧贵(贵县)线
	四和船务行					
	荣利船务行	1946	梧州	林荣等	风轮拖渡	梧江线
	某船务行	1946	梧州	黄某		梧江线
	和发船务行			梁耀昆等		梧江线
	兴利船务行					梧江线
	利兴船务行	1930	广州	粤商	共有2艘轮船	梧江线
	利记船务行					梧江线
	恒发祥船务行					梧江线
	安仓船业公司			梁伯等		梧江线
	成兴船务行			颜炳培等		梧江线
	惠民航业公司	1925	江门	鹤山资本家李氏等合资	5艘汽轮不定期接拖竹木排,上下行运输,货品为盐木柴炭等	梧穗、梧江线
	兴发船务行	1923			7艘汽轮	梧穗线
	天行船务行	1938	广州	粤商		梧港、梧江线
	祥安船务行	1936	广州	粤商邓胜才	有小电船2艘,走梧州戎圩短线,并将船租为郁江柳河的货船	梧江线
	百事船务行		广州	粤商陈耀川	置汽轮1艘	
福安船务行	1945	广州	粤商陈林		梧穗线	
文光船务行	1934	广州	粤商文光祥等		梧穗线	

续表

类别	行号公司名称	时间(年)	总部地	投资人	业务概况	主要航线
轮 船 运 输 行	顺和船务行	1921	广州	粤商	购有汽轮              7艘汽轮 3艘汽轮	梧穗线
	两兴船务行	1927	广州	粤商		梧穗线
	白马船行务	1927	广州	粤商崔庆杰		梧穗、 梧澳线
	利行船务行	1945	梧州	陈南独资		梧穗线
	天泰船务行	1933	广州	粤商黄氏独资		梧穗线
	瑞兴船务行	1935	广州	粤商		梧穗、梧 江及澳门
	大市折汽轮			雷昌等人合资		
	左中管汽轮	1931	广州	雷昌等人合资		梧穗、 梧江线
	洪昌粤昌汽轮		广州	广州商人合资		梧州澳 (门)线
	横兴卢江福济 汽轮			广州货商		梧穗、 梧江线
	义利汽轮	1926	广州	粤商陈某独资		
	新泰汽轮	1920	广州	粤商		梧穗线
	永和船务行					梧江线
	广泰船务行	1928	广州	广州航商		
	华南新轮西轮 兴江洋行		广州	粤商福隆、胜隆 等合资		梧港线
	福荣船业公司		梧州	梧州资本家福生 号海品什店		梧州至 三水线

据上表统计, 1909—1949年40年间, 在梧州, 仅行至下河(西江下游)的航商有104家, 至少可断定由粤港商人开办者有62人, 占40年间全部航商的59.62%。其中, 为机动客货轮提供湾泊的航业筏8家, 6家为港穗客商, 1家为梧州粤商创办经

营。梧州汽轮运输业对下河（西江下游）主要走梧港、梧穗、梧江（江门）三条航线，在梧港线上营运的有31家航商，香港华商最多，有17家，占该线航商的54.84%；梧州粤商也有四家，相合占该线全部航商67.74%。主要在梧穗线上营运的有31家航商，以广州航商最多，共21家，占其中67.74%；梧州等地粤商也有2家。主要在梧江线上营运（出澳门）的有15家航商，至少有4家为粤商，其他11家籍贯尚难判定，但估计也多为粤商。此外，还有不定期、不定线经营以上三线航运的商家十余家，也大多是广州等地的粤籍商人。西江下河三线的轮船运输是近代广西进出口最主要的输送带，而这一输送带牢牢掌握在粤港商人手中，这说明，广西城镇的新式航运业主要是在粤港商人的营造之中发育成长起来的。

## 2. 海运业

广西南部拥有1595公里长海岸线，由东而延过琼州海峡可达澳门、香港、广州，由西南而延展，逾境可西达东南亚、南洋群岛，并直接加入世界环球航线的西半循环圈。北部湾的弧顶口岸城市北海，是近代广西沿海海运交通行业的总枢纽。在晚清民国时期，北海的长途海运业始终把握在资本雄厚、拥有一流航海技术的外国航商手中<sup>①</sup>，外国资本的海运业优势，中国民族航商固然难以与之抗衡。但是在外国航商势力未达到以前，或在抵达以后的民族经济范围内，广西海运业仍始终是在粤商营造中发育成长的。如道光年以后，随着北海作为大西南门户的区位优势开始显现，澳门航商与抵达北海的广府商人逐渐联合，购置头猛船，共同经营北海至琼州、广州、江门、澳门、香港、海防、新加坡等七条航线的长途海洋运输。头猛船是广东陈村制造的一种

---

<sup>①</sup> 黄铮主编：《广西对外开放港口》，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5页。



适于长途海运的大型帆船，又称“红单大帆船”，型号有载重 30 万司斤（合 176 吨）和 50 万司斤（合 2950 吨）两种，在当时国内海船制造业中属于较高的水平。澳门及北海航商通常拥有 40 艘头镗船从事各线运输。在 19 世纪 40 年代至 70 年代末近 40 年中，澳门及北海航商的头镗船海运，一直是以北海为枢纽的北部湾及南海沿岸南洋航运业的主要船队。“斯时载运货物，俱是头镗船，入口则花纱、匹头、呢羽、鸦片、药材。出口则青油、靛青、食糖、纱纸、八角、八角油、桂油、云南锡板、牛皮”<sup>①</sup>。直至 1876 年北海开埠以后，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并凭借不平等条约给予的种种侵略特权的英德日葡等国外轮船，大量驶抵北海，头镗船才不堪竞争，逐渐退出海上运输的主要地位。但直至清季民初，它在民族海运经济中也仍占有主要的地位，《英国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仍对头镗船有详细的记载。时至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木帆业向机动化进步的过程中，广东商人也仍起着关键作用。如当时名噪两广的三挂尖头大帆船万丰号，在两广有“帆船之王”之誉，它就是广东湛江商人庞义光、黄海帆与航商韦光宇合资约 5000 多元资本，委托高德人建造，继而投入海运的。<sup>②</sup> 在历经了大约 40 余年外轮垄断北海的长途海运之后，至民国初年，广东沿海民营轮运业也发展起来，广东商人的民营海轮，又作为当时南海沿岸民族海轮的主力，进入北海，构成北海民营海轮业的主干。据陈锦光主编的《北海交通志》记载，“（广东）广南船厂造的千吨海轮、安益公司的两艘民轮（985 吨）、广东航商的海利、大司字（673 吨）号及其他民营小轮，加入北海港运输，分别航行广州、香港—海口—北海和陈

① 光绪八年《北海杂录》商务。

② 陈锦光主编：《北海交通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6 页。

村—海口—北海—钦州线”<sup>①</sup>。虽然由于外轮的垄断，使它对北海运输业影响甚小，但从广西沿海口岸城镇民族海运业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它毕竟开了先河。

从行业的环链发展看，广西城镇交通行业“无东不成市”局面，也是前文所述的广西进出口行业、百货、农村土特产收购等行业“无东不成市”局面发展的配伍或行链完善。既然上述行业主要是在粤商营造下发育成长的，它们对城镇交通运输能力提高的需求，当然首先并主要就是粤商的需求，而满足这一需求的经济行为本身所成就的最新的致利良机，当然首先成为粤商最新的致利良机，从而促进了粤商比之其他任何一帮商帮都有着强烈的冲动投资举办广西交通运输行业。同时，粤商主营的前诸行业和初期运行，已为粤商积累了最为雄厚的利得储蓄，这也使粤商能够拥有投资交通运输行业的最大资金来源，这也是其他商帮所无法比拟的。这样，广西进出口经纪、百货、农林土特产收购等诸行业的“无东不成市”局面，也就规定了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投资客商构成，必然是“无东不成市”的。

粤商为主所营造的交通运输行业，在整个广西城镇经济发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该行业始终是广西城镇经济的大行业之一，仅轮船运输业以其资本规模在广西城镇经济行业中就已位列前排，如在1933年时拥有50个行业的梧州，为第四大行业；在南宁为第十大行业，在柳州为第五大行业。<sup>②</sup>粤商在桂举办的交通运输业，尤其是新式交通运输业，深刻地改变了明清以来人力木船运输的落后状态。晚清以后，木船运输已退居次位，在广西大部分河道，轮电汽船已成为最主要的运输工具。据民国27年陈晖《广西交通问题》一书资料统计，当时广西境内50公

<sup>①</sup> 陈锦光主编：《北海交通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197页。

<sup>②</sup> 引自民国22年《广西年鉴》第一回，商业统计。

里以上的中长途运输中，民船（即木船）仅有 2517 公吨，而仅以载重量计电船、汽船、拖渡就有 9405 公吨，加之电汽船平均速率是民船的 3.07 倍，实际上同一单位时间内，后者的运输量应是“9405 公吨  $\times$  3.07 = 28873.35 公吨。为民船运输量的 11.4 倍”<sup>①</sup>。这就大大提高了广西各城镇间商路命脉的运载能力，拓展了城镇的市场腹地，这可以理解为：各城镇间经济联系数以十倍地增强，距离耗减系数数以十倍地减弱。广西各城镇更密切地融合发育为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

## 二 其他行业

正如即使在广东商人具有主营优势的行业中，粤商也并不能穷尽地包揽整个行业的所有店号，在行业的次要部位上，仍是由广西和其他帮商人经营一样，粤商也并未包揽广西城镇所有经济行业的发育。在广西城镇经济行业中粤商主营行业主要集中在体现工商基本过程的上述各类行业，此外，在那些体现工商业务运转次要过程的其他行业，粤商势力虽也颇具分量地参与，但远远不及在前面所述的七大类行业中居于主营业位的优势。一般来说，广西本地商人在这些行业中，保持了自身主营商帮的地位（参见表 2-6）。

依据表 2-6，我们逐业略加分析。

旅客、客栈行业：客栈是下等旅店，一般客房仍以伙铺为主，即十人、八人同睡一太平铺板；店内中还各有菜刀、砂煲、风炉若干，由旅客自己煮食；经营多属夫妻店，极少雇用工人，收费便宜，如 1938 年时柳州为每人每天四角。<sup>②</sup> 旅馆属于中等旅店，设施较客栈齐备、先进，设有各种客房，收费标准，单房

① 陈晖：《广西交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 27 年版，第 34—37 页。

② 黄克成：《解放前的柳州旅店业概况》，《鱼峰文史》第 5 辑。

日收八角至一元，双房收一元伍角左右。一般也设有饮食业相配置，雇工数名，并保持相当数量的太平铺。<sup>①</sup> 这两类旅店的顾客通常是一般的乡镇客商或小贩、采购人员、相命家等。该行业第一要素是有房产、地产，经营过程不跨地域，故而相对简易，也无需较复杂的加工过程，只要拥有地皮和住家，稍事装修即可转化为旅馆客栈。因此，这一行业中店号以人口基数最大、有住家之便的当地街民开设最多，粤商为之仅属偶尔。

表 2-6 1933 年广西六大城市其他行业已知籍贯店号统计表

地点	旅馆			客栈			茶酒楼			粉食			酒米			杂货		
	总店数	粤籍	桂籍	总店数	粤籍	桂籍	总店数	粤籍	桂籍	总店数	粤籍	桂籍	总店数	粤籍	桂籍	总店数	粤籍	桂籍
梧州	13	3	10	6	2	4	9	6	3	30	18	11	79	34	39	63	32	33
南宁	6	1	5	15	2	8	5	3	1	39	7	31	84	7	74	149	12	136
柳州	10	1	9	16	1	11	7	4	3	10	2	8	34	4	28	141	37	99
玉林	3	0	3	2				0			2	0	9	0	9	137	1	136
贵县			2							1	0	1	4	3	7	53	30	22
百色			1	1	0	3	2	1					1	0	1	42	11	30
总计	32	5	29	40	6	25	24	15	8	80	27	51	205	48	158	585	123	456

资料来源：引自民国 22 年《广西年鉴》第一回，商业统计。

饮食业：即一般的小米粉店、小餐馆（酒米），米菜土酒多直接在当地就近采购，加工过程简易，当地街民住家稍事维修配置即可转化为接待一般顾客的餐馆、粉店，因此经营该业者多为本地人，粤商为之也仅属偶尔。

杂货行：该行业是杂烩经营各种土洋日杂的小型简易商店，分工简单，本小利薄，就地进货和销售，经营简易，是属于城圩最原始、最分散、最底层的商业。该行这种特点使人口基数最大、往往有住家之便的广西当地居民，凭着粤商所没有的就近优

<sup>①</sup> 梧州市工商联：《旅馆业发展的四个时期》，《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

势，在这一行业中始终保持着主位商帮的地位。1933年，粤商在该业的经营者的只占21.03%的很小比例。

据民国22年统计，广西梧、邕、柳、贺、玉、百、全等八个主要城市中，有籍贯的注册商人3410人，其中粤籍1412人，桂籍2012人，桂籍超过粤籍共600人。而在旅馆、客栈、酒米、杂货四业中，桂商比粤商就多达510人，占广西八市桂商超过粤商总数的85.28%，可见粤商在桂城镇行业中的弱势也主要限于这四类行业范围内。

但是，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这些粤商没有树立主位地位的弱势行业中，粤商却也往往保持自身对于全行业的主导和示范地位。其一，这些行业中行业发展水平最高的行店仍是粤商行店，如在旅住饮食业中，大凡高级档次的旅馆、餐馆仍主要由粤商经营，因此上表中茶酒楼一栏，广西八市已知籍贯的茶酒楼共24家，粤商举办者就多达15家，为总家数的62.5%。如北海，20世纪30年代以广州风味著称的西施酒家<sup>①</sup>、贵县颇有声名的桃源酒店<sup>②</sup>、梧州20年代最好的饭店大同酒店<sup>③</sup>、南宁的万国酒家等都是粤商开办经营的。这些大酒店、大饭店与桂商创建的小旅店、小饭店不同，资本投入数额高，经营规模大。如在梧州，罗定人开的大同酒店，雇请职工二三十人，设施先进齐备，设有广州风味的中餐馆和适合外商口味的西餐馆，厨师一般从广州高薪聘请，设有高档客房、高级家具、冷热水浴室、剧场，客房多达八九十间，这无论是在追赶时尚潮流，还是经营管理水平方面，在全行业中堪称巨擘。<sup>④</sup> 他们的客源主要是达官显要、巨商富贾，拥有着消费水平最高的以粤商为主的客源。又如20世

① 潘展云：《三十至四十年代北海饮食业市场阵容》，《北海文史》第3辑。

② 郑开基：《贵县工商业史料》，《贵港文史资料》第14辑。

③ 梧州市工商联：《旅宿业发展的四个时期》，《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④ 同上。

纪40年代梧州的西亚酒店，楼高四层，拥有80间客房，双人房租每天10元，单人房租每天6元（当时米价每百斤6元左右）。这种粤商顾客才能够消费得起的高级餐饮业，举办者自然也多是粤商。其二，即使桂商人数远远超过粤商的杂货行业中，经营规模和能量最大者也主要是粤商。在平乐，解放前有杂货店几十家，大多为本地人开设经营，但是该业中“较大的几家”，能从梧州、广州直接进货者，“全是广帮人”<sup>①</sup>。粤商所开尽管家数不多，但在该行业中却酝酿着杂货业向着更高级行业形式——百货行、批零行升格的发展方向。其三，从行业环链中看，桂商居多行业对于粤商主营行业也仍始终居于附从和补充的地位。桂商虽然总家数多于粤商，但其经济活动无不以粤商为主体的七大类行业为轴心。他们零售的主要货源如食盐、洋货必须仰赖粤商的运输、经纪和批发，他们所收购的广西产品也都要中经粤商之手下梧州出广东；即便是桂商居多的小行业，大户仍多是粤商。总之，大利所在仍为粤商所掌，货流之源仍为粤商左右。从某种意义上说，桂商所办的行店，实际上正是应近代粤商集中发展五大行业所引起的新的分工布局：粤商多趋往利润较大、居于主导地位的要津行业，而渐渐后起但资本尚不雄厚、又有乡土便利的桂商，则承担起过去统由粤商承担的城镇经济中最底层的分工，为自己创造自身条件所规定的最大利益；同时，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分工配置，不断地为居于支配地位的粤商创造着更大的利益，使粤商运输、经纪、批发、银号等行业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这不改变且实质上是“无东不成市”格局的一种特殊的历史延长。

本章七节的探讨证明，在桂东、桂东南、桂中、桂东北、桂北、桂西南、桂西、桂南内路及沿海各区，覆盖广西大部分

---

<sup>①</sup> 何锦均：《解放前的平乐商业》，《平乐方志通讯》1984年第4期。

地区的多数城镇中，主要经济行业即进出口行、经纪行、百货行、土洋货批零销售行、农林土物产收购行、银号行、私营银行业、典当行、新式工矿业、商品性手工业、新式交通运输行等，都主要是由粤港客商人桂营造，并不断推动其日趋发育成长的。

晚清民国时期促成 11 大类行业发育，以及其所带动起来的其他行业的发展，集中连片，便使城镇经济功能区域面积进一步扩大，最突出的表现，是从城墙外向原属行政功能的城内发展。至民国，广西多数城镇的经济功能区已普遍地内外连片，城墙壕沟已经成为其功能实现的人为障碍。所以，约自 20 世纪 20 年代，广西各城镇普遍地掀起了填壕拆墙、兴建马路的热潮。如 1924 年梧州商埠局开始拆除城墙，将大南门、小南门一带城基辟为南环路，便利城市交通。<sup>①</sup> 南宁在民国以后便拟订马路拓展计划。民国 4 年，“先开辟北豪东豪西豪南豪各马路”，“路面材料用沥青或水泥三合土，或水结马克当”取代了青石板，以后又逐渐拆城扩建。民国 17 年完成民生路，民国 18 年完成兴宁路，民国 20 年完成民权路、中山路，民国 21 年完成民族路，路宽约 1929 公尺至 2134 公尺。<sup>②</sup> 当时县级以上城镇都经历了这种过程。尤其要指出的是，近代广西城镇出现的城街新建筑，特别是沿街店铺还深深打上了粤商的烙印——一般都是广州式的骑楼。据笔者实地调查和考察，桂林、长安、百色、龙州、梧州、南宁、柳州、玉林等广西绝大多数县城大镇，主要商业区都采用广州式的骑楼建筑风格。这种骑楼，楼上为住家，楼下内为门市铺面，外为避雨走廊，骑楼相接，就连接成了雨淋不着、日晒不到的长长的人行道，这种建筑很适合岭南的气候特点，最早形成

---

① 吴庆洲：《古代和近代梧州的城市建设》，《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13 辑。

② 民国 26 年《邕宁县志》卷 8，街市。

于商业最繁华的广州。<sup>①</sup> 广西与广东气候大体相同，粤商人桂自然也将这种建筑风格带进广西城镇。他们要按照广东的习惯，把在桂店铺建成骑楼式。由于粤商众多，骑楼自然整街排列，以后各籍商人也纷仿效，加之政府的统一规划，便形成了广西街市的广东骑楼风格。这种景观，也生动地反映了近代粤商因素对广西城镇经济行业发育的主导作用。粤商移入此风，当然有着显著的城镇经济效益：骑楼扩大了铺面的空间，减少了自然因素限制，延长了商店营业时间，方便了人们的市场活动，从商在功能空间设置方面，扩大了广西城镇的经济功能。现在，南宁市兴宁路一带广州式骑楼街保存完好，经过精心修缮，已开辟为象征广西街市历史文化景观的商业步行街组，仍为当今南宁市民逛街购物的最繁华、热闹的商业街区。

上述的 11 大类行业包容了工商业务所有的三个程序，粤港客商对该 11 类行业牛耳的执掌，说明了近代粤港市场对广西的辐射不是表面层次的，而是深层次的；不仅停留在工商业经济循环的某一个环节或程序，而是全面渗入其主要环节和全部程序；不是或继或断的，而是动态循环、连续无间的。广西的整个城镇经济行业系统及其运行都呈现十分突出的“无东不成市”特征，这种对粤港商人在全行业范围深度依存的格局，在全国十分罕见。

---

<sup>①</sup> 民国 26 年《邕宁县志》卷 8，街市。



## 第三章

# 晚清民国时期“无东不成市” 格局与广西城镇经济网络 “无市不趋东”等级分布体系 ——“无东不成市”格局的结构透析

然而，“无东不成市”的格局在广西并非全区匀布的，它顺着粤商入桂的东西走向，形成粤商聚居规模和比重水平，由东而西、高低不等的梯度差异。由于粤商在桂的主位地位，这种梯度差异，又构建了近代广西整个城镇经济网络等级分布体系的突出特征：东密西疏、东端中心、西端末梢。这对此一时期整个广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广西更为长远的发展注入了一种十分富有增长空间的、以东西走向为基本规律的客观的区域机制。

### 第一节 “无东不成市”在广西的 分布面及其梯度差异

本节拟从城镇经济总体的角度，进一步分区逐县地确定“无东不成市”在全广西的分布范围，并揭示其程度等差的梯度分布状态。

## 一 东南组县市考察：粤商人桂第一程地带与“无东不成市”区最高梯度

该组地区指桂东区、桂东南区、桂南沿海地区，本书简称东南组地区。这一组区南起博白县山口，北至贺县桂岭，粤桂交界地带长达 1000 余公里，南向沿海直接连接广东南部沿海线，是粤港商人向桂推进的第一程地带，在广西范围内与粤港距离最短，位于粤商商路人桂段核心部分和第一圈层分叉的西江主干浔江流域、桂江下游、北部湾沿海商路。粤商在此首先抵居，必先经过，往返频次最繁。广大农村的主要居民即所谓当地人也实际上几乎全系明清人桂的广东或中经广东人桂的广西、福建汉族移民，即土白话人、客家话人、潮汕话或闽南话人。<sup>①</sup> 因此，以粤商与当地农民联系为核心的城乡市场联系，最为直接密切，本身就属于广东先进的生产力向广西实施空间推移同一过程中不同行类即工商类与农业类的同籍移民之间的相互协作搭配。农业商品经济部分呈农商高度一致的粤港市场指向。该组区对粤商人桂的“引力”最大，该区块所形成的“无东不成市”格局程度最高，粤商也因而在此聚居最众、总量最大，比例通常为工商人口的 90% 以上；城镇经济的绝大多数行业 and 所有层次的（县城和圩镇）所有市场聚落点，几乎纯粹或主要由粤商开设、包揽和垄断把持。其最有力的佐证是：该类区块中尽管外围广大农村操土白话语、潮汕闽南语、客家语和少部分壮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但是几乎所有城市大小圩镇，都纯以粤商方言广府白话为交际语，如同旧志所云，“城

---

<sup>①</sup> 参见刘海涛《蒙山的语言及其分布》，《蒙山文史资料》1981 年第 1 期；拙作《清代广西的客家人口及其开发贡献》，卢斯飞编著《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同治六年《藤县志》輿地志，风俗；光绪《北流县志》卷 9，风俗；民国 38 年《广西通志稿》，民族。

廓街市多粤东人，亦多东语”<sup>①</sup>，形成了以城镇为分布点的一座典型的广府白话方言岛。

### 1. 桂东区

梧州。地处桂东端，为地绾两粤的广西第一大门户，粤商人桂的第一大站和最大聚居地。明代时即已形成“往来横渡口，强半广州音”<sup>②</sup>局面。据笔者实地调查，晚清民国梧州工、商业者90%以上是广东祖籍的。<sup>③</sup>1946年6月，梧州18—60岁成年人共51063人，从事工商交通业人口比例占47.41%，计24209人<sup>④</sup>，按90%折算，当时梧州成年粤商及从业人口约有21788人。

苍梧县。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客民为广东接壤尤众，专事生息什一而出什九……盐商木客列肆当圩多新顺南海人”，本地居民则“不谙商贾”<sup>⑤</sup>。该县当时19座大小圩镇，全部纯操粤语。<sup>⑥</sup>

藤县。1934年6月，该县注册商户428家<sup>⑦</sup>，面在受抗战影响、商业规模呈收缩状态的1941年，广东旅藤同乡会、南海旅蒙江同乡会、南海旅太（平）同乡会会员仍多达380名（户）<sup>⑧</sup>，占当时县域总商户数的大约79.1%。此外，全县22座圩镇，全操粤语。<sup>⑨</sup>

① 同治六年《藤县志》卷之5，輿地志，风俗。

② 谭少鹏编著：《古代诗人咏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

③ 1988年5月笔者访梧州市工商联黎慕梧先生。

④ 民国34年《广西年鉴》上册，第191页。

⑤ 同治十一年《苍梧县志》卷之5，风土卷。

⑥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梧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⑦ 民国24年《广西年鉴》第二回，第474页。

⑧ 民国30年《藤县志》第五章，职业团体。

⑨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梧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岑溪。全县圩镇 22 座，全操粤语。<sup>①</sup>

蒙山县。“解放前蒙山城内做生意的，全是广东人，做手工业者多是湖南人”<sup>②</sup>。八座圩镇中，纯操粤语者八座，主操粤语夹用西南官话者一座。<sup>③</sup>

贺县。由于位处粤湘桂三省交界地带，湘商亦常来常往乃至定居。但总的局面仍是“来做生意的外商，十有八九是广东人”<sup>④</sup>。据该县最大商业城市八步主要四个街道街民姓氏祖籍调查统计，广东籍贯者竟高达 97%—98%。<sup>⑤</sup> 粤商同样也垄断着各主要圩镇的经济命脉，24 座圩镇中，全部主操粤语者 20 座，操粤语但以官话（西南官话——以下同）、客家话为主者仅 4 座。<sup>⑥</sup>

昭平。情形介于贺县、蒙山之间。圩镇 17 座，主操粤语 12 座，兼操粤语而又以官话为主者 5 座。<sup>⑦</sup>

钟山县。共有圩镇 14 座，主操粤语兼操官、客语者 11 座，占其中绝大多数；情形像两安圩那样，“广东人开铺子并不很多”、“最多是湖南人”的圩镇<sup>⑧</sup>，即以官话为主的圩镇仅有 3 座。<sup>⑨</sup>

---

①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梧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据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钟文典（蒙山县客家人）先生回忆。

③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梧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④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 3 册，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

⑤ 八步镇志办：《八步镇志》第五编社会，第三节，民族，姓氏，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⑥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梧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⑦ 同上。

⑧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 3 册，第 271 页。

⑨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梧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2. 桂东南区

平南。38座圩镇全部纯操粤语<sup>①</sup>，因“居民多为广东商人后裔，故说话较近广州方言”<sup>②</sup>，如大安镇粤商至少占工商者总数80%以上。<sup>③</sup>又如武林镇，“居民99%从广东上来，以新会、九江、南海人较多”<sup>④</sup>。

桂平。47座圩镇全部纯操粤语<sup>⑤</sup>，以江口镇为最典型，民国时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店都是广东人办的”<sup>⑥</sup>。

贵港市城区（贵县）。48座圩镇全部纯操粤语<sup>⑦</sup>，据老粤商黄文海回忆，“过去商界是广东人的天下”，民国所建商会，“商会成员大多是广东商界人士，会长也自然是广东籍商界巨头”<sup>⑧</sup>。典型的圩镇如大圩，据饶任坤等编著的《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收录的口碑：“大圩是乾隆年间建圩的，最初到大圩做生意的是姓郑的广东人，当时有半条街是他们的，后来大圩附近的土地就逐渐为他们所有了。”

北流。光绪年间该县即形成“城市商贾辏集，多南海人”<sup>⑨</sup>的局面。因此，圩镇25座全部纯操粤语。<sup>⑩</sup>

---

①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梧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1988年平南县委办：《平南县志》第一章，民族第二节语言（文稿）。

③ 1988年11月笔者平南县大安镇访得。

④ 笔者1988年11月平南县武林镇访得。

⑤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梧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⑥ 据1974年5月7日江口张素华口述，广西师院历史系编《桂平历史调查资料》。

⑦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梧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⑧ 黄文海：《贵县商界变迁》（文稿），存贵港市工商联。

⑨ 光绪六年《北流县志》卷9，风俗。

⑩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梧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容县。“与东粤接壤，东人经商更众”<sup>①</sup>，该县 19 座圩镇全部纯操粤语。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该县毗连广东，上通梧州，逆北流江，略过陆路，从玉林入南流江出海，也是粤商进而辐射东南亚的中转站，从而使容县成为广西第一大侨乡。

玉州区（玉林）。圩镇共有 32 座，全操粤语。<sup>②</sup> 直至民国初年，“本地人的商店只经营农副产品如米、酒、麸、油、糖、豆之类，……其余多是广东人经营”。其行业范围包括苏杭绸缎、五金、什杂、熟药行、生药行、烧腊味行、京果酱园行、烟丝行、牛皮行、制糖行、中西成药行等。<sup>③</sup> 如兴业街“广东人定居的户数占全街百分之四十”<sup>④</sup>。虽然玉林商人崛起，在广西颇有名气，在玉林本地玉林商人势力赶上粤商，还只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的事，也就是说，在百年之长的近代，玉林商人超过广东商人的时间，不过仅占十余年。

陆川。全县 21 座圩镇，纯操粤语 16 座，以粤语为主辅以客家话者 6 座，纯操客家话者 1 座。<sup>⑤</sup>

博白。共 14 座圩镇，纯操粤语者 7 座，粤语为多辅以客家话者 6 座，纯操客家话者 1 座。<sup>⑥</sup>

### 3. 桂南沿海区

北海。为桂南沿海最大门户和粤商海路入桂第一站。光绪年间，北海“店铺不下千家，大中商号约四五十家，广府商人尤

---

① 光绪二十三年《容县志》卷之 4，舆地志风俗。

②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梧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③ 周贱谟：《民国时期玉林商业和各行业摆卖的散布情况》，《玉林市文史资料》第 3 辑。

④ 覃义桐：《清末民初的兴业蓝靛》，《玉林县文史资料》第 2 辑。

⑤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玉林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⑥ 同上。

占多数”<sup>①</sup>。北海的同乡会组织主要是广东系列的，1909年的广州会馆，1886年的高州会馆；还有广东的潮阳、阳江两座会馆。另因当时的北海属于广东，还有1座广西会馆。<sup>②</sup>城市纯操粤语。

钦州。圩镇25座，其中24座纯操粤语，1座操粤语兼有壮语。<sup>③</sup>1784年即建有粤东会馆，光绪十八年（1892）又重新修葺。<sup>④</sup>民国时期，来钦州开办工商企业者，多是“广州、佛山、三水、南海、番禺、香港等地的企业家……进口货源多从广州佛山等地运到钦州，然后转运及西南各省市地区销售”<sup>⑤</sup>。

合浦。合浦廉州为古代北部湾主港，清前期粤商大量涌入，并在嘉庆年间（1796—1820）先后创设新旧两个广州会馆。<sup>⑥</sup>大致在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北海港正式取代其主港地位。但因为合浦珍珠和海盐闻名，仍有众多粤商到此营生。如距廉州23公里处有一座小镇西场镇，咸丰年间（1851—1861）还有粤商到此设立广州会馆，馆联曰：“恩波通象郡，福曜普羊城。”<sup>⑦</sup>该县圩镇33座，全部纯操粤语。<sup>⑧</sup>

防城区（防城港市防城区）。清代民国时期，“广府人大凡圩市，几乎无处无之，而且掌握商场势力”，“尤其江坪、竹山两地，极一时之盛，故今日两地尚遗存广州会馆”<sup>⑨</sup>。全县23个

① 光绪八年《北海杂录》商务。

② 潘展云：《北海市工商联合会沿革概述》，《北海文史》第3辑。

③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钦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 光绪十八年钦州《重修粤东会馆碑记》，（碑立钦州市冯子材故居碑林）。

⑤ 李瑞祥：《解放前钦州金融演变概况》，《钦州文史资料》第5辑。

⑥ 合浦县博物馆《合浦记事》（文稿）。

⑦ 笔者1992年10月合浦县西场镇街上实地访得，当时广州会馆馆地尚存。

⑧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北海市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⑨ 民国34年《防城县志》第一章第一节，缘起。

圩镇纯操粤语。<sup>①</sup>

浦北。21 座圩镇纯操粤语<sup>②</sup>，浦北县的寨圩还建有广州会馆<sup>③</sup>。

灵山。1855 年时，灵城即有“广府官窑会馆”之设<sup>④</sup>，全县 22 个圩镇纯操粤语<sup>⑤</sup>。

上思。该县位于十万大山北麓，桂南沿海区西缘，为壮族聚居区（占总人口 85.6%）<sup>⑥</sup>，粤商锋芒有所减钝但仍居优势：18 座圩镇中纯操粤语 6 座，粤（语为）主壮（语为）辅者 3 座，壮主粤辅者 5 座。<sup>⑦</sup>

## 二 中腹组 23 县市考察：粤商人桂第二程地带与“无东不成市”地带第二梯度区

该组地域位于广西内腹广大地域，包括桂南内陆区、桂中区、桂东北南半区，本文简称为中腹组地区。该区分布在粤商商路人桂段中段，包括浔江主干郁江、郁江主干邕江，黔江主干柳江、桂江的中游等流域，是粤商向桂推进的第二程地带。与东南组地区相较，该组区与港粤距离拉大，粤商人抵稍迟、往返频次递减，往往依托东南组区再行推进。外围广大乡村主要的农业居民，已不是与粤商同籍的或同一起来向的粤闽移民，而是土著少数

---

①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玉林地区、钦州地区、北海市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同上。

③ 民国《浦北县志》。

④ 饶任坤、陈仁华主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04 页。

⑤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玉林地区、钦州地区、北海市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⑥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钦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⑦ 同上。



民族居民或者湘赣等省移民。在桂南内陆区环抱南宁的邕宁、武鸣，在桂中区的武宣、象州、金秀、来宾、罗城、柳江、融水、三江、龙胜等地，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已占总人口数 60%<sup>①</sup>以上；在桂林以南的平乐、荔浦、阳朔、恭城等地，虽然也有不少粤闽移民人居，但人口过半的也是代表着湘赣市场指向并与湘赣商帮共同构建当地农村产业的湘赣农业移民。<sup>②</sup>以粤商与当地农民关系为主要内核的城乡市场联系，因受到民族差别的梗隔、湘赣市场拉力的分扯而相对疏松。粤商势力从绝对优势，演变成为一种相对优势。作为东南组区高梯度的“无东不成市”格局的直接延伸，此种局面虽然仍然保持着，但在程度上又有一定递减。表现为：该组区粤商聚居最众的是南宁、柳州，都远不可与梧州相比，粤商比重也在下降，如平乐粤商，占当地工商人口 60% 的比例，在该组区已属最高，较之梧州、平南、贺县下跌了 10—20 个百分点。在该组区，粤商执经济牛耳的方式改变为：垄断和主要执掌当地在总圩镇数中过半数的主要圩镇经济命脉，并且通过这些圩镇，间接控取其他较次要的另一部分圩镇经济。在部分县区城镇中，仍以粤语为主，但在大多数城镇中，粤商的广府语只限于同籍客商中流行，未能扩大为整个城圩的市场语、通用语，粤商更多的是学操壮语、官话与当地入交易。

### 1. 桂南内陆区

南宁。位于桂南内陆区西缘，粤商人桂段商路的西江主干浔江、郁江并伸往左、右江的水路，从登陆的北海、钦州与沿海路，北进并直上柳桂官道的陆路，在此交会成埠，为粤商重要的

① 参阅《广西市县概况》中关于市县 1982 年人口、民族比例的统计数据，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以下各县市该年份该项数据均引自此处，不再引注）。

② 参阅民国 38 年《广西通志稿》，氏族；晚清民国时期桂北诸县志。

聚居地。该市及附郊的 13 座圩镇纯操粤语。<sup>①</sup> 咸丰年间（1851—1861）至民国 26 年，在南宁“独执商场牛耳者，厥惟广帮”<sup>②</sup>。南宁固然也有江西、福建、两湖会馆，但以广东系列者最多，计有广东会馆、岭东会馆（梅县等地）和新会书院。<sup>③</sup>

邕宁。该县北抱南宁，壮民比例高达总人口的 88.72%。圩镇 30 座，纯操粤语者 11 座，主操粤语兼操壮语者 15 座，壮主粤辅者和纯操壮语者各 2 座。<sup>④</sup> 笔者曾实地考察该县城关蒲庙镇街，即从现在的五圣官至人民旅社，“多系广东人居住，名之为广东街”<sup>⑤</sup>。

武鸣。该县南邻南宁，壮族聚居人口占总人口的 88.72%。31 座圩镇中，壮语为主者 28 座，其中兼操粤语者 12 座，兼操官话者 1 座；粤主壮辅者 1 座；壮语为主官粤话兼操者 1 座。<sup>⑥</sup> 但是，即使粤商已不足使自身方言成为城镇主要通用语，当地壮族农户确也颇多做起小生意，粤商也始终保持支配商场主要商帮的地位。如壮语为主的双桥镇，最活跃的是汉族商人“罗定客”，其次是玉林、合浦、钦州、永淳的汉族商人。又如壮语为主的县北的府城圩，解放前最大商号是中山人吴国强开设的均利祥号。该圩设有粤东会馆，粤商吴、梁、李、关四姓多达 100 多人<sup>⑦</sup>，势力无任何一商帮可比。

---

①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市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民国 26 年《邕宁县志》，社会二。

③ 同上。

④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⑤ 农浩：《县城蒲庙镇往昔的概况》，《邕宁县文史资料》第 1 辑。

⑥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⑦ 《武鸣县社会历史调查》，广西师大历史系编印《广西民族史研究系列》（二）。

横县。情形仍属桂东南型。“咸同年间，横州城很热闹，有许多广东商人”<sup>①</sup>，“市厘商贾，悉东粤人”<sup>②</sup>，32座圩镇，31座纯操粤语<sup>③</sup>。

宾阳。33座圩镇主操粤语<sup>④</sup>，兼操平话。宾阳老粤商陈义新先生的回忆和宾阳商业局修志办的研究都指出：解放前宾阳最重大的商业，特别是与广东市场关系密切的商业，多为广东人把持。<sup>⑤</sup>但值得指出的是，自宋代狄青平定侬智高以来，宾阳即渐成为从军而来并定居下来的山东汉族后裔的聚居地，这部分汉族人群构成了宾阳的主要居民（操平话）。他们携中原经济文化优势，在粤闽人抵达前已先期在宾阳开发，拥有独到的农业手工业技术，晚清时代，已将宾阳营造成为以手工业专业村为特色、在广西颇具名气且在全国也属少见的手工业之乡。<sup>⑥</sup>在这一基础上，造就了宾阳人势颇众、成长独立性较强、具有较大的西向辐射力的本地商帮，加之宾阳并无大川水路直达，这些因素，都明显地抗阻和耗减了粤商的锋锐。这是我们在把握宾阳“无东不成市”格局程度时应该注意的。

## 2. 桂中区

柳州。该市位于广西中部，是粤商入桂段商路黔江、柳江与纵贯广西南北的广西官道（桂林—柳州—南京）十字交会的路

---

① 饶任坤、陈仁华主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4页。

② 嘉庆六年《广西通志》。

③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钦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 同上。

⑤ 笔者1990年11月在宾阳采访宾阳县供销社陈义新先生（当时70余岁）所得，陈先生是宾阳解放前的工商业老前辈。

⑥ 参见广西师范学院政治系《宾阳县手工业专业村调查专辑》（1991年装订本）。

口，是粤商人抵桂中地区的最大聚居地。据前章研究，柳州的经纪行、百货行、洋货行、收购行、小五金、照相、各类新式工业、新式金融等最主要的经济行业，都主要由粤商营造，在柳州颇具影响的湘赣商帮也不可望其项背。据1933年民国广西省政府《广西年鉴》统计，柳州注册商家已知籍贯者569家，广东籍177家，占总数的31.1%；湖南籍56家，仅占总数的10%；江西籍仅7家。具有就近发展优势的本地商帮314家，占总数的55.18%，但本地商帮主要分布在资本少、能量小的比较原始初级的杂货行、酒米行、客栈行等，这些行业在城镇经济中只处于附从地位。柳州及附郊圩市全操官话，粤语通行的现象已经基本消失<sup>①</sup>，但是，这并未影响“无东不成市”格局在总体上依然存在。

武宣。该县壮族居民通常占总人口的65.8%。12座圩镇只有东部河马圩以粤语为主，南部思灵、新龙两圩夹有粤语，其余9圩全操官话。<sup>②</sup>但是，粤商仍是各圩镇中支配大局的主要商帮，民国旧志记载：“行商坐贾，多属粤人。”<sup>③</sup>

象州。壮族通常占66.5%，12座圩镇为官话、壮话区。<sup>④</sup>但晚清民国壮商仍少见，“其由广东来者大都经营商业，而由湖南来者，多数肩挑小贩，余皆劳工之辈”<sup>⑤</sup>。决定市场衰荣悉由粤商，如最大圩镇运江圩形成于咸丰年粤商涌入之时，鼎盛于光绪二十余年粤商涌入盛极之时，衰落于1940年湘桂铁路通车、

---

①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柳州市和柳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同上。

③ 民国3年《武宣县志》卷12，纪事风俗。

④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柳州市和柳州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 民国23年《象县志》第二篇，社会。

商路改道、粤商外迁之时。<sup>①</sup>

来宾。也为壮族聚居区，圩镇操官话、壮话。同时，湘赣商帮在该县各圩镇也颇有影响，但是总体局面仍是：“县境商民强半属广东籍”，“县属富户寥寥，稍巨商业多广东来客操之”<sup>②</sup>。

金秀。该县为壮族瑶族聚居区，圩镇操官话、壮语。但商民多粤商。如最大圩镇桐木镇，“桐木商民以广东、湖南两省籍最多”，赣、闽帮则人少财薄。而粤、湘帮中，又以粤帮为最主要，金秀 26 条溪河都属于粤商控驭商路命脉的西江水系，“湖南、江西人则多从内地陆路流入”，经营本小利薄的各类小手工业。<sup>③</sup>

鹿寨。该县壮族通常占 44%，汉族占 51%，广东客家人颇多人居<sup>④</sup>，商人以粤商为主，如该县重镇寨沙即是“光绪初年粤人到埠经商渐次繁盛”起来的。<sup>⑤</sup>

柳江。该县为壮族聚居区，城圩操官话，但商人以粤商为首位商帮。如县城拉堡圩就是广东客家人詹、袁、马、魏诸姓于乾隆年间所创立的。咸丰年以后，粤湘赣商人又陆续迁入，建立生盐、木柴、蓝靛、草纸等行业，从而促进了街市的繁盛。大发、六道等其他圩镇情形也与拉堡圩类似。<sup>⑥</sup>

柳城。该县居民约汉壮各半。汉族中尤以广东客家人最醒目，客家商帮是各城圩主要商帮。1934 年《柳城县志》卷四记载：“近八十年县属各大市场及柳江沿岸”，多为广东来的“客家人”聚居，“经济权亦渐为该族所操”。另外珠江三角洲商人

① 《历史上运江商业的兴衰》，《象州县志通讯》1988 年第 5 期。

② 民国 25 年《来宾县志》下篇，历史篇，食货农工商业。

③ 参阅《桐木镇志》第二章，汉族（1988 年稿本，存广西区通志馆）。

④ 刘炳运：《寨沙客家人来源及习俗》，《鹿寨文史资料》第 4 辑。

⑤ 民国 23 年《雒容县志》卷上，輿地。

⑥ 《柳江文史资料》第 2 辑。

也众多，致使在官话、客家话包围之中，柳城仍保持着“粤语各圩市商号最通行”的粤语方言岛。据广西师范大学柳城客家籍老师刘道超的调查，该县城大埔镇商民中80%以上为广东客家人。当年围绕大埔圩地点的择定，客家人与土著人曾发生纷争，终以客家人财势较大而择址今地。<sup>①</sup>柳城湘商人数亦众，但只限于经营纺织等小手工业。<sup>②</sup>

### 3. 桂东北南半区（指桂林以南的桂东北地区）

桂林。桂林历史上是广西省城，也是桂北的最大城市，纯操官话，荟萃十余省商人。其中以粤湘赣三帮影响最大，三帮中又以粤帮为首位。还在明清时期，桂林城即有各省商帮建立的十数座会馆，其中，粤东会馆三，为最多；江西会馆二，湖南会馆二，为其次；闽滇浙川黔陕苏会馆各一。<sup>③</sup>整个晚清民国时期粤商首位格局始终未变。一方面，桂林及附近乃至整个桂东北区主要农村人口多属明清时期迁人的湘赣汉民<sup>④</sup>，传统的消费习俗较多地依靠湘赣手工业、农副产品资济，因而造成湘赣商帮仍得以源源不断地为之营销，从灵渠等孔道入桂；另一方面，桂林商路又主要从属于连通广东的西江水系，广东来货尤其对包括湘赣移民更具吸引力的工业品都需经粤商运人，桂北土货部分过桂湘货也终经粤商之手顺桂江、抚河掠梧州出海，这又造成：在桂林，虽然没有类似于东南组区那样的大量同籍农业移民作铺垫，粤商同样能成为优势商帮中的魁首商帮。光绪三十一年（1905）《临桂县志》三十二卷记载：“桂林为广西首郡，内外商贾云集，粤东江右人居多，见闻甚于他郡。”<sup>⑤</sup>又据辛亥老人回忆：当时桂

① 刘道超：《广西柳城县大埔镇、龙头乡客家历史经济考察》（打印本）。

② 《柳城文史资料》第4辑。

③ 李文利：《桂剧的班社、庙会和剧社》，《桂林文史资料》第3辑。

④ 民国38年《广西通志稿》，民族。

⑤ 参阅曾度洪、覃树冠《桂林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林有六大商帮，“第一是广东帮，它的资本最多，营业最大”，第二至六位依次是赣、湘、闽、桂、其他各省（山陕川滇黔浙苏等）商帮。<sup>①</sup>

平乐。该县为城圩官话区（解放前也兼操白话）。该县有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的、在明代万历年间创建的粤东会馆。清季以来，平乐县城又是汽船、电船在桂江可抵的终点站，商人60%以上为粤商。<sup>②</sup> 1937年旧志载，该埠“来自东粤者多设商肆，来自三楚者多操工业，而来自江西福建亦不乏其人”<sup>③</sup>。同治年间捐修平乐粤馆的粤商共428户<sup>④</sup>，其中，本县粤商382户，而按1934年注册的平乐商户数为240户<sup>⑤</sup>，虽然年份相隔甚远，不可简单折比，但至少可断定382户粤商当占同治年间该埠商户的绝大多数。

荔浦。该县亦为城圩官话区。但在晚清时期，至少有荔城、马岭等各城圩三座粤东会馆。1914年时“城郭，民戍杂居，商贾皆东粤三楚之民，岁冬则归来，春聚本邑”，而当地“人民但知耕植，不谙贸迁”<sup>⑥</sup>。

阳朔。该县各城圩皆操官话。但是，清末民初县城最大商号为粤商元安和、公兴号、万利祥三家水面行。据陈文同志回乡调查，逢过年，当地扎龙要这三家扎，烧烂龙也要这三家烧，按当地风俗，扎编和最后拜烧喜庆的纸龙，要由公认最有福气、能代表祥吉的人家来担当。可见三家富足，享有盛名，沾尽体面。阳朔县有粤湘赣三座会馆，以粤馆财力最厚，湘人主要是做手工

---

① 宋维楨：《辛亥革命前的桂林商业的概况》，《桂林文史资料》第2辑。

② 1988年2月平乐老粤商后裔陈正芦提供。

③ 民国26年《平乐县志》，民族。

④ 同治年平乐《重修粤东会馆碑记》，碑立平乐县城粤东会馆旧址。

⑤ 民国24年《广西年鉴》，第474页。

⑥ 民国3年《荔浦县志》，风俗。

艺，生意不大。<sup>①</sup>

恭城。该县地处都庞岭南麓，纵贯全境的茶江在历史上曾为中原进入两粤的重要航道，县东北与湖南省江永县相邻，下水可达平乐、梧州、广州，各城圩操官话。城镇工商业者的构成，以湘帮最众，粤赣帮次之。1937年“未入户籍之各族人口（工商流动人口——笔者注），江西千余人，广东约二千余人，湖南一万五千余人，灌阳约三千人”，但“来恭工作”的“业工艺者十九系湖南、全灌客民”，万人规模的湘帮主要是“双肩一啄”的担贩游匠，虽也有浩大声势，在风险小、利润稳、服务当地的各种手工业中，往往“利市三倍”<sup>②</sup>。但是，就对整个城镇经济支配能量而言，仍不及操纵进出口贸易大宗的粤商巨大。这从当地当时的标志性建筑物各省会馆的气派比较中可以看出，当地流行的民谣曰：“湖南会馆一枝花，广东会馆赛过它，福建会馆平平过，江西会馆烂冬瓜。”<sup>③</sup>

#### 4. 桂北区

该区北邻湖南，有柳江、浔江可以直接通达，城镇商帮的构成情形类似于桂东北南半区。

罗城。该县仫佬族、壮族相合通常占人口的66.4%。城圩多操官话，“粤语亦颇流行”<sup>④</sup>。少数民族以外的汉人“以广东、福建、湖南、河南来者为多”<sup>⑤</sup>，如最繁华的龙岸镇，“有粤湘闽三座会馆，以粤湘商人为最多”<sup>⑥</sup>。

融水县。该县苗侗壮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61.4%。城圩

---

① 陈文（历史学硕士，现为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家乡阳朔县经济史调查》（手稿）。

② 民国26年《恭城县志》第二编，社会。

③ 1987年1月笔者在恭城县文物管理访得。

④ 民国31年《天河县志》第三编，社会。

⑤ 民国26年《罗城县志》，民族。

⑥ 罗城县教育局温阳（广东梅县客家人）同志提供。



商人中，数以百计的流动担贩“主要是湖南人”，但有固定店铺设置的城镇大商业行业，如前枚举的木材、山货、百货、洋杂等，主要由粤籍商人经营和把持。<sup>①</sup>

融安县。即使县北、县东北地带僻远的小圩镇，粤商也是开辟圩场、支配一方市场经济的主力商帮。如板揽圩上，“除当地壮族外，有广东、福建、湖南人迁来，以广东人最多”。光绪二十五年（1899），以周广兴为首，共70多名粤商捐建规模浩大的粤东会馆，现老街附近还有200多座粤人墓。雅瑶圩：为咸丰年间粤人黄和胜开店经商后成圩，有民谣曰：“先赶黄和胜，后赶瓦窑圩（雅瑶）。”该圩也有粤东会馆之设。龙妙圩：清代前期即建有粤东会馆。1924年2月正式开圩，发起人之一即粤商（梅县人）黄氏。县南各圩更是如此，如大坡镇，开圩商人是粤商周、杨、范、骆四姓，惟一的外籍会馆就是粤东会馆，乾隆年间就已经建立。至光绪年间，粤东会馆迁到门市地段最好的圩头重建。直到解放前，圩上最有名的商号仍是粤商骆星堂。<sup>②</sup> 1936年《融县志》概述了以上情形：“大商多为广东人，次为本县人，又次为各省人”，“商业之资本，商人来自广东者较为崇厚，各省及本地人资本较少。”<sup>③</sup>

三江。该县为广西著名侗乡，少数民族通常占总人口的77.76%。城镇商人“大商为广东人，次商为湖南江西人，又次为本县及各县人。资本以广东人为雄厚，此外诸省大率资本较少”。特别是，在桂东南不甚活跃的广东客家商人在三江则格外醒目，他们“散居各市镇，善经商，博厚利，每致一地，率多致富”<sup>④</sup>。

---

① 《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② 莫乘宗：《融水县农村圩场调查》，《橘乡今昔》第1期。

③ 民国25年《融县志》第五节，实业。

④ 民国35年《三江县志》卷2，社会；卷4，经济。

龙胜。该县北邻湖南县，为壮侗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县。该县商业命脉始终掌握在粤商手中。如最大的圩镇飘里街，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会期，就是从广东会馆会期演变来的。原来这个日子是粤馆置田交租日，届时迎天后宫神圣上殿，敬祀祖先。会馆还请广东戏班大演三天三夜。后来，粤东会馆的会期逐渐发展为由粤东会馆主持的全圩人民盛大的固定节日，增添了抢花炮等活动。在会期的日子里，各族人民穿红戴绿，四方客商辐辏而来，人流熙往，百货云集，街民一般把会期看得比春节还重要，粤商自可大做生意。粤馆会期竟成当地人民固定节日，说明了晚清以来粤商的财势在城镇经济生活中具有显著的优势地位。在飘里街，虽然湘商人数多于粤商，但经济实力和能量不及粤商。湖南会馆也有六月六会期，但只有民国 27 年、28 年举行过，其他几次均搞不起来。这是因为他们所占据的行业不如粤商所占重要，所具有的经济能量不如粤商巨大，所以，在经济上缺乏粤商那种感召力。<sup>①</sup>

### 三 西南组 23 县市考察：粤商人桂第三程地带与“无东不成市”第三梯度区

该组地区指桂西南区、桂西区，本文简称为西南组区。该组地区位于广西西南和西部边远地带，分布在粤商商路人桂段枝梢段，包括左、右江流域地区和红水河上游流域以南，西至云贵高原东缘的地带。这是粤商向桂推进的第三程序地带，与粤港地理距离进一步拉大，加之该组地区地势高险，层峦叠嶂，水系纤细，交通往往只能依赖崎岖回转的山道上人挑马驮，粤商人抵时间更迟，往返频次大减，往往依托中腹组地区尤桂南内陆区再行

---

<sup>①</sup> 据解放前曾任飘里街长的 78 岁老人李韬口述，1988 年 2 月笔者到龙胜县飘里街调查访得。

推进。外围广大乡村从语言划分角度看属于南壮（族）语区，主要居民中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比例通常高达80%以上，较之中腹组地区更高。壮族人口基数之大，以至于常常出现迁人的汉族反而发生“壮化”的情形。<sup>①</sup> 深受不同民族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习俗类型上差异的影响，以粤商与当地农民关系为主要内核的城乡经济联系，较之中腹组地区更为疏松。但是，城镇经济中粤商的主位地位即“无东不成市”格局仍然牢牢保持，而且该组区远离湘桂走廊，没有似柳江以北区湘赣商人那样的强力商帮的竞争而优势更显，粤商比重似乎并没有较之中腹组区下降（如龙州为64%，百色为41.49%），当然，这也是由于边埠贸易、城镇贸易和滇黔烟土生产的引力强大，同时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基数较小的缘故。不过粤商进入西南地区总量较中腹组区已的确小得多。在该组区，粤商执掌城镇经济牛耳方式的间接性，较之中腹组区又增大了：在大多数县市中，粤商所直接垄断和支配的往往只是只占圩镇半数以下的若干中心城镇，或较重要的圩镇，间接控驭半数以上的中小型圩镇。因为西南组区这一层次的市场聚落仍很原始，往往不是3天一圩，而是12天、10天、9天、7天、6天、5天为一圩。<sup>②</sup> 交易量小，交易频次少，粤商常驻的基本条件较差，粤商聚居规模进一步递减、缩小。表现为语言布局：在最重要的市场聚落各县中心城市和较大圩镇中，仍主操着粤语；但为数占多数的最原始的市场聚落即各小圩镇，均操壮语为主<sup>③</sup>，间或夹有粤语、官话。商业交易仍多通用粤语。

### 1. 桂西南地区

扶绥。尽管壮族占总人口的82.14%，但民国时期经营小商

① 编辑组整理：《那坡县的民族源流》，《那坡县文史资料》第1辑。

② 民国22年《同正县志》卷7，民籍。

③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小贩的“县治居民半多外籍”<sup>①</sup>，而全县16座圩镇，以粤语为主者10座，纯操粤语者1座，壮语为主间夹粤语者4座<sup>②</sup>，可知所谓“外籍”主要是指粤籍，当地城镇主位商帮应是粤商。

崇左。该县壮族占总人口的80%，但城镇商帮以汉商为主，民国时人云：“明时自广东、江西、福建各省迁居是地者甚众，至今生齿日繁。”<sup>③</sup>该志还将粤语列为城圩中第一方言，由此可知汉商诸商帮中，显然以粤商为首位。8座圩镇全部流行粤语，其中4座以粤语为主。<sup>④</sup>

龙州。该县壮族占总人口的94.27%，但据1946年《龙津县志》第四编所陈列，明清以来人居龙州圩街的姓氏99姓，其中65姓是从广东迁来的。换言之，即粤商及其从业人口占该埠人口的64%。据民国旧志记载：至近代，“自清光绪中叶中法战争，大军云集，粤东商贾衔尾而来，及至龙州辟为通商口岸，粤商遂争相投资，始成巨埠。以故商场牛耳执于粤人之手……十商场几无不有粤商足迹”<sup>⑤</sup>。圩镇的语言表征中，粤语地位并不居首位，17座圩镇中，以壮语为主，粤语为辅者有13座。<sup>⑥</sup>但并不影响上述粤商显著的主位商帮地位。

宁明。该县虽然壮族占总人口的78%，但城镇圩商多为“至本县经商”“落业不归”“日见蕃殖”的粤商，“海渊、那堪等乡皆其辟为商场”，“城厢白话异于乡”<sup>⑦</sup>的方言格局于是形

---

① 民国26年《崇善县志》第二编，社会。

② 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民国26年《崇善县志》第二编，社会。

④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 民国25年《龙州县志》卷3。

⑥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⑦ 民国37年《思乐县志》卷4，社会篇。

成。全县 11 座圩镇，纯操粤语者 7 座，主操粤语兼操壮语者 3 座。<sup>①</sup> 广东商人众多以及粤剧观众成为当地地方戏观众的主要人群。以至于民国以来“演剧多为过境之粤剧，或近日新习所组织的白话剧”，历史上一直占据着宁明戏剧舞台的壮族的采茶小调竟因此“已消灭”<sup>②</sup>。

凭祥。该市为壮族占总人口 83.5% 的壮族地区。中法战争后，苏元春移民实边，在今隘口建房造圩，形成近代最早的中越边境贸易市场。“尔后，广东、江西、福建等地商人往返经商于此，边境贸易和县内商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sup>③</sup>。其方言布局是“城镇主要讲白话……乡村主要讲壮话”<sup>④</sup>。城圩诸汉商帮中显然以操白话的粤商为主帮。

大新。壮族通常比例高达 96.89%，但是，民国时期“惟通衢圩市，客商贸易，多操粤语以相应酬”<sup>⑤</sup>。大新多数圩镇是以壮话为主的，但是，这些圩镇也仍是粤商执掌经济牛耳。如只操官话、壮话的全茗街（系全茗上司司治所在地），从清代同治年间至民国初年，街上较固定的商户 11 家，资本额共 8180 元光洋，广东汉人和客家人共 7 家，资本额共 5880 元光洋，分别占总数的 64% 和 72%。壮族商户无有一家。<sup>⑥</sup>

天等。壮族占总人口的 98.8%。全县 15 圩镇，操壮语同时流行粤语者 7 座。<sup>⑦</sup> 由此可推断大部分圩镇经济控制在粤商

---

①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玉林地区、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民国 37 年《思乐县志》卷 4，社会篇。

③ 凭祥市志编委会：《凭祥市志》商业志，民族志，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④ 同上。

⑤ 民国 35 年《雷平县志》第三编，社会。

⑥ 黄现藩：《广西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 页。

⑦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手中。

德保。壮族比例高达 97.7%。各圩镇全操土语和官话，似乎粤商影响不大。但是，旧志和回忆资料记载：“边郡土人（壮族）不过菽粟布缕鸡豚蔬菜，随时贸易以谋朝夕”，而“视都会辐辏之区，……多异籍人盘踞圩场，垄断逐末，大抵利归于客民。”<sup>①</sup> 直至解放前，德保县城大商家也多为粤商。<sup>②</sup>

靖西。全县壮族比例高达 99.27%，但客商多广东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查州属各家祖籍系广东居多”<sup>③</sup>，民国以来，“广东各县之商人每年数次联成大帮约千人之谱运来布匹、估衣、洋杂等货，转购鸦片以归”<sup>④</sup>。所造成的方言格局是：“白话、官话皆盛行于城市。”<sup>⑤</sup>

那坡。壮族占总人口的 90.2%。但在光绪年间，县城五六家洋货匹头行，全是粤商开设。<sup>⑥</sup> 又据当地同志研究，那坡汉人多自广东南海迁来，其中一部分还发生“壮化”，放弃粤语，学操壮语，融入壮民族中。<sup>⑦</sup>

## 2. 桂西地区

上林。壮族占总人口的 80% 以上，而城圩“生意最盛的走贩生意操于粤人之手”<sup>⑧</sup>。

马山。该县壮族占总人口的 75% 以上，而“城厢、南屏、尚贤等乡（主要圩镇——笔者注），多外籍人杂居，各掺其本籍

① 乾隆三十一年《镇安府志》卷 2，舆地志下，墟市。

② 据广西师范学院政经系副教授何平实地调查。

③ 光绪二十五年《归顺直隶州志》卷 3。

④ 民国 37 年《靖西县志》第四编，经济。

⑤ 民国 37 年《靖西县志》第三编，社会、语言。

⑥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⑦ 编辑组整理：《那坡县民族源流》，《那坡文史资料》第 1 辑。

⑧ 民国 23 年《上林县志》卷之 3，建设部上。

语言……与粤东语无大异”<sup>①</sup>，仅“入城镇各乡以种菜或小负贩为业的新民人（广东客家人）约计近千口”<sup>②</sup>。

都安。如光绪至民国年间，垄断该县主要商业即纱纸贸易者多为粤港办庄。<sup>③</sup>

隆安。全县城圩 13 座，经济规模位居前三位的城厢、丁当圩、南城均流行粤语。<sup>④</sup> 光绪至民国，隆安纱纸贸易大部分也掌握在粤港办庄手中。<sup>⑤</sup>

田东。壮族比例虽高达 84.8%，但是还在光绪年间，城圩“市厘商贾，多粤东来，其次滇南，亦有他郡寄居者”<sup>⑥</sup>，致使“白话，县城居多”<sup>⑦</sup>。

田阳。田州镇上最热闹的沿江码头上，粤东会馆气势最为雄伟。<sup>⑧</sup> 该县最重要的特产八角，主要即由粤商运销海外。<sup>⑨</sup>

百色。该县位于云贵高原向南岭丘陵的过渡地带，也为右江航道汽船、电船西进的终点站，县城为滇黔桂三省交会的最大的交通和商业枢纽，也为粤商在桂西的最大聚居点。解放前，百色镇商人“以粤省为最多，次为南宁和湘闽”<sup>⑩</sup>。1933 年时注册商户 157 家，粤商有 65 家，占总数的 41.4%。<sup>⑪</sup> 如果将未公开登记的主由粤帮组成的鸦片收购行考虑进去，则粤商比例当占总商

---

① 民国 27 年《隆山县志》第二编，人口。

② 同上。

③ 刘炳新：《都隆那纱纸工业》，广西统计局《统计月报》第 1—8 期合订本。

④ 参阅吕孟禧、蔡中武等《广西圩镇手册》南宁地区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⑤ 刘炳新：《都隆那纱纸工业》，广西统计局《统计月报》第 1—8 期合订本。

⑥ 光绪八年《百色厅志》，思隆县城厢附近图。

⑦ 据民国 23 年《思隆县志》，社会。

⑧ 田东县平马镇乐善里 104 号居民劳荣焕口述。

⑨ 光绪八年《百色厅志》，思阳分州全图说。

⑩ 1960 年《百色镇志》第三章，民族。

⑪ 民国 23 年《广西年鉴》第一回。

家数 50% 以上。粤商后裔估计，解放前，百色商人 90% 以上是粤商。<sup>①</sup> 这个估计可能过高，理解为粤商占半数以上当是恰如其分的。

百色以西，开始了攀登云贵高原的里程，地势逐渐梯起，水路削细，万山重叠，陆径盘旋崎岖，马帮成为主要交通工具，然而粤商仍不辞险阻推进，将“无东不成市”局面推向偏僻山深的广西“省尾”之地。

凌云。道光、咸丰年间拥有商店、银庄、当铺百余家，铺号多为广东等外地客商开设经营，县城建有雄伟的粤东会馆<sup>②</sup>；光绪至民国年间，凌云的大烟帮“绝大部分是广东来的”<sup>③</sup>，这一时期，凌乐镇较固定的商户先后有 32 家，粤商 9 家，桂商 22 家，但是城镇中最大行业苏杭绸庄和烟土庄几乎全部为粤商经营。赢利额以粤商商户最大，总计粤商平均发展资本是初来资本的 9.38 倍，而桂商该项仅为 2.39 倍；商业专业化水平也以粤商商户为最高，粤商商店的商业收入所占比重平均为 83%。其他兼业经济仅占 17%，而桂商该项则仅占 66%，其余 34% 赖靠兼营农业或收地租。<sup>④</sup> 凌云也常有“滇黔大帮”抵达，但是，一般他们换购所需货品后即行返回，很少长驻，在经济上也受着粤商的支配。

田林。早在 1706 年和 1723 年，旧州和百平街即建有广州会馆。<sup>⑤</sup> 民国时期乐里镇粤商聚居所在，还形成了一条“广东街”<sup>⑥</sup>。

隆林。民国时期由于“外地经营商业者络绎而来”，“广语，多于商场用之”<sup>⑦</sup>。

---

① 1994 年 2 月笔者在百色市城区邓家港访得。

② 赵宗平：《古今凌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③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 4 册，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00 页。

④ 同上。

⑤ 民国 27 年《田西县志》第八编，杂记。

⑥ 同上。

⑦ 同上。



西林。该县壮苗等少数民族比例极高，而“城居民均系外来客籍”<sup>①</sup>，这些客籍当多为粤商。粤商在当地以其经济实力和活动能力，常常获得官府信任，取得代理征粮的差事。粤商越发村曾在代理粮差时与那劳岑毓英（岑春煊父亲）发生冲突，竟能号令当地粤籍人员向那劳屯挑起械斗，竟使岑氏败走云南。<sup>②</sup>足见粤商即便在最边远的山区县，势力之大亦举足轻重。

乐业。民国时期“县之流寓生理者操粤语”<sup>③</sup>。

#### 四 东西北组四县市——粤商弱势区组

该组地区指桂东北北区、桂西北区延绵于从东北至西北紧邻湖南、贵州的广西北缘地带，分布在粤商人桂商路末梢和湘赣商帮入桂商路主干。虽然从地理距离上看桂东北北区应属粤商入桂的第三程地带，但是由于这里是直接连通湘赣的湘桂走廊主孔道及湘赣商人向桂推进的第一程地带和最密集聚居区，粤商的北进已经为数寥寥，城镇经济几乎全由湘赣商帮把持。农村居民以湘赣汉族农业移民为绝大多数<sup>④</sup>，城乡经济联系也主要体现为湘赣商帮与湘赣农业移民的分工协作和市场对流，农业的商品经济部分呈农商高度一致的明显的湘赣市场指向，广西“无东不成市”局面在此已呈消失状态。红水河、金城江流域桂西北区从语言区划看属北壮地区，壮瑶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过半以上的比例；从地理上看属粤商人桂的第四程地带，但与同处偏僻地带的桂西、桂西南省区相比，不仅与粤港相距更远，而且其纤细短小的龙江小河水道远不能与可通行汽船电船的左右江航道相比，特别是，所处区域位置封闭于内陆大石山区，更不能与桂西南拥有诸多边

① 民国12年《西林县志》。

②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③ 民国21年《乐业县志》第二编，社会。

④ 民国38年《广西通志稿》民族二。

贸口岸、邻近沿海粤商商路的区位相比，因此，这一区中，虽然也颇多粤商渗入，但其锋锐远不如在桂西、桂西南地区。而湘赣商拥有就近从湘省及桂东北直接辐射的优势，在该区所铸造出来的城镇经济局面基本上也属“无湘无赣不成市”的格局，广西“无东不成市”格局延伸至此已呈消失状态。表现为方言格局：城镇圩市全操官话或壮语。

### 1. 桂东北北区

富州。圩镇9座，全操官话。据《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三册记载，县城富阳“开铺子做生意的人来自各方，但主要是“从湖南的衡阳、衡山、祁东、祁阳、邵阳等地而来”，约合七八十家，占1935年总商户170家的66.7%。

永福。光绪年间，当地“市与贸易民用，悉用邻境”<sup>①</sup>，而当时“接踵而至”的汉族人民，全系“湘赣桂全之民”<sup>②</sup>。该县城圩当以湘赣商帮为主位。

灵川和临桂。该两县环抱桂林，湘赣商人垄断城镇经济命脉，灵川县所有圩镇几乎是湘赣商帮的一统天下。如素有“广西第四大圩”的大圩镇，商人以湘商最多，生意最大，赣商次之，还拥有一条“江西街”。粤商仅有三四家，均无钱财建房，平时寄居在粤东会馆中。大圩首富“东乡第一家”黄元盛、“白果大王”周巨锋均属湘籍。<sup>③</sup>又如熊村圩，湖南会馆是这一小圩镇上惟一的客商会馆。<sup>④</sup>又如“白果之乡”海洋圩，“从清代到民国，在海洋圩筑屋开铺的半数以上来自兴安全州湖南江西，其

---

① 光绪十一年《永宁州志》卷3，舆地志下，风俗。

② 民国6年《永福县志》卷1，舆地。

③ 据灵川县大圩镇老赣商周裕和（1909年出生）口述，1988年2月在灵川县大圩镇访得。

④ 据灵川县熊村人伍官盛（1902年出生）口述，1988年2月在灵川县大圩镇访得。

中又以湖南江西人为多”，建有湘、赣会馆。<sup>①</sup> 又如谭下圩，“商界大户多湖南人，起码四十余家，大多经营纺织手工业，广东人在这里只是中等人家，主要经营洋杂、刨烟、染织，最多时也不上十户人家”<sup>②</sup>。

兴安。该县是灵渠所在县，1937年湘桂铁路通车以前，灵渠“实为三楚两粤之咽喉，行师饮粮以及商贾百货之流通，惟此水是赖”<sup>③</sup>。但是，晚清时期只有湘、赣会馆，而无粤东会馆。<sup>④</sup>

全州。该县为广西北端门户，东北比邻湖南，县域湘江为中原人桂主要孔道，县城“市场繁盛，货物充斥”，“拥挤喧闹”，为“两广咽喉”和桂北一大都会。但是，粤商在此几无身影，“客商以湘赣居多，鄂皖闽浙苏次之”，“其贸易操于湘赣大贾之手”<sup>⑤</sup>。

资源。“操奇赢游都市者，往来皆楚南客商”<sup>⑥</sup>。

灌阳。尽管文市在宣统年间也建有粤东会馆，但粤商势力微弱。商帮最大是湘帮，湖南会馆中竟还细分成四个帮系——祁阳帮、衡阳帮、宝庆帮、永州帮；其次是赣商，也建有江西会馆。<sup>⑦</sup>

## 2. 桂西北区

忻城。该县壮族占总人口70%左右，城镇街民也多为壮族。但商人仍以广东、湖南、宾阳籍为多。<sup>⑧</sup> 这可能是湘粤优势区难

① 李晋：《灵川县工商行政管理志》下卷，主要集市考。

② 陈平：《谭下镇志》（稿本）。

③ 道光十四年《兴安县志》卷6，建置二。

④ 笔者2002年6月到兴安县调研所得。

⑤ 民国26年《全县志》第七编，经济。

⑥ 道光二十六年《西延轶志》卷2，风俗。

⑦ 蒋琳：《民国时期灌阳商业》，《灌阳县志通讯》。

⑧ 樊韬：《解放前忻城县宁江壮族社会经济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

分彼此的分界地带。

宜山。壮族占人口 75% 左右。城圩商人以汉族商人为主。1949 年宜州城有“广东同乡会”和“惠潮嘉同乡会”，但成员人数不及湖南会馆多，财势不如江西会馆充裕<sup>①</sup>，粤商虽仍颇具能量，但显然已不具备足够的人手力量由自己一一控制主要经济行业，而往往是“委托当地壮族商贩收购黄豆、花生等，并兼营汇兑和银器戒指等业”<sup>②</sup>。

环江。壮族、毛南族等占人口 80% 以上。城圩商人多汉族商人。汉族姓氏中，又以湖南籍为最多，有 10 姓；广东籍为次，有 3 姓。<sup>③</sup> 可推断湘商是城圩主要商帮，当然粤商也颇有能量，如思恩镇 128 家商店中，最大店号是粤商欧湘波的布店，贵州小贩也常来往。<sup>④</sup>

南丹。壮族、瑶族人口占 60% 以上。城圩商人多为汉商。从清代光绪年间至民国，给人留下记忆较深的，县城有约 20 家商户，其中，已知桂商 8，粤商 4，湘、川商各 2，赣商 1，5 家不明籍贯<sup>⑤</sup>；月里街该项中，粤商 3，规模平常；湘商 3；川商 5；黔商 3；宾阳商人最多，有 12 家，而且经营百货布匹为主，平均资本额也最大。<sup>⑥</sup> 这是广西桂商为优势商帮的不多的县区之一。

东兰。壮族人口占 85.7%，城圩商人则以“湖广客”为主，“县城尚有湖南、宾阳客商多户，而本地籍人民则以农业

---

① 黄光毅：《清末及民国年间有关宜山商业的民间组织》，《宜山文史》1987 年第 1 辑。

②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 5 册，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3、287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 2 册，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15 页。

⑥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 1 册，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29 页。

为本”<sup>①</sup>。

凤山。壮族人口占 57.6%。“县人经商求学均趋柳庆桂林”，而该路实为湘赣商人在桂主干商路。“联袂而来”的“外来经商”者，“又多说官话”，特征明显属于湘商。又据民国旧志关于汉族姓氏来源记载小计：山东 2，广东 6，江西 3，湖南 7。<sup>②</sup>可以断定，当地商人以湘商为最多。

天峨。该县壮族人口占 57.5%。城圩商人“大部分从湖南迁来，小部分从四川迁居天峨”，也有一些宾阳人人抵营生。<sup>③</sup>

## 五 “无东不成市”的分布范围及梯度差异综观

以上，笔者如同铺地毯式地分别考察了广西几乎所有的市县。按 1996 年的广西区划，共有 88 个县市，7 个地级市，相合 88 县市。<sup>④</sup>除平果、合山、河池市金城江、大化、巴马由于历史资料的短缺而暂时阙如以外，笔者对其余 83 个县市都已设法进行了考察。考察表明：

第一，属“无东不成市”情形的县市多达 68 个，占所举证县市总数的 82%。也就是说，广西除了 15 个县市以外，其余 68 个县市城镇圩市都是由粤商构成主要商帮，并由他们创建和经营主要经济行业，缔造和编织城镇工商主要经济网络的。“无东不成市”格局在广西的全省分布并不是飞地式、跳跃式或者星点式的，而是自东而西、由南而北，逐程递进，逐县连绵，普遍满布的，它是结构同一、覆盖广西大部分面积的完整板块。此范围中，无任何一个县市能够出现“无东不成市”格局的例外。从广西地图上看，“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分布面就是一幅蔓延全区

① 民国 36 年《东兰县政纪要》人口分布。

② 民国 22 年《凤山县志》第二编，社会（铅印本）。

③ 同上。

④ 同上。

东西南北中、扩张动态十足的图形，这 68 个县市东起梧州，向西一直顶推至广西西极的西林、那坡，南启北海、钦州，向北一直顶推至广西北端的三江、龙胜。“无湘无赣不成市”格局在广西虽然也有 15 个县区，但整个被挤压到地域极有限的广西北缘地带，而且就连这一地带最重要的城市桂林市以及水运最便的柳江上游三江、龙胜诸县也已被“无东不成市”的区块嵌入，亦已处在一种不断被“无东不成市”格局挺进、切割、包抄，从而不断收缩的动态之中。

第二，“无东不成市”格局在广西，由东而西地呈三级梯度分布状态。广东较先进生产力推入广西在地段程序上的不同，决定着入桂粤商聚居规模、构成比重、伸展幅度、影响能量的参差不同。从广西地图看，这三级梯度带大致分高、中、低梯度，由东而西递减排布：东南组区→中腹组区→西南组区。这大致反映了粤商势力渗透广西的基本顺序和主要节律，每组区县市数都又大致等分，都是各有 22—23 个县市，这说明“无东不成市”格局在广西的梯度变化，在既定的历史与自然的条件下，也存在着具有某种函数意义的规则性。

“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分布广达广西 82% 的县市，这与序论所述粤商西江商路在广西总水系流域中所占 82% 比例，与第一章中所论粤商经营的进出口份额通常占广西该项总额 80% 以上的比例，应该说是不同角度、在函数意义上的正相吻合。它也以更加全面的地理视角，进一步印证了前章所论的近代广西行业主由粤商促成发育的基本观点。而“无东不成市”格局在广西的三级梯度差异，则铸造着对整个广西城镇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全局有着深刻影响的城镇经济网络结构发育的模子——即下节将讨论的广西城镇经济以“无市不趋东”为特征的等级分布体系。

## 第二节 “无东不成市”的梯度差异与广西城镇经济网络“无市不趋东”的等级分布体系

“无东不成市”既是广西城镇经济发育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现象，其梯度带的三级分差也必然对整个广西城镇经济等级布局结构产生深刻的、决定性的影响，它导致了广西城镇经济总网络等级分布这样一种奇特结构——“东端为中心，无市不趋东”，即广西城镇经济网络整个地对粤港客商家乡广东省和香港、澳门地区方向呈强烈的倾斜趋附，并以最邻近广东的广西东端城市梧州为整个城镇经济体系在广西范围内的总轴心。

### 一 “无东不成市”梯度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水平的“东高中中西低”布局

由于营造广西城镇经济的主要力量是东来的粤商人群，也由于经济地理学的距离递减规律规定了粤商在广西境内一般只能先东后西、东密西疏、东多西少地分布，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经济的总体格局只能是：最邻广东而地处两广出入口的东端城镇经济发育程度最高，规模最大，而由此往西，随地理距离的延长，城镇经济发育的程度和规模则会相应递减，延至西端区域，城镇经济发育的程度和规模只能处于最微弱的状态。在工业化未全面实现的历史条件下，近代中国城镇经济仍是以商业经济为主体的，商业发展规模可视为衡量当时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参数。以下，我们通过 1934 年 6 月广西在“无东不成市”板块范围内各县商业店统计及其在当时广西主要的 78 县份商业经济总量统计中的份额<sup>①</sup>，来揭示“无

<sup>①</sup> 民国 24 年《广西年鉴》第二回，广西统计局编印，第 473—474 页。

东不成市”三级梯度与近代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程度三级等差的关系。

表 3-1 1934 年 6 月桂东区、桂东南区各县商业各项数据表

无东不成市类别	分区	县市别		商店户数 (家)	资本总额 (元)	每户平均资本 (元)	位次 (以资本总额确定)
		今县市	民国县份 (空白处即与今同名县)				
第一梯度带 (未括当时不属于广西的桂南沿海五县市) 城镇群	桂东区	梧州	苍梧	2294	2634940	1148.62	1
		苍梧					
		怀集		417	231236	554.52	5
		(今属广东)					
		藤县	藤县	428	90584	211.64	9
		岑溪		327	78070	238.75	10
		蒙山		184	60630	329.51	12
		贺州市八步区	贺县	265	238349	899.43	4
			信都	157	38800	247.13	17
		钟山		137	45356	331.07	15
	昭平		81	41570	513.21	16	
	富川		222	46855	211.06	14	
	桂东南区	平南		612	245270	400.77	3
		桂平		726	214085	294.88	6
		贵港市(城区)	贵县	963	432284	448.89	2
		玉林市玉州区	玉林	476	174572	366.75	7
		容县		369	113940	308.78	8
		北流		510	64160	125.80	11
陆川			324	37723	116.43	18	
博白			153	59200	386.93	13	
合计	18 个县市	18 县	8645	4847624	560.74		



表 3-2 1934 年 6 月桂中、桂北、桂东北南区、桂南

内陆区各县商业各项数据表

无东不 成市 类 别	分 区	县 市 别		商店户数 (家)	资本总额 (元)	每户平 均资本 (元)	位次 (以资本总 额确定)
		今县市	民国县份 (空白即与 今同名县)				
第 二 梯 度 带 城 镇	桂 南 内 陆 区	南宁	邕宁	1572	841116	535.06	1
		邕宁					
		武鸣		94	9040	96.17	20
		横县		494	135071	273.42	4
			永淳	351	95900	273.21	6
		宾阳		105	31350	298.57	13
	桂 中 区	柳州		467	253460	542.74	3
		武宣		138	20485	148.44	16
		鹿寨	雒容	171	51380	300.47	9
			中渡	131	13220	100.92	17
			榴江	52	9335	179.52	19
		柳城		276	26445	95.82	14
		来宾	迁江	104	23700	227.88	15
	桂 东 北 南 半 区	桂林		1157	425013	367.34	2
		平乐		240	128925	537.19	5
		荔浦		115	68830	598.52	8
		阳朔		245	43750	178.57	11
		恭城		274	39437	143.93	12
		永福		66	8410	127.42	23
		百寿		83	9970	120.12	18
	桂 北 区	罗城		120	8548	71.23	22
		融安	融县	209	82374	394.13	7
		融水					
		三江		337	49617	147.23	10
		龙胜		37	8560	231.35	21
	合计	21 县市	23 县	6838	2383936	348.63	

表 3-3 1934 年 6 月桂西南区、桂西区各县商业各项数据表

无东不成市类别	分区	县市别		商店户数 (家)	资本总额 (元)	每户 平均资本 (元)	位次 (以资本总额确定)	
		今县市	民国县份 (空白处即与 今同名县)					
第三梯度带城镇	桂西南区	扶绥	扶南	39	3770	96.66	26	
		崇左市江州区	崇善	196	24160	123.27	6	
			左县	48	6300	131.25	16	
			龙州	178	89450	502.53	2	
		宁明	上金	45	10200	226.67	15	
			明江	19	4200	221.05	23	
			宁明	37	6104	164.97	18	
		凭祥	思乐	75	14410	192.13	12	
			大新		125	17370	138.96	10
				万承	16	1250	78.13	28
				养利	32	5740	179.38	19
			天等	雷平	47	6210	132.13	17
				镇结	25	2330	93.20	27
		靖西		50	14930	298.60	11	
			龙茗	23	4050	176.09	24	
	那坡		7	1400	200.00	28		
	德保		44	5500	125.00	20		
	上思		70	10630	151.86	14		
	桂西区	上林			35	4840	138.29	21
		马山	隆山	44	4520	102.73	22	
			那马	197	18900	95.94	9	
			隆安	185	56900	307.57	3	
		都安	156	19500	125.00	8		
		平果	果德	33	3900	118.18	25	
			田阳	135	42250	312.96	4	
		田东	奉议	76	11360	149.47	13	
恩阳			59	20890	354.07	7		
恩隆			164	28230	172.13	5		
百色			139	155380	1117.84	1		
合计	19 县	29 县	2299	574674	249.97			

根据 1935 年《广西年鉴》第二回的数据，1934 年 6 月，广西主要 78 县（未包括解放后从广东归划给广西的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南部沿海市县以及广西地处偏僻、商店稀少、缺乏明确

记载的少部分县份)，注册商店总数和资本总额分别是 18916 家和 8075868 元。以该组数值为百分数，对各组区反映商业发育程度的数值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无东不成市”格局的一、二、三梯度差，直接衍生为广西大部分城镇经济发育的高、中、低三级梯度差。

属于“无东不成市”最高梯度带的桂东、桂东南城镇群，是广西范围内经济发育水平最高的城镇群组。由于这一区域广西主位商帮粤商聚居最众，所营造行店最多，所集聚资本最密集、数额最大，城镇商业店数、资本总额等各项指标在广西无不最高。参与统计的 18 个县市商店数为 8654 家，占 78 县商店总数的 46%；资本额 4847624 元，约占 78 县总资本额的占 60%。该组区中，又以地处两广总出入口、粤商聚居规模为最的梧州市为城镇经济发育最高梯度带之巅峰：商店数多达 2294 家，拥有资本额 2634940 元，分别占该组区县市该两项总数的 26% 和 54%，在该区乃至整个广西城镇经济的等级规模体系中，具有极高的首位度。

属于“无东不成市”第二梯度带的桂中、桂北、桂南内陆、桂东北南区域镇群，构成了广西范围内经济发育水平中等的城镇群组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区域，由于广西主位商帮粤商聚居规模递减，所营造的行店相对减少，投资金额缩小，因此，参与统计的 22 个县市城镇的商店数、资本额等各项指标相应降滑：商店数为 6836 家，较前组减少了 1807 家，在 78 县所占比例降为 36%；商业资本 2383936 元，较前组减少了 2263288 元，在 78 县总资本数中所占比例降至 30%。该组区中，南宁、桂林先后曾立为省城，南宁为该梯度带中粤商聚居最众因而城镇经济发育最高的城市，桂林则为粤湘赣诸省商帮在广西交会聚居规模最大之所而成为第二大城市，人口规模也时常与梧州不相上下，甚至超出。然而，该组城市经济发育水平却远不可望梧州之项背：

南宁市商店 1572 家，桂林市 1157 家，分别比梧州少 72 家和 137 家；资本额分别仅为梧州的 32% 和 16%。总之，该组整个城镇群经济发育水平较之前组都降落了一个梯度。

属于“无东不成市”第三梯度地带的桂西、桂西南区城镇群，是广西范围内经济发育水平最低的城镇群组。由于广西主位商帮粤商在这一区域聚居规模最小，流多驻少，所营造行店相对最稀，所投放的资本数额也最小，因此，城镇的商店数、资本额等各项指标在广西均处于最低。参与统计的 19 个县市商店数 2299 家，资本额 574674 元，这不但不能与第一梯度地带城镇相比，也不能与第二梯度地带城镇相比：商店数仅为邻梯度区的 34%，和 78 县的 12% 资本额仅为邻近梯度区的 24% 和 78 县的 7%。本区中因粤商聚居相对最众而规模最大的百色市，固定商店数 139 家，资本额为 155380 元，分别仅为南宁市的 11% 和 19%。由此可知此区域的城镇经济发育处于更低的水平上。

从其他一些单项也可看出上述趋势，如 1933 年广西城镇行业种类也由东而西不断递减，梧州为 56 行，至南宁减为 51 行，至百色减为 32 行<sup>①</sup>；店号个体资本规模、经营规模也同此理。据表 3-1、表 3-2、表 3-3 所列，东中西三组区城镇每家商店平均资本额由东而西呈不断递减趋势：560.74 元→348.63 元→249.97 元。

三组相较，即形成了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经济发育“东高中中西低”的等级组合布局。

## 二 “东高中中西低”布局与广西城镇经济网络“无市不趋东”等级分布体系

城镇经济发育的“东高中中西低”布局，意味着广西城镇经济动态能量的东强西弱。很显然，商人众、行店多、资金巨、

<sup>①</sup> 民国 24 年《广西年鉴》第二回，商业篇。

行业健全的城镇，总是居于支配中心和辐射轴心的地位，具有强大的经济组织能量；反之，商人少、行店稀、资本额小、行业残缺的城镇，则总是居于下级城市地位，接受上级城市的辐射、吸附与支配。这就导致了广西城镇经济网络的等级分布体系总体上的“无市不趋东”特征。无论是处于何方位，无论局部发生何种变形，城镇在经济运作上都对粤商家乡粤港方向呈强烈的倾斜趋附，都以相对东段中心城市为上一级轴心，层层东趋，始终如一地保持着明显的广东、香港市场指向，如同一枚永不改向的指东针。其具体表征如下：

第一，广西城镇经济总网络始终以东端城市梧州为总轴心或最高一级中心。20世纪30年代，吴半农、千家驹等先生即把梧州之于广西，喻之为上海之于中国。<sup>①</sup>梧州虽然地处广西东极，从经济地理学中地论（认为市场中心最佳点应在圆心）观点看，作为整个城镇体系总中心位置，并不适中，但是，以当时主要依靠水运的历史条件以及粤商因素为主所酿导出的区域经济格局的规定之下，广西城镇经济网络总中心择址梧州，却又是最现实、最有利的。当时，惟有梧州拥有最雄厚的资金实力、商人力量以及最完善的行业组织，以一埠之地，启动乃至控驭整个广西城镇经济体系的全局运作。以作为口岸城市对广西全省的进出口贸易的组织为例，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907—1908），两年合计，广西出口贸易总货值为8802326银两，广西人口贸易总货值为16763862银两。而该两年，梧州出口货值为6711196银两，占广西出口总货值的76%；入口货值为13595611银两，占广西人口总货值的81%。<sup>②</sup>可见，广西进出口贸易绝大部分由梧州埠组织完成。

<sup>①</sup> 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

<sup>②</sup> 《广西官报》宣统二年第六十八期。

第二，由于广西特有的城镇经济“东高中中西低”分布律的作用，其二级分中心城市在理论上本属于一级城市可能发生带的广西中腹地形成，它们是南宁、柳州、桂林。凭借在广西内地相对适中的位置，南宁和桂林都先后为省城，在行政上是梧州的上级城市；柳州作为广西的中点（接近于圆心点）城市，在1938年湘桂铁路、黔桂川黔铁路通车以后工商经济发展也颇有直追梧州之势（解放后完成了这一过程，发展成为广西最大的工业中心和经济城市）。但是，当时既定的经济发育较低的梯度位置，规定了这三者只能主要扮演东向服从总中心城市梧州的二级分中心城市的角色；只能是地方性城市，而不可能成为全省性经济的总中心城市。

南宁，虽然“外控交趾，内接滇黔，近通廉钦”，但其当时，根本优势还在于它可以经梧州“以达于（广）东省”<sup>①</sup>。作为广西当时第二大城市，人口六七万，超过梧州的六万人，但是，其辐射范围除郊县以外，只有西向的左、右江地区，其他方向几无。南下钦廉北海，北上柳州、桂林的商路十分稀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北上桂林的土特产纵向商路，迟至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才由赣商王春晖等人联营开拓。<sup>②</sup>向东则不可与梧州强大的市场引力相竞争<sup>③</sup>，即使距离不远的上林、宾阳、横县等，都未能够拉入自身的辐射范围，如宾阳、黎塘的花生油经江口、贵县集于梧州，运销广东的鹤山、广州，而不走南宁—北海路<sup>④</sup>，对桂南如此，对桂东南更无法染指。即使对本身拥有的桂西辐射区的控驭，也不过是梧州凭借南宁本埠为中转，向桂西区

① 宣统元年《南宁府志》原序。

② 李启祥、谭津：《王春晖发家史》，《南宁文史资料》第12辑。

③ 参阅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④ 饶任坤、陈仁华等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42页。

的延伸。直至民国三十八年，南宁汇总桂西输送的土产以及本身的需求和向西部分销的大量棉纱、布疋、燃料、洋杂等，百分之九十五都要经梧州出入。<sup>①</sup> 作为低一级城市中心，南宁的经济功能当然远逊于梧州。据宣统二年（1910）《广西官报》第68期公布的数字，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间（1907—1908），南宁也是参与广西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关市之一。但是，该两年南宁出口货值为2044344银两，入口货值为2900044银两，分别仅为广西该两项总值的23%和17%。

在桂林，1933年时人口为67301人，比梧州61295的人口还略多。<sup>②</sup>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它附从梧州的下级城市的地位。民国21年10月广西省政府调查的《各县物品运输情况》表明：桂林是桂东北北半区各县区物产的最大集散地，而在桂林汇集的白米、桐油、牛皮等所有货物均运销梧州。桂林的辐射范围也远不是方圆的，它也没有自身东南方向的辐射范围区，其东南方向即使近如阳朔、恭城、平乐等也均为梧州所直接控驭，该诸县区物产都是直下梧州，很少上桂林；像平乐那样较桂林经济规模小得多的城镇，倒是经常可凭借邻近梧州的位势，对桂林起着传导梧州市场指令的作用。<sup>③</sup>

柳州，拥有桂西北、桂北柳江水系地区的广阔腹地，是西控该域城镇群的最大城市中心，20世纪30年代人口在三至四万之间。<sup>④</sup> 各种资料表明，柳江上游诸十数县出产均汇柳州，到柳州之后，除少部分北入湘桂走廊商路出北向各省以外，大部分均直销梧州。<sup>⑤</sup> 由于梧州作为广西城市总中心的强劲市场张力挤压的

---

① 民国38年10月9日《中央日报》（南宁）第3版。

② 民国24年《广西年鉴》第二回。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结果，柳州在南向、东向、东南向近邻县区也无自身辐射范围，如南向的来宾“其贸易往来多在浔梧间，大湟江口（桂平市的江口镇——笔者注）为其中枢……县虽柳郡属邑，而商业关系轻桂林省垣（自然包括柳州——笔者注）”，与新省府南宁“商业更无关系”，以致入市场“称物之秤”，全用江口的下江称，而桂林称、柳州称、南宁称在“县境无用之”<sup>①</sup>。又如据民国24年《广西年鉴》第二回“各县货流走向表”的数据，东向的鹿寨，虽与柳州紧邻，但所产出货糖油米之属，却很少进入柳州，大部分都是直销梧州并转销广东省。

综上，广西三座二级中心城市，始终以梧州为轴心，其动态趋势都具有“承东启西，西控东趋”的特征。

第三，同理，“东高中中西低”的广西城镇经济发育总分布律，还规定了桂西地区所形成的中心城市只能是广西城镇的第三级分中心城市，它们是百色、龙州、宜州三市。

百色。1934年，该市拥有商业资本156380元，人口约1.7万，是桂西最大埠市。它的直接辐射范围也主要在自身西北方向深山区：一脉“上溯西林之驮娘江”<sup>②</sup>，进而入滇东、黔南；一脉溯澄碧河上凌云<sup>③</sup>、乐业，进入黔南。但是，它所邻连，并且具有右江航道优势条件的东向县区，则为作为广西二级分中心城市南宁的直接辐射和吸附范围，如田东平马“沿江而下可达南宁”<sup>④</sup>，货物进出均直赖南宁，而非百色。百色本身所集散的货物，进口以南宁为主要货源地，由南宁向百色提供“类皆来自东粤”的“百货”<sup>⑤</sup>；出口主要以南宁为运销地，货物“源出云

---

① 民国26年《来宾县志》上篇，县之食货一。

② 光绪八年《百色厅志》卷3，舆地水利。

③ 同上。

④ 民国23年《思隆县志》交通。

⑤ 光绪八年《百色厅志》卷2，舆地物产。



南土富州，下达南宁，汇于郁水”<sup>①</sup>。可见，桂西重埠百色，作为第三级城市，以南宁为轴心的“西控东趋”情形，也类同南宁之于梧州。

龙州。龙州历为桂西南边关重镇，清代嘉庆年间即有“商贾辐辏，实居边土州县之首”地位。<sup>②</sup> 1899年又开辟为广西四个通商口岸之一，与当时已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常有小额进出口贸易，1933年城市人口13155人。<sup>③</sup> 然而，龙州毕竟地处城镇经济低发育带，表3-3所列商店户数、资本额甚至不如百色。因此，该处地只能形成第三级城市中心。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907—1908）两年，该埠所组织的进出口货值分别为268207和46786银两，分别仅占该两年广西进出口货值的2%和1%。<sup>④</sup> 可见其经济组织功能远不可望南宁之项背。从货流情形考究，龙州直接辐射区主要在其北向、西北向右江以南的靖西、大新等数县，该诸县货物均多运销龙州。<sup>⑤</sup> 虽然龙州关可对当时法国殖民地越南直接进行进出口贸易，龙州在自身东部区也有一些辐射影响，如宁明、崇左不少货物趋往龙州出口，但总体上看，大部分东部区分别仍属于南宁和北海的直接辐射和吸附的范围，如崇左县的黄糖、蛤蚧等十数种货品仍是主要走往南宁，其次才走龙州<sup>⑥</sup>；宁明、上思、防城则主要属于北海的辐射范围<sup>⑦</sup>，货物主要走由北海出口。而龙州本身所集汇的各县货品的销出，以及外国工业品、百货的进口也仍主要分别

① 光绪八年《百色厅志》卷3，舆地水利。

② 嘉庆八年《龙州纪略》，开语。

③ 民国24年《广西年鉴》第二回。

④ 宣统二年《广西官报》第六十八期。

⑤ 民国24年《广西年鉴》第一回，614页。

⑥ 同上。

⑦ 广西通志馆编：《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26页。

以南宁和北海<sup>①</sup>为轴心。所以，龙州作为广西三级中心城市之一，也具有“西控东趋”的特征，并同时以南宁、北海为自身趋附的上级中心城市。

宜州市。1934年该市商户345家，拥有资本129540元<sup>②</sup>，人口有10167人<sup>③</sup>，为当时桂西北区最大城市。虽然该市已不属“无东不成市”地带，但是，覆盖广西大部的“无东不成市”格局梯度分异所造成的城镇经济发育“东高西低”分布律，同样也规定了该处分中心城市的形成只能是第三级的，而且渗入该区的优势商帮湘赣商帮如同前文所论，是较粤商低一序位的商帮，该处城市级别更不会因此而超出这一等级水平。虽然如此，它也同样会以东部上级城市为轴心，主要以自身西部地带为辐射范围，呈现“西控东趋”的运作态势。晚清民国时期，宜州就是以粤商聚居较多并主执经济要津的东向的二级中心城市柳州为依托轴心，以自身西向的河池、罗城等县为主要辐射范围的。

综上，广西三座三级中心城市，都始终分别以相对东段的上级中心城市南宁、北海、柳州为轴心，其动态趋势也都具有“承东启西，西控东趋”的特征。

第四，“东高中西低”的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总分布律，还规定了发展相对独立、径直出海的南部沿海所形成的口岸城市北海，在晚清民国时期只能居于广西城镇系统中介于梧州与南宁之间的等次，可称之为准一级城市，或准总中心城市。南部沿海区也属于“无东不成市”高梯度地带，与此相应，该区也属于城镇经济的高发育区。该区又是广西1876年就已开埠的口岸地区，具有背靠大西南、面对东南亚、径直出海的优越区位，该

---

① 广西通志馆编：《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6页。

② 民国24年《广西年鉴》第二回。

③ 同上。

区所形成的中心城市北海，当然较之城镇经济中度发育带形成的中心城市南宁，有较高的等级位次。然而，该区在广西城镇经济高发育带中，与梧州相比，毕竟位居城镇经济发育相对递减的西段，环雷州半岛的曲线海路实际上还大为强化了这一西段位势，使北海与粤港联系更不如梧州。加之南部沿海径直出海的河流仅有流量、流域十分有限的南流江、廉江、湖海运河和钦江，其他出海孔道均赖陆路，在当时没有铁路运输、汽车公路运输又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北海的辐射范围主要限于南部沿海、西南沿边诸县和玉林以下桂东南个别县份。虽然滇黔川以及广西百色、南宁、玉林、北流<sup>①</sup>、武宣<sup>②</sup>常有货物从北海出口，但是，在晚清至民国的大部分时间内，上述广阔地带的货物进出仍以梧州总控驭的，以汽电、轮船运输为主要方式的西江孔道为主要商路，如时人回忆玉林“走北海，也是一条商路，……此路交通不及玉林至梧州一路方便”<sup>③</sup>，情形往往如此：一旦由于战争等因素造成“西江梗塞”，北海商务则“大为兴旺”；而一旦西江恢复畅通，北海商务即形衰落。<sup>④</sup> 常态之下，北海辐射范围是远不足与梧州相竞争的。这些因素都规定了北海尽管在近代以来有突出的崛起之势，并酝酿着广西城镇经济布局发展的崭新方向，但却始终无法逾越梧州总中心城市的位次，从而取代梧州成为广西城镇总网络的轴心，而只能居于梧州与南宁之间，成为广西第二大城市和准一级、准总中心城市。据《东方杂志》第九卷第六号《内外时报》公布的数字：清代宣统三年（1911）广西海关收入关平银，梧州为 115392783 两，北海为 21654134 两，南宁为

① 光绪八年《北海杂录》商务。

② 民国 23 年《武宣县志》第四十七章，畜牧。

③ 饶任坤、陈仁华：《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1 页。

④ 光绪八年《北海杂录》商务。

21326171 两，民国元年梧州为 140768489 两，北海为 27433729 两，南宁为 25054258 两。<sup>①</sup> 这样，在该两年广西海关总收入 351620564 两（关平银）中，梧州占有 73% 份额，高居首位；北海占有 14% 份额，位居第二；南宁占有 13%，与北海相差不多，但位居第三。北海口岸径直独立出海，无须似南宁、柳州、桂林等广西大多数城市那样，直接或最终以梧州为总轴心城市，并在经济网络运作上环绕作功，呈现强烈的倾斜趋附，但是，从更大的范围看，北海城市运作也是“承东启西，西控东趋”的。前章已举，1879—1937 年，以北海港为中转站终点站的定期不定期轮运航线 8 条，全部启程或中经香港、广州，其中 6 条航线启程于粤港。<sup>②</sup> 这说明北海的市场指向也以东向为主，只是它不是梧州而是梧州也最终趋附的粤港地区的城市总中心——双元中心城市——广州和香港。

综本节分析，广西全域性“无东不成市”梯度分异，导致了广西城镇经济网络“无市不趋东”等级分布体系的形成；它由东南组区高度发育带、中腹组区中度发育带、西部组区低度发育带三大组城镇群，构成了其群组分等体系；在此基础上，由东端一个一级城市中心，中腹部三个二级城市中心，西部三个三级城市中心以及南部沿海一个准一级城市中心构成其三级城市中心体系。而三级城市中心体系构成以后，又统驭广西全体城镇进行“承东启西，西控东趋”为特征的经济运作——推动各组城镇群市场流层层西控，又吸附各组城镇群市场程程东归。最终，无论是汇于梧州还是集于北海，都归宗东趋，直趋粤商人桂商路起点城市，即位于珠三角核心地带的粤港地区城镇体系的呈双元结构的总中心城市——广州与香港，通过纳入粤港城镇体系，实现与国际市场的大对接。

① 《东方杂志》第九卷第六号，《内外时报》，第 31—32 页。

② 陈锦光：《北海交通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9 页。

经济地理学关于区域城镇职能、规模及其分布体系的理论，最著名的是德国地理学家 W. 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学说，按该学说的理论，城镇等级分布体系基本模式是以一级城市为圆心的正六边形市场区的重叠关系，即一级城市在圆心，二级城市为圆心相同的正六边形角点，三级城市为圆心相同，但棱角匀称交错的外层正六边形角点。<sup>①</sup> 该模式中五等级城市动态当是以中心为轴心，呈“无市不趋中”的模式，由于它揭示了城镇大小分布体系的一般规律得到了国际地理学界的普遍接受，并誉为“克里斯塔勒模型”<sup>②</sup>。但很显然，广西城镇经济的等级分布体系相对于这一模式而言，已产生严重变形：外观上呈朝东向飞行中的彗尾状，一等城市不在中心地（圆心），而在东端地；二、三级城市不是等距而交错地环绕一级城市，而是依次间隔、纵排式向东追随一级城市。如下两图比较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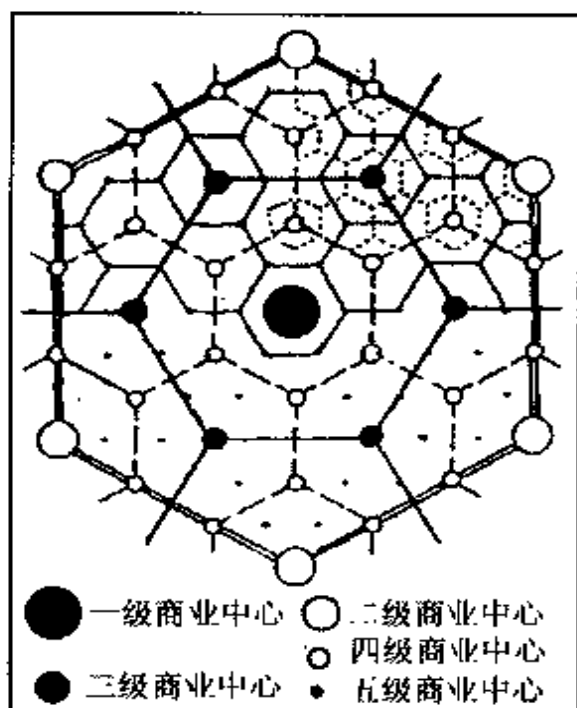


图 3-1 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系统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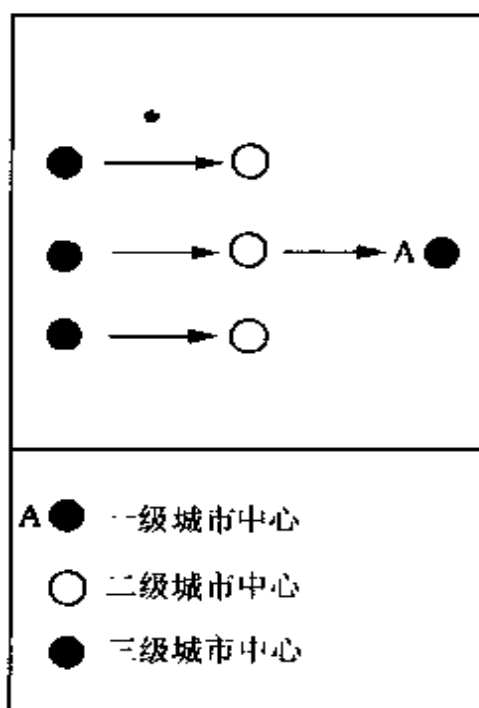


图 3-2 近代广西城镇经济网络三级分布体系“彗尾状”模式

① 参阅曹迁藩等《经济地理学原理》，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 同上。

比较表明，近代广西城镇的等级分布体系的结构确实十分特殊。追溯广西城镇等级分布体系源头，在明清以前，从秦汉至宋元，广西城镇分布体系以桂林为总中心，以“北高南低”为特征，它虽然不完全吻合却也相对接近克氏的模式，毕竟桂林仍处中腹区北缘段。<sup>①</sup>从明清到民国，广西城镇等级分布体系确实经历了一个总中心从中腹地桂林，东移东端城市梧州，从相对接近克里斯塔勒模式向不断对克里斯塔勒模式背离、悖异的过程，这种以东向奔突为突出特征的模式变异，说明了粤商人桂并作为主位商帮将广西城镇向家乡粤港方向拉动能量的巨大；说明了粤商人桂将自古恒有的天然河流西江水系和南部沿海岸线营造成为商业通途，焕发出沉睡千古的巨大经济价值所产生的能量之巨大；说明了商品经济辐射、市场经济引力和开放发展的趋势对整个社会经济改造能量之巨大。

### 第三节 城镇经济的等级分布体系的 “无市不趋东”特征对广西 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影响

经济地理学指出，城市是区域的核心。作为一定规模的非农业人口的聚集空间，城市与圩镇，无论其规模的大小，它作为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中心，总是在区域经济社会中起主导作用，尤其是，它作为经济中心，它是工业商品生产基地、商贸流通枢纽、最集中的消费地、信息传播摇篮和金融、科学、文化教育中心之所在，在区域经济中起着组织和管理经济、增长经济的核心作用。<sup>②</sup>既然发

---

① 参见拙作《唐代广西的市场网络雏形初探》，《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② 汪宇明：《合理布局与持续发展》，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挥上述作用的近代广西城镇等级分布体系以粤商铸造的“无市不趋东”为基本特征，那么，这一特征必然对整个广西社会经济生活格局发生重要影响，并深刻地打下自身的烙印。比较显著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价格操纵和市场传动机制：以东向城镇为轴心

商品价格的升降是市场传动的杠杆，以“无市不趋东”为网络布局等级分布特征的广西城镇经济，这种杠动市场全局的商品价格的操纵轴心，始终在东向的上级城市，或者相对东段的、由上级城市直接支配区的重埠。

下级城市中心与一级城市梧州之间。

在柳州，食米大部分运销梧州，所以，民国时代“梧州米价的涨落和本市米价有很大关系”，商人惟梧州米价马首是瞻，“一旦梧米报涨，即在本市大量收购食米运输出口”，以致常使柳州米价发生剧烈波动。<sup>①</sup>

在平乐，“商场的行情，多以梧州为依归，在两三小时之内，港澳的市情也知道了，物价骤变时市场上的抢购之风，满街都是”<sup>②</sup>。

在南宁，20世纪40年代白银买卖直接受梧州银价支配。1946年11月时，一旦“白银梧州报淡，本市亦无甚买卖”<sup>③</sup>。南宁的米价起跌，全以梧州谷米行市为归依。据民国35年4月22日第四版《南宁商报》报道，1946年4月14日至20日，南宁米价起落无常，翻天覆地，均为梧州米价一统操纵，情形颇为典型：“在星期日星期一（1946年4月14—15日——笔者注）这

① 柳州市人民政府：《调查研究》第二期（工商调查专辑），1950年7月。

② 何锦钧：《解放前的平乐商业》，《平乐方志通讯》1984年第4期。

③ 《南宁商报》民国31年11月12日。

两天里，谷米市谷呈上涨风之遗威，继续不断上扬，至街细米竟突破了二万六千五百元（每担价——笔者注，其余同），红粟米也达到一万七千六百元，而开创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一夜之间，每担米价上涨二三元之巨，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到了梧州米价涨风的影响，同时有一批客商大量收购集米粮，致使米价急速上涨”。但是，当梧州米价涨风一过，客商购米收缩，原先涨价所引来的大量邕米滞销，便又紧接着导致南宁米价惨跌，“星期二，各米市价已呈颓势……迨至星期三，市价涨落之势已成”，“谷米之惨跌情形，诚如黄河决堤，一泻千里”，“粟米竟由一万七千元跌至一万二千五百元，街细米则降至二万二千一百元”。

相对东向的广西二级城市与相对西段的各下级城镇之间，以及等级更低的城镇之间、城乡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上述以商品价格为杠杆的市场传动关系。对于西向的下级城镇而言，它们总是处于价格操纵和利益优先的轴心主导地位。我们可以从民国时期正常年景之下，相对西北段贝江产区融水镇与相对东南方向的上级城市柳州市杉木的买卖价和利润值的比较中，看出这种关系。<sup>①</sup>（参见表3-4）

表3-4

杉木规格	产地成本 (贝江售价+砍运费)	融水镇售价 (每根)	利润值	柳州市售价 (每根)	利润值
正木	3角4分4	1元2角	7角8分6	2元	7角7分
平排	7角9分2	2元	1元2角9分	4元	1元9角2分
半苑	1元7角3分2	4元	2元7角6分	10元	5元5角
红皮	2元9角3分7	8元	5元5角5分	30元	21元5角
四种产品 诸项平均值	1元4角5分	3元8角	2元6角	11元5角	7元4角

在地域上，产地（贝江）的相对东段上级城市是融水镇，

<sup>①</sup> 《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融水镇的相对东段上级城市是柳州市。三地杉木卖价变异趋势是：越是相对西段的低级城镇，可控驭的价格区间和利润值区间越小；越是东段的上级城镇，可控驭的价格区间和利润值区间越大。也即是说，围绕着各自的赢利目标，越往东段上级城市，决定价格的主动权越大；越往西段下级城镇，决定价格的主动权越小。其现实结局也是，同样经营数量相同的一项产品，相对东段的上级城市可凭借必经集散地和市场传导领先的区位优势，获得较相对西段的下级城镇大数倍的利润。如表3-4中所举，四种规格杉木每根平均利润值，柳州为融水镇的2.85倍；而相对西段的城镇、乡村只能在东段城镇高额利润值区间的挤压规定下，在很有限的数值区间中，考虑自身的赢利。

## 二 货币流通：粤币主位

“无市不趋东”的城镇经济等级分布体系，还规定了由梧州、北海统摄的广西大部分地区，以粤商家乡广东省的主位货币为自身货币流通中的主要货币。

梧州是广西城镇经济网络总中心，但是它也像它所统驭的其他广西城镇一样，并无自身东部支配区，它本身也受着“无市不趋东”规律的制约，向着粤商的来向即自身的东段城镇——粤港域内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尤其是广州、香港继续趋附。后文还将论及，梧州在整个珠江水系，不过是广州、香港巨埠向西分发的一个下级中心城市，或者分中心城市。在梧州，垄断着城镇经济并进而对广西城镇经济具有操纵能量的粤商，是只认用家乡广东的货币——东毫的。据记载，晚清民国时期，梧州粤商与家乡商人以及港穗客商之间的贸易、资金互拨，都只用东毫，而不用西毫（广西毫——笔者注）。<sup>①</sup> 港粤市场规范之下，东毫在梧州

<sup>①</sup> 《梧州银元话旧》，《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实为本位主币。此情之下，货物进出、资金过往均仰赖于梧州，而实际上大部分也由粤商执掌着经济牛耳的广西各城镇圩市，自然以梧州为标范，以东毫为主币。如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即使处于广西城镇经济网络末梢地带的桂西的城镇，如宜山、南丹、凤山、西林等最偏僻的山乡，都“只用东毫，不用西毫”<sup>①</sup>。

东西毫间的主位之争，曾为广西金融史上一大悬案。清季，币制改革，废两（银两）改元（银元），广东造币厂（设在广州）于光绪十六（1890）年 4 月开工投产，大量铸造以二角银毫为本位的小洋。直至 1917 年底，计连续开工 28 年之久，铸双毫即二角银毫 938989440 枚，合银元 187797888.00 元<sup>②</sup>，俗称东毫。广东厂所铸双毫本位币与各省铸币厂所铸的主要货币 1 元本位币即大洋大不相同。银毫本来是银元的辅助货币，但其含银量不足值而掺杂次质金属材料，值低于面额而又增加硬度，便于小额交易，铸小洋既有利可图，又可增强使用价值，所以广东厂乐于以铸造币值 2 角的银毫为主。<sup>③</sup> 随粤商人桂成为广西主位商帮，并营造了广西城镇“无市不趋东”的体系，东毫源源涌入广西，在各交易市场，也自然形成本位货币的地位。广西在清季尚无铸币厂，直至 1919 年，旧桂系军阀当局欲图铸币取利，成立了广西铸币厂，按广东流行的 2 角银毫单位，也铸面额 2 角的银毫，俗称“西毫”，是为西毫之始。其后，新桂系广西政府又在梧州、桂平、南宁不断铸造 2 角西毫，又称双毫，并通过官方训令宣布西毫（又称嘉禾毫）的省内本位地位，采取劝导乃至若干行政强制手段，减阻东毫流入，巩固西毫的币值<sup>④</sup>，颇有以西毫夺回东毫所占据的主币地位之势。然而，“无市不趋东”的

① 郑家度：《广西金融史稿》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31 页。

② 同上书，第 159 页。

③ 同上书，第 239 页。

④ 同上书，第 241 页。

客观规律，不是人为可以随意逆转的，广州作为梧州及整个广西城镇经济体系在国内的终极中心城市，它规定着东毫较之西毫有两大不可比拟的优势：其一，依靠广东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技术设备，根据广东发达地区市场经济需求而制造的东毫，成色远较西毫为好；其二，市场信度高，得到广东商民和入桂粤商广泛认可，畅通于广东而无可阻，具有西毫所无的流通使用价值和清偿债务的能力，而这对于对粤省贸易处于入超地位、“每年汇粤之款较由粤汇人之款为多”的广西省<sup>①</sup>尤其重要。此情之下，“惟东毫可通行于广西，而西毫不能通行于广东”<sup>②</sup>的局面，坚若磐石，难以动摇，西毫主币地位始终不成。最后，新桂系广西政府终于认识此点，同时为避免西、东毫汇兑之间的汇水损失，于1929年决定回收发行一时的广西造币，全部熔解折算，改铸东毫。两广货币遂以这种方式实现了统一。<sup>③</sup>东毫在桂的本位货币地位不但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完全确立。可以说，东毫最终取代西毫，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两广地区不依人的意志所转移的、以“无市不趋东”为特征的客观的市场机制运作和取舍的结果。

### 三 区域经济发展：东南部率先

城镇经济对所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市场组织功能。以“无市不趋东”为特征的广西城镇经济网络所组织起来的广西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呈现出东部、东南部率先的基本节律。

首先，由东部、东南部最密集的城镇巨埠和最大的城市中心所组合起来的最为强大的市场组织，促使东南部农村的经济发展居于全广西最为领先的水平。据统计，民国23年，

---

① 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第174页。

② 同上。

③ 郑家度：《广西金融史稿》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广西有年产过百万斤稻谷的产稻大县共 22 个，其中有 17 个“百万”县位于柳州、南宁以东的桂东半区，占 80.9%，而尤以今属梧州玉林市的桂东南、桂南东缘为多，桂东南、桂南东缘 15 县〔苍梧、藤县、平南、桂平、岑溪、容县、北流、陆川、博白、玉林、兴业、贵港（县）、宾阳、横县、永淳〕即占 62%。当年广西 107 个县（当时划分）稻总产量 61501325 担，而仅占总县数 14% 的 5 县，稻产量为 2393350 担，为全广西稻谷产量的 39%，桂东南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广西粮仓”<sup>①</sup>。主要农村副业的饲养业也呈现出同样的情形：也是以上 15 县，共有牛 836900 头，占全省 107 县总牛头数 2302180 的 36.4%；猪，15 县共有 949384 只，占全广西数的 30.6%；鸡，8965980 只，占广西总数的 47.8%，近达一半；鸭，2124720 只，占全广西 7514500 只的 28.3%；鹅，111296 只，占广西总数 163240 只的 68.2%，近达 70%。<sup>②</sup>农村手工业也是如此，如前文论及的桂东南的玉林纺织手工业是广西最重要的手工业中心之一，此不烦叙。

其次，“无市不趋东”的城镇经济等级分布体系，还使桂东、桂东南地区城镇、乡村具有最好的市场组织基础、设施条件以及人文环境，这也决定了当时当局举办的公营现代化事业率先并比较集中地在桂东区发展。梧州既是广西城镇经济体系的总中心，也就拥有当时广西境内官营现代化投资的最佳环境——商帮雄厚，客户众多，信息灵通，机器设备、工料来源丰富，交通发达便捷，最靠近港粤市场，产品销出便捷等等，实乃当时广西所仅有。由于近代以来梧州素有“广西的上海”声名<sup>③</sup>，这对于晚

<sup>①</sup> 广西统计局编：《晚清和民国时期广西统计史料摘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44—351 页。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印行，第 224 页。

清民国时期资金有限而又欲图举办各种现代化事业的广西历届地方当局而言，当然是首选之区。所以，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公营（或称之为国营）的较大型的现代化企业、事业，大部分都集中在梧州。还在光绪三年（1877）清政府广西当局就创建了梧州炼锑厂，这是目前已知的广西最早的现代化新式工厂。<sup>①</sup> 工厂1919年由梧州知府志琛与官僚李开洗计划开办，除民间集股以外，官方拨款7200两白银及地方仓款入股，购置一批机器和蚕丝原料进行生产。<sup>②</sup>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桂系政府发起的颇具势头的广西建设运动中，广西公营现代化工业建设进入高潮，梧州也为最重要的基础，先后有1927年建立的梧州电力厂、1928年建立的梧州硫酸厂、1928年建立的梧州自来水厂、1928年建立的梧州卷烟厂等。这些工厂无论是资金投入、科技骨干水平还是动力设备的先进程度、生产规模、管理水平等，在当时均为广西全省之冠。<sup>③</sup> 1935年，广西糖厂还专程东迁到蔗源丰富同时城镇市场组织能力较强的贵（县）罗泊湾，于1938年开榨生产，每年产糖5万石，拥有资本120万元（国币），机械设备有切蔗机、压榨机、输送机35种，均系美国檀香山钢铁公司制造的较先进的机器。

广西官营电讯事业也自梧州开始，以梧州及桂东南为重心。有线电报：光绪十一年（1885），“尔时上海广州间，电报线路业已完成，复于广州梧州向沿途立杆架线，长凡二百余公里，就梧州设电报局，收发官商各项电报，是为本省有线电报设局之始，年复由梧州三聚设线路，经贵县、南宁，西达龙州，四十余

---

① 《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63页。

② 同上书，第164页。

③ 梁桂清：《解放前梧州工商业发展情况及其特点》，《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年来，逐渐推广设局几遍各县”<sup>①</sup>。有线电报是当时人们使用的现代通讯手段。当时，商界大多用之。1933年广西57个有线电报局商务报费收入共计147271元，桂东南13局共计633216.53元，占总数43.4%，其中苍梧县（含梧州）排行第一位，为49311元，占桂东南总数额的79.8%，占全广西有线电报数商务报费收入的34.7%。<sup>②</sup>由上我们可以廓出广西早期现代化发展过程所包括的基本区域规律：东部城镇是现代化中心和重心，由东向西播散。

复次，“无市不趋东”的城镇经济体系，还孕育了晚清民国时期，桂东南商帮、桂南商帮在广西的率先崛起。如前文所论，广西以往向无稍大商帮，即使是明清时期，在桂东南也尚未见本地商帮的身影。至晚清民国，城镇经济的核心网络在东南部、东部突出地发展，促进了桂东、桂东南农村商品经济的率先活跃，农业商品性产品大量增多；加之广西“无市不趋东”的城镇体系，还使桂东南地区最先得宜，成为广西最早最多接受新信息、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和接纳各种人才的最佳经济区位。此情之下，桂东南、桂南农民也开始发生较大批量的向城镇圩市转移过剩劳动力的过程——涌入城镇务工经商。势头之大，颇有超过粤商之势。<sup>③</sup>接着又在本地工商业相对饱和的情况下，模仿粤商拓展的方式，结成同乡帮伙，顺着粤商进发的指向，向着粤商势力不及的间隙，向桂中、桂西南、桂西北等广西边远地区辐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宁、百色、龙州、宜山、忻城、宾阳、柳州等重镇，都出现了玉林五属（玉林、兴业、博白、陆川、北流）会馆或同乡会。<sup>④</sup>西林、隆林、南丹等极边山区，也时常

① 梁立权：《贵港市糖业发展史》，《贵港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② 民国22年《广西年鉴》第二回下册，第821页。

③ 同上书，第820—821页。

④ 笔者综合各县市史志资料、口碑资料、实物资料。

可见玉林商帮的足迹。<sup>①</sup> 桂南沿海钦州、廉州、灵山商帮的兴起也类同于玉林商帮。桂东南、桂南商帮的崛起，在广西商业史上具有突破意义，它终结了广西素无从事长距贸易的本土商帮的历史，标志着广西具有穿透自然经济樊篱能量的市场经济自身的发育能力已经开始形成。

#### 四 利益流动结构：“无利不趋东”

在城镇经济“无市不趋东”的等级分布体系中，经济利益的回环流动最终也是层层趋东的。由于晚清民国时期营造广西城镇经济的主导力量是粤商，又由于粤商组织的两广商品对流关系是当时广西与外部的最重要的经济联系，在广西城镇经济网点中，自然形成越往东趋贸易机会越多，生意买卖越大，赢利额越大的利流总格局。这种格局以及整个广西城镇经济的“无市不趋东”结构，就是按照粤商东稠西疏分布律向粤商进行利益分配的结果，是粤商利益在广西的地理载体，是数十万计、动机具体不同但同为谋生获利的入桂粤商经济活动积演和总汇在经济地理上的宏观表现。作为主要营造者，粤商当然也是这种城镇经济结构的最大利益享有者。（参见表3-5）

由表3-5可知，广西各地城镇的首富普遍是粤商，而且越往东趋的城镇，由于粤商的营造作用越突出，粤商富户户数越多、富裕程度也越高，如梧州正是广西这种情形的极点状态。由此可见，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经济的进一步发育所形成的主要利流，是汨汨流往其营造主体——粤港商人的。“无利不趋东”结构的内核正是“无东不成市”过程及所导致的“无市不趋东”体系动作的必然结果。

<sup>①</sup>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

表 3-5 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各城镇首富情况比较表

地名	首富姓名	籍贯	时 间	首富规模及一般情况	方位
凌乐城	苏义记	广东	光绪末年 至 民国末年	经营苏杭铺，兼营车衣，初抵资金 25 元光洋，后发至 5000 元光洋（折东毫 6175 元）为初来资本的 200 倍 <sup>[1]</sup>	桂西南部
南丹城	朱林记	广东 罗定	1943 年	经营土洋杂货，原资本 400 元，抗日时扩展至 5000 多元。为初来资本的 12.5 倍 <sup>[2]</sup>	桂西北部
南丹 月里街	张盛昌	宾阳	1941 年	经营百货布匹。初来时仅携资 5 元。发展至 900（银币元），1927 年发至 10000 元洋，折东毫 1800 元。为初来资本的 180 倍 <sup>[3]</sup>	桂西北部
大新 全茗街	黄元兴	广东	光绪年间	经营布匹、缸瓦、杂货、收囤，资本 2000 元（光洋）折东毫 2470 元 <sup>[4]</sup>	桂南西部
大新 养利州	广福祥		光绪十六 年至民国 9 年	初时仅有资金 160 光洋，到 1927 年时发展至 10000 元光洋，折东毫 12350 元。为初来资本的 66.6 倍 <sup>[5]</sup>	桂南西部
罗城 (天河)	邝广华	广东 佛山	民国初 至末年	初经营丝绒布匹，批发零售，后发展到食杂、日杂，并代广州收购土产，代办邮政。初资本 600 银币，到抗战胜利约有 20 余万银币元，折东毫 40 万元。为初来资本的 333.3 倍 <sup>[6]</sup>	桂西北区 东部
融水	叶长发	广东	同治年间 至 民国年间	初来经营小杂货，后买山雇人种杉，成为头号大山主，大木材商。拥全部大苗山杉林的 3/4，估计杉木百万株之多。每年砍售 10 万株，按时价可获利 80 万元银币即 160 万元东毫，拥财 800 万元银币 <sup>[7]</sup>	桂北西部
桂林	罗焯致	福建	清 末	罗义昌银钱兑换铺为中心，兼营当铺、鸦片、估衣、果铺、馆铺，家财号称 200 两白银。他发财途径主要靠与广西厘金局长和广西巡抚相勾结而致利 <sup>[8]</sup>	桂东北部



续表

地名	首富姓名	籍贯	时 间	首富规模及一般情况	方位
桂林	张永发	湖南	民国时期	初时，以 400 吊钱开设染店，后来发展至 26 万元，垄断桂林纺织和印染 <sup>[9]</sup>	桂东 北部
南 宁	万利 酱园	广东 佛山	同治六年 至 1946 年	初以白银 30 两摆酱料杂摊，同治六年（1867）资本至百两白银时挂“万利酱园”招牌，开坊生产粤式酱料，后又兼代理英商火油，后发展至正店、支店、工厂共 10 处，资本 150 万元以上 <sup>[10]</sup>	桂南 西部
平南 大安	高义记	广东 南海	20 世纪 40 年代	是 20 世纪 40 年代平南头号资本家，抗战前夕达全盛。他在大安街上经营行业很多，如纱布、洋杂海味、药材、杂货、牛皮作坊等。另外，在梧州、广州、上海、玉林、香港还开办船务行、牲口庄、花纱行、纱厂、汽车运输、金融汇兑等，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总资本当在 100 万元以上 <sup>[11]</sup>	桂东 南区
梧州	梁颂庸	广东 鹤山	1902— 1920 年	走私鸦片起家，1899 年发至白银 3 万多元，以后除继续经营鸦片贩运外还经营银号、杉排、平码、杂货、烟丝、酱料、谷米、药材、轮运等几乎所有大行业，支配梧州市场 30 多年，总资本额多达 300 万银元 <sup>[12]</sup>	桂东
梧州	吕辑堂	广东 四会	同上	经营贞记火油公司、大南酒家、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银钱业、航运业，并代理洋纱。总资本估计为银元 100 万元 <sup>[13]</sup>	桂东
梧州	左镜明	广东 顺德	1923— 1949 年	在梧州、南宁等地办新式的化学、皂药、印刷、工厂 28 间，总资本数百万元。但据本人回忆，在梧州富户中他还仅排在前 20 名上 <sup>[14]</sup>	桂东

注：[1]《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 4 册，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4 页。

- [2]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
- [3]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南丹月里乡壮族社会历史调查》。
- [4] 参阅拙作《论近代广西城镇经济的“无东不成市”格局》，《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4期。
- [5] 同上。
- [6] 吴敏《邝广华发家史》，《罗城文史资料》第2辑。
- [7] 《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7页。
- [8] 罗启鉴述：《清代桂林巨商罗炳致》，《桂林文史资料》第7辑。
- [9] 刘开泰：《张永发的发家史》，《桂林文史资料》第7辑。
- [10] 邓德建、谭津：《万利酱园的兴衰》，《南宁文史资料》1987年第2辑。
- [11] 参见平南县县志办《人物传略·高义记》。另外，高义记业主属广东省南海籍贯，此为笔者到平南县大安镇访得。据平南县工商界前辈回忆，当时平南公认的第二大资本家陈心菜拥资已逾百万元，而高义记又是公认的平南县第一大资本家，其实力在陈心菜之上，总资本应当在100万元以上（资本总额100万元，为推估出来的）。
- [12] 梁颂唐、吕辑堂材料均见侯雅云《从“四大富商”的盛衰看梧州的资产阶级》，《梧州史志》（经济资料选辑）。
- [13] 同上。
- [14] 据广西工商联黄晓丰先生提供《左镜明传》原始资料（资料原件由左镜明先生提供）。

综上，城镇经济等级分布体系“无市不趋东”结构，对广西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影响是全方位的。以它为统驭，形成了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区域格局，构成了广西当时的市场特征，规定了广西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区块位序和这一系统运转的主要动态节律；以它为统驭，晚清民国时期广西整个社会经济纳入到以粤商家乡为核心的珠江流域经济圈这一大系统中。

## 第 四 章

# 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客商与广西 城镇经济发育关系探源

——海内外相关地域的经济发展  
梯度推移的宏观比较环视

近代粤港商人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何以具有如此紧密的关系？晚清民国 100 余年广西城镇“无东不成市”格局在更广阔地带上赖以构成和延续的根源何在？入桂粤港商人是从广东、港澳地区推进而来的，谜底，还得从粤港地区开始寻觅。笔者认为，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经济发育所出现的“无东不成市”局面以及相随形成的“无市不趋东”网络结构，原因在于，无论是在包括广西全境在内的整个珠江水系流域地区（主要包括广东全境、广西大部分、滇黔湘省小部分地区——笔者注），还是在由越南以及中国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广西、广东、香港、澳门组成的所有环广西地带范围中，粤港地区都处在经济发展水平分布的最高梯度区域，商品经济市场辐射的扩散推移力最为强大；而同时，环广西省区中惟广东、香港、澳门与广西完全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地理单元——都属于珠江水系地带和南海沿岸地区，粤港对广西的经济发展梯度推移，最有条件径直和充分地抵达。

因此，只要我们沿着粤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关系中若干最关键的逻辑剖面溯往广东、香港，将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地区社会

经济决定前者的发展变化因素揭示出来，我们就能探明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前述特殊关系形成的全部根源。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时期环广西地区中粤港商品经济辐射的最强大与粤商商务在桂的主位地位

客商商帮一般是经济发展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施以商品经济辐射过程中推移出来的职业商人群体，商帮集团的规模以及拓展势力的大与小，取决于客商原在地区经济发展梯度和商品经济辐射能量的等级。本节拟从环广西地带中粤商家乡——粤港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梯度及其相应的商品经济辐射能量角度，环视粤商商务在桂主位及粤港客商在桂主要商帮地位的基本成因。

### 一 广东经济发展高梯度区形成过程的历史回顾

广东并非自古以来就是经济发展高梯度区和商品经济辐射源地带。秦汉至唐，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广东和整个岭南地区一样，一直是全国范围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百越之地”。据历史记载，即使是到了我国经济重心已经逐步南移，长江流域尤其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同样濒临南海的邻省福建得到大力开发的南宋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仍是“烟瘴地面，土广人稀，田多山少”<sup>①</sup>，广东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地域的布局、序列也和广西一样，仍是“北稠南疏、北高南低”，北部为重心。<sup>②</sup>当时，产稻虽丰，甚至作为商品大宗远济泉州、福州<sup>③</sup>，但单一的植稻尚不足以引

① 黄慈辑：《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57年刻印本。

② 参见拙作《历史上珠江流域的人口移动的主流变迁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地理》1995年第12期。

③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29。

起商品经济在当地的普遍发展。广东种类特多的经济作物，如一年可“五收”<sup>①</sup>的蚕桑等，尚未有较大面积的种植，商品化手工业还没有也不可能普遍发展起来。食盐本是沿海的广东大宗面可远销的产品，但一直是封建国家的统制物资，由国家统一调拨、专卖，受委商人视之为苦差。海外进口则不过是金银、珠宝、香料之类满足官贵需要的奢侈品，与民间生计关系不大，市场流通量很有限。在宋代或更早时间，应该说，由于地近我国传统的贸易对象南洋列国，加之拥有特殊的官统外贸地位，广东是有了一支有一定数量的商人队伍的。但如上所述，广东一直缺乏全民性的大宗商品产出，广东商人除粮食和有限的官货产品以外，无甚运转，他们不可能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活动并大规模进行长距运销，也无足够的实力远射他域，所以即便对于近邻的广西，也是“商不乐至”的。<sup>②</sup>

广东作为经济发展高梯度地区和商品经济辐射源地带的形成，当从明代开始。从明代起，中国封建经济步入封建小商品经济阶段，王朝政府开始实行“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私营工商业的法令制度。广东发展商品经济的巨大优势，如雨热足、物种多、濒临沿海、境内交通水网丰富、广州长时间拥有独口通商外贸巨埠地位以及澳门是当时中国惟一的远东贸易重要中心等，从明代开始逐渐充分发挥出来。在明代，广东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地区，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起来。农业方面，单一的植稻结构向着商品性多种经营移型，商品性农业长足进步，大片果林、蔗园连片出现，顺德县陈村附近40里地，龙眼、荔枝、橙树已是“弥望无际”。<sup>③</sup>自15世纪中叶起，广东农民还创造出—

① 参阅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圩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② 参见同治《苍梧县志》卷之10，《杨芳盐法议》。

③ （明）屈大均：《广东新语》。

种因地制宜、循环生产、商品量特大的商品性农业组合经营方式——桑基鱼塘，鱼丝两类商品皆得不断互促倍增，利润极高，常常“十倍于禾”。<sup>①</sup> 在顺德、南海、番禺、新会、三水、高要、东莞、香山等许多县，桑蚕鱼塘比比皆是，废田树桑迭起高潮，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顺德龙山一乡基塘面积竟占总耕地面积的80%<sup>②</sup>，咸、同年间（1851—1874）又发展至使稻田面积不及十分之一。<sup>③</sup> 相应的在手工业方面，适应于农业商品化迅速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需求，各种农产品加工业、大型手工业制造业也迅猛崛起，明清时，蚕丝产区南海、顺德已家家流行缫丝和纺织手工业；在葵田广聚的新会，形成了葵扇手工业生产中心；在水草广为种植的东莞县，编织睡席、草绳的草织手工业则充分发展。南海县境的佛山，还从宋元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落，迅速崛起为享有“天下四聚”之誉的全国罕见的手工业巨镇。宋代时，佛山才以“孤村冶铁”起步，至明中叶竟已发展成为“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的手工业巨市。<sup>④</sup> 除冶铁行业以外，清代佛山还形成了陶瓷、丝织、棉织等近200个手工业行业<sup>⑤</sup>，清初时仅丝织棉织行业，织工就多达20万人左右。<sup>⑥</sup> 广东农副手工业、商品生产的这种大规模发展，向市场提供了巨量的商品。此外，在这期间省外乃至海外的地区和国家也向具有国内国际市场重要中转地位的广东输入了大量的农副手工业商品。如道光初年（1821），佛山市面上就大量流通着以“北

---

① 光绪《高要县志》卷之2，地理，物产。

② 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圩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③ 参见《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4册。

④ 《明朝经世文编》卷368。

⑤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

⑥ 参阅罗一星《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货”或“外江货为专称的外省商品，如西北的裘皮、马鞍，京省的布匹、苏杭的美物、川广的药材、江西的粗布等”<sup>①</sup>。

商品的巨量产出或中经广东，诱启了广东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引起了货物在价值规律支配下而不是在封建政府行政指令下发生巨大流动，这种流动不再是官府所组织的官营式或调拨式的货流，而是在民间自然发生的、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之间不同产品的自由的市场对流。这种市场对流的规模是巨大的，这可从广东大量加入营销货物的商业人口的比重中窥见一斑：当时人估计，在嘉庆年间（1796—1820），“南海商贾十之六，顺德新会十之四，番禺、东莞、新宁、新安十之三，增城、三水、花县十之三，香山、从化、清远十之一”<sup>②</sup>。若以嘉庆年（1796—1820）《南海县志》和道光年（1821—1850）《新会县志》所记载的两县人口数折算，则南海县商贾就有 671606 人，新会商贾有 275364 人，两县相合有 946000 余人。以此推估，当时整个珠江三角洲和广东，商人以数百万计不成问题，货流的频繁和巨大可以想见。这巨大的货流和数以百万计的从商人口在广东各地城镇有限地域内达到一定的饱和，必然很快向广东域外拓展。自明代起，以丰富的货源为依托，粤商迅速崛起为一支全国最著名的商帮集团，并向海内外广大区域辐射。如苏州市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已出现了粤商所办的岭南会馆、东官（莞）会馆。<sup>③</sup>至清代，粤商则“或奔走燕齐，或来往吴越，或入楚蜀，或（经广西——笔者注）客滇黔，凡天下省郡市镇，无不货殖

---

① 参阅罗一星《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② 嘉庆年间龙廷槐：《敬学轩文集》。

③ 参阅吕作燮《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其中”<sup>①</sup>，尤其是在东南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当时俗称南洋），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连省跨国的商品经济辐射圈。而作为此圈的核心区域，广东地区自然成为商品经济的原发辐射源地带或者辐射轴心地带，成为当时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最高梯度区之一。据罗一星先生统计，鸦片战争以前岭南地区主要商品流通总值为6008.7万两（白银），按当时广东省人口计，人均2.4两，远超过全国人平1两的平均值。<sup>②</sup>可见，鸦片战争前500年左右，广东即已逐渐成为全国最高梯度的经济发展区。这是近代广东在全范围内始终保持经济发展最高梯度地位的极其重要的历史基础。

## 二 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的最高梯度区地位的保持

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英国为先锋的资本主义列强首先以鸦片和大炮从广东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个并不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性的重大经济技术梯度推移过程，首先在广东、港澳地区发生并形成——世界范围内以现代化大工业生产为基础，以欧洲列强、美国及亚洲的日本为中心区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最高梯度区，凭借着最强大的商品经济辐射穿越力，漂洋过海，以广东等沿海地带为前沿，向整个古老的中国发生推移。这使广东和港澳地区始终在全国保持经济发展最高梯度区的地位，并且由于区内经济内涵开始发生从农业、手工业、渔盐业向近代化大工业，从国内贸易和洲（亚洲）内贸易为主向国外贸易尤

<sup>①</sup> 嘉庆：《龙山乡志》卷4。

<sup>②</sup> 参见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学术研究》（广州）1991年第2期。



其是跨亚洲地区与欧洲、美洲贸易为主的转型，增强了自身的商品经济辐射能量，形成了自身在全国范围经济技术发展最高梯度地区之一的领先地位。表现如下：

首先，具有近代型经济增长极和商品经济辐射轴心意义的开放口岸埠市，率先在广东沿海沿江大批出现，并组合成一个辐射量巨大的体系，统率整个广东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始终保持领先地位。明清时期大部分时间中，广东乃至全国对外通商口岸仅限于广州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租占的澳门，而且由于外商被王朝政府规定只允许与十三行商人接触交易，广州贸易仍是不充分自由的，广州对外通商实际上也只处于半开放状态。而由 1842 年 8 月 29 日《中英南京条约》签字生效为开端，打破了广东乃至全国经济上闭关自守延续千百年的陈局。《南京条约》中最关键几项条款，即是直接在广东、香港地区实施的：取消公行制度，开放广州等五口岸，英国割占香港。

取消公行制度以后的广州，市场发育的自由空间扩大，能量倍增，据陈华新《近代广东对外贸易史料》统计，至 1852 年以前，广州一直仍为中国对外贸易首位口岸城市，占据中国与当时国际贸易主要对象英国贸易份额的 50.62% 以上。广州外贸总额 1868 年为 1833.65 万海关两，至 1919 年增至 9579.80 万海关两，长 4.22 倍。<sup>①</sup> 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广州城市人口陡增。1891 年为 180 万，20 世纪初年增到 240 万。<sup>②</sup>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未有的巨型新式港市——香港的出现。香港原属广东省东莞县，是珠江口外一个海岛，面积 75.6 平方公里，原人口约 3500，主要从事农、渔、运输业，地扼广州进出口贸易必经孔道，英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于 1860

① 陈华新：《近代广东对外贸易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 70 辑。

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下册，第 1172 页。

年又割占九龙半岛，在 1898 年 6 月又强租新界以及 235 个岛屿，面积扩大为 1036 平方公里。香港是一个避风汲水的天然良港，以它为中继港的航线四通八达，外国商船往返中国以及广东沿海，一般都要经过香港。1841 年，英国殖民者强行侵占并宣布为无税自由港；1842 年，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被迫向英国割让香港。自此以后，香港货物汇集，货商、外商蜂往，从洪仁玕《资政新篇》的亲历见闻来看，它在 19 世纪 50 年代已初具规模。据记载，1845 年，人口增长到 165000 人；1894 年，“香港已取得几乎无与伦比之优越商业地位”；1901 年，人口又增至 300000 人；到 1931 年，人口再增到 878947 人；1941 年日本侵占前曾达到 150 万余人。<sup>①</sup> 港市经济规模扩大速度惊人，成为近代广东、全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同时也成为世界有名的巨型港市之一。香港虽然是在英国殖民统治者当局出于侵略动机下开始营造的，但它始终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区域经济角度看，尽管香港经济具有国际化特色，但它的市场辐射作用的发挥始终紧紧地依托着国内地区，而且随着它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重要，这种对大陆的依托关系就更加密切。1864 年中国内地与香港贸易总额（即通过香港中转的国际贸易）为 1824.39 万海关两，占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以及英国、美国、新加坡、印度、俄国、日本贸易总额的 17.3%，以后逐年上升；1878 年该两项数字分别升为 4242.37 万海关两和 30.75%；1887 年为 8915.42 万海关两和 47.39%；1893 年为 12918.12 万海关两和 48.11%，接近当年中国国际贸易总值一半。<sup>②</sup> 从经济的社会构成看，虽然西方国家资本居于总

---

① [英] 丁戴维·莱思布里奇：《香港的营业环境》，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六十三年以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十五表；引自陈华新《近代广东对外贸易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 70 辑。

操纵的地位，然而，具体运营仍多华商资本，如1888年时，“华人是（香港）最大的财产所有者，支付着香港收入的百分之九十”<sup>①</sup>。香港居民更是以华人为绝大多数，如1931年香港华人人口为859425人，为当年香港总人口的98%。<sup>②</sup>尤其以广东本省人最多，“香港基本上是一个中国社会，一个广东社会”<sup>③</sup>。所以，无论英国殖民主义者如何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香港的繁荣都是中华民族双手创造的。它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国南部经济成长最新、最快、最大的增长极。

清季，穗港之外，广东沿海还先后开辟以下一系列商口岸城市：汕头（1860年开埠）、九龙（1887年开埠）、拱北（1887年开埠）、江门（1890年开埠）、三水（1896年开埠）、琼州（1876年开埠，今属海南省）<sup>④</sup>；此外，还有1899年法国凭借《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的广州湾（今湛江市），法国宣布它为“无税”自由贸易港<sup>⑤</sup>；加上葡萄牙殖民者自明代起即已占据的澳门，总计，广东一带共有通商口岸12处之多。这些商埠的经济集聚规模都不小，如1887年九龙开关以后，头13年除第一年以外，贸易总额都超过广州，直至20世纪又被广州超过。又如1860年开埠的汕头市，在粤港地区范围内，它的规模仅次于香港、广州、九龙，位居第四，但1933年时该埠市区总人口19万多，大小商号共30000多家，商业之盛，仅次于上海、

---

① G. B:《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77页。

② [英]丁戴维·莱恩布里奇：《香港的营业环境》，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③ 威廉·比瑟：《香港经济与未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④ 《1895—1919年广东九口外贸总额比较》，《广东文史资料》第70辑，第34页。

⑤ 吴均：《广州湾航运简述》，《湛江文史资料》第7辑。

天津、大连、汉口、胶州、广州，在全国内地城市中居第七位。<sup>①</sup> 拱北关市经济集聚规模也不小，其外贸总额在1902年以后也跨过了1000万海关两大关，以后近20年一直保持，通常相当于广西准总中心城市北海市的3.5倍。<sup>②</sup>

近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是：与世界经济发展最高梯度区国家直接接轨的对外开放口岸，总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率先受世界近代化工业文明影响带动的最核心、最重要和最大规模的增长极。而粤港一带，密集着如此众多的经济增长极，在全国是罕见的。它们相互组合，如同一组最强固的支架系统，有力地支撑着广东、港澳地区自明清即形成的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梯度区之地位，在晚清民国始终保持，并不断扩大对包括广西在内的全国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巨大的梯度差。

关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最高梯度区，学界一般都认为是已取代广州的全国外贸中心地位的上海及其所直接辐射的浙江、江苏诸省即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个观点虽然有许多合理价值，但却有绝对化之处，典型偏颇是“上海一元经济总中心论”，即认为：近代中国只有上海为全国经济总中心。<sup>③</sup> 关键偏颇是没有把香港的崛起考虑进去，只看到1852年以后广州作为全国第一商埠地位的丧失，没有看到中国第一中转国际贸易中心同时又在相近地域的香港崛起。诚然，上海位于拥有我国三分之一人口的长江流域的顶点，地处东海沿海，又为我国大陆整个海岸线北连北方的渤海、黄海，南接南部南海的中点，同时向西溯江可深入广大中国腹地，向东出海可直接连接由日本、美国启程的太平洋航线，东西南北均为中心。正因此，在未计入香港数值的情况下，上海在商贸、

---

① 饶宗颐：《潮州志·实业志》商业篇。

② 《1895—1919年广东九口外贸总额比较》，《广东文史资料》第70辑，第34页。

③ 长期以来，国内现行经济史教科书和学术文章都流行此说法。

交通、新式工业诸项中，通常都占有全国内地总值的50%以上，在全国经济中具有很高的首位度。如1925—1935年，上海外贸占全国港口外贸55%、内贸的38%。<sup>①</sup>又如1888年进出上海船只5000艘，占当年全国内河船艘的96%。<sup>②</sup>但是，当时香港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前举数据，显然没有把香港的数据统计进去。

香港，从来都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主权领土，其经济功能始终也是祖国大陆内地统一、联体运行的。我们以这样的观点，将香港置于全国经济总体格局中去考察，并将香港与上海作一番比较，不难发现，“上海一元中心论”难以成立。实际上，港沪各有千秋，难分高下。两者分别居东、南方位，各领分工，遥相协作，共同组成了整个近现代乃至延贯至今的中国经济沪—港双元式总中心。<sup>③</sup>1920年上海人口多达200万<sup>④</sup>，但1927年上海与全国往来的外洋及国内商船共37422艘，吨位总计32463323吨<sup>⑤</sup>，1924年到香港的各国商船却多达76492艘次，吨位总计57000000吨，竟分别是上海的2.04倍和1.76倍。<sup>⑥</sup>1933年上海内外贸易总值为2238251166国币元<sup>⑦</sup>，而省港大罢工前的1924年，香港每年进出口货值为1.5亿金磅，约合当时货币2500002000华币（即国币——笔者注）元，尚超出1933年上海

---

① [美]丁罗兹·里菲：《上海——近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参见保雷筠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319、353页。

③ 笔者这一观点可概括为“沪港双元式经济总中心论”。

④ 参见《上海人口志略》，第6—8页。

⑤ 引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1927年期。

⑥ 程浩编：《广州港史》近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7页。

⑦ 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上海——近代中国的钥匙》一书载，1933年上海直接对外贸易货值为1051978048国币元，又据该书142—143页1870、1880、1890、1900、1910、1920各年份上海对外贸易值和对内贸易货值数据，求出上海相对稳定的内贸和外贸份额的通常比例分别为53%和47%，按此比例，上海1933年内外贸货值为2238251166国币元。

内外贸货值多达 261750884 国币元<sup>①</sup>。可见，无论轮船进出口还是内外贸总货值，当时的香港，都不在上海之下，而且比它还高——它确实是与上海地位大致对等的中国又一大经济总中心城市。沪港的并立，并不矛盾，如前文所举，清季民初，中国对外贸易包括上海所占据最大宗的部分，通常有总值的 30%—50% 还须通过香港中转完成<sup>②</sup>；从主要分工看，上海是内贸为主的总中心，其内贸比重通常占 53%，外贸比重为 47%<sup>③</sup>，香港则是中国外贸及民间组织远东国际贸易的最大中心；从外贸具体分工来看，上海是中国参与环球商路东段航线国际市场循环（东渡太平洋抵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总中心，而香港则是中国参与环球商路西段航线（即西走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沿岸、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出大西洋抵英法德等西欧各国）市场循环的总中心，港沪并立，分工合作，共同引领着整个中国走向世界，也共同承接着世界走进中国。由此看来，近代广州在全国地位的下降主要原因并不是众所认为的上海的崛起，而是咫尺之远的香港的新兴；作为全国的外贸最大中心商埠，它从未离开华南乃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地带，只不过它发生了短距离的调整性变动：由港湾深处的广州移至地当出海的香港。

在近代，粤港地区仍然是全国经济发展总中心的双元轴心之一的地带，全国最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极依然强势保持，加之还有前文论及的众多规模不小的其他辅助性增长极的烘托，这是广东省依然保持其在全国的经济发展最高梯度区地位从而构成了近代中国最高经济梯度地带之一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大工业产品率先涌入，农、

---

① 程浩编：《广州港史》近代部分，海洋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97 页。

② 陈华新：《近代广东对外贸易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 70 辑。

③ [美] 丁罗兹·里菲：《上海——近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林、副、矿诸业产品的优先出口，使粤港地区得世界科技和市场信息之先，始终保持经济发展在全国的领先水平。

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晚清民国时期，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凭种种侵略特权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技术优势，通过口岸将所产的大量工业产品倾销中国，并大量收购中国农、林、土、副、矿诸业产品，粤港地区当然首当其冲。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从外国进口至广州的商品主要有棉花、棉布、手巾、棉纱线、洋纱、其他毛织品等<sup>①</sup>，特别是洋纱，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头 50 年间广东仍然是全国进口洋纱的主要省份。见下表：

表 4-1 1867—1892 年华南八港进口洋纱统计 单位：担

年 份	华南八港	全 国	华南八港占全国 (%)
1867—1871 年平均	53844.23	55007.29	97.9
1872—1876 年平均	75915.28	80429.48	94.4
1877—1881 年平均	119180.69	137240.32	80.8
1884—1888 年平均	303695.67	477521.02	83.6
1889—1892 年平均	513170.68	1078905.02	47.6

资料来源：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2 卷，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97 页。

此表中，华南八港指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北海、九龙、拱北、蒙自，若剔除厦门、福州、蒙自三港的洋纱进口量，广东也平均占全国进口洋纱的一半以上。广东洋纱进口，多从广州、汕头输入。1873 年，汕头进口洋纱仅 17000 担，1883 年达 81000 担。1883 年《汕头贸易报告》说：“汕头在诸商埠中是棉纱进口最多的港口，每年棉纱进口价值仅次于鸦片。近年来对孟买棉纱的需要甚殷”，“因为印度棉纱价钱便宜、纱支较粗，适

<sup>①</sup>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 1 册，第 553—534 页。

于广东市场需要。进口棉纱大部输入嘉应府兴宁县，那里广泛地织造着一种普通棉布，这种棉布的最大市场是广州附近的佛山。”<sup>①</sup> 1884年《汕头贸易报告》又说：“汕头棉纱进口的迅速增长，今年还继续着，进口总量是96590担，较1883年增加15000担，汕头的进口量达到了全国各埠进口量的三分之二。”<sup>②</sup>

整个近代，洋货输入都始终保持种类愈来愈繁多，货值愈加增大的趋势。即使在全国外贸地位日趋下降的广州，洋货输入也始终保持很高的增长势头。两次鸦片战争后的广州，1865年洋货净进口货值为6775928两，1866年升至9893836两。之后，略形减少，但自1873年起又始回升，达5680306海关两（是年起以海关两为单位），此后直至1886年，各年多保持在四五百万海关两左右。而1887年则骤增至7960171海关两，到1894年高达13699283海关两<sup>③</sup>。据1946年1月至1947年6月广州港进口贸易与全国贸易总值比较表统计，从英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商品除各色洋布、棉纺织品以外，还有毛织品、人造丝、金属及矿砂、机器及工具、车辆和船艇、金属制品、酒类、颜料、油漆、书籍、地图、化学产品、燃料、玻璃等80余种，总值达155764231000元（法币）<sup>④</sup>，广州如此，香港及其他口岸自不必论。

广东的出口贸易也获得了优先发展。明清时期广东货流的国内主向至近代已向着国际市场主向转型，世界上经济发展高梯度区的工业化国家巨量的原料需要和强大的购买力，也较之传统的贸易对象南洋列国（东南亚诸国）更为强劲地激发中国特别是

---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22—1423页。

② 同上书，第1620页。

③ 同上。

④ 参见《中国贸易年鉴》民国37年版。



广东地区的出口需求。据统计，广东对外贸易出口值（未含香港、澳门）在1868年时为1149.45万海关两，1878年渐增至1353.22万海关两，1888年增至3247.42万海关两，1894年增至4174.82万海关两。<sup>①</sup> 出口品种也日趋繁多，据民国37年《中国贸易年鉴》统计，1946年1月至1946年6月，广州港出口贸易货品有动物及其产品、生皮熟皮、皮货、鱼类、海产品、豆、杂粮及其制成品、植物性染料、鲜果、干果、制果、药材及香料、子仁、酒、糖、茶、烟草、蔬菜、其他植物产品、竹、燃料、藤、木材及木制品、纸、纺织纤维、纱线纺织品、针织品、匹头、其他纺织品、矿砂金属及金属制品、玻璃及玻璃器、石泥沙及制品、化学品及其产品、印刷品、杂货等48类，总值合计175417579000元（法币）。

商品进出口贸易的领先发展，对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外国工业品在广东的率先输入，在客观上率先向广东供应大批科技先进、效率倍增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等，这些从大到小的各类洋货商品，在当时中国尚不能自行生产或大批生产的历史条件下，都具有一定的开启新生产力的作用，并使先得其惠的广东对于其他省区始终保持着经济技术领先的优势。如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机器大量输入广东，促使珠江三角洲原用手工操作的缫丝业迅速转变为机器缫丝业，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所产生丝品质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就是率先在珠江三角洲的缫丝业中问世的。<sup>②</sup> 又如外国汽车的输入，促使了广东公路交通迅速发展。1919—1923年，广东全省开筑公路2万多里，至1935年，广东公路里程居全国各

---

<sup>①</sup> 《历年海关报告》引自陈华新《近代广东对外贸易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70辑。

<sup>②</sup> 吴振兴：《近代珠江三角洲机器缫丝业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省之冠，仅官营长途汽车即有 1278 辆，公路运输已初步形成一个以广州为中心，包括纵横省内东西南北 17 条公路干线、326 条支线的系统<sup>①</sup>，这使广东非水路地区交通运输效率率先得到提高。土货出口贸易与洋货进口贸易相辅相成，它同样具有率先在广东开启新生产力的积极作用。近代机器生产之所以率先在缫丝业中形成，缫丝业之所以较其他行业率先引进和使用机器，其经济原因是生丝在国际上具有最广阔的市场，其市场之大以至于生丝出口构成了当时广东全省经济的生命线。1929 年，珠江三角洲生丝出口值 48832587 海关两，占当年全省外贸出口总值 75097383 海关两的 65.02%。<sup>②</sup> 因此，该行业必须较多地使用机器，较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并从中赢取自身应得的最大利润。总之，洋货的率先涌入和土货的先行出口，构成了近代广东社会经济发展一大重要的区位优势，这两个“率先”，使广东在全国接受和学习消化世界现代化工业文明过程率先起步，并将最先接触到的科技信息、市场信息转化为自身现实中生产力进步的始终领先，转化为自身对其他省区的经济技术优势，不断形成和扩大自身的商品经济辐射能，从而在近代始终保持了自身经济发展在全国范围的最高梯度区之一的地位。此外，从广东进口的外国工业品，数量之巨，远不是广东一省的消费市场能够容纳的，大宗浮游于广东需求之外的外国工业品，也直接为广东商品经济向他省辐射提供了丰富的货源，从而也大大增强了近代广东商品经济的辐射能量。

再次，晚清民国时期广东省仍然保持全国经济发展最高梯度

---

① 何苏照：《陈济棠时期的广东公路》，《开放》1985 年第 1 期。

② 吴振兴：《近代珠江三角洲机器缫丝业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91 年第 5 期。

地区地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拥有最为巨额的侨资侨汇，与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强势的区域经济互动机制。

广东是我国最大的侨乡，汉唐之际就有人到南洋侨居。明清时期，依托着广东较发达的封建小商品经济的辐射，出现了广东移民大批往抵南洋等国家和地区贸易、开垦的局面。近代以后，广东移民到南洋、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澳洲、欧美、日本等谋生者源源不绝。据统计，1957年中国海外华侨总人数12097425人，其中广东籍华侨就有8231281人，占68%。<sup>①</sup>明清时期，广东华侨在东南亚、南洋等各国贸易开垦，颇多致富，甚至在大多数侨居国也造成了执掌城镇经济牛耳的“无东不成市”局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华侨大批返回祖国家乡投资工商业的情形一直没有出现。

近代以来，西欧工业化国家船舶前往中国，华侨所侨居的东南亚各国家和地区是必经地区。在那里能够更早地接触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熏陶和英法德等世界经济发展最高梯度区现代型商品经济的辐射，一些埠市甚至成为向中国中转这种辐射的口岸。如新加坡1825年即已开埠，较中国第一批开放口岸开埠早近20年。这造成了这些地区未曾有过的经济辐射逆转，即由中国封建小商品经济辐射的接受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反面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水平高梯度地区对中国播散商品经济辐射的替代轴心。这种位势下，积聚一定财富的粤籍华侨纷纷返乡投资工商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侨资侨汇返广东的热潮。华侨投资广东，最早的时间大体上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目前有资料记载的最早一例，是秘鲁粤籍华侨黎氏，于1862年从国外汇款投资广州的出口商业。接着是1872年粤籍南洋华侨陈启源，携回数万元白银在南海县开

---

<sup>①</sup> 1957年《广东省侨务统计资料汇编》。

办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继昌隆缫丝厂。以后，侨资侨汇如潮涌回，整个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几乎每个县市都有侨商投资，尤以广州为侨资最密集区，汕头、潮州、江门、南海、顺德、梅县、开平、文昌等侨资聚集也十分稠密，华侨投资范围几乎遍及所有的工商行业，诸如工、商、农、垦、矿业、金融、服务、交通、房地产等等，在整个广东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1919—1927年，华侨在广东投资户数5373户，总投资额为104244025元；1945—1949年间，投资户数3745户，投资总额为43089682元。据估计，广东的侨办工业占全省的民族工业约有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左右。<sup>①</sup>此外，在广东的城市里较大的工商业大都是华侨资本所经营的，如广州市的餐厅、酒楼、戏院、旅店、洋服、洗衣等行业多为华侨及亲属所经营，尤其是私营金融业如广州四邑、潮汕、海南岛等地的银钱业和侨批业大都为华侨资本所经营。1936—1938年，广东侨汇收入金额11.5亿元，占全国侨汇收入金额13.7亿元的83.9%。我国当时的巨额外贸入超主要是靠侨汇来平衡的，当时全国三年合计入超4.73亿元，广东侨汇收入弥补了全国外贸逆差之后，尚有巨额剩余。<sup>②</sup>源源不绝、自外域返粤的巨额资金，给广东社会经济注入了其他省区所没有的活力，也成为支撑广东经济在全国最高梯度区地位的支柱之一。

综上，具有经济增长极意义的口岸规模及数量、进出口贸易的平均货流密度以及侨资侨汇的金额及比重三项在全国均为最高水平，我们有理由将广东划为全国经济技术发展的最高梯度区之列。

---

<sup>①</sup> 参见林金枝、庄为玘《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第一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sup>②</sup> 曾桂蝉：《广州解放前后国家银行引导侨汇为新中国建设服务》，《广东文史资料》第70辑。

### 三 环广西的商品经济辐射源地带省区的梯度分异对广西桂 诸省商帮各自位序的规定

既然入桂粤商的故乡广东是世界经济技术最高梯度向中国推移过程的最先发生区，并因此而始终保持社会经济发展在全国的领先状态和最高梯度区地位，那就决定了在环广西地带中，同样是具有商品经济辐射能量的省区——湘赣商帮的故乡湖南、江西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只能处于低一级梯度的位序上，其对广西的商品经济辐射能量当然只能比广东小。事实上正是如此。以地处内陆沿江省区的湖南为例，近代只有长沙、岳州（今岳阳）两个对外通商口岸城市，远无法与广东 12 个口岸商埠相比；长沙迟至 1905 年 7 月才开埠，较广州、香港晚达 60 余年<sup>①</sup>；进出口额，1911 年长沙为 1602.32 万海关两，仅为同年广州该项 7927.54 万海关两的 20%。<sup>②</sup> 在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江西省情形也如此。江西省近代只有九江一处通商口岸，迟至 1862 年才开埠，较广州开埠和香港崛起时间晚 20 多年；九江进出口贸易的通常规模虽然大于湖南长沙和岳州，但仍远低于广州，更不及香港，1936 年时，在全国的口岸（未计入香港澳门）位序中，九江仅位居第九位。<sup>③</sup> 这样，在环广西地带具有商品经济辐射能量的省区中，广东的强度是最大的，湖南、江西的强度是次大的。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近代上海开埠并作为全国经济总中心城市之一崛起以后，明清时期湖南、江西分别至广州两条主要商路改走上海出海，这一商路的改向，虽然加速了广西近邻省区湖

① 《中外条约汇编》，第 29 页。

② 湖南数据引自张明园《中国区域现代化研究——湖南省》（台湾版），第 113 页；广州数据引自陈华新《近代广东对外贸易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 17 辑，第 159 页。

③ 民国 25 年《江西进出口贸易分类统计》。

南、江西经济的发展，但是并未给湘赣两省对广西的商品经济辐射增添多大的分量。迟至 1938 年，湘桂铁路才正式通车，湘赣两省与广西之间的交通运输孔道狭小梗阻如故，上海对广西的辐射，主要仍不可能通过湘赣过道顺畅入抵。上海的崛起，确实也对广西产生了重要的辐射影响，如它凭借着在全国南北居中、东牵西连的有利地位和强大的枢纽组织功能，建立起了东北、华北、华东与广西的较密切的市场联系，促成了这些区域与广西之间频繁的大宗货物对流，造就了明清时期所未有的大宗货流新格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主要不是借道湘赣省区由北而南纵向进行的，而是借道广东省区，由东而西横向进行的——通过运输成本低、速率高的东南沿海海上航道，抵达香港、广州，再由港穗溯西江和走南海西段航线输往广西。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北货、沪货的南来，桂货大宗的北往均走此路。如 20 世纪 30 年代广西贵县颇为畅销的上海布（上海民族纺织工业的产品）就是由穗港中转销入的。<sup>①</sup> 又如广西主要销入华北各地、天津、宁波、上海、青岛的食糖，销往华北、东北的八角等，都是先下穗港，再由穗港输往上海，终由上海组织分销的。<sup>②</sup> 也就是说，近代上海的对广西辐射大都必须与香港、广州联轴传动，中转完成，上海的对桂辐射进入南部沿海以后，完全与广东、香港对桂辐射叠合。所以，尽管上海的崛起确实夺走了原属广州辐射范围的江西、湖南各省的大宗商业货流，分割了作为华南总中心城市广州的辐射能<sup>③</sup>，但是它对广西方向的辐射则又强化了广东对广西的商品经济辐射，这也是环广西地带具有商品经济辐射能的湘赣两省同广东所不能比拟的。

---

① 梁澜贵：《贵县棉布销售史话》，《贵港市文史资料》第 17 辑，第 159 页。

② 潘载生等：《广西大宗出口贸易调查报告》，民国 22 年版，第 23—24 页。

③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63 页。

这就导致了第一章已论的局面：在近代广西商帮系统的等级位序中，粤港商帮居首位，湘赣闽等商帮为第二等次，作为商品经济辐射接受省区的广西，本省商人为第三等次，而作为广西的商品经济辐射源地带的非邻近省区或者环广西的非商品经济辐射原地带省区（与广西无梯度差的省区），前者诸如浙江、福建等省，后者诸如云南、贵州等省区各省商帮，只能位居第四等次。

由于从广东到广西之间有着湘赣等省所不可比拟的“一江一带”（西江水系航道和南海沿海航道）为纽带、渗透广西80%以上面积的江海交通孔道，也由于广东域内连贯广西的西江是包括北江、东江等广东所有珠江水系河流中流量最大、航道最长的主干大川，千吨火轮可从广州直到梧州<sup>①</sup>，而连通广西北部湾口岸的沿海航道轮运更无吨位的限制，广东、香港地区对广西地区，这种近距、直接、覆盖式近乎一体化的交通孔道优势，又使粤商在桂工商全局中的地位不仅仅是首位商帮地位，而且还被交通优势进一步放大为主位商帮地位，从而导致了广西城镇尽管同时并存着许多商帮竞争营生，但粤港商人始终成为城镇经济中的主要商业人群，始终保持着由粤商执掌经济牛耳的“无东不成市”格局。

## 第二节 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地区城镇经济行业的 相对充分发展与粤商对广西城镇经济 主干行业的营造

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地区既为全国的经济技术发展高梯度地区，它在城镇经济中的表现，必然是各个行业相对充分地发展，而正是粤港城镇行业相对充分地发育所形成的梯度推移，构成了

<sup>①</sup> 陈福文等编：《中国商业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页。

更为辽远的区域经济原因，从广西的域外，遥控般地铸成了第三章所论的广西城镇经济主干行业的发育主要由粤商推进完成的历史格局。

### 一 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地区城镇经济行业的充分发展和梯度推移力的形成

近代粤港地区经济发展的高梯度与城镇行业的较高度发育当然是互为表里的。具有近代型经济增长极意义的口岸如笋般竞立，商埠聚落规模的巨大，形成了城镇行业发育的最佳区位；较大的货流密度尤其是进出口贸易流量的特别巨大，提供了城镇行业发育所不可缺少的丰富货源和工贸机会；侨资侨汇的巨大份额，给城镇行业的发育和运转注入了无可比拟的资金活力——这些因素都促使了粤港地区城镇经济行业获得相对充分的发展，并在全国始终居于最高或领先的水平。下面我们分行业考察。

#### 1. 进出口行业

作为全国最大的口岸地区之一，近代粤港地区城镇进出口行业获得最为突出的发展，并始终居于整个城镇行业系统中轴心行业和龙头行业地位。从1842年广州被迫开放为通商五口之一和香港被英国强占、宣布为无税自由港开始，广东城镇经济行业经营的主要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辐射本地生产的农副手工业商品为主变成了中转外国进口的资本主义大工业产品即洋货商品为主，从向内地内陆省区内销省内及国内产品为主转变为向国外出口农副矿业等原料产品为主。经营方式也由清代十三行（即公行制度）垄断的半官营模式转变为民间（不分国籍）的普遍自由化模式。近代粤港进出口行业的突出发展中，又以外国资本的洋行和委托粤商的代理行的发展最为显著，实际上，整个近代，该类行口构成了粤港进出口行业的核心部分，执掌了粤港进出口贸易的命脉。如1847年英国渣甸洋行迁入香港，初期只经办出



口货，后又兼办船务，成为香港首屈一指的大公司，次年，设在香港的外国商行又增至大小各十多间<sup>①</sup>，初期洋行增加速度如此快，可推知整个近代香港当为全国外资商行公司代理行最多的口岸，是近代中国进出口行业的最大中心之一。如前论所举，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进出口行业所组织的进出口业务量，一般情况下都高于中国另一大总中心城市上海。<sup>②</sup>这说明香港的洋行聚集规模，也在有“中国经济中心”之称的上海之上。据李康华等主编的《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记载，美国向中国倾销火油的德土古火油公司，油库“以香港的为最大，贮量最多”，总的规模和容量都比在广州的油库大四分之三以上。另一最重要的口岸广州，虽然远远逊色于香港，但是，与内地口岸相比，所集聚的外资进出口商行在全国也是数量最多和规模较大的。如甲午战争前后一段时间，广州老洋行进一步扩充，新洋行纷纷设立，麇集于列强在广州的据点沙面。著名的洋行有13间，号称外资“十三行”，它们是：英国办的怡和公司（J. M. & CO. Ltd）即渣甸公司，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 Ltd），天祥洋行（Dodwell & Coltd），泰和洋行（Reisy Bradley & Co. Ltd），洛士利洋行（Loxeley & Co. Ltd），卜内门洋碱公司（the IMPERIALC, Chemistry Industries Ltd，简称 I. C. J），时昌洋行（T. Ghifith & Co. Ltd）；日本的三井洋行（Nissen Kissen Kaiza）；德国行商办的礼和洋行（Carlowity & Co. LTD），鲁麟洋行；丹麦人办后由美国商人接办的慎昌洋行（Anderen Mylher & Co. Ltd），美国行商办的旗昌洋行（Swormtond & Co. Ltd）；国籍不详的免那洋行（John Manners & Co. ltd）。除13家主要洋行外，

---

① 丁又：《香港初期史话》，三联书店1958年版。

② 程浩编：《广州港史》（近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7页。同时参阅本书前页关于近代香港与上海比较的有关数据。

还有其他一些外商开设的洋行和专业公司，如英国商人开设的还有棉华洋行、亚细亚火油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等，法商开设的有余洋行，德国商人开设的瑞记、吻嗜氏、味地、些喇、山打、高枝、提成等洋行，美国商人开设的美孚火油公司、德士古火油公司、域琴偈油公司、通用电器公司、夏巴洋行等，荷兰行商的好时洋行以及瑞典、波斯（伊朗）、阿富汗等国商人的洋行等。<sup>①</sup>怡和洋行对广州港和其他商埠的进出口贸易居于垄断地位，其业务范围，从进出口贸易到铁路、轮船、码头以至金融、保险、地产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在出口方面，该行设有茶叶部、生丝部、中国土产出口部，网罗了从华北到南方的土特产，如桐油、猪鬃、皮毛、茴香、肉桂、生姜等。在进口方面，该洋行运到广州和其他通商口岸倾销的商品，从机器、路矿器材、纺织品、木材、五金到日用消费品、奢侈品无所不包。<sup>②</sup>礼和洋行是德商1845年在广州开设的，后改组为美国商行，1920年时，“广州电灯公司电力厂所办各种机件，广州全城电灯之电力由其供给”，“粤汉路粤段……广州汉口间一段，所用测量器具以及建筑用品均由香港、广州两分行供给”，此外，“香港分行与广州分行售出冷藏机与造冰机亦为数颇巨”<sup>③</sup>。美国的亚细亚和德士古三家火油公司，均属当时有名的世界性托拉斯组织，广州港进口火油的贸易，几乎全部为该三家洋行所垄断。<sup>④</sup>这些外国公司和洋行在华实力之雄厚，是当时包括粤商在内的华商所无法与之竞争的。但是，这些公司洋行在华的业务运作，又主要是依赖所

---

① 冯翰伯：《广州沙面洋行忆旧》，《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黄孝宽：《英帝国主义侵华企业怡和公司》，《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

② 程浩编：《广州港史》（近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页。

③ 林金枝、庄为玘：《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第一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④ 程浩编：《广州港史》（近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

雇用或委托的华员华商进行的，它们在华尤其在粤港地区造就了一支环绕服务的庞大的买办商人队伍。欧美工业品大宗输华以及以此为先导所组织的市场对流和商品经济辐射，是长距离跨洲的远洋辐射。在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前，从英国的曼彻斯特抵达中国，单程就需90—135天<sup>①</sup>，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也仍需许多时日；另外，欧美日本等商品经济辐射又属于全球性辐射，如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的商品辐射地遍及欧、美、非、亚、大洋洲，有“日不落帝国”之称。以其不多的人口基数和如此多向的货流细分，他们的商人不可能一一包揽所有的进出口购销过程，而只能借助当地商人为主力代为营销，虽然外国行商会始终保持主导、操纵的地位，却也只能将营销的代理权、终售权和土货初办权交给华商，尤其是交给在他们看来“性质之活泼、知识之灵敏、营业心之坚忍、同工业之熟练，实于支那人别开生面者”<sup>②</sup>的粤港商人。所以，无论是香港还是广州，外国公司洋行的雇员和代理商，仍多系粤商。当时外国商人已意识到“外国商业及实业之在中国者，终有归华人管理之一日”，如英美烟草公司“管理权，全握华人之手……间有外人充职其间者变不过顾问资格而已”<sup>③</sup>。在内地开行店倒往往采取委托制，如在汕头，外商常常是“让一位有地位中国店主负责主持”<sup>④</sup>。即使在英国殖民当局直接控制而洋行最多、进出口贸易规模最大的香港，也如前文所举，华商是最大的财产拥有者，支付着香港收人的百分之九十。<sup>⑤</sup>笔者认为，尽管粤港地区外国经营进出口业的公司洋

---

① 聂宝璋：《1870年至1895年在华洋行势力的扩张》，《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② 织田一：《中国商务志》，蒋方译，1902年印行，第31页。

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 同上。

⑤ G. B.：《香港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77页。

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产物，其资本的所有权终归外资，营销利润的最大宗也终归外商，但这毕竟发生在主权国家中国的领土上，且主要由中国商人具体操作，所以，洋行丛集及买办商人（实为挂着洋行牌照的中国进出口商）兴起，仍然应视为近代中国城镇经济行业发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国家主权受到破坏但仍保存的历史条件下，粤港地区进出口行业的重大发展。另外，粤省本省商人也纷纷独资开办进出口行店，特别是部分侨商和原来充当买办的商人，他们在积聚了一定资金，交结与外国商人的业务联系，掌握了进出口贸易的基本规律之后，也转而独资另立，一般不再打洋行招牌。如 20 世纪 30 年代汕头市出口商，以采办潮州土货及国内各地产品运销南洋各地为营业，按贸易地域分为南商和北商。按经营货品类别又可分为酱园和果业等，其中以南商（或称南部）营业范围最大，规模最大，出口地域遍及安南（今越南）、马来亚群岛、南洋荷属各岛屿及香港等地，1933 年开设商号共有 54 家，每家一年营业额达 30 万元至百余万元，至 1935 年汕头进出口商至少 202 家。<sup>①</sup> 外国公司、洋行在粤港的林立，加之侨资和部分买办或其他身份来源的粤商投资开业，独立经营进出口行业，造成了粤港进出口行业在全国范围中的突出地位。

## 2. 经纪、百货洋货批发零售行业、土产收购行业

进出口行业充分发展又直接推动了经纪、百货、洋货批零行业及土产收购行业的相对充分发展。在进出口贸易推动下，粤港当地城乡的商业交易也日趋活跃，进口货大部分从口岸销往各县城乡以及广东以外地区，出口货中农副业手工业产品，则从各地城镇圩市汇集到口岸城市，是故，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又促进了城

---

<sup>①</sup> 洪松森：《潮汕近代工商业述略》，《广东文史资料》第 70 辑；参阅黄促渠编《潮州志》实业志 6。

乡各地商品流通量的增长，从而推动了各地商业的发展。

百货、洋货行：1920年，仅广州一市，以销售外国工业制品为主的“华洋杂货店”就有605家。<sup>①</sup>广州市百货业分为批发业与零售业两种。批发商绝大多数和广州沙面的洋行发生贸易往来。直接和外国厂方订货输入者为数较少，一般批发商都向洋行订购百货，然后分销广东省内外；由于舶来品的百货都控制在洋行手里，广州的批发商只是居于第二手的地位。至于零售商，大型的主要与香港有直接联系，一方面从香港输入舶来品，一方面从上海等地批发商购来商品供应本市。大型的以洋货零售为主，中型的洋货国货并重，小型的以经营国货为主。粤港百货、洋货业无论是资金实力、行店数目、组合方式、管理方式和设施的现代化程度、经营规模，在全国范围看也都居于领先水平。如1911年由澳洲粤籍华侨在香港创建的先施有限公司，以股份制方式集资，额定资本为港币1000万元（约合粤币1317.5万元）<sup>②</sup>，每股港币10元，合计100万股。在香港政府注册称为总行，分支机构遍及国内各大商埠，在澳门、广州、上海、武汉、哈尔滨、济南等地设有分行或办事处，在伦敦、东京也设有办庄，主要经营百货销售，统办环球商品，推销华洋什杂，兼经营水火保险、人寿保险、化妆品厂等，为全国百货行最大的企业之一。该公司1914年在广州市设立的分公司——粤行即广州先施有限公司，拥资100万元港币，约合粤币131万多元<sup>③</sup>，是当时广州市和华南最大的百货企业之一。该公司主营百货，兼营大酒店、汽水、化妆品、玻璃、铁器、皮鞋、饼干等各类工厂，同时

---

① 引自王水《二十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经济史》1987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

② 林金枝、庄为玘：《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8、543—571页。

③ 同上。

兼营保险、信托银行，拥有广州当时最大的五层百货大楼，楼顶还开办有大型的综合性先施天台游乐场，演戏放映，招徕顾客，还在沪、港、澳等城市联网发行“礼卷”，扩大零售收入等等。粤行在抗战前职工多达500人左右。此外，中山籍澳大利亚华侨开设的大新公司、永安公司、美华公司也为广州乃至华南最大的百货零售店，大新有职工500人，美华有职工200余人。这些百货公司总部都设在香港，资金雄厚，如香港大新总公司1958年时资金达港币800万元。这些公司一般都凭借自身较高信誉兼营储蓄业务，如1920年永安公司吸存港币六七百万元，先施公司吸存三四百万元，大新公司也吸存有二三百万元，既方便和吸引顾客，也为自身发展获得大额周转资金。<sup>①</sup>以上所举的港穗例子，都具备了股份组合、跨国跨省经营、联网经营、多角化经营等现代商业企业的若干特点，在全国百货业中也是罕见的，基本代表了当时全国百货行业发展的最高水平。

土产购销行：近代广东土产购销行与出口行业关系十分密切，常常难分彼此。大致有两类：供应欧美等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原料产品的收购行和供应东南亚、南洋群岛众多华侨的消费市场的手工业制品收购行。第一类典型如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茧栈，该行业专事替丝厂加工出口丝品、收购蚕茧原料，随着生丝出口在广东外贸中生命线地位的形成，茧栈在珠三角地区大小圩镇中大量兴起，如1920年仅顺德县容奇、桂洲两个圩镇，就共有茧栈184个，大茧市3个。<sup>②</sup>茧栈的购销业务量极大，如容奇，其茧市年贸易额竟高达700万至800万元之巨，蚕栈业旺季时，每时由广州运往容奇支付丝款的白银达30万元，以至容奇有“小

<sup>①</sup> 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8、543—571页。

<sup>②</sup> 参见吴振兴《近代珠江三角洲机器缫丝业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金山”之誉。<sup>①</sup> 第二类收购行业可说是侨乡广东所独有的，一般也多为粤籍侨商经营。如潮州茶叶购销行颇为典型。潮州凤岗乡盛产茶叶，潮州侨商旅居泰国、越南等南洋各国以后，仍保持着嗜茶习惯，对家乡凤岗茶叶有着大量需求，于是，从1907年起，潮州侨商返乡开设茶叶购销行多家，资本规模一般达15万银元，专事收购凤岗茶叶运销南洋一带供应华侨消用。<sup>②</sup> 江门经营烟、茶拥资400万元的朱有兰公司<sup>③</sup>，广州的万隆兴行<sup>④</sup>，经营大埔碗及柴炭竹，集资100万元的万川公司<sup>⑤</sup>，收购佛山、广州土布出口的广州某实叻庄<sup>⑥</sup>等等，都属于此类情况。东南亚各国家和地区是明清时期即已形成的广东商品的传统国际市场，至20世纪50年代，那里留居着粤籍华侨多达7484661万人。<sup>⑦</sup> 尽管这些国家地区自近代以来也受到西方工业品倾销的冲击，但由于习俗上的原因，华侨仍始终对祖国土产尤其是家乡广东土产有巨大需求，这使广东在近代始终拥有全国其他省区所没有的一个巨大的土产市场，刺激着广东土产收购行业较快发展。

### 3. 金融行业

在近代资金市场形成的基础上，新式金融行业兴起，旧式金融行业银号业、典当业也获得新的发展。1847年香港出现了东方汇丰银行，随后，外国现代银行逐渐在港穗纷纷建立，雇用不少粤人为职员。19世纪60年代以后，也有一些侨商建

---

① 参见吴振兴《近代珠江三角洲机器缫丝业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② 1959年6月《汕头专区华侨企业调查报告》。

③ 1959年《江门专区华侨企业调查报告》。

④ 据1959年3月广州市工商联座谈会汇录材料。

⑤ 据1959年3月《潮梅商会联合会半月刊》第1卷3、4期合刊，第14页。

⑥ 见1940年《经济研究》第1卷第1期。

⑦ 据林金枝、庄为玳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第31页，《广东海外华侨分布地区及人数统计》所列20世纪50年代各年份数据统计。

立华侨银行，但由于举办现代银行需要特别巨大的资金实力和对西方的现代银行制度规程的熟悉，粤商的金融投资仍不能主要投向现代银行的建立和经营，而只能主要集中在具有传统经验的侨批业、银号业和典当业方向。侨批业是指专门经营侨汇承接业务的行业，性质类似于汇兑银行，它是我国最大侨乡广东的“特产”金融行业，其店号机构即所谓华侨批局（外国人称之为汇兑店）几乎全为粤籍华侨所开设经营，业务上与南洋、美国等国华侨在当地举办的批信局联网运行。约在1890年左右，汕头、广州、海口、江门等市就产生了侨批业。从1862—1949年间，广东全省华侨投资与侨汇有关的金融业多达1005家，投资额40299969元，平均每年的投资额为462067元，每户平均投资数为40090元。<sup>①</sup> 侨批业业务额巨大，在尚未计入香港数据的统计中，1926—1936年间主要通过批信局接揽的海外汇往广东的侨汇平均每年“达2亿元（粤币）左右。实为广东收入之大者”<sup>②</sup>。香港数字尚未掌握，然而，由于多年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与汇兑上的习惯，香港一直是侨汇主要的清算中心，可以断定，香港更是批信局最主要的集散中心。如星逻（今泰国）款汇汕头，几乎完全经由香港潮汕帮调拨。其他各地汇款亦大部分先汇至香港。在国币跌价时，款汇香港的数额更大。香港接汇的批信局较大的有：余生兑药局接新加坡汇款，丘元荣行接巴达维亚汇款，许福成汇庄接曼谷汇款，益华行接西贡汇款，友联行接马尼拉汇款等等，都有很繁盛的业务。<sup>③</sup> 据1950年1月23日《香港金融时报》公布的数据，从1912年到1948年的36年间，全国历年侨汇总值高达

---

① 1959年《广东华侨企业的调查报告》。

② 黄文滚：《华侨与广东经济》，1937年《华侨问题》专号。

③ 《批信局侨汇业务的研究》，《广东省银行月刊》1947年第3卷第8期。



24.67 亿元（美元）。按广东占 50% 计<sup>①</sup>，这 36 年，主要经批信局接揽的广东侨汇总值高达 12.335 亿美元，平均每年多达 3426 万多美元。近代广东银号业的发展既同侨批业的蓬勃发展、接揽侨汇数额的巨大有密切关系，也与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的突出发展关系十分密切。巨额侨资的返粤促使不少侨商投资这种略具某些新式工商银行特征，能使资金增值的行业。如 1931 年广州银号有 540 家，资本 700 万元，平均每家资本 12962.96 元，“华侨约占一半”<sup>②</sup>。珠江三角洲地区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则是广东该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市场温床，素有广东外贸生命线之称的丝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对银号业发展促进尤其大。据吴振兴先生研究，20 世纪初，广东的银号主要是由丝业中心的顺德、南海一带商人及侨乡四邑一带商人经营。随着蚕桑、生丝生产规模的扩大，在专业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桑、茧、丝数量不断上升，货币流通量激增。每当蚕茧、桑叶、生丝上市时节，由广东运往顺德各属的现银，每月多达上千万元。甚至广州银行的 80% 以及其他城镇各项生意都靠顺德蚕丝业中的资本周转。1924—1929 年，广州银号最多时有 300 多家，从业者达 5000 人，其中顺德人占大部分。前面所举 1931 年广州银号 540 家中，顺德、南海人（含华侨）所控制的就有 340 家，占 60%。在顺德仅容奇一个圩镇，就拥有各类银号近 50 家。<sup>③</sup> 侨批业和银号业是近代广东民间信用最普遍的主要行业，它们的高度发达，反映了整个广东金融行业在全国的领先水平 and 独特的地位。

---

① 参见《广东文史资料》第 70 辑，黄文濠先生估计广东侨汇额占全国侨汇总额的 50%。

② 《民国日报》（广州），1935 年 1 月 5 日。

③ 吴振兴：《近代珠江三角洲机器缫丝业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91 年第 5 期。

#### 4. 新式工矿业、商品性手工业

近代广东该两类产业的发展也始终居于全国的领先行列。众所周知，学界通常当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诞生标志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就是1872年南海籍南洋华侨陈启源返乡创建的。<sup>①</sup>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书的洪仁玕《资政新篇》折射的香港情形看，那里的粤籍华商民族工业的诞生时间可能更早。至1899年，广东“机器缫丝业分设内地，约计有二百家”<sup>②</sup>。1906年，日本人对广州附近机器缫丝厂作过调查，能具列出厂址、厂名、工人数目（200—800人不等）的就有174家。<sup>③</sup>机器缫丝工业是广东独有的优势工业，仅此一类已在全国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地位。而在其他各类民族工业和商品性手工业中，广东的发展也居于全国领先水平。据1912年农商部统计，当时广东有2426家工厂，其中织造工厂类413家（包括制丝、织丝、织物、刺绣、成衣、染坊及漂洗、编织等厂），机械及器具工厂类189家（包括机器制造、船舶车辆制造、器具制造、金属品制造等），化学工厂类1154家（包括窑瓷、造纸、制油、制蜡、制漆、火药火柴、化妆品、染料颜料、香烛等厂），饮食品工厂类560家（包括酿造、制糖、烟草、制茶、制盐、汽水及冰糕点、碾米等厂），杂工厂类109家（包括印刷刻字、纸制品、竹藤柳制器、毛皮革制品、玉石牙骨介角制作等厂），电气厂1家。<sup>④</sup>这些工厂又分为使用机器动力的工厂和不使用机器动力的手工业工场两类。在1929年的统计中，广东无论工厂数还是使用动力的工厂数，都高居全国各省首位。如该统计中，广东2426家工厂，使

---

① 陈天杰：《广东第一间蒸汽缫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源》，《广州文史资料》1963年第2辑。

② 光绪二十五年《关册》。

③ 《清国事情》（日文，1908年）第2辑，第771—786页。

④ 《中华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商统计表》（1915年刊行）。

用机器为动力者 136 家，共拥有动力（蒸汽机、电动机）4566 马力；列入该统计的，全国共有使用机器的工厂 363 家，共拥有动力 24544 马力，广东一省即分别占全国该两项的 37% 和 19%。<sup>①</sup> 如果将广东机器缫丝业的较全面的数据和香港的民族工业考虑进去，这组比例数据当会更高。还在 1899 年，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奏折中已指出了广东工业、手工业在全国的领先状态：“（广东）工商两项，较他省为盛。近年风气大开，有以机器仿制洋货者，有制土货专销外洋者，造作日精，行销日广。”<sup>②</sup>

### 5. 新式交通运输行

在该行业发展方面，近代的广东也遥遥走在全国前列。江海航运方面如前文已举。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香港进出商船的艘次和吨位竟分别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 2.04 倍和 1.76 倍，可知香港的航运行业的发育，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全国最高水平。广东最大城市广州，航运行业发展虽然远逊香港，但 1932—1936 年间在香港未参统计的全国各埠中，它往来外洋及国内商船总吨位数仍名列前茅：1932 年总吨数为 8351202 吨，占全国各埠总吨数的 6.17%，居全国各埠第二位；1933 年为 7102493 吨，占全国各埠总吨数的 5.17%，居全国第六位；1934 年为 8751810 吨，占全国各埠总吨数的 6.23%，居全国第四位；1935 年为 9335938 吨，占全国各埠总吨数的 6.48%，居全国第四位；1936 年为 8338972 吨，占全国各埠总吨数的 5.75%，居全国第五位。<sup>③</sup> 由此可见，广州仍不失为全国航运业最发达城市之一。公路汽车运输：1919—1923 年，广东全省开筑公路 2 万多里；至 1935 年，广东公路里程已居全国之冠，在全国率先形

① 《中华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商统计表》（1915 年刊行）。

②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4301 页。

③ 根据档案：1932—1936 年《中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

成了以省城广州为中心，纵横省内东西南北的汽车运输公路系统。<sup>①</sup> 清季，铁路运输业也在广东起步。20世纪初年，广东先后成立了三个铁路公司，即潮汕铁路公司（1903年成立），新宁铁路公司（1904年成立），广东全省粤汉铁路总公司（1906年成立）。至1913年，分别建成潮汕铁路42公里，新宁铁路104公里，粤汉铁路由黄沙至沙口站176公里；另有广九铁路广州至深圳段143公里，广三铁路49公里。<sup>②</sup> 晚清民国时期广东铁路运输业的地位虽然不及航运、汽车运输业在全国的地位那么突出，然而也仍属于全国各省中较高的水平。如广东全省粤汉铁路公司计划集股2000万元，到1911年实收股金1513万元，是当时广东乃至全国最雄厚的民族企业之一。<sup>③</sup> 它的创办者是广州商务总会、七十二行、九善堂<sup>④</sup>，各行业都各认股份，在广州以外则由当地商会负责招股。它开创了国内商人赎路自办的先例，我国最早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南海人）曾任该公司总经理兼工程师。<sup>⑤</sup> 同对其他工商行业一样，粤籍华侨对广东交通行业投资巨大。从1862—1949年间，广东华侨投资交通业包括铁路、行车公司、交通运输、码头及轮船业，总投资户数242家，投资总额计人民币43469944元，每年平均投资476666元<sup>⑥</sup>，成为省港交通运输行业总体保持全国领先水平的独特的重要支柱之一。

以上分行业考察表明，相对于全国大多数省区，粤港地区

---

① 参阅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交通部、铁道部等编委会：《交通史·路政篇》第12册，民国24年版，第4571页；第13册，第5003页；第16册，第283407页。

③ 参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963年第3册，第1149页。

④ 《宣统二年农工商部统计表》。

⑤ 徐启恒、李希泌：《詹天佑和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页。

⑥ 林金枝、庄为玠：《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页。

城镇行业发育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率先、创新。从时间上看，粤港行业总是最早或率先起步发育的。从态势上看，粤港行业总是处于主动创新、更新、添新、不断求新的连续过程中。在全国经济行业整体中，总是构成创新源泉部分，俨然一创新的母体。典型如 19 世纪 70 年代诞生的广东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其二，成熟、饱和。从成熟性看，粤港行业总处于投资金额高，集聚密度和经营规模大，行种门类齐，形式水平高、科技力量强，投资经营实体多元，外资、侨资、内资（国内资本）荟萃，市场开放度大，行业间配置循环关系和谐，致利机制良好而稳定等发达状态，这些都是全国大多数省区所无法相比的。从饱和性看，粤港行业又总是与广东、香港的有限地域面积发生矛盾，行业成熟发达同时又总是伴随着域内行业过密、竞争过剧，需向外域分流的趋态。这两个非同寻常的特点，使粤港城镇行业具有较之其他一般省区更为突出的外拓发展能量：它的创新性，总能使广东环围区域对粤港城镇行业产生最强大的引进“拉力”，不断吸收在粤港行业发育的现成成果，如现成的科学技术、行业形式、经营管理模式，现成的市场信息、条件等等。而它的成熟饱和性，使粤港行业总能处在高梯度上向外推移拓展中，总能居于饱和内压之中，向外分泌过荷，两者相合，总能形成向外围经济低梯度区寻找新的成长空间的最强大的自我“推力”。这一“拉”——“推”，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充分发展的粤港城镇经济行业，以香港、广州为轴心，向环广东乃至更大范围的地域强劲外拓，而又不断逆向返趋的商品经济辐射动态回环。

区域经济学认为，梯度发展总是有着以下三种相互配置的效应同时在起作用的，即增长极总是优先发展、优先提高梯度的“极化效应”；增长极向低梯度推移扩散促进当地生产力发展的“扩展效应”；从低梯度区中赢取利益最大宗，从而扩大自身与

低梯度区两级分化的“回程效应”。<sup>①</sup> 根据这一理论，经济发展高梯度区的经济行业的现实存在、运营空间，不仅仅株守于增长极原地，而且还包括了扩展、回程效应发生所在的域外相关地域，因此，处在经济发展高梯度区的粤港行业、粤港本域行业不过仅仅构成了其“极化”部分（通常说为核心部分），其发展最充分、规模最大；它的“拓展”和“回程”部分，则程度不同地分布在广东省外相关的广阔地域中，而作为粤港地区有江海孔道贯通的近邻广西，自然是粤港行业“扩展”和“回程”部分所布往的最重要的省区。

## 二 充分发展的粤港行业强劲推移扩展与粤商对广西城镇经济主干行业营造

很显然，正是充分发展的粤港行业向同属珠江水系的邻省广西的强劲推移扩展，造成了粤港客商以无可比拟的势头源源入桂，并铸就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经济主干行业主要由入桂粤商营造的局面。

### 1. 粤港行业的同行种推移与广西城镇主干行业的发育

近代广西城镇各经济行业首先是粤港行业同行种向广西拓推移发育的结果。

(1) 进出口行。19世纪70年代以后，主要由粤商创建和经营的广西进出口行业，实质上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香港、广州形成和获充分发展的进出口行业向广西的推移。如1948年广西梧州以粤商占绝大多数的68个进出口商会员行店，全部是与驻香港的外国洋行、代理行、厂商直接发生业务往来关系的：1941年创立的梧州北发行，就是香港利兴行、美国摩士洋行华

---

<sup>①</sup> 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143页。

南总代理香港公利行的进口货物在广西的批量分销业务网点；百和祥号（1921年成立）曾为德国嘉色融颜料厂驻港行口在广西的代理行；1946年创立的锡安行则是香港太子行在广西的分号，专为总行组织粤桂间进出口贸易，总部仍设在香港；1946年创立的志诚行，店东原即为香港均易、新志利洋行高级职员，他们是在掌握了进出口行业经营的基本方法并积累了一定资金之后，到梧州自立门户的，其业务上仍主要同原两家洋行来往，也可以说是香港进出口行口衍生的<sup>①</sup>。无论与香港进出口联系是往来型、代理型抑或是分号型、衍生型，其基本性质都是香港进出口行业向广西的同行种推移扩散。

（2）百货行、洋货行。19世纪70、80年代以后形成规模的广西百货、洋货行业，也是粤港地区城镇19世纪40、50年代已形成的百货、洋货行业在先期发育三四十年以后，在外国工业品倾销不断增加的挤压下，向广西地区的自然推移。广西该行业主要货源是粤港行业提供的，如桂林百货商行，货源通常从广州百货行大批采购，“终年往来，络绎不绝”<sup>②</sup>。据1959年4月的百货商老行号材料记载，解放前广州市百货业在向洋行订购百货以后，一般省外主要分销向桂湘鄂三省区<sup>③</sup>，广西当为主销省区。货源地区全在穗港，广西百货洋货行本身当然只能是粤港行业的延长。正是作为广州百货行业的延伸，广东罗定商人在南宁、平乐、梧州、大新、武鸣等地经营的百货行业生意才特别活跃，垄断一方。广西城市一些较大的百货商店，往往就是粤港百货业行店的支店。如南宁大新百货店，就是广州大新百货公司在南宁设立的支店，而该公司总部设在香港，是华南乃至全国最大的百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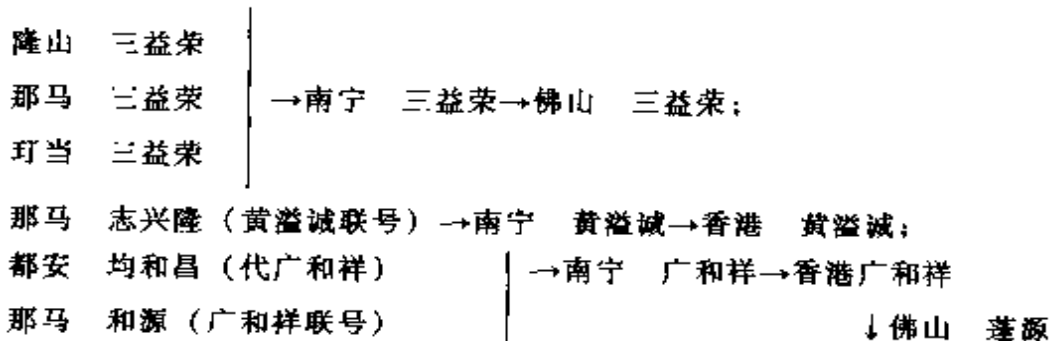
① 民国37年9月《苍梧县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会员调查表》。

② 李常光：《桂林百货简史》，《桂林文史资料》第13辑。

③ 林金枝、庄为玘：《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3页。

公司之一，为澳洲中山籍侨商蔡昌等集股开办<sup>①</sup>，若将三者相连，可组成一个典型的百货业推进图式：香港大新百货总公司→广州大新百货公司→南宁大新百货支店。洋货行同样如此。如前文所举的广西贵县城区，光绪年间佛山人开设的悦兴号花纱布匹店，业务往来最密切的是广州佛山客商，店号本身也常常提供宿舍给穗禅客商开设庄口。<sup>②</sup>这一类情形中，粤港行业推移与粤商对桂行业的营造完全是同一过程、难分彼此的，粤港行业推移具体地表现为粤商对广西行业主干的营造。

(3) 农林土特产收购行。近代广西农林土特产收购行也是广东土货收购行，为满足粤港口岸不断增大的出口需求，沿江海孔道西向的自然延伸。例如，自光绪年间直至20世纪30年代，主要由粤商把持的都安、马山、隆安三县（时称都安、那马、隆山县）的纱纸收购行，若将各商号从属关系程程东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行业的粤港来头：



都、那、隆以上各商号业务最终是受穗、佛、港联号或总号操纵支配的，与穗港纱纸庄存在着某种子母关系。黄溢诚、广和祥在香港的总部本身就“向为香港纱纸庄的巨擘”<sup>③</sup>。又如百色，1951年3—12月间，粤商颜佐荣合股开设的山货收购庄华记号，

① 黎照寰：《华侨资本的五家银行》，《广州文史资料》1965年第1辑。

② 广西通志馆档案卷961。

③ 刘炳新：《都那隆纱纸工业》（民国）广西统计局《统计月报》第1—8期合订本。



本身就完全是粤商资本拓入广西的产物，见下表：

表 4-2 1951 年 3—12 月百色城华记号各出资人股金、地址表

单位：万元

出资人	籍贯	各股金（人民币）	现住址
关义和	广东	7091	南洋庇能埠宋犬巷 30 号
梁惠金	广东	3737	广东佛山福贤路由义里 1 巷
梁兆祥	广东	5389.84	澳门庇山爷街 39 号
颜佐荣	广东	709.1	百色城东宁街 9—10 号
江蔚文	广东	1897.1	广州小新街 194 号
江彬	广东	1418.34	广州濠祥街 333 号
江锡	广东	1897.1	广东南海县西隆乡
江继	广东	1897.1	广东佛山适安里 6 号

该号原始资本白米 10 万斤，以 1951 年 3—12 月的币值，固定资本为 6200 万元，流动资本 2 亿零 800 万元，经营山货加工制作牛皮等，主要货源购自百色，销往广州诸地

资料来源：1951 年百色镇工商户注册登记表。原件存百色地区档案馆。

这是 1951 年百色城一家广东商人的商号注册登记的合股人的地理分布情况。该号合资人共 10 名商人，值得注意的是，只有颜佐荣定居在百色城东宁街 9—10 号，其余股东都不居住百色。其中，最大的股东是南洋粤籍华侨商人，第二大股东是澳门粤商，第三大股东是佛山商人。定居百色的颜佐荣只是最小的股东。所以，该山货收购行店显然是广州、佛山、南海等地城镇山货行业在百色投资开设的收购网点。

（4）金融行业。典型如银号业。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地区城镇银号行业发展饱和，资金市场十分拥挤。1911 年以前，仅广州一市就有银号 504 家，顺德县容奇镇就有银号 50 家，仅这两地银号店数，就是 1933 年广西全省银号业总数 37 家的 14.9 倍（见前文），若加上其他埠市银号以及广东十分发达的

侨批业，两广之间金融业发展的强弱反差当会更大。广东银号业饱和发展，造成同业之间过剧竞争，致使广东地区内该业利息降低，以至于在广西，“梧州及邕宁之利息，一般较港粤为高，港粤银钱业视为资金运用之一条出路”<sup>①</sup>。于是，其游资主要经入桂粤商之手源源流入广西从而形成了广西初具现代银行功能的金融行业——银号业，而粤商当然成为该行业的营造主力。例如1934年4月成立的桂林惟一的一间银号裕益号，就是总部设在广州的裕国号之分号。一些居桂粤商也适应广东银号业业务分流的情势，投资举办银号业。如梧州粤商梁颂塘，19世纪末走私鸦片起家以后，于1899年投资金银3万多元，与人合作开设均隆银铺<sup>②</sup>，是为梧州乃至全广西银号业之始。入桂粤商举办的银号业虽然地点设在广西，但实际上无不是广东银号业的移位发展。就主要的业务功能而言，主要是为粤港商人从事的行业和广东的特货（鸦片）、花纱、盐等行业的交易服务的。如20世纪30年代，梧州24家银号（粤商创办经营的有23家）的业务比例是：放款——各银号放款于粤商为主举办的特货行、水面行、平码行者，当占放款总额之七成；存款——存款之最大户为广州、香港及梧州之特货行、花纱行与盐业行，约占存款总额的70%左右，据估计，广州约占四成，香港占两成，而梧州本市不过占两成。汇兑方面，也以汇往广州的资金为最多，占六成，香港次之，占两成，其他各埠两成。而汇兑业务一直占据着银号行业营业总额的七八成。正因为广西银号业资本周转多赖港粤挪移，一旦“广州银根短绌，挪用不易，且港粤银号类多紧缩政策，收回在西之存款”，

---

<sup>①</sup> 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等：《广西省经济概况》第四章，金融三部，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

<sup>②</sup> 《梧州史志》，《经济资料选辑》1986年。

梧州银号就难以应付而纷纷倒闭。<sup>①</sup>

(5) 新式工矿业。在这一标志着崭新的近代型生产力形成的产业中，广东与广西之间显然也存在着源流派生的关系。其一，近代广西新式工矿业中，不少厂家本身就是粤港总厂的分厂。如1937年9月梧州的兴华电池厂，就是广州兴华电池厂的分厂。<sup>②</sup>其二，不少厂家是广东厂家与广西人士（指人桂粤商）合股的企业。如1935年八步镇的“西兴和铁工厂”，就是广州协同和机器厂与广西矿商合办的。广州协同和厂是广州有名的大机器厂，自然在资金投入、机器设备、技术人员聘任、经营管理等方面，起着总支配的作用。<sup>③</sup>其三，不少广西厂家是广东厂家技术人员入桂，仿照粤港厂家经营范式，引入粤港厂家技术，投资设厂的。如解放前广西最著名的工业资本家之一左镜明先生，先后在梧州、南宁、柳州等城镇创办化工、皂药、印刷各类工厂20余家。究其身世，他原先就是香港先施制枧（肥皂）厂的技工。1920年他进入该厂学制枧，1922年3月来到广西，凭借所掌握熟悉的粤港厂家制皂技术、工序及经营方式，在梧州创办利成皂药厂。他所举办的这些厂家，从行业空间推移角度看，正是粤港各类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向广西的延伸发展。<sup>④</sup>其四，即使广西厂家厂主与粤港厂家无直属或人事的联系，也同样属于粤港工业的向桂推移扩散。如玉林振华电力工厂，其技术、机器均从广州厂家购来。<sup>⑤</sup>民国初年，苍梧县一带曾出现百余家机器缫丝厂，显然是以19世纪70年代继昌隆缫丝厂创立为标志形成的蓬

---

① 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等：《广西省经济概况》第四章，金融三部，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

② 钟杰生：《梧州工业史料片断》续二，《梧州文史资料》第5辑。

③ 见本书第二章第五节。

④ 根据广西工商联黄晓丰先生（1988年时约70多岁）收集整理。《左镜明传》的原始资料、资料原件均由曾任广西工商联副主席的左镜明先生亲笔所写。

⑤ 周肇天等：《玉林电业鼻祖——振华电力公司》，《玉林文史资料》第14辑。

勃发展的广东机器缫丝行业溯西江而上向广西推移扩散的结果。<sup>①</sup> 我们可以说，广西民族资本主义新式工矿业就是延伸入广西区域内的广东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

(6) 新式交通运输业。由于西江孔道和南海航道是将两广联成珠江流域同一地理单元的主要纽带，广西新式交通运输行业同样是延伸入广西境内的粤港行业，这在广西江海新式航运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前章已举，具有广西江河运输总枢纽地位的梧州，1909—1949年，在104家航商企业中，有38家总部或总公司设在香港和广州，占航商总数的37%，也就是说，近代梧州新式航运企业中，至少37%是香港、广州两地新式航运业的分支机构或分支企业，是总部仍驻粤港的粤商所建立的。<sup>②</sup> 这当然造成了粤商在梧州航商中占据过半的极高比重。由于航道上的一致性，广东航商还常主动带动入桂粤商合作建立跨越两广的共同的航运企业。如前文所举的近代北海头锰船海运业，就是由澳门航商联合抵北海的广府商人共同创建经营的，它是澳门航运业向广西海域的延伸。又如1907年底，在抵抗英国攫夺西江航运权的斗争中，“广州七十二行商人出面仿照日本邮船会社创办轮船会庄”，“希望将来轮船公司办有成效，则银行、畜牧、工艺诸大事业，不难登高一呼，四方响应”<sup>③</sup>。后来，“粤省七十二行”和“梧州七十二行”联合招股创立两广邮船会社有限公司，“置轮行驶内河及外洋各商埠”<sup>④</sup>。此种在粤港行业强劲推移下建立起来的两广联营企业，当然主要由粤商担当主角，支配全局。

限于篇幅，以上仅举几类。考察表明，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经济11类主要行业，可以说都具有粤港同种类行业向广西

① 谭汝南：《梧州工业史漫谈》，《梧州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3期。

② 据张子良：《西江航运兴替史沿革资料》（油印本）逐一统计。

③ 《粤商自治会函件初稿》（广州，1908年），第73页。

④ 《两广邮船会社有限公司招股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第2期。

西拓、发展的性质，或者说，它们本身就主要是延入广西境内各个城镇中的粤港同类行业。

2. 粤港行业不同行种在相互配置中交叉式推移与广西城镇主干行业的发育

近代广西城镇各经济行业，还是粤港行业不同行种在相互配置中交叉推移发育的结果。

(1) 广西经纪行。近代广西经纪行发展规模特大，它实际上主要是为粤港的土产收购行、进出口行商服务的，从这一角度看，它又是粤港诸行业在市场交叉刺激下形成的中介行业。粤港进出口商和土产收购商从穗港渗入广西，毕竟距离遥远、路途迢迢，市场时效要求有一种行为为之中途居间，利用常驻当地、熟悉人事等优势，代客找客、组织货源和沟通销路，实现货流的有效畅通。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及他们同乡圈中的部分人，自然首先转而举办这一性质的、主要为粤港各行业服务的经纪行业，并在该业中始终保持主营地位。如梧州经纪行是19世纪80年代广东的西南、南海、佛山、鹤山等客商到戎圩收购土产而刺激产生的，1897年梧州开埠后，又是专营土产收购和出口的广东办庄、洋庄、港庄涌入梧州收购各路土产以后，获得迅速发展的。<sup>①</sup> 民国年间，贵县最大经纪行店恒易号的靠山就是禅庄（佛山）、穗庄和港庄。<sup>②</sup> 民国年间，南宁经纪行帮甚至在1928年以后还增加了一个“香港帮”，专为香港进出口行店分销洋货、组织土货货源。<sup>③</sup> 广西经纪行完全处于总体上环绕粤港土产行进出口行服务的格局之中，是粤港该行业在广西的交叉式延伸。

(2) 广西农林土特产收购行。近代广西该类行业的发展也

① 陆冠芝：《平码行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梧州文史资料》第2辑。

② 郑开基：《贵县工商史概况》，《贵港市文史资料》第14辑。

③ 谭津：《南宁经纪行的兴衰及其内幕》，《南宁文史资料》第6辑。

可以从广东各个行业向广西的交叉推移发展中找到成长基因。如自清季至民国，梧州柴炭收购行的兴旺与粤港两大行业的兴旺直接相关。一是港、澳柴炭出口行。该行柴炭出口业务量不断加大，1921年以后，尤不断派员派船到梧州办货出口。二是清季以来蓬勃发展的广东珠江三角洲诸县市手工和机器缫丝业。该行业需大量柴炭用以烧炼、烤饼、烘蚕茧等。<sup>①</sup> 粤港两大行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广东对广西柴炭收购继而外销的巨大需求，从而支撑着广西梧州柴炭行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广西梧州的柴炭收购行业，是粤港特别发达的进出口和机器缫丝行业在梧州异种行业领域中的空间推移之一。又如至1927年到1937年合浦县的铁路枕木收购行——“福安公司”，完全是配置于广东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而形成的，它10年间收购运销的20万条枕木，全部供应给广东新宁铁路公司。<sup>②</sup> 因此可以说，广西农林土特产收购行总体上也是环绕粤港进出口行、土产收购行、民族工业行等各行业的业务服务的，它是后者各业向广西交叉式的推移、拓展。

广西其他各行业也都能从粤港各行业向广西的交叉推移发展中找到成长基因。如以加工出口、外销主导的广西商品性手工业行业，具体如梧州篱竹加工业、北海、百色牛皮制作业，桂东南桂圆、果干加工业等，订户多来自港粤，实为粤港出口行业向广西推移发展中的行业变种。又如广西的百货、洋货行，其外国及上海工业品货源主要是广州、香港进口行业批量进购再转而批发供应的，从这个角度看，它又是粤港进口行业向广西境内商品终售地带的延伸。

### 3. 广西行业的粤港属性与粤港商人的主营地位

以上考察表明：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形，近代广西城镇经济

---

<sup>①</sup> 参阅饶任坤、陈仁华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9页。

<sup>②</sup> 庞松暉：《抗战十年间合浦铁路枕木产销概况》，《合浦文史资料》第2辑。

各个主要行业，都是充分发达的粤港城镇经济行业向广西强劲推移、发展的结果。广西行业尽管由于距粤港地理距离的延长和人文因素的变化，也存在着由自身因素所导致的若干变异，但是总体上仍然是移植生长在广西土地上的粤港行业。其支配总轴心，始终是香港和广州。既是粤港行业的推移结果，广西行业当然主要由粤港行业向桂推移的主要实施人员粤港商帮营造。在广西经济行业总体环绕粤港行业作功的格局之下，其他商帮包括桂、湘、赣商帮当然也可参与经营，但是，任何省区的商帮都不能打破家乡就在粤港地区的粤商的地缘优势——在粤港人事最熟，亲戚朋友最多，关系最广，资金来源最丰富，市场信息最灵敏，行业宗祖范式最成熟，经验技术最先进，可最直接地摄取作为全国最大经济中心港穗以及国际上的市场传动能量——这当然规定了粤商在广西经济行业总系统中始终保持着主位商帮的地位。

俯视整个两广地带城镇经济行业规模的梯度分布状态，也可以进一步补证这一点。以下，我们比较几组数字：1909 年仅广州市城区共有商号店铺 27524 家<sup>①</sup>，汕头市 1910 年有商店 6000 多家<sup>②</sup>，而 1934 年广西最大城市梧州共有商店仅 2234 家<sup>③</sup>，仅为广州的 8%，汕头的 37%；1934 年广西 78 县所有商店数为 18961 家<sup>④</sup>，仅相当于广州一市商家数的 69%。清季，广东立案被征税的当铺 2000 间<sup>⑤</sup>，而 1933 年广西共有当押仅有 182 间<sup>⑥</sup>，仅为清季广东典当数的 9%。由此大致可推估，粤港地区仅广东省区范围（未含香港）与广西相比，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① 《广东咨信局编者录》1910 年（下），“政治丛述三部”，第 103—104 页。

② 《宣统二年广东咨信局第二次常年会报告书》，第 114 页。

③ 民国 24 年《广西年鉴》第二回。

④ 同上。

⑤ 参见曾涛《广东的典当业》，《银楼纵横》，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⑥ 民国 24 年《广西年鉴》第三回，第 635 页。

落差，远不止 10:1 之巨。两广近为比邻，水系相同，同处岭南及南海沿海，两省面积也大体相当，经济发展梯度高低落差、行业聚集的稠疏等差却如此巨大，这必然形成粤港行业对广西最为强劲的分流与推移。而凭托着粤港行业最强大的扩展张力，源源入桂的粤港商人当然成为了营造广西城镇行业的主力商帮，造就了近代广西城镇行业发育的“无东不成市”局面。

综本节所论，在环广西地带中，惟粤港城镇行业具有全国行业发育最高水平，因而其具有的梯度推移发展能力最为强大。正是这一宏观格局，奠定了近代广西境内城镇经济主干行业主由粤商营造的局面。

### 第三节 粤港轴心辐射的海内外巨大环圈 与广西全省性“无东不成市”格局 形成的经济地理原因

作为中国经济技术发展的最高梯度区，而又地濒中国岛屿众多的南部海疆，粤港的商品经济辐射必然即是全国性的，又是国际性的（特别是以东南亚为主要范围），粤港轴心的辐射区是一个连省跨国的巨大环圈。而作为这一环圈中深度辐射和直接辐射带部分，即“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分布，又是一个东起粤港、北至黔南、西至滇东南、南抵东南亚各国的巨大的弯月形延绵带。广西全域均内含在这“一圈一带”的最内核区中。这“一圈一带”构成了“无东不成市”格局在广西的全省性。

#### 一 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商品经济辐射环圈概观

试图以一个确切的数据去说明粤港商品经济的总能量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将粤商抵达的省区、国家连成整个粤商辐射圈，并详细考察广西在这一环圈中的特殊地位。如此，我们



就可以从中揭示粤港商品经济对海内外辐射总量与广西全省性“无东不成市”格局形成的关系。

考察表明，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商品经济以及粤商的对外辐射，远不只广西一省，广西不过是其巨大海内外辐射环围的一小部分。

这个环围在明清时期就已初具规模。如明清时期，仅广东顺德县隆山一个乡的商人，在国内就“或奔走燕齐，或来往吴越，或入楚蜀，或客滇黔，凡天下省郡市镇，无不货值其中”<sup>①</sup>。在国外，明清时粤商就已经大量远漂南洋，定居营生。<sup>②</sup>至晚清民国时期，这个辐射环围有增无减，正如1907年8月4日广州的《七十二行商报》指出的：“各行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五洲四海无不有粤商足迹。”<sup>③</sup>以下分国内外概述。

#### 1. 国内

北向有江苏、湖北、上海、浙江、湖南、江西、山东、天津、安徽、山西、河北、河南省等。江苏省的苏州市，清代建有潮州、宝安、嘉应、两广、仙城（广东？）等至少五个广东系列的会馆。<sup>④</sup>上海：近代上海崛起为一大商埠后，“沪地百货鬻集，中外贸易……半皆粤人为之”<sup>⑤</sup>。19世纪70年代，汉口的买办全是粤商，形成了一支不下500人的买办队伍，后来虽有宁波等地人加入，但仍以粤商人为首。<sup>⑥</sup>浙江省：北部的南浔镇也“毕集

① 嘉庆年《龙山乡志》卷4。

② 《七十二行商报》（广州）1907年8月4日。

③ 江醒东：《明代中国与菲律宾的友好关系》，《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该文考证表明：明代赴菲律宾贸易的“以福建、广东人为多。”

④ 参见吕作燮《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文中关于苏州、上海、汉口的会馆列表，引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⑤ 王韬：《瀛海杂志》卷1，第819页。

⑥ 参见吕作燮《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文中关于苏州、上海、汉口的会馆列表，引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南粤金陵商”<sup>①</sup>。山东大连：近代的海运业，多为粤商操纵。该北向诸省区域距广东遥远，粤商人抵仍颇具规模，比邻广东的江西、湖南自不待言。从东向看：福建省、台湾也为粤商大量入抵之区，如近代福建的“福州之台南地区，为省会之精华区，洋行茶行密切栉比，其买办多广东人，自道咸以来，操是术者，皆起家巨万”<sup>②</sup>。从西向看：粤商还大量抵达广西以外的其他省区，如贵州、云南、四川。例如晚清时期四川、重庆就有粤东会馆活动，粤商纷纷进入川康等地，收购药材。<sup>③</sup>在云南东部富宁、广南等县，清代时也有粤东会馆之设。自1931年抗战期间，广东商人仍为昆明六大商帮之一。<sup>④</sup>

## 2. 国外

据林金枝、庄为玘先生综合整理的广东华侨史资料记载，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往外开拓，从事贸易、垦荒、务工的广东华侨，辐射的范围包括五大洲，具体国家地区有：亚洲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菲律宾、沙捞越、北婆罗洲、日本、印度，非洲的毛里求斯、南非、马达加斯加，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牙买加、秘鲁、古巴，大洋洲的夏威夷群岛、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欧洲各国。<sup>⑤</sup>

将以上各中国省区以及境外各国家地区视为一个整体，就构

---

① (清)南浔人董丹：《卖丝诗》。

② 《申报》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③ 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④ 参见昆明市志办编《昆明史志资料长编》(近代部分)。

⑤ 林金枝、庄为玘主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该文据大致1957年前后各类关于粤籍华侨在各国家、地区的分布的统计资料制作成表，并折算出粤籍华侨占总华侨人口的比例。所列粤籍华侨在世界上的分布范围当较为全面。

成了以粤港为总轴心的广东商品经济以及粤商强烈辐射的巨大的海内外环圈，其面积是广东 22 万平方公里面积的何止数十倍。也就是说，粤港商品经济辐射的总能量，基本上是一个足以照射“五洲四海”<sup>①</sup>的大环圈数值。而仅拥有 20 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西全境均内含在这一大环圈之中：北临湘赣，东界广东，南界越南，西接滇东及黔南，这就初步规定了粤港商品经济以及粤商对广西城的辐射必然是全省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

## 二 中国陆地环粤港邻省区中“无东不成市”格局独在广西形成的原因——粤港对邻省的经济辐射比较

粤港辐射圈虽然是一个国际性、全国性的巨大环围，但并非所有这个环围区内，都形成了以粤港为核心主体的深度辐射格局即“无东不成市”格局，而只是发生在环邻粤港地区的粤港经济技术的深度辐射地带中。与一般的粤港辐射圈地区相比，粤港的经济深度辐射区域即“无东不成市”区域有两大基本特征：其一，是以粤商为主位商帮，执掌所在区域经济牛耳；其二，往往有其他行业的粤籍移民如农业移民同时相随，较大批量地相伴推进。由于闽湘赣经济发展较高梯度的抗阻和交通孔道狭小的梗隔，这一深度辐射带并未能匀称地布往邻省，而只是惟一地朝着广西方向伸展，这规定了“无东不成市”格局只在广西等西南省区中形成。以下试较诸省：

### 1. 福建

福建是粤港地区的东邻省区。“道咸（1821—1861）以来”，多有粤商营业。在福州之台南，甚至洋行、茶行买办“多广东人”<sup>②</sup>，但是，从福建省不存在像遍布广西的粤语方言岛的情状

<sup>①</sup> 《七十二行商报》（广州）1907年8月4日。

<sup>②</sup> 同上。

可以断定，在总体上，粤商在闽省城镇经济中远未赢得主位商帮的地位。其基本原因在于，福建经济发展的梯度与广东大致相当，也是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福建至晚从宋代起，就成为中国封建小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起步甚至还早于广东。当珠江三角洲仍是“烟瘴地方”的北宋时期，福建省就已经出现了耕地开发饱和，人口过剩外溢，商品作物大量种植，手工业发达进步，商业都市繁荣的景象，如泉州就是当时中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商港。当粤商尚名不见经传的时候，闽商则早已与徽商齐名，成为当时中国乃至南太平洋地区最有名气的商帮，出现了远射日本、东南亚各国，近射包括广东在内<sup>①</sup>中国沿海及各岛屿的情形，现代广东沿海诸市县的闽方言分布即是宋代形成基本格局的<sup>②</sup>。到明清民国时期，在以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的崛起为标志的粤港商品经济强烈辐射源地形成的同时，水平上比广东略逊色的福建，商品经济的轴心辐射也仍十分强劲。厦门也是中国第一批开埠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在近代，福建始终仍居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列。从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在近代，福建商品辐射的范围在国内至少：西至重庆，如19世纪90年代重庆的福建会馆每年都举行社交聚会，次数在100次以上<sup>③</sup>；北到上海口岸，如光绪年间在沪的闽商还重新修葺了建汀会馆<sup>④</sup>；西南至广西，如清末桂林，拥有200万两白银的巨商罗致，就是福建人<sup>⑤</sup>。从国际范围来看，前文所举的粤商辐射的大部分海外国家地区中，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南洋地

---

① 如广州大行商伍氏家族原先就是从明以前福建迁广州的。

② 如潮汕话实属于闽南语系，潮汕人实系闽人粤移民的后裔。

③ 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72页。

④ 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5—279页。

⑤ 罗启鉴：《清代桂林世罗炤致》，《桂林文史资料》第7辑。

区，实际上同时也是闽商的强劲辐射圈，福建省因而是中国仅次于广东的第二大侨乡。在东南亚诸国，闽侨商帮势力仅稍次于粤帮。在南洋的东半区岛国中，闽商的势力还明显地超过粤商。如在菲律宾，在执掌该国商业经济命脉的华侨中，80%以上是闽人，呈现出“无闽不成市”的局面。<sup>①</sup>如同广东一样，商民四射是福建本域农工商业相对充分发展，过密饱和所致的向外分泌，也是闽商在本省域内充分发展、势力雄厚乃至过剩推移发展的表现，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从整体上始终牢牢掌握着本省城镇经济的牛耳，与粤商之间形成的是梯度水平大致相当的对流式的相互辐射、相互推移。

在这种情况下，粤商虽然有能量在福建穿插致利，却仍没有足够的优势突破地理距离递减与人口基数有限的制约，覆盖闽商辐射的强大抗阻和竞争，全面反客为主地执掌当地城镇经济主干行业，从而将“无东不成市”格局推移入闽，不仅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府商人没能做到，即使是与闽江比邻的韩江三角洲的潮汕商帮也未能做到。

## 2. 湖南省、江西省

湖南省、江西省为广东的北部邻省，当然也有粤商大量涌入，如清季的湘潭市，广东商人就颇有能量。<sup>②</sup>又如江西北部的吴城镇，清朝末年也有粤商在此建立粤东会馆。但是粤商在该两省也始终未取得主位商帮地位，广东辐射的湘赣的共同航道北江仅仅是珠江支流的细小的尾支，运输容量有限。在湘赣境内，南接广东货流的湘南、涑水和赣南的章水又都分别只是湘江和赣江水系的纤细的尾支，运输容量也十分有限。另外，广东与湘赣省

---

<sup>①</sup> 林金枝、庄为玠主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据各种资料计算出闽侨在各国家地区中的人口、占华侨总人口中的比重。

<sup>②</sup> 张明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台湾版）。

区水系并不连通，货流抵北江重埠韶关以后，入赣省还要东沿浈水，至南雄启岸，以挑运方式通过梅关古驿（海拔高二三百米）的山岭小路，越大庾岭至大余，才可下赣水；入湖南则还要西沿武水至坪石、岐门启岸，以挑运方式通过曲折崎岖的骑田岭岭间山道，抵桂阳郴州后才可以“悉由（来）江挽运”<sup>①</sup>。而清季动工的粤汉铁路只走湖南入粤，不过江西，而且迟至1937年才竣工通车。<sup>②</sup> 随着中国进入八年抗日战争，其交通孔道作用尚未来得及发挥。在以上海为总汇的长江各城市先后开埠以后，这延续千年的传统南北交通孔道日显没落，这既是入近代以来湘赣进出口商业改道北走上海而不再南下广州，也是广东商人北进受阻、难以凭洋货优势入主湘赣的第一个基本原因。此外，晚清民国时期湘赣省区虽然作为内陆省区，由于一向繁荣的手工业受到上海来的洋货侵入而呈萎缩，地区经济发展在全国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并且经济发展梯度始终也较广东为低。但是凭着明清500年繁荣的余脉，湘赣仍不失为我国商品经济发展居于中上水平省区。在循着明清时形成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移民运动余脉，仍不断向外分溢人口的情况下，近代湘赣两省各自人口从1840—1922年间，始终分别保持着2000—2800万和2400万以上的规模，1922年仅次于四川、广东、河南、山东、江苏而分别位居全国前六、前七名。<sup>③</sup> 除去战争频繁发生给经济发展造成的起伏因素以外，一般说两省传统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发展水平在内地仍属较高。

湖南是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20世纪30年代初期，湖南粮食产量就占全国总产量的11%，仅次于广东（15.23%）与四川

---

① 光绪三年《两广鹾政备览》。

② 参阅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数据引自朱贤枚《中国历代人口统计》，《江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14.8%)。<sup>①</sup> 1929—1938年，全省粮食产量在103亿斤至207亿斤之间起落，亩产量从359斤上升为大部分年份的416斤至491斤之间。<sup>②</sup> 畜牧业也明显发展，猪只从1919年的年产400多万头增加到1936年的700多万头；牛只从200万头增加到300多万头。<sup>③</sup> 素来发达的传统手工业，虽然许多行业如纺织业由于洋货的倾入，日形枯萎，但仍有不少洋货无法取代的手工业还在发展。农民利用农闲经营小手工业，仍是湖南经济的一大特色。终晚清民国百年间，湖南在全国均以手工业的制造出名，如浏阳、醴陵、湘西诸县，衡阳、郴州等城市，民间多产爆竹，“声雀远播，十家九爆”，仅民国时的浏、醴二县，以制鞭炮为业者有多达40余万众。<sup>④</sup> 另外，长沙的卷烟，益阳的铁锅，各地的茶叶、湘纸湘绣也大量产出，在难以全被机制品占领的广大的中国农村传统习俗市场上仍是很畅销。

江西省在近代以来，尤其1922年以后，社会经济呈明显的衰落，如1922年以后全省人口明显下降。但是在近代的大部分时间中，江西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全国内陆仍是较高的，作为全国最大的产茶业之一，1863年从江西出口茶叶19万担，占同期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12%；1882年为27万担；1886年又跃至37.5万担，约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七分之一。<sup>⑤</sup> 在素称发达的传统手工业方面，由于外国工业化日用品的冲击，生产规模确不如前，但仍保持着相当规模。如著名的景德镇，1916年仍是一个拥有40.95万人口的巨大的瓷业手工业专业城镇，即使在洋瓷冲击和历经内战以后从业人口减至最低点的（17.53万人）1937

---

① 引据《湖南谷米与农情报告》（1932年）。

② 同上。

③ 宋斐夫主编：《湖南通史》（现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

④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8页。

⑤ 吴湘：《九江茶市变迁》，《江西方志》1987年第3期。

年，全镇仍“年产瓷器一亿九仟九百五十四万八千件”<sup>①</sup>。又如江西宜黄县棠荫镇的经济，是“以夏布业为主体的商品经济”<sup>②</sup>。民国初年，棠荫镇夏布产量较清代中叶减了一半，但是仍有十余万匹，其产品远销山西、上海、芜湖、天门、南昌等城市以及高丽、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购者纷纷，常出现供不应求……依次轮流进货”的情形。<sup>③</sup>其他还有铅山纸业、萍山的爆竹业等也都有类似情形。可见，入近代以来，尽管与明清时期相比，江西商品性手工业、农业陷于下滑，但就当时全国而言仍是为数不多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之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近代的湖南、江西仍然拥有着本地自产的丰富的商品货源，拥有着自身独立的商人队伍，它们本身也仍然是相对独立的跨十数省域的商品经济辐射的轴心地带。

因此，入近代以来，赣商、湘商依托着本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大体能在各自省区大部分地方保持着自身的主位商帮的地位。在江西各城镇传说的谚语是“三个南昌佬，不如一个九江佬”<sup>④</sup>，而不是“无东不成市”。在湖南各城镇，首位商帮往往是赣商，但这很大程度上是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的历史余脉。实际上，近代湘商与赣商相比，已有后来居上之势。如长沙的制鞋业中，民国初年江西帮就已衰落，湖南本地帮多达140多家，700余工匠，江南帮、江北帮各不过二三十余家<sup>⑤</sup>。长沙经营柴、煤的煤栈业，已分别掌在长沙人、衡阳人手中，钉子业七八家全是宝庆（邵阳一带）人<sup>⑥</sup>。近代以来，湘赣商人数之众，实力雄

① 《解放日报》1947年2月2日。

② 雷文：《棠荫镇的兴衰史》，《江西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4、5期合刊本。

③ 同上。

④ 据广西师范学院教务处袁明如（江西籍）老师口述。

⑤ 李行之：《长沙旧事》，《长沙史志通讯》1988年第4期。

⑥ 同上。



厚，不仅足以执掌各所在省区城镇经济牛耳，而且还基本保持了明清时期即以形成的湘赣商品经济辐射区，甚至还有所扩张。湖南商人以洞庭湖区平原、湘资沅四水河谷平原为核心，以长江为主渠道，辐射范围如下：西南至川黔滇，如近代四川总中心城市重庆的第二大会馆就是湖南会馆，又如同光年间，左宗棠湘军平定西北，主要从事茶叶贸易的湘商以湘军为后盾，在新疆、甘肃势盛无比<sup>①</sup>；东至江西，如双丰人孙福生在1936年多次由家乡运土硝到江西萍乡县、芦溪镇贩卖，后来举家迁此，开办了芦溪第一个硝厂<sup>②</sup>；北至武汉，如19世纪中叶以后，湖南木材商凭借湖南水路丰富的木源，云集汉阳，仅在长江岸上的鹦鹉洲就建立起湖南各属会馆20余间。湘帮首先挤垮了江西商人和湖北黄州商帮，使自身具有优势的该州从汉口的木材附属市场变成了武汉主要的木材市场，这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木材市场。接着，他们又对湖北汉水流域的汉帮，在鹦鹉洲木材市场上大加排斥，引起了与汉阳商帮间诸多的冲突，直至曾国藩出面协调解决<sup>③</sup>。

近代江西商帮则以鄱阳湖平原及赣江诸平原为核心，也以长江水系为主渠道，辐射范围至少如下：向西至滇黔川湘鄂<sup>④</sup>，向东至上海，如咸丰二年（1852），江西商帮中仅董事会成员及同都各号向上海的江西会馆捐款者就有98人（店）<sup>⑤</sup>；向北还浮海抵达营口，在营口也有三江会馆（江西、江苏、浙江）之设；

---

① 魏丽英：《明清时期西北城市的商帮》，《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

② 《萍乡鞭炮烟花史料》，第65页。

③ 彭雨新：《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④ 参见《昆明市志长编》（近代部分）；参阅周勇、刘景修译《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四川大学出版1987年版，第72页。该处记载：1892年时，重庆的江西会馆每年开展社交聚会活动300多次。

⑤ 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9—344页。

东南至江浙、福建，如清季同治年间（1862—1874）江西的瑞州府“巨商大贾，遍于吴、越、楚、蜀”<sup>①</sup>；向南抵两广，清代，佛山《禅镇江西义庄官示抄刻碑记》就记载：“江西一省，客粤谋生者，人数殷繁。”<sup>②</sup>

湘赣商帮的力量在本域内已有足够的势力主掌本域市场，而且还向如此广阔的外域强劲辐射，这当然使粤港商品的辐射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都要受到限制。以经营洋货产品著称的粤商在进入湘赣省区以后，在湘赣本地商人的面前也不存在优势。岳阳（州）、长沙及九江的洋货则主要从上海进货，湘赣及东路沿海诸商人从口岸接货后，向省内以北南走向分销，正好与粤商人湘赣的南北走向对顶；加之北来洋货较南来洋货运输成本上的优势，正好将粤商北进的锋锐挡在南部省界以外。既然已失却“洋广商”优势，粤商向湘赣输入的主要只是珠三角生产的、很有选择的农副渔盐手工业制品，如入赣省吴城的粤商销入的主要就是赣省缺乏的粤糖，这不能不使粤商势力大减。粤商当然也能以与湘赣商帮势力相互抵消的对流方式，颇多进入湘赣。如清末后期，在赣西北鄱阳湖畔的吴城镇，也有粤商颇多进入，并建立粤东会馆，但是曾遭到人多势众的赣省本地商帮的强力阻挠。当时，吴城镇的赣商为了阻止粤东会馆的建立，竟垄断了当地全部的建筑工料买卖，禁止售予粤商。寄人篱下的粤商，只得采取一袋糖夹藏一块广东青砖的偷运办法，从广东运砖，花费了两年才备足砖料<sup>③</sup>。粤商入赣窘境如此，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在该域取得主位和首位商帮的地位，当然不可能执掌江西城镇经济行业的牛耳，从而将“无东不成市”格局推入江西省。

① 同治《上高县志》卷4，风俗。

② 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

③ 张红华：《吴城兴衰始末》，《东西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4期。

可见，尽管湖南、江西经济技术发展梯度低于粤港地区，但毕竟仍属全国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与广西相比，它们又各自具备着一定强度的独立的商品经济辐射能量，具有着对广东辐射推入的较高的梯度抗阻。这也是湘赣两省虽然也较强烈地承受着粤港商品经济的辐射，但却始终没有形成“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 3. 广西在环邻粤港的省区中“无东不成市”格局独成原因

环邻粤港的省区中惟广西是粤港深度辐射即呈全省性“无东不成市”格局的省区。与湘赣闽省相比较研究，有两个原因。

第一，天然的交通孔道优越。粤商人桂一江一带（西江和沿海带）的水路交通，远远优越于由粤入闽、入湘、入赣的商路孔道。在广东范围内，珠江水系分为三大支流，即西江、北江和东江。在这三支流之中，以西江的长度、流量和流域面积最大，航运条件最为优越，也正是这一点，成为粤商人桂商路优越于粤商进入其他三个邻省商路的关键优势之一。粤商人福建，若走内河，经东江以后，仍要经过陆路才能跋涉入闽，因此一般都只走沿海大道一途。与此路相比，粤商人桂即可从沿海入抵又可溯西江大川鱼贯往达，两路并进，并且西江路还能通过丰富、遍展的各支水系直接深入，抵达广西各县城镇圩市中。粤商人湘惟一的一条通道是由北江—骑田岭—来水—湘江，粤商人赣惟一的一条通道是由北江—大余岭—章水—赣江航道，粤商进入这两省的惟一通通均需通过河床浅、河面窄、流量小、航运载重少的北江水路，然后登陆，攀越山岭，才能分别进入。而粤商人桂商路，与此二路相比，不仅拥有“黄金水道”的西江大川，直接贯透广西全境，而且同时还拥有南海沿海海岸航线，可直接连通广西沿海，抵北海、钦州、防城登陆入桂。因此，对于粤港而言，入桂商路之通达，是进入任何一个邻省的商路所远不可比拟的。对此，粤商们体会尤深，在清代时，他们就对西江商路给

予了高度的称赞：“吾东人货于市者，禅（佛山）镇扬帆，往返才数日，盖虽客省，东人视之，不啻桑梓矣。”<sup>①</sup>这与同一时期粤赣商路仅仅在梅岭关陆路段运输动辄需要投入的“力夫人数共约几十万”<sup>②</sup>、交通成本昂贵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晚清民国时期，水运轮运化和机电化基本实现，入桂江海航道通达的优势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这使得粤港商品经济的辐射在陆地邻省中惟对广西的辐照最为直接，程度最深，使得广西独到地形成了“无东不成市”格局。

第二，经济发展梯度落差最大。在环粤港地区的所有省区中，惟以广西经济发展水平所处的梯度最低，与粤港地区形成的经济落差最大。这使得广西成为粤港商品经济惟一能够以绝对压倒优势推移入抵，从而使粤商得以入主城镇，执掌经济牛耳的地区。由于历史、自然和社会等诸原因，广西历为我国经济开发较晚的地区，直至民国时期，这一格局基本仍未改变，1949年时，仍被人们“向称贫瘠省份”<sup>③</sup>。土著的壮、瑶、苗、侗少数民族人民，生产力仍很低下，在桂林、柳州、南宁一线以西，占广西面积过半的区域，土著人民的农业仍很原始、粗放，可耕地利用十分有限，刀耕火种，广种薄收，仍然比比皆是，“耕作水利不多讲求”<sup>④</sup>，人口的生息繁衍，也最为缓慢，即使明清时期由于粤湘赣省移民移入而开发比较充分的地区，也仍有不少地方如地处沿海的防城一带，土著居民的农业也还处于“旱不求水，涝不疏水，既无粪壤，又不耕耘，一任于天”的状况。<sup>⑤</sup>

---

① 乾隆五十三年《重建戒圩（粤东）会馆碑记》。

②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③ 《广西之生产力及其在全国之地位》，民国38年，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

④ 参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民委组织人员调查编成的《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全24册，广西民族出版社版。

⑤ 民国34年《防城县志》第一章，缘起。

从粤、湘、赣、桂、闽诸省几个综合反映农业生产水平的主要项目指标的比较中，不难看到，最基础的农业产业方面，广东、福建的农业发展水平最高，处第一级梯度水平；湖南次之，与江西一道，处于第二级梯度水平；广西最次，处于第三个梯度水平，与广东存在着最大的梯度差。

表 4-3 晚清民国时期粤、湘、赣、桂、闽五省农业水平  
若干项目指标比较和梯度水平示意表

项目	省份	广 西	湖 南	江 西	广 东	福 建
亩产 及 位次		1949 年亩产 265 市斤，为全国第 21 位 <sup>[1]</sup>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末湘潭等地每亩均产约 4.08 石 <sup>[2]</sup>	光绪年间普遍为 3 石 (300 市斤) 左右 <sup>[3]</sup>	广东梅县清代时稻谷亩产高达 1037 斤 <sup>[4]</sup> ，居全国第 1 位	
耕地 面积		1949 年大约为 2989 万亩 <sup>[5]</sup>	1873 年为 6600 万亩，1913 年为 5800 万亩 <sup>[6]</sup>		1873 年为 39791000 亩，1873 年为 40192000 亩，1929—1933 年为 40594000 亩	
粮食 总 产量		1949 年列全国第 11 位，排在苏浙皖赣湘鄂粤川以后 <sup>[7]</sup>	1932 年为全国第 3 位，占全国总产量 11%，仅次于广东		1932 年为全国第 1 位，占全国总产量的 15.23% <sup>[8]</sup>	
人 口 数 <sup>[9]</sup>	1851 年 1888 年 1922 年	7823 千人 7509 千人 约 12268335 人	20468 千人 21007 千人 约 2844 万人	24516 千人 24567 千人 约 2447 万人	283899 千人 291749 千人 约 3717 万人	20099 千人 24949 人 约 1316 万人
牲 畜		1933 年 2889110 头猪，2446990 头牛 <sup>[10]</sup>	1936 年 700 万头猪，300 万头牛 <sup>[11]</sup>			
人均 耕地		1947 年 2.042 亩 <sup>[12]</sup>	1873 年 3.01 亩； 1913 年 2.4 亩； 1933 年 1.9 亩 <sup>[13]</sup>		1928—1931 年 1.38 亩 <sup>[14]</sup>	
梯度		第三级梯度	第二级梯度	第二级梯度	第一级梯度	第一级梯度

- [1] 《广西之生产力及其在全国之地位》，民国 38 年，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
- [2] 张明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台湾版）。
- [3]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第 642 页。
- [4] 《中国农业的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
- [5] 《广西之生产力及其在全国之地位》，民国 38 年，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
- [6] 宋斐夫主编：《湖南通史》（现代卷），湖南出版社 1994 年版。
- [7] 《广西之生产力及其在全国之地位》，民国 38 年，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
- [8] 湖南、广东谷米总产量出处均自《湖南谷米与农情报告》（1932 年）。
- [9] 各省人口数据均引自朱贤枚《中国历代人口统计》，《江西大学学报》1982 年第 3 期。
- [10] 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印：《广西年鉴》第三回，上册畜牧，民国 33 年，第 535 页。
- [11] 宋斐夫主编：《湖南通史》（现代卷），湖南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3 页。
- [12] 据民国 36 年度《广西统计年报》所载数字。
- [13] 引据《湖南谷米与农情报告》（1932 年）。
- [14] 司徒尚纪：《明清和民国时代广东人口和耕地的历史变化》，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0 年第 2 期。

在手工业方面、工业方面也是如此。手工业方面，广西土著经济中一直缺乏类似于福建、江西、湖南那样的可与粤货在一定程度上相抗衡，具有跨省区辐射能量的商品化手工业大宗产出，“工土之民朴拙，不习奇技淫巧”之类记载，在广西各县旧志中比比皆是。在桂西半区的普遍情形是，往往连一个本地专业铁匠、木匠、泥瓦匠都没有<sup>①</sup>。即使在手工业较发展的桂东半区也是如此。后来成为广西手工纺织业中心的玉林、临桂、桂林，在粤湘移民抵达以前，纺织业也还不成规模。宾阳的瓷器手工业虽在广西颇有名气，但是“因制法笨拙，致其销场，不惟未能达之省外，即连西江下游，亦无人问津”<sup>②</sup>。现代工业方面，1947

① 参阅《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全 24 册，广西民族出版社版。

② 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印行，第 10 页。

年广西规模较大的现代化工厂仅有 88 家，广东则有 1117 家（尚未含港澳），湖南有 405 家。<sup>①</sup> 广东的厂数是广西的 12.69 倍，湖南厂数也是广西的 4.60 倍。农业和工业水平的低下当然造成了桂商势力的弱小，这也是前文所论桂商势力即使在本域也逊色于粤湘赣诸帮的原因。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虽为近邻省区，但与粤湘赣诸省区商帮在桂遍设会馆的情形形成鲜明反差：湖南、江西、广东域内均没有发现一处广西商人创办的广西会馆。广州 20 世纪 40 年代出现了广西同乡会，但如前文已论，成员并非商帮，而是赴穗的从军从政或求学打工者。<sup>②</sup> 作为沿海省区，广西虽也有“全国第三大侨乡”之称，但细究之，广西的侨民与粤闽两省华侨很不相同，他们很少产生富商大贾，而是以务工、务农为主。而且，这些侨民迁发地全在桂东南、桂南沿海，实际上，也是更早时期迁入广西的粤民后裔。由此看来，广西侨乡不过是广东侨民出国过路的中转之乡。<sup>③</sup> 它并不能说明广西本域与粤闽侨乡一样，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商品经济辐射推移能力。

这种与粤港经济发展水平落差最大的省情条件，使广西不可能像湘赣闽诸省一样，形成本土的商品经济辐射源。也恰因此，在粤港辐射圈的邻省区域中，独广西形成了“无东不成市”格局。

首先，恰因广西农业落后，粤港对广西的辐射能够从农业根基开始。商品经济深度辐射过程，包括着农业经济辐射过程并以此为基础。商品经济辐射源的形成，固然表现为农业手工业商品化的充分发展及其产品外销，但它还包括维持人基本生活的粮食

---

① 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广西之生产力及其在全国之地位》，民国 38 年。

② 从《广州广西会馆（民）二十三年份馆务报告书》所登记的会员身份统计。

③ 参阅赵和曼编《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生产（在南方即稻谷种植业）为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大面积让地而向本土以外新区域转移的过程，包括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口较快繁殖所产生的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人口向本土以外新区域转移的过程。离开了这一过程，商品经济辐射源仍然是无法形成的。而如前所论，湘赣闽等省区农业发展已相对饱和，人均耕地数远小于广西，承载能力也趋极限，本身已无法再大量接受外来人口。这使粤港经济辐射的这一重要过程在内陆地区不可能挺向邻近的湘赣闽三省，而惟一的，只能在“大率土广民稀”、“半由田亩之荒芜”<sup>①</sup>、尚有很大开发余地的广西地区发生。这就意味着，作为十数省区乃至跨越诸多国家之广范围赖以辐射的商品货源基地的形成，粤港地区所必须外移出的大面积的粮食种植业以及大量的农业人口，主要要由广西一个省区接纳。所以，自明代尤其人清代以后，广西植粮（包括稻谷、杂粮）面积迅速扩大，成为即使丰收之年也仅有半年粮的广东须臾不可离开的主要商品粮供给基地。雍正时人记载，广东“专仰给于广西之米”<sup>②</sup>。而这个植粮业外移过程，又是通过以种植粮食的农业人口迁徙来完成的。所以，当时广东农业人口流入广西的情形是：广东过荷的农民沿西江源源涌入广西，以解决耕地与人口的尖锐矛盾所引起的本身口粮问题和广东缺粮问题。其分布遍及广西全省大部，尤其是集中于最为邻近广东的桂东、桂东南农村。移入广西的广东农业移民总数量（含繁殖量）在清代即当以数百万计，构成了在明清民国时期实际上已超过广西总人口半数以上的汉族人口的主支。自从东汉永和五年（140）直到明代天顺至隆庆年间（1464—1571），在这1400多年岁月中，广西全省人口密度布局

---

<sup>①</sup> 据雍正十一年（1733）《广西通志·地理·气候》记载：“粤西自桂林外，昔（当指明朝时期——笔者注）称瘴乡，大率土广民稀……”广西“半由田亩之荒芜”，记载见曾国荃《督粤批牍》卷5，《曾襄公全集》。

<sup>②</sup> 雍正年《广东省志》。



一直是以东北部地区最为稠密，而至明清以后大县清代民国时期，格局演变为东南部地区最为稠密。直接原因，就是这一历史阶段粤农大量入桂并主要抵居桂东、桂东南地区造成的<sup>①</sup>。从各县志材料看，现在广西境内讲土白话、客家话和闽南话的各支汉人，他们的祖先就是当年从广东或中经广东涌入广西的。广西农村这种以广东来民反客为主、并普遍覆盖全省大部的独特的农业居民结构，也可称之为“无东（农）不成农”，构成了广西整个农村居民结构的基干。例如据薛暮桥先生 20 世纪 30 年代的研究，当时广西的白话居民和客家话居民，竟占当时广西总人口（以农民为主）的 81.92%（其中白话者 62.77%，客话者为 19.15%）。剔除粤民当地娶妻及当地人仿学等因素，广东移民及后裔至少占广西总人口的 50% 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出现“无东（商）不成市”局面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广东农业移民入桂以后，衣食住行当然不会屈就于广西少数民族的方式，而要尽量维持原有的水平和习惯方式。这就要求紧跟着他们入桂之后，大量广东的商品如原在广东使用惯了的铁农具、石湾陶，穿惯了的夏布<sup>②</sup>也源源相随入桂。他们掌握着一系列广东式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具有在广东形成的一整套较先进的耕作经验，也不可能屈就少数民族刀耕火种的“一任于天”，而要凭此对广西农业进行技术改造，大幅度开山种荒、开发地利，提高其农业产出。如自明清起至民国时的平南，广东方向来的闽南人、土白话人将瑶人不会开发、只用做安放“火罐”（骨灰）坟地的江边山脚坦地开辟为大片稻田。<sup>③</sup>如在象州，民国时“本

① 参见黄贤林《广西人口》（打印本）第二章。

② 嘉庆二十七年：《藩宪严禁挖沙印砖碑》记载：广东石湾陶“备两广之极”。

③ 据平南县志办同志调查和文物工作者挖掘考证，平南县马练、大鹏、思旺、官城等乡的许多田地，原为瑶族人埋放火罐的坟地。

县农民向无远计，对于沟池蓄水，甚鲜讲求。近年下游客民（广东来民——笔者注），来象渐众，昔属旱地苦土，满目蓬蒿，今已渐变水田”<sup>①</sup>。自清代乾隆起至民国的壮乡宜山，也因粤湘农民迁入“艺豆……当获千石，又种蔗煎糖，多获数万石”<sup>②</sup>。他们所开发出的“辄有余”的谷米产品和在本地无大销路的土特产品，也需要顺水运往他们家乡广东销售才能实现利润。这些都要求广东农民家乡的商人——粤商集团来到广西的城镇圩市为之组织转运。由于入桂广东农业移民是分布广西全省的，为之转运的粤商的分布，也自然就是全省性的；由于入桂广东农业移民在广西大部分地区中构成了汉族移民的主支，为之转运的粤商又自然在这些地区的城镇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这一切，自然造成了广西城镇经济“无东不成市”的格局。

其次，恰因广西手工业落后，广东对广西的商品辐射是压倒式的，不会遇到类似湘赣诸省那样的本地产品抵制而可获相对充分的畅销。广西的手工业产品数量少，技术水平差，功用效益低，它们既不能就近满足入桂粤农的农业开发和生活动用的器具方面的需求，也不能满足壮瑶等土著少数民族在汉族人民影响下生产和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所产生的器具需求。所以，与湘赣诸省不一样，广西无法与高度发达的广东的手工业产品相抗衡，广东商品以及由粤港进口的洋货商品几乎可以在不遇任何竞争的情况下在广西大部地区行销，在不少地方甚至就是全面地填补日用手工业产品的空白。如现属大新县的原全茗、茗盈壮族土司地区，“农业用的犁、耙、锄、铲、镰刀、锹等，手工业用的斧头、锯子、凿、刨、铁

---

① 民国23年《象州志》，地理。

② 道光九年《庆远府志》卷3，地理志，下，风俗。

锤等，本地区不能制造”<sup>①</sup>，甚至耕田犁头都不是铁制而是用硬木削尖而成。<sup>②</sup> 所以，广东输入的整套系列的铁农具在这里都有绝好的销路，它几乎供应了当地的全部需求，以至于“许多农具的名称都沿用汉语中的粤音”，也即保持各自的广东名字，“如镰称‘镰’，凿子称‘箫’，刨子称‘暴’，钻子称‘钻头’，耙称‘把’，斧称‘不’”等<sup>③</sup>。粤港商品对于广西大部地区的这种压倒优势，当然会使营销这种商品的粤港商人在广西大多数城镇中具有压倒的经济优势，这也导致了“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出现。

可以说，特别落后的省情条件，是在粤港经济的辐射圈的邻省区域中，惟独广西形成“无东不成市”格局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因。

综上所述，广东省中、北部由分水岭所构成的交通运输的天然阻隔，长江流域已相当发展的湘赣省区及东南沿海的福建省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的抗阻，使粤港近代以来迅速倍增巨大商品经济辐射能不可能匀质分布，在广东环省区范围内只能主要集中向同属珠江水系及南海沿岸的广西全域推移播散，从而造成了环粤港省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独广西形成全省性“无东不成市”格局的情形。

### 三 “无东不成市”格局在广西具有全省性的原因环视

在粤港轴心辐射的巨大环圈中，“无东不成市”格局又不仅仅限于广西一地，它是一个远大于广西全域而积的、由东而西再由西折南的绵长的地带，它包括广西大部、贵州南部、云南东部，

---

①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52页。

② 同上书，第160页。

③ 同上书，第40页。

并向中国境外奔突，包括东南亚、南洋群岛等诸国家和地区，具体包括泰国、新加坡、马来亚、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总体的地理分布形状像一牙弯月，而这一连省跨国的弯月带从当时的历史上看，是一组连片延绵的经济发展的相对低梯度地带。

### 1. 中国其他省区“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分布地带

贵州南部。根据贵州胡克敏先生的研究，晚清民国时期，商帮势力地区的大致分界如下：“整个黔南多广东、广西（商）人”，黔北则多四川商人，黔东则多湖南、江西商人。<sup>①</sup>在川赣湘诸省商人的交织辐射推压之下，推移路途迢迢、路经云贵高原高山大岭的粤商也只能把“无东不成市”的局面推至黔南一带。很显然，这已经到了“无东不成市”格局分布的西向边际地带。

云南东部。根据各方面资料的记载，滇北主要为川商、湘商、赣商的辐射范围，而滇东则仍主要为粤商的辐射范围，具体包括昆明以东、以南，其中包含蒙自、个旧等城市以及滇越铁路沿线地区，广东商人在滇东由于推销洋货面特别活跃。<sup>②</sup>

与广西不同，以上两省区的“无东不成市”分布带，不过仅占据各自省区的一个小局部。

### 2. 国外的“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分布地带

这一地带，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各国家和地区。还在明清时期，广东商人已经凭借着以广东核心区的中国封建小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所形成的强大的辐射推移力，源源不断地大量涌入这一地带，侨居营生，并初步形成了当地城镇经济中“无东不成市”的格局，对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据有关学者的研究，中国华侨在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时俗称南洋）

<sup>①</sup> 胡克敏：《贵州军阀统治时期的商业概况》，载贵州师范大学编《贵州史论文集》。

<sup>②</sup> 广西通志馆编：《中法战争调查实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都已是人口数仅次于原住民的第二大居民群体。至晚清民国时期，这一局面并未改变。尽管英、法、德、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集团凭借着现代经济技术的强劲辐射，已经实际上垄断或者控制该地带国民经济的命脉，但是，遥远的地理距离和有限的人口基数，使欧美列强只能限于以少人员、大资本的方式，实施要津控制，而不能实施全部由本国工商业人员直接控制。当时，这类业务的具体环节，只能大部分由工商业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粤籍华侨商人最终完成。欧美资本家不仅没有摧毁“无东不成市”局面，而且在更好谋取自身最大利润前提下，保持甚至助长了此种局面的发展，粤籍华人华侨商人仍是这一地带主要的工商业人员。另外，该地带国家和地区由于地处西欧国家驶往中国的必经地区，他们较中国更早地接受世界经济发展水平高梯度地区西欧的现代型商品经济辐射，并成为向中国中转、传播这种辐射的转口地区（如新加坡 1825 年即已开埠），从而造成了明清时期这些地区未曾有过的经济辐射逆转，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世界工业经济对中国施以辐射的替代轴心，也正是这一原因，造成了前文所说的近代以来侨资大量返汇广东，侨商大量返乡创办资本主义的新式工商业，从而形成粤港域内独特的“无侨不成市”局面。但是，这也不妨碍这些国家地区以粤港为轴心的“无东不成市”格局的保持和发展。其一，当时东南亚各国本身内部的主体经济，仍然是较中国尤其广东省低几个梯度的传统经济。如当时的泰国处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刚刚过渡的阶段，所以，明清以来即以形成的广东封建小商品经济仍以高梯度地带的态势强烈辐射该域，而且这种辐射在欧美现代型（工业化）的大商品经济辐射从外部注入中国乃至广东以后，不仅没有减弱或被取代，反而因为外来的强大的现代型辐射的进入，又源源不断地内化为封建小商品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加强了它的扩张力。这一点造成了：尽管近代南洋地区较中国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产生更早，尽管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的西方垄断资本实力远大于华侨资本，控制着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命脉，但华侨经济却仍然作为当地民族经济中最易于和最早向现代资本主义工商经济转化的部分，而所谓南洋对中国广东的辐射也主要是由粤籍侨商实现的，而不是由南洋当地的土著商人实现的。其二，1842年以后，中国广东地段的香港被英国割占，宣布为自由港后，香港迅速崛起为最大的现代化中转口岸，经济能极上赶超了东南亚各口岸。由于香港处于对美国、日本东西走向的远程航线、西欧西东走向的远程航线、中国珠江水系航线和长江—渤海、东海海岸线南北走向的中近程航线的最适中点，不仅西欧最多的船只从南洋移往香港集散，而且美国、日本等后崛起的资本主义强国的大商品经济辐射也都依赖香港并依靠粤商转播东南亚各国。从这个意义上看，粤港也具有着对东南亚各国中转现代化、工业化商品经济辐射的能力。这也有力地加强了传统贸易中形成的粤籍华人华侨商人在东南亚各国民族经济当中的优势商帮地位。以下分别考察各国情形。

泰国。据史金纳先生研究，泰国华人资产阶级在泰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突出。至19世纪末，虽有西欧各国公司的激烈竞争，但是华人资产阶级的对外贸易额仍占该国对外贸易额的一半以上。华人的大资本家，尤其是新加坡和香港的华人公司在泰国和越南的大米贸易中具有支配的地位。<sup>①</sup> 1906年，泰国的锡矿生产几乎全部属于华人矿产主，1916—1917年，华资所占份额高达67%，1926—1927年高达70%。<sup>②</sup> 1919年，泰国66家大碾米厂中，华人企业就多达56家。<sup>③</sup> 1888年，泰国出现了第一批欧洲

① 史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第105页。

② 英格南：《1850年以来泰国的经济变迁》，第100页。

③ 史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第213、215页。

人举办的首批蒸汽机锯木厂；1894年，大锯木厂的比例，外国人与中国人之比为3:1。但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曼谷和泰国北部的大部分锯木厂都开始采用了蒸汽动力，这些工厂业主全都是中国人，其他各个行业也都有类似的情况。<sup>①</sup>而这些华侨商人中，又以粤籍侨商占最大多数。据统计，1957年泰国华侨3500000人，粤籍华侨共有3080000人，粤籍华占华侨总数的88%。<sup>②</sup>由此可知，上述执掌泰国工商经济主要份额的侨商实际上主要就是粤商。泰国的城镇经济显然是呈“无东不成市”格局的。

新加坡。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南端，成为欧、亚、澳航旅必由之路。是世界上海外华人占多数的惟一国家。<sup>③</sup>据统计，中国华侨在新加坡城市人口中的比重极高，1931年为76.4%，1947年为78.7%<sup>④</sup>，主要从事工商职业。华侨在城市中如此高的比重，说明了新加坡工商经济主要是由华侨所经营的。如20世纪50年代，华资就控制了当时新加坡所有的木材加工业，包括25家大锯木厂，1家胶合板厂，几家小锯木厂等。<sup>⑤</sup>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加坡华人贸易公司与欧洲之间进出口贸易扩大特别大。而据1947年和1957年的数字综合统计，新加坡华侨总数当为1243615人，其中粤籍华侨占65%。<sup>⑥</sup>由此可知，主要执掌着新加坡工商经济牛耳的华侨也主要是粤籍侨商。在新加坡城

---

① 史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第345页。

② 引据林金枝、庄为玳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中《广东华侨在海外人口分布表》所列1956年左右的统计数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 黄激生等：《战后东南华人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

④ 参阅〔苏〕H. A. 西莫尼亚《东南亚各国的中国居民》，《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1期。

⑤ 参见《1955年新加坡殖民地年度报告》，第92页。

⑥ 引据林金枝、庄为玳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中《广东华侨在海外人口分布表》所列1956年左右的统计数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镇，显然也是呈“无东不成市”格局的。

马来西亚。华侨居民90%以上居住在经济最发达的马来半岛西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在素有“锡和橡胶地带之誉的”霹雳、森美兰、柔佛等地。据1947年统计，中国华侨的城市居民占该国城市人口的62.3%，自然在城镇工商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1910年时马来华人的矿场主在全国锡矿中所占的比重为78%，1913年为74%，1919年为68%，1925年为56%。<sup>①</sup>虽然此时华人中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但是在形式上显然仍然保持着主营商帮的地位。当时的华侨总数大约为1971249人，粤籍华侨占其中的65%。<sup>②</sup>由此可知，执掌着马来西亚城镇工商经济牛耳的侨商主要也是粤商，马来西亚城镇经济也呈“无东不成市”格局。

印度尼西亚。据卡德先生研究，华人资产阶级控制着印尼零售商业的绝大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大米贸易主要掌握在华商资产阶级手中。制糖业还把持在华人企业家手中；当时的殖民地宗主国荷兰的商人仅仅控制着销售权。在当时印尼的大约130家糖厂中，日本只有一家，欧洲只有三家，其余的全部是中国人。到1922年，爪哇等共有40家糖厂，华人就占有三分之一。<sup>③</sup>根据1957年的统计，印度尼西亚华侨总数为2500000人，粤籍华侨人数为1475000人，占华侨总数的59%。<sup>④</sup>由此可知，

---

① 亚伦·东尼逊：《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西方企业》，参阅《远东经济评论》第24卷，1958. MO。

② 引据林金枝、庄为玳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中《广东华侨在海外人口分布表》所列1956年左右的统计数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 卡德：《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1—12期合订本。

④ 引据林金枝、庄为玳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中《广东华侨在海外人口分布表》所列1956年左右的统计数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执掌着印尼城镇工商经济牛耳的侨商多为粤商，印度尼西亚城镇经济同样也呈现出“无东不成市”格局。

越南。1957年，越南南方注册登记的企业以及大中小商号共有17288家，华人企业就有10793家，占其总数的62.43%。<sup>①</sup>越南最大的碾米厂主要设在西贡、堤岸，西贡、堤岸共有碾米厂70家，华人的企业就占其中的60%。<sup>②</sup>又据记载，“南越的一切角落，几乎都可以看见华人资产阶级的小锯木厂”。在国内贸易方面，华人资产阶级控制着越南南方国内贸易的五分之四左右。<sup>③</sup>越南北部主要城镇商业基本上也是华侨经营的，据唐景崧《请缨日记》记载，“河内与海宁汛（海防），通商皆我华人，并无越人贸易”。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越南南方的零售商80%以上仍是由华商经营的。而据黄天缔先生研究，粤籍华侨在越南华侨中占据89%的比例。<sup>④</sup>由此也可知，越南城镇经济也呈现出“无东不成市”的局面。

柬埔寨。据贝却地先生研究，20世纪四五十年代柬埔寨尚无工业资产阶级，华人资产阶级是该国商业的主要核心。<sup>⑤</sup>而依据1957年的有关统计，柬埔寨的华侨中粤籍华侨占有59%的比例，可以推知，柬埔寨的商业也主要是由粤商来经营的。因此，该国城镇经济也属于“无东不成市”的格局。

东南亚其他国家，如缅甸、菲律宾等，粤商也大量涌入定居，并在当地城镇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从统计数据看，他们仍未获得过半的比重。如菲律宾则是以闽籍华侨为主

---

① 《远东经济评论》第24卷，1958.MO.第12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黄天缔：《华侨经济问题》，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1期。

⑤ 贝却地：《溯湄公河而上》，CW, GBurchett, *Mekongry Upsteran*, 河内，1957，第194页。

执掌城镇经济牛耳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已不属“无东不成市”的局面，但在整个东南亚和南洋地区中，这些国家和地区毕竟只居少数。

由上可见，“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分布带，是一个东起广东本省、北至黔南、西至滇东南、南抵东南亚诸国的一个巨大的弯月形的延绵带。换言之，粤港商品经济深度辐射能量即足以造成“无东不成市”格局形成的能量，是一个足以辐照比广西省区远大得多的广阔地域的数值。而广西在这一延绵带中，直接连接广东，在位置上首先是和最充分地接受粤商深度辐射的最内层圈地区，粤港深度辐射发生的频率也最高，同时也是粤港对滇东、黔南，对东南亚各国施以深度辐射所必然过往的地区。过滇黔则必须沿西江水系贯通广西全境大部，过东南亚则必须中经两广沿海航道，掠经桂南沿海地区。既然粤港深度辐射能量足可远达近3000公里以外的新加坡等南洋诸国和有云贵高原大山阻隔的滇东黔南，那么“无东不成市”的格局在广西省区的分布，自然不可能是局部性的，而必然是全省性的。

可见，巨大的粤港辐射圈，决定了粤港在桂活动的全省性；广西特殊的省情以及两广特殊的地理联系，又造成了这一辐射圈中广西独特的“无东不成市”格局；而巨大的深度的粤港辐射能量，凭借着两广特殊的地理联系和悬殊的经济梯度落差，又独特地在广西造成了“无东不成市”格局分布的全省性。

#### **第四节 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城镇广州—香港在 粤港城镇经济网络中的总中心地位与 粤商对广西城镇经济“无市不趋东” 等级分布体系的铸造**

既然广西的“无市不趋东”城镇经济等级分布体系是由粤商由东而西递进和逐渐递减分布的规律造成的，那么，寻找它的真正中心，绝对不应限于梧州，而要从梧州以东的粤商的大本营粤港境内，从粤商最主要的发源地核心区中所形成的粤港城镇经济网络的总中心城镇即广州—香港来寻找。进一步的考察将使我们发现，正是粤港这组在全国具有经济总中心城市地位的总中心城镇广州、香港的最强大的市场组织力，规定着入桂粤商广西城镇经济等级分布体系，并铸造成以广西东端城市梧州为中心的“无市不趋东”的城镇经济网络结构。

##### **一 历史基础：明清时期广州、佛山在粤港城镇的总中心地位的形成与粤商对广西城镇“无市不趋东”等级分布体系的铸造**

明代以前广东一直没有形成市场性的城镇经济中心。如前所论，广东当时商品产出的稀有、商人队伍的弱小和经济行业的未出现，自然无法促成城镇经济的发育和它的网络总中心的形成。明以前广东早已出现的城镇也如同一时期的广西，基本上属于军政型，尚未具有市场性的组织功能。历史发展最久、规模发展最大的广州市，虽早已具有官统外贸的全国中心地位，但它并不是本地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而是在行政指令规定下，汇总各省和海外官统外贸物资集聚发展起来的，它与广东本区域的经济

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尚未具备市场总中心的组织功能。广州所处的珠江三角洲，巨大的商品经济发展潜在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它一直没有形成强大的市场引力和对广西的商品经济辐射力，促使最靠近广东的东端城镇戎圩或梧州形成广西最大的经济性城镇，从而造成广西整个城镇经济等级分布的“无市不趋东”结构。正因如此，明代以前的梧州，无论其人口规模还是经济规模，从秦汉至宋元，一直远逊于北部的桂林。

富庶的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中部，是广东最大的平原，面积11000平方公里，它主要由西江、北江、东江，还有绥江、潭江、增江、流溪河等带来的淤泥在海湾内堆积复合而成。它较之地处粤东的广东第二大平原潮汕平原的位置居中，而积大9.2倍。<sup>①</sup>至明清时期，广东经济重心迅速向沿海南移，珠江三角洲自然成为广东经济发展最核心的巨区。

宋代及宋代以前，广东经济发展重心在粤北地区<sup>②</sup>，随着经济重心从粤北向珠三角南移，广东的市场性城镇经济总中心终于在商品生产、商人队伍组成和行业发育最为集中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并以广州（附澳门）—佛山为二元市场中心。<sup>③</sup>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内贸经济的最佳地理点上，它“控羊城之上游”，可将内贸经济与广州的外贸经济联结互托，又“当西、北江之冲要”<sup>④</sup>，能最便当地将珠江三角洲商品运销全省各地，也能最便当地将各地商品吸纳市中。加之自明代起，佛山日益成为民间用量最大的商品之一——铁器用品的生产中心。因

---

① 《广东风物志》，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② 参见拙作《历史上珠江流域人口移的主流变迁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地理》1995年第7期。

③ 参见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④ 《重修佛山堡八团祖祠碑记》。

此，它从明初时仍然名不见经传，没什么经济地位的农业性村落<sup>①</sup>很快发展成为最能吸引和聚集三角洲商人因而规模最巨的市场聚落。据佛山史专家罗一星先生考证，嘉庆道光年间，佛山已成“周遭三十四里”，人口二三十万的繁华都会。<sup>②</sup>佛山与京师、苏州、汉口并称明清“天下四聚”之一。广州，则地处珠江三角洲外贸经济的最佳区位上。它内倚内贸巨镇佛山，外扼珠江出海口，历为省城和官府外贸巨埠，有很高程度的市场聚落基础。随着商品经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迅速发展，它自然也最能吸引和聚集珠江三角洲商人，发展成为规模最大、以外贸为主兼有内贸功能的市场聚落即经济性城市。广州与佛山构成的首先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市场二元中心，它们所集散的商品主要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服务，构成它们的主体商帮，主要就是珠江三角洲商人。有人估计，嘉庆年间（1796—1820），省会（广州——笔者注）、佛山、石湾三镇的客商中，“顺德人居其三，新会人居其二，番禺及各县各府、外省之人居其二，南海人居其二”<sup>③</sup>。广州和佛山，实为珠江三角洲商人的大本营和派发珠商分往营造广东各城镇市场聚落点的总指挥部，从而也成为明清时期广东全省范围的城镇经济二元式总中心城市。依托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与佛山在本省内还造成了以自身为中心的全省城镇环绕式分层的等级分布体系。<sup>④</sup>

尤其特别论及的，是广州南去约百公里、实为广州重要外贸

---

① 罗一星：《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② 刘继庄：《广阳杂记》。

③ （清）龙廷槐：《敬学轩文集》，清嘉庆年间撰本。

④ 参见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圩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该文指出：珠三角的圩市分布网络，大致以广州、佛山为中心，从密到疏地分布其周围。笔者据此思路进一步考察，明清时期整个全广东的城镇、圩市的格局也是如此，都以广州、佛山为二元中心。

外港的澳门在省、佛二元中心运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澳门半岛原称壕镜澳，为当时我国广东香山县地，位于珠江和西江三角洲的南端，原始面积为2.78平方公里，明中叶直至1840年6月，为我国国家主权仍充分行使之下，主要与广州进行贸易的葡萄牙等国商人在中国形成的居留地。由于它是中西方直接交流的港口，又依托着富庶的西江、珠江三角洲，明清时期曾为具有中外贸易中心地位的著名的国际性港市。以它为枢纽，形成了葡萄牙—印度—中国—日本—菲律宾—墨西哥—秘鲁、澳门—大小巽他群岛等各条贸易航线。佛山、广州二元中心所集汇的货物，大宗是经过澳门出口的。史称澳门地方货港“均由省镇、佛山各处市镇转运到澳售卖”<sup>①</sup>而运销海外的，大量从海外换回的白银，许多是从澳门吸入的。据不完全统计，在1637年以前，经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多万两，约相当于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中国官营银矿总产量的2.1倍，万历年间明政府国库岁入的3.8倍。来自日本的白银为数更多，在1636年一年中就达235万两，总数可能有1亿两左右。<sup>②</sup>据可靠推算，盛产白银的日本此时所生产的白银有近一半经过澳门输入了中国。此外，葡萄牙、印度也大量运来白银经澳门输入中国。<sup>③</sup>澳门的外贸繁荣又强劲地壮大着省—佛二元中心在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城市功能影响。广东省以上的区域经济格局，我们可称之为“无市不趋珠”（“珠”指珠江三角洲。下同——笔者注）。

广东的西江水系地域以及由西江延伸贯透的广西大部分地区，一并构成了粤港“无市不趋珠”环圈式城镇等级分布体系

---

① 《粤海关志》卷29。

② 参见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白银的输入》，载《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集》，第1553页（该文引日本学者提供的资料）。

③ 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52页。

的西向扇面。由于如前所论，广东尤其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在当时具有全国经济发展最高梯度的地位，广东省是商品经济辐射入桂的主要省区，以广州和佛山（简称省佛——笔者注）为中心的城镇网络，必然通过粤商拓展向广西全域推进，此情势之下，主赖粤商营造起来的广西城镇经济必然始终保持着对广州—佛山二元总城市中心的总向心力，始终以省—佛为终极轴心，并根据自身各个城镇点与省—佛距离的近与远，经济联系的强与弱，为省—佛服务功能的大与小，排布自身总体的等级分布体系——上列诸项越近、越强、越大，粤商聚居的梯度水平以及城镇的聚落功能水平就越高，等级就越高，反之亦然。而珠三角和省—佛等轴心对广西而言总是处于东向，这当然铸成了广西以东端城市为总中心，总体等级分布呈“无市不趋东”，越往东趋城镇级别越高的体系结构。笔者曾对明清时期广西此说有专论：明清时期广西城镇经济体系等级分布具体就是如此，桂东端的梧州及附近戎圩镇为最大经济总中心城镇和圩市；然后由东而西，广西的城镇和圩市的等级规模不断递减而去。<sup>①</sup>

这样，明清时期，广西原先也居北（以桂林为总中心）的城镇中心，在广东商品经济省—佛轴心的强劲辐射下，发生东移。广西城镇经济分布体系发生东倾，初步演变为以桂东端城镇梧州、戎圩为中心的“无市不趋东”结构。这就为晚清民国时期广东穗（广州）—港（香港）二元式总城市中心地位规定着粤商对广西城镇经济分布的“无市不趋东”结构的继续维系奠定了历史基础。

---

<sup>①</sup> 参阅拙作《明清时期广西“无东不成市”布局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93年第5期。

## 二 局部微调而总局未变——晚清民国时期穗港在粤港地区总轴心地位与粤商对广西城镇“无市不趋东”等级分布体系的铸造

### 1. 二元总中心城市组合的变化：从广州—佛山到香港—广州

自鸦片战争以后，以香港的崛起为突出标志，广东的二元总中心城市的组合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在1842年被英国割占、被宣布为无税自由港以后，迅速崛起，在大约十数年间，一跃为广东乃至全国经济规模最大的贸易港市，加入了二元总中心城市的组合之中，并在这一新组合中成为位序高于广州的首位城市。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香港还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市，形成了以下多条相对固定的全球性的国际国内航线。国际航线西向有：（1）英国至香港线。由英国的利物浦南行人直布罗陀海峡，经地中海，至塞浦路斯岛，经塞德港入苏伊士运河（1869年3月11日通航，使欧洲船只不必绕过好望角）经亚丁出红海，经印度洋至印度加尔各答，过马六甲海峡，抵新加坡，入南太平洋而至中国的香港，此为亚欧往来的主要航道。（2）法国至香港线：马赛—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越南西贡—中国香港。（3）德国至香港线：汉堡—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中国香港。（4）荷兰至香港线：鹿特丹—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中国香港。东向有：（1）香港至北美线：中国香港—上海—日本或美国檀香山—加拿大温哥华。（2）美国至香港线：旧金山—檀香山—中国香港。（3）日本至香港线：日本—上海—香港。其他方向的还有诸多航线：从香港至澳洲新金山、纽西兰；至菲律宾马尼拉；至越南西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至新加坡和印度加尔各答；至印度尼西亚和波罗洲。

国内沿海航线更是密布如织：香港至台湾，至上海、青岛、



天津、大连等；至汕头、厦门、福州等；至湛江、北海等。<sup>①</sup>

由于香港较广州更为前突的港口位置和更为宽松的贸易自由度，“各国商船亦将香港视作中国领海的第一中心港，先将货物运至香港，然后再分别运往中国各埠（包括广州——笔者注）销售”<sup>②</sup>。这势必分夺原属广州的最大宗的货流，广州虽然仍保持着对全省的市场控驭的总经济中心地位，但在二元组合中，已降为第二位。据记述，1872年时，广州销往全省的洋货主要是由有“广东省的保险仓库”之称的香港供应。<sup>③</sup>而广州汇集起来的全省出口土货，也多由香港中转。如1914—1918年的四年间，广州与港澳（主要是香港）之间的航行进出旅客，共6848250人次，占广州同期与外地各口岸之间航行进出旅客共7175889人次的95%，这也可理解为广州与外地客商往来中与香港最为大量、频繁，占绝大多数比重。<sup>④</sup>因此，香港显然形成了对广州的控驭，构成了二元总中心组合中的第一轴心。至1894年时，香港在广东口岸城市群中的首位度已大得惊人。据统计，香港该年仅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总额为13321.79万海关两。<sup>⑤</sup>而该年广州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951.96万海关两<sup>⑥</sup>，仅为香港对国内贸易额的22%。即使当时广东的六个口岸（广州、汕头、九龙、拱北、琼州、北海）相合，当年的进出口总值也不过8731.17万

---

① 陈谦：《香港旧事闻见杂录》《广东文史资料》第44辑。

② 程浩编：《广州港史》（近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62、308页。

③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61—762页。

④ 《民国七年通商海关华洋贸易全年总册》下卷，1919年版，第1224页有关统计表。

⑤ 《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5表，引自陈华新《近代广东对外贸易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70辑。

⑥ 《历年海关报告》，引自陈华新《近代广东对外贸易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70辑。

海关两，仅占香港一埠对内地贸易一项总值的66%。<sup>①</sup>

佛山已退出了二元总中心位置，它原先的第二轴心地位，则由被香港取代首位轴心地位的广州来顶替。港—穗二元中心运行机制类似于明清时期的省—佛二元中心，即联体运行，内外贸易分工——广州主要担当起以往佛山内贸中心城市任务，而香港则专门承担着以往广州的外贸中心城市的职能。诚如陈明铨先生在比较近代穗港情形以后指出的：“如果说那时的香港是近代中国华南产品的‘外贸部’，那末广州就起着这些出口产品‘采购收集’作用和进出口产品的‘分配传播作用’。”<sup>②</sup>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与上述局变相应，一直作为广州外贸外港的葡萄牙占据的澳门也随广州地位的下降和香港的崛起，失去了重要国际商埠和外商在华主要居地的地位，经济一落千丈，商业多向香港转移。<sup>③</sup>这也是近代广东二元中心城市组合变异的一个侧面的表现。

## 2. “无市不趋珠”：总格局未变

近代中心城市组合的变化，却始终没有改变广东城镇经济总体上的“无市不趋珠”等级分布结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心城市的基本的区域经济性质未变。广东城镇二元中心城市位置的向外移动，是以环球开放为特征的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大工业经济向中国及广东推移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与中国广东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区的充分发达的封建小商品经济外拓发展的必然趋势相一致的。实际上，明清时期，无论历届王朝政府如何闭关自守，广东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已经初步呈现出了这种向外开放和拓展的客观趋势，广东经济重心的南移，整个珠

<sup>①</sup> 《历年海关报告》，引自陈华新《近代广东对外贸易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70辑。

<sup>②</sup> 陈明铨：《近代香港与广州的比较》，《学术研究》1988年3期。

<sup>③</sup> 程浩编：《广州港史》（近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62、308页。

江三角洲经济举世瞩目的发展，广州的突出繁荣，澳门的兴旺，粤籍侨商的四拓辐射都是明证。中国固有的客观的市场趋向性也会使地当珠江出海口而港泊条件优良的香港必然或迟或早地形成广东大港市。只不过这种客观存在的趋向性未能及时被清朝政府所认识，而是被已先期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拥有更高的经济技术梯度，而又有着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不断向全球扩张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发现并首先加以利用。<sup>①</sup> 因此，虽然香港是由于英国的锐意营造辟为良港的，但是，香港从建港到发展，始终又是遵循着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广东经济发展的区域规律运作的。它是世界工业经济推移发展的产物，但从根本上看，它首先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依托着珠江三角洲经济突出发展而形成的广东乃至华南崭新的城市总中心，是依托着广东经济的突出发展而形成的崭新的中国外贸城市总中心，又是依托着地大物博的中国全国经济新发展而形成的远东国际贸易最大中心港市。<sup>②</sup> 尽管当时的香港社会性质是殖民地性质的，广州也呈半殖民地社会属性，但是，其基本的区域经济性质即与国内经济同一整体的基本属性却没有改变。对于广东而言，香港—广州毫无疑问是一组足以构成全广东城镇等级分布“无市不趋珠”结构的强有力的辐射轴心。

(2) 二元中心的地理位置总体未变，仍在珠江三角洲的核心范围。广州自不必论。新兴的香港，包括香港岛本身、地处大陆南尖的九龙半岛、新界也都地处珠江出海口，实为珠江水系的最终端地带，相距广州，不过 100 多公里。作为二元中心组合第

---

<sup>①</sup> 1836 年在华英商的《广东记录报》(Canton Register) 提议：“只要保证香港为自由港，它在十年之内就会变成好望角以东最大的商业中心。”参见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33 页。

<sup>②</sup> 参阅匡世平、张中华主编《港台澳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 页。

一轴心位置，从广州向香港南向 100 多公里的转移，这对于拥有 22 万平方公里的广东全省是微不足道的，居于珠三角核心区的地理位置没有改变。另外，尤须指出的，地处西、北江要冲，位于珠三角内贸最佳区位并一直保持手工业巨市地位的佛山，虽然在近代退出了二元中心城市行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全省性内贸中心城市功能完全丧失。实际上整个近代，广东许多县区货物仍赖佛山集散，它也仍是广东全省最大的冶铁、制陶中心，如光绪年间外国工业品冲击下的佛山手工业虽已衰落，但仍有 178 个行业<sup>①</sup>，产品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加之佛山相距广州仅三四十公里<sup>②</sup>，它仍始终协作广州发挥着全省性中心城市的作用。

(3) 全省城镇等级分布体系的“无市不趋珠”结构未变。近代崛起的香港，大量吸引前往经营谋生的首先和最多的是广东经济核心区的珠江三角洲的商人。据估计，1908 年时，“粤商营业于香港者不下二十万人”<sup>③</sup>。而当时相近年份的香港总人口，1901 年为 30 万。<sup>④</sup> 据英国人戴维·莱思布里奇研究，在香港，“广州市附近来的”“广东人今天居最多数”，“其次为四邑人（来自广东省西江下游），再其次就是潮州人”<sup>⑤</sup>。广州附近及四邑实均为珠江三角洲地带。从香港方言系广府语状况看，云集香港构成港商的绝大多数的粤商中，也肯定多为珠商。这样，位于珠江三角洲城镇经济发展最佳区位上的香港也与广州一样，实际上是珠商经营活动的大本营。这里聚集着整个珠商集团中最为核心和基干的力量。所以，当省港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在整个广东

---

①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

② 张维持编：《广东石湾陶器》，广州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③ 《半星期报》（广州）光绪戊申（1908 年）第 7 期。

④ [英] 丁戴维·莱思布里奇：《香港的营业环境》，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⑤ 同上。

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而实际上成广东省城镇经济总中心时，在广东范围内所造成的整个城镇经济网络必然是一个“无市不趋珠”的等级分布结构。首先，广东大部地区的城镇经济发育，都是珠商分往营造的结果。北部如邻近湖南的连县，民国时县城由于商人多广州府来而流行广府语<sup>①</sup>；西部如乾隆时怀集县，商人“多新会、顺德、南海人”，近代此局也延续着<sup>②</sup>；又如民国时罗定县，“今市商场多广州人。各操乡音……日久相化成为方言”<sup>③</sup>；南面如阳江县，乾隆时经商者“多南海、新会人”，晚清以来也未改变<sup>④</sup>；沿海西向时属广东的钦州、廉州、北海、合浦各城中，如前所论，商人也“以广府人尤占多数”<sup>⑤</sup>。又如广州湾（即今湛江市）商帮分为广州帮和潮州帮<sup>⑥</sup>，而据笔者实地考察，两帮中又以广州帮为主力商帮。<sup>⑦</sup>其次，由于广东大部地区城镇经济网络由珠商缔造而成，各个中结点都以珠江三角洲城镇总中心即珠商大本营广州、香港为回归轴心。如粤东的广东第二大平原——潮汕平原地带，即韩江三角洲平原，由于韩江、榕江、练江以及其他大小 60 多条支河均集韩江独流入海，相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系统有自身一定的独立性。1933 年的汕头，拥有 19 万人口，3000 家商店，口岸的发展、经济规模水平在全国也曾排至第七位<sup>⑧</sup>，在广东范围通常被视为仅次于广州的华南第二大商港（未包括香港在内）<sup>⑨</sup>，同时也是广

① 民国《连县志》。

② 乾隆《怀集县志》。

③ 民国 24 年《罗定县志》，地理，第六，风俗。

④ 乾隆《阳江县志》卷 8。

⑤ 光绪年《北海杂录》商务。

⑥ 湛江市工商联：《广州湾商业琐谈》，《广东文史资料》第 56 辑。

⑦ 1991 年笔者在湛江访得。

⑧ 饶宗颐：《潮汕志》，实业、商业篇。

⑨ 洪松森：《潮汕近代工商业述略》，《广东文史资料》第 70 辑。

东省内最大的侨乡。然而，该区及无论城内经济运转还是对东南亚的外拓、辐射都始终紧紧以香港为经济中心。工业品货源方面，汕头仰求香港，如当时外国人记述，汕头“接近香港这样的自由港，对外国商品的所有需求很容易从那里得到供应”<sup>①</sup>。对外贸易输出方面，始终主要以港澳和由港澳中转的东南亚为主要市场。据汕头海关历年统计，1909—1931年，汕头港的对外贸易额中，由与侨商、港商有密切关系的四个公所组织输往东南亚及港澳的数额通常占总额90%以上，至低也在83%以上。<sup>②</sup>这也造成潮汕商帮构成香港华商中仅次于珠商的第二大商帮的局面。潮汕如此，其他经济成长独立性远逊而又同处珠江水系的县区，自然更惟以香港、广州为归依中心。在近代，广东西江、东江、北江沿河县区的城镇均直接或通过佛山转接，以广州为经济中心，如四会县的香粉，在光绪年是载往“佛山香粉行发卖”广州的。<sup>③</sup>又如陈济棠主粤时期，广东修建的纵贯东西南北贯通全省重要集镇的17条公路干线326条支线，均以广州为中心。<sup>④</sup>广东沿海城镇则主要直接以香港为经济中心，而广州直接统驭的广东全省内陆城镇又最终以香港为总经济中心。这两张网络相互叠加，就组成了一个以香港、广州为圆心，包括广东全部等级分布环绕层次分明的近似圆市场网络结构。在这里，“无市不趋珠”结构已接近于经济地理学理论上标准的圆形（或正六边形）市场结构。<sup>⑤</sup>从利流关系看，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城镇经济网络也是“无利不趋珠”的，即利润最大宗还是流往珠江三角洲地区，

---

① 谢雪影：《汕头十指》第十篇。

② 王绵长：《近代华侨对汕头经济和海运贸易的贡献》，《汕头侨史》1986年第1期。

③ 光绪《四会县志》编一，物产。

④ 何苏照：《陈济棠时期的广东经济》，《开放》1985年第1期。

⑤ 曹廷藩：《经济地理学原理》，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并最终汇往省佛和省港的。所以，无论明清还是晚清民国，广东最富的商人多在广州、佛山和香港。清前期有人记载：“南海大镇为省城、佛山、石湾”，“南海繁富不尽在民，而在省会、佛山、石湾三镇。”<sup>①</sup> 广州“十三行”怡和洋行洋商伍秉鉴，拥有资产达2600万元以上。同文行洋商潘正炜总财产也达一亿法郎。<sup>②</sup> 这不仅是广东首富，而且堪称全国首富，在当时世界上也不多见。近代香港实例材料笔者尚未掌握，但可推知，香港所集中的巨商当比省一佛更多更大。这些都说明广东城镇经济网络始终是围绕着省港二元中心也即珠商的大本营创造利润的。

## 2. 粤港城镇总中心在珠三角范围的新组合与粤商对广西“无市不趋东”等级分布体系的进一步铸造

既然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变异以后的穗港总中心仍在珠三角区内，“无市不趋东”布局并未根本改变，这当然规定了粤商对广西城镇经济等级分布体系的铸造仍然如同明清，是呈“无市不趋东”特征的，所变异的只是趋东终极所在不是省佛而是穗港而已。

首先，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全省性的“无珠（商）不成市”，规定了广西“无东不成市”实际上也是“无珠不成市”的，前文已论及的广西粤商主要帮系是珠江三角洲商人，广西城镇经济又主要是粤商中的珠商营造的，典型如梧州，珠商人数占梧州粤商人数的74%<sup>③</sup>，从这个意义上，广西“无东不成市”主要内涵是“无珠（商）不成市”。

既然“无珠（商）不成市”造成了粤港城镇经济等级分布网络的“无市不趋珠”并进而以穗港为中心，那么，作为这一

① 嘉庆年间龙廷槐：《敬学轩文集》。

②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印行。

③ 据民国30年至38年《苍梧县西药、经纪采运、食糖同业公会会员注册登记》籍贯登记统计。

环状结构延入广西的西向扇面，广西的“无珠不成市”也必然造成了广西城镇经济等级分布结构的“无市不趋珠”并以穗港为总中心。一方面，人桂珠商运入广西的大部分广东商品都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所生产或流经并由省佛或穗港集散、批发而来的。如经珠商运销大量人桂的“洋货”商品，主要是由“洋货在华南的总中转港口”香港和广州承接批发而来。1932年，由香港直接输入广西的工业品就占当年广西进口货值的35.45%。<sup>①</sup>广东其他城市与广西的进出口贸易数量和比例则都很少。另一方面，珠商运出的广西农林土副特产商品也主要是销往珠江三角洲地区或经省佛省港转销国际市场的，而不是广东其他地方。如晚清民国时期左右两江沿岸地区的牛皮、八角、茴油、云耳、木耳、蛤蚧等商品都是远销广州转香港出口的。<sup>②</sup>珠商人桂的营销活动既以珠江三角洲中心城镇广州和香港为业务起点，又以它们为由桂省回归的终点。这往返之间所编织起来的广西城镇经济网络，必然最终是直接趋往珠江三角洲地区，并最终在广州、香港为总经济中心的。而在广西境内，晚清民国的梧州距离省港最近，又上扼广西各支水路的总汇，下接广东最大的运输动脉西江，最能够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分销商品和组织货源。所以，梧州构成了省港总中心在广西的第一级分中心。也正因如此，它在广西范围内聚集珠商的规模最大，广东城镇经济行业延入的程度最高，从而成为广西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由此往西，城镇的等级和规模则不断呈梯度递减，这就组成了城镇经济等级分布在广西域内的“无市不趋东”体系。

从利流关系看，广东的“无利不趋珠”、富豪尽聚省佛港澳的机制，也造成了广西城镇经济网络大利东流的总格局。从广西

---

① 潘载生：《广西进出口贸易》，《广西经济》第2号，民国23年8月。

② 概据笔者综合的左右江沿岸各县志、回忆资料。



到粤港的城镇经济网络，实际上是一条单元同一且利润主要汇往珠江三角洲省佛和省港的“生意链”。广西境内各地城镇以珠商为主的粤商，实际上都处在这根“生意链”的不同部位上数量不等地分取利润。决定这种不同部位取利数量不同的，是各地城镇粤商能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省佛香港总中心珠商实现利润的多与少。在广西范围内，梧州最靠近省佛香港，汇集着人桂珠江三角洲商品和人粤广西商品最主要的部分。这些地方的粤商，当然能最多最直接地为广州和香港的珠商实现大头利润，他们从“生意链”中分取的利润当然最大，因而富裕程度最高。而戎梧以西，随着与省佛、省港地理距离的延长，粤货销售规模和人粤桂货聚集规模相应递减，直接为广州、佛山、香港实现大头利润的数量随之递减，因而这些地方的粤商分取利润的数量也自然相应递减。所以，越往西部，人桂粤商富裕程度就越低。例如，同是经营鸦片起家，桂东端城市的梧州珠商梁颂塘可富达300万银元，而桂西凌乐县城专营烟土的当地大户——粤商石如记仅发展到光洋3000元，折银币仅1851元。<sup>①</sup>同理，人桂粤商不管如何致利，他们的取利份额又都不可能高于省佛尤其广州和香港的珠商。如清末梧州粤商梁颂塘拥资300万银元，是为广西首富。但若与清代广东的首富、广州怡和洋行洋商伍家的2100万银元拥资数额相比，则又相差了1800万银元。这种情况，1933年时吴半农等先生也从贸易不利的角度谈到过：“广西内地各都市无不对梧州为入超，而梧州对港粤又为入超。”<sup>②</sup>

而以上情形，同时也造成了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区域经济发展一系列特殊的局面，如区域经济发展的东南部率先，市场价格的东部操纵，货币流通的粤币主币等等，从而铸成了广西区域经济

①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② 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

发展诸多一直延贯至今的重要区情。

总之，正是广州—香港二元中心地位，规定着入桂粤商根据自身与广西各部位城镇市场经济关系的强弱、地理距离的近与远，铸定了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经济等级分布体系的“无市不趋东”结构以及梧州在广西城镇体系中的总中心地位。

综第四章所论，在晚清民国时期，是粤港商品经济辐射源的形成和保持，才使粤商人桂有了物质基础；是粤港城镇经济行业的充分发展，才使粤商缔造广西城镇经济基本行业有了发源依托；是粤港商品经济的巨大辐射圈使粤商能独在西邻省区广西全面造成了城镇经济的“无东不城市”局面；又是广东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域广州、香港在两广市场中的总中心地位，规定了粤商将广西城镇经济等级分布体系造就成“无市不趋东”、中心在东端的奇特结构。而商品、行业、商人和市场性城镇点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四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元素，既然是粤港的这四元素决定了粤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特殊的“无东不成市”关系的方方面面，那么，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商品经济在全国具有最高梯度水平的高涨发展，就是同一时期粤港商人促成和主导广西城镇经济发育发展的全部根源。

## 总 论

### ——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无东不成市” 格局的历史评价及当代思考

#### 一 近代广西城镇“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历史评价

“无东不成市”——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商人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之间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其实体现着广西与粤港作为同一珠江水系流域相互同一的特别密切的市场联系。通过以上的探讨，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第一，广西与粤港虽然行政区划不同，但在晚清民国时期却属于同一市场体系：两地商品生产、转输协同，城镇行业同类或同根，市场总中心同轴，这些又都是通过主体商人同源即两地城镇经济营造的主体都是粤商或者确切地说都是珠江三角洲商人这一因素兑现出来并且串联起来的，全书所论的粤港商人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特别密切的关系，正是晚清民国时期两地市场统一性的表现。

第二，在两地相互连贯的城镇经济网络所组合成的市场体系中，广西与粤港地区的地位又是不对等的。在时序上，两地城镇经济网络的形成发展历经了一个先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省佛穗港城镇点，渐到珠三角以外广东西区以及广西地区的过程。广西城镇经济网络分布就像一株根系在珠江三角洲流域、躯干成于梧州口岸、枝杈逐渐伸展广西大部地区的市场经济巨树。在发展水平的梯度分布上，粤港高居全国最高的梯度水平，而广西却低居于全

国较低的梯度水平，两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梯度差，粤港对广西有着强大的梯度推移能量；从劳动地域分工配置上，市场总轴心香港、广州所在的粤港地区部分对于中心城市在东端梧州的广西部分具有主导的地位和支配的作用，而后者对前者有着附从的地位和依从服务的作用。所以，全文所论的粤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特别密切关系，也正是这种过程移动和作用发生的外在表现。

两地之间这组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到晚清民国时期所必然出现的经济过程。它是自明代起中国封建小商品经济发展与近代经济发展梯度更高的世界资本主义大工业商品经济辐射中国的双重作用下，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和发展在珠江流域这一局部地区的具体体现。

从中国轴心范围来看，自明代起，封建经济进入小商品经济阶段，全国市场统一局面主要是通过前所未有的，以大规模经济移民迁移为指向的经济推进开发运动实现的。发达或已开发地区过密化<sup>①</sup>饱和人口沿江沿海或从其他通道向未开发的边远省区甚至境外海外地区大量疏散，开垦营生。最著名的事件和过程，沿长江轴线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等移民运动，沿陆路轴线有的山东河北人民“闯关东”，移民运动沿海路轴线有福建移民迁移东南亚、南洋群岛等移民运动，人流规模各省多有数百万计。作为当时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梯度最高、人口密度最大的广东地区移民情形也不例外。在国内，则分别向台湾、海南岛、广西诸省大量填迁，尤以沿西江、南海轴线迁移广西为最，文中所

---

<sup>①</sup> 美籍华裔著名学者黄宗智先生指出，明清时期中国的商品经济是过密化商品经济，即人口发展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的商品经济，是一种有发展而无增长的商品经济。笔者不完全同意这种结论。但是，笔者认为这个角度很有启示，并认为人口过密而导致的移民的大量经济性迁移，是我国封建小商品经济阶段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言及的占广西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土白话人、客家人、潮汕话人正属这种情形；向国外，则表现为前文所论的粤籍移民大量迁往东南亚、南洋群岛侨居垦殖谋生。广东大量农业移民入桂所造成的粤桂经济的区域一体性，必然牵拉粤商人桂，造成两地城镇经济网络的区域一体性，从而最终完成两地市场统一性的实现。

从世界工业化国家的轴心角度看，处在世界范围经济发展梯度最高水平的各国经济技术对中国的推移，客观上要求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化、一体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而香港坐落在珠江流域又为首选之区，这也必然大大加强粤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相关度，从而使两地市场统一性进一步加强和成熟。

广西城镇经济“无东不成市”格局既然是中国历史积淀的延贯和近代新文明背景下更高技术经济梯度推移的双重作用的结果，是当时珠江流域中西江流域区域经济对城镇体系格局最自然、最合理也最有效益的选择。经呈此格局的城镇体系的市场组织，粤港商品经济的强劲辐射，对晚清民国时期整个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表现在：

第一，大大优化了广西的区位条件，使广西在全国少数民族省区中，处于最为优越的经济区位上。广西素来为偏僻边远、封闭落后、开发较晚的少数民族省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广西·山川志》中记载：明代的“粤西僻在一隅，不得与五岳四渎（按古称独流入海的长江、黄河、淮河、济河为四渎）……怪石参差，幽洞玲珑，十洲三岛，……山多肤立，而少草木；食土之毛者什不得一。三江之水，势若建瓴，而注于东渤。故其民类，不能逐倍称之息，家鲜盖藏。……沮洳不修，金石为焦，惟束手以听命诸天。岂巧拙故殊，亦限于山川”。而晚清民国时期“无东不成市”格局所导致的“无市不趋东”城镇体系，就使广西这个位置偏僻、市场发育原始、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省区，径直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区之一广东、最大的增

长极穗港以及广大的海外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这就整个改变了广西的经济区位；原先只无声无息“注于东渤”的西江各支流成了汽轮穿梭、经抵穗港、联通世界的“黄金水道”；原先只有短距的运输和渔捞作业的环北部湾海岸线也成了桂南联结穗港的巨大通途——落后的广西省区由此整个纳入了粤港为轴心的两大生长轴线地带，即西江轴线经济开发带和南海沿岸轴线开发带之中。而如前所论，港穗是全国最大的、辐射能力最强的增长极之一。这样，广西成为全国范围内惟一最靠近全国级经济总中心的沿边少数民族省区。较之云南、贵州、新疆、西藏、内蒙古、甘肃等少数民族省区，较优越的区位给近代广西带来了较多的发展机会，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的不足。如20世纪30年代广西桂系当局主持的“广西建设运动”，成绩颇著，广西在全国竟以经济建设全国“模范省”名噪一时，尽管这与当时出于自身集团利益的桂系军阀的锐意图治有关，但其建设基本思路就是借粤兴桂，特别是利用西江轴线开发带机制进行实业建设。前文所举当时桂系政府所举办的较大规模的官营新式工业，全部布局在西江、浔江、郁江所组成的西江走廊带。<sup>①</sup> 尽管广西经济发展始终与粤港有着很大的时间差和程度差，但毕竟深受珠江市场体系的轴心区即粤港尤其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牵动，能够直接从轴心地区较快的经济增长中摄取自身发展的新活力、新能量，这已成为广西地区发展自身社会经济一个特有的重要优势。

第二，由港粤径直向广西地区输入了极其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促进了广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劳动力要素。入桂粤商及从业人员本身就是从粤港输入的工商劳务力量。前文已论，

---

<sup>①</sup> 参阅民国《桂政纪实》、民国《广西年鉴》等民国时期有关旧文献。这些记载都表明，桂系当局举办的现代工厂多在梧州、南宁两地。

由于自然经济瓦解度低，广西历来缺乏本省的专业工商业者，粤商人桂就给广西输入了大量的工商劳动力。1935年计，仅罗定一县“计在广西各埠营工商者约四万人”<sup>①</sup>，罗定并非经商人桂人数最多的县份，广东仅珠江三角洲就有十多个县市，若以此推算，广东输桂商务劳动人口当以数十万计。而1923年广西各城市人口（一部分圩镇人口尚未列入）为603097人<sup>②</sup>，可见粤商及从业人口已构成广西基本的工商业人口力量。此外，粤商在各城镇的市场组织，也使广东农业移民在广西大多地区进行以粤港市场为指向的商品性农业开发成为可能，从而又牵拉了广东农业移民继续大量涌入。如市场上呈“无东不成市”格局的柳城县，1854—1934年间连续涌入的广东客家人竟布满了县属各大市场和柳河沿岸。<sup>③</sup>保守地估算，20世纪30年代，从明清至民国陆续迁人和繁衍的广东土白话人、客家话人、潮汕话人至少占广西总人口一半以上。<sup>④</sup>以1935年1月广西总人口13325293人计，广东移民及后裔当有6662646人（若计入北海、钦州、防城港比例会更高）。<sup>⑤</sup>这样，与“无东不成市”局面相关联，粤省对桂还输入了数百万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且，这部分劳动力经受过广东商品经济大潮的洗礼，拥有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具有较强的开发进取精神和经营意识，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素质较高。广东工商业农业移民的进入，还有力地加速了广西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民族融合过程，加强了汉族先进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带动影响，倍增了广西经济开发的人手力量，形成汉族

---

① 民国24年《罗定县志》。

② 民国24年《广西年鉴》第二回，第241页。

③ 民国23年《柳城县志》卷之四。

④ 薛暮桥：《广西农村经济概况调查》，民国23年版。

⑤ 广西统计局编：《晚清和民国时期广西统计史料摘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页。

与少数民族人民团结凝聚，共同开发八桂大地的大好局面。(2) 资金要素。广西素来地瘠民贫，家鲜盖藏，“富户寥寥，藏金之家不及万圆，隼粟之家不及三千石”<sup>①</sup>，资金积累基础薄弱，开发速度及程度深受制约。而粤港商人入桂经营，就从富庶的广东给广西带进了可观的开发资本。又如光绪至民末，凌乐的粤商苏义记抵桂时，带来资金 25 元光洋，开苏杭店兼营车衣，后来发展到 5000 光洋；20 世纪 30 年代，南丹城粤商朱林记带 400 元资本入抵，经营土洋杂货，抗日时发展至 5000 多元；罗城粤商邝广华从佛山初抵时带来资金 600 银币元，至抗战胜利时发展到 20 余万银币元。<sup>②</sup> 粤商初抵带入的资本当然大多不过是广东所剩余的小资本，但是，粤商人桂计以数十万众，所携资本相合，对广西就不是个小数字，若再加以发展资本相合，对广西就更是举足轻重了。据 1948 年 8 月《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广西分会会员调查表》统计，广西所有会员厂家资本总额合 1804251.5 万元。其中广东资本家厂家资本总额竟占了其中的 55%，为 986127.5 万元，而广西及其他省籍资本家厂家资本份额不超过总额的 45%。<sup>③</sup> 又，1933 年，广西九个主要城市（梧州、南宁、柳州、玉林、贺县、百色、全县、桂林、龙州）商业资本总计是 5165079 元。笔者依各市粤商店铺比例按最保守原则估算，其中粤商资本就多达 2907936.3 元，占商业资本总额的 56.3%。<sup>④</sup> 因为粤商人桂，一般多长期以至世代定居，正常年景下粤商资本都不再抽回广东。这样，这笔甚至超过本省资本数额的巨大资本，无疑倍增了广西当时经济建设的资金实力。这对广西而言是特别宝贵的。(3) 技术要素。“无东不成市”城镇经济格局也径直通

① 民国 25 年《来宾县志》之三。

② 吴敏：《邝广华的发家史》，《罗城文史资料》第 2 辑。

③ 该表册存梧州市档案馆。

④ 民国 22 年《广西年鉴》第一回，商业统计部分。



过粤商人员举办新式工厂，将包含着新生产力的西方科学技术由粤港输入广西，前文所举粤商工业企业实为科技推移入桂的载体。这类企业具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对广西人民起到了明显的示范、带动作用。如宁明县壮族人民在道光年以前，只知道向从事加工业的粤商提供八角原料产品，但咸丰年以后，也学会了广东人的技术，自己开坊“蒸作茴油”，产出竟成为“州中贸易”的“大宗”，并远销“出洋”，“获得甚厚”。<sup>①</sup>又如那坡县有名的民族资本企业黄恒棧，原先烟丝生产用手工操作，到第二代的黄奕勋时，着手将广东机器工业技术引进那坡，派人从广州购回四台机动刨烟机和印刷机、发电机、电动机各一台，装机运转后产量比原来提高了20多倍，成为广西资本实力位居第五的资本家。<sup>②</sup>（4）生产、生活资料要素。“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广西城镇系统所组织销入的粤港商品作为外来实用物资的主源，给当时生产力状态还比较落后的广西地区的人民提供了手段较新、功效较佳的生活物品和生产工具，极大地满足了广西的社会需求，接济了广西人民的生计，促进了广西人民的生产。广西许多生产资料，许多农林等作物的优异品种都是从广东购来在广西逐渐推广的。据李炳东先生研究，广西著名的荔枝、苍梧古风荔、北流新丰黑叶、灵山香荔，陆川、北流、博白等县出产的桂味、糯米糍、桂绿等，都是从广东引种的。<sup>③</sup>稻谷的广东红，橙果的新会橙等也是如此。广东良种的输入，提高了作物果实的产量和质量，从而提高了广西农业生产率。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生活资料如煤油、洋纱、火柴等，也给广西人民创造了生活便利，提高了生活效率。不少与生产工具相关的洋货更是直接提高了生

---

① 光绪八年《宁明州志》卷下，风俗物产。

② 麦庄耀：《右江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黄恒棧》，《桂海论丛》1991年第4期。

③ 李炳东等：《广西农业经济史稿》，广西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页。

产率。上述生产要素的输入广西，当然转化为生产力的相应发展。

第三，将广东乃至国际上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和经营观念传入广西。广西颇有名气的玉林商帮的兴起，也可以说是受广东货殖观念和方式直接影响的典型结果。玉林人本来并不善商，在玉林最早经商的是广东人，乾隆年以前玉林县城和大平山圩已建立起粤东会馆。<sup>①</sup> 玉林人初时往往是到粤商店铺里做学徒，逐步学会和掌握了做生意的基本套路，而后逐渐独立开业的。到民国中期，玉林商人势力发展很快，不仅在本老家数上反超粤商，而且还向广大桂西地区辐射，故而宜山、百色等桂西城镇中，玉林五属会馆时常可见。一位玉林老工商者曾说：“是广东人教会了玉林人做生意。”1908年，广东商人梁颂塘等在梧州创办了广西最早一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股份有限公司——西江航业股份有限公司，此后，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形式陆续由东而西，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地陆续出现。20世纪一二十年代，广东资本家在梧州创办了广西第一批资本主义近代工厂，此后，近代工厂制度遂由东而西，逐渐成为广西各重要城镇中工业企业的基本制度。先进经营方式、观念的人桂，有力地开掘了广西生产者、经营者的智力潜能，加强了广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要素的有效构成，为广西添加了新鲜的生产力。

第四，广东和香港、澳门的区域经济分工需求，初步焕发了广西的产业优势，刺激了广西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广东和香港地区对桂辐射，实际上是一个粤港向广西寻求建立经济协作分区的过程。一方面，它要使广西地区成为其商品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它要求广西向它提供更多的粮食和特产商品，以满足其出

---

<sup>①</sup> 饶任坤、陈仁华主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9、475页。

口贸易需求和工商业户、商业化农户日益增长的食粮需求，这一过程必然会刺激广西商品生产向前发展。首先，它推动了广西稻作农业的长足进步。明代以前广西虽已植稻，但多粗放，大部分土地仍为荒野，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广西：“深广旷土，田家所耕，百分之一耳。”但至明清民国，随着广东越来越强烈地依赖桂米，粤商越来越多地人桂购米，昔日荒地大片大片地被辟为水田、梯田，广西农业发展水平迈上了一崭新台阶——成为支撑广东尤其珠江三角洲经济繁荣的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清代，每天从戎圩销往广东的广西谷米竟有六七十万斤，此计一年可有200万石以上，以至于当时“粤东民食”，“全赖西省米源接济”<sup>①</sup>。民国时期，“广西谷米，每年由梧州出口年约三百万市石”<sup>②</sup>之多。另外，粤港商品经济的辐射还启动了广西各县农林副工各业商品生产基地因地制宜，陆续形成。如融水县贝江一带杉木生产基地，原来这里“大都是茶林和青山”，“种植杉树尚未成为专业”，约在19世纪50年代，广东商人大批入山购木，遂使杉木种植迅速走上商品化的道路。至临近1949年时，商品杉林地发展到792.912亩，占大苗山所有林地的45%，每年至少运出10株商品杉。又如，广西种桐榨油历史悠久，“各土州俱出”，但种植规模很有限。近代以降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上航空、汽车等工业迅速发展，对具有不透水、不传电、速干等性能的桐油仰求剧增，广州的出口贸易对广西的桐油生产提出了更大的需求，从而促使广西在20世纪30年代掀起了广种油桐的热潮。广西当局当时还实行了“总动员植桐”，向凡能植桐地方的农民贷款供种。当时各县植桐面积多达110万亩。<sup>③</sup>以柳州为中心，柳城、

① 桂平县大宣圩乾隆五十五年《奉两广部堂福公宪恩禁供应碑记》。

② 孔繁珉：《广西谷米运销》，民国25年广西省政府印行。

③ 邱昌谓：《广西县政》，同时参阅谢裕光《广西桐油产销概况》，《农业通讯》1947年8月1卷8期，第183页。

象州、雒容、榴江一带还出现了经营油桐生产的资本主义垦殖场。<sup>①</sup> 1937年，广西桐油经广州、香港转销国外总值达1000余万元，约占当年广西出口总值的23.5%，凌驾于矿产、牧畜、稻米而跃居首位。<sup>②</sup> 广西从而成为全国桐油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其他种植业如种烟、种果等也程度不同地有着类似情况。粤港辐射所促成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初步开发，特别有利于水网丰富、山林面积广大、土产资源丰富的广西地区生产力的匀布发展，使素来封闭落后的广西，得以初步形成与粤港相配置的劳动地域分工，得以初步形成适应于区域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开放式产业结构雏形，并在这一结构中体现出自身固有的经济优势来，从而铸成能够容纳和生发更高水平生产力的新的经济地理格局。

第五，粤港辐射对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启动，非常具体地体现在这一历史阶段广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广西人民由于承受粤港经济辐射，致利条件明显改善、致利机遇显著增加。粤港辐射把广西推到了直接而向珠江三角洲和海外国际大市场这一十分有利的经济区位上，给广西人民带来了明显的经济实惠。如在桂平县，马尾松原来只当柴烧或用以烧炭，而近代“轮舰既通”以后，广东地区大量用它作为木材，于是“松价腾贵，贫民日砍一、二株，挑入城市，高者银五、六角，少者亦三毫以上”<sup>③</sup>。又如光绪年间，两广商路热闹起来以后，玉林人民“以蓝取靛，花生取油，甘蔗取糖，三者为大宗，岁得厚利”<sup>④</sup>。经济收益水平的这种明显提高，当然不断提高了广西人民的生活水平。

---

① 邱昌渭：《广西县政》，同时参阅谢裕光《广西桐油产销概况》，《农业通讯》1947年8月1卷8期，第183页。

② 陈正祥：《广西地理》，正中书局印行，第80、70—79页。

③ 民国9年《桂平县志》。

④ 光绪二十年《郁林州志》。

第六，焕发了广西沿海优势，羽翼和培植了广西作为大西南出海大通道的雏形，为后来广西区域经济战略地位的改变奠定了重要基础。它的标志是北海作为广西准总城市中心和第二大经济增长极在近代的崛起。1876年开埠以后，北海在广府商人的主营下崛起，虽然它始终位于梧州之下，并仍以港穗为主要趋附中心，但是它毕竟径直入海，可以相对独立地与东南亚、西欧诸国发生直接贸易联系，这就为广西乃至中国西南地区初步开辟出了一条崭新的出海大通道，开始改变此前商品货流单一由梧州集散抵港穗出海的状态。同时，在与港穗频繁来往商务的顺带、支持下，开始了径直抵东南亚、南亚和西欧各国的贸易。这是近代广西城镇“无东不成市”格局母体中孕育出的新一走向的格局突破，这一突破对于广西城镇经济体系而言，具有深远的跨世纪的意义。

第七，“无东不成市”格局运载的粤港对桂辐射所促进的城镇聚落前所未有的发育发展，还兼具有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综合的积极作用。入桂粤商本身在明清即已构成了体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广西市民主体，近代则构成了体现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广西的资产阶级主体。这为后来辛亥革命在广西的发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城镇网络所连通而成的两广商路，也成为新文化、新思想进入广西的最重要的通道。如清季的反清民主革命思想，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是从粤港人广西梧州进而播散到全省各地的。这种综合的积极作用虽是非经济的，却也有着深刻的价值效应——它们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信息和文化教育的，但都是为了营造使社会经济实现长远的更大发展的合理的社会环境——这又回归到了城镇经济的意义上来。

从粤港角度看，广西的上述发展不过是珠江三角洲的繁荣向珠江水系上游诸分支区域的推进发展及递减分布，它反过来又促进和助成了珠江三角洲更大规模、更高程度的发展，促进和助成

了香港和广州的繁荣，从而对于粤港地区在全国最高经济梯度地位的保持和香港在远东地位的日益提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广西角度看，珠江三角洲的繁荣既为自身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和条件，同时也是本身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向珠江下游地区回馈和递增的成果。作为珠江市场体系总核心，粤港无疑集汇了当时两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较大利流，但作为同一体系市场的一个重要部分，广西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是在当时历史、交通和区位的条件下，广西所能获得的最大利益。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对于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无东不成市”格局所运载的粤港的商品经济辐射也有着巨大的积极的历史作用。

## 二 近代广西城镇“无东不成市”格局缺陷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基本克服

当然，上述过程毕竟是在不合理的封建社会制度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大环境下发生的，它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历史缺陷，我们可称之为“区域社会病”。如粤商资本由于封建剥削的制度导向，经常滑向“无商不奸”的邪道。清代桂平、江口粤商对农民高利贷剥削高至一石还一石七<sup>①</sup>；近代不道德的鸦片贸易在梧州、南宁竟然发展成为大行业；融水粤商叶长发竟可以只用18元银毫，霸去了苗族山了贾老芳有16000株松木的山木<sup>②</sup>等。又如由于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枷锁，近代城镇经济的发展又是畸形的。粤商运用城镇经济行业所进行的营运活动，并无完整的国家主权保障，他们主要推销的是凭借侵略特权倾入中国的

---

① 饶任坤、陈仁华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5页。

② 《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

“洋货”。他们组织出口货物，不可避免地起到了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廉价原料服务的作用。相比起桂商，城镇经济大利确实归于粤商，但归于粤商之后其中的最大部分最终还是流入外国资本家之手。无论是“无利不趋东”还是“无利不趋珠”，实质上都是无利不趋外国资本家。这说明了在近代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广西城镇经济网络中，民族经济的利益是大量外溢的，这些是我们在肯定粤商促进了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积极意义时所不能忽略的。

作为一种区域经济布局，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无东不成市”格局及其所导致的“无市不趋东”等级分布结构，也有着自身的缺陷，区域经济学称为“区域经济病”<sup>①</sup>。其主要症状是：其一，由于两广之间、港穗与广西各城镇之间的市场联系是东西横式、东强西弱的，所造成的广西域内生产力分布呈东高西低极不匀称分布。以粤港为轴心的轴线直接开发力度十分有限，这一结构，无力全面直接担负起资源和能源丰富，但距离较远，山岭纵横、交通闭塞的广西西部开发的牵动重任；其二，由于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分布的“无市不趋东”结构，实际上这是轮运时代的产物，是按照河流及海岸的东西趋向自然分布形状发育成长的。缺乏河流沟通的广西南北之间，交通运输极不发达，因此，广西虽然有1595公里长的海岸线，有可以径直出海的重要经济中心城市北海、钦州、防城港口岸，甚至广西沿海的位置较之于粤港，与我国海疆所拥有的最多的邻国即东南亚诸国以及西欧至中国航线的地理距离更为短近，北海、钦州、防城港、港市较之梧州方位也更加偏中，却仍然难以形成足够深广的腹地，从而未能在南部沿海形成能够统驭广西全省的外贸总中心城市群。这使广西沿海的区位优势未能形成具有全局战略地位的优势，沿海的区位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

<sup>①</sup> 参见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页。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新中国的建立，根除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致的“区域社会病”，并且也着手开始进行治理广西“无东不成市”格局“区域经济病”的巨大系统工程。1949年以来，特别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一工程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展示了美好的前景。首先，党和国家重点投资了铁路交通建设，至目前为止，已建成了以柳州为中心枢纽（柳州设有铁路局，为全国13个铁路局之一，是区域路网的指挥和调度中心）以湘桂、黔桂、黎湛、枝柳铁路南昆为骨干线，包括南防铁路等地方铁路支线，初步覆盖了广西大半壁国土的铁路网，20世纪90年代中叶时路网密度已超出全国路网平均密度10%。特别是湘桂路，南北斜贯广西中部，与南防铁路衔接，并与近年修建的桂海高速公路相合，构成广西交通的最大动脉。<sup>①</sup>其他几种主要的交通设施、方式如公路等运输方式也获得长足发展。如最近几年，桂林—南宁—北海高速公路全线贯通。铁路和公路是较之轮运速率高、载量大、受自然地形限制较小的现代运输方式，铁路枢纽在中部的崛起以及南北路线的贯通，改变了历史上广西交通“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单一的趋东走向。正是在这一新构架上，广西圆心地带的柳州迅速崛起，连赶梧州、南宁、桂林，现已成长为广西最大、在全国也颇有地位的工业制造中心城市。而湘桂铁路干线上的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经济规模也都已跃超梧州，整个广西城镇地域体系呈现出向中地论“克里斯塔勒模型”（即中心在圆心的正六边形城市等级分布体系）还原的趋态（参见总论表1）。

---

<sup>①</sup> 汪宇明：《合理布局与持续发展》，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总论表 1

单位：%

项目 地区	增长极	国内生产总值 占全区比重	工业总产值 占全区比重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占全区比重
桂东南	梧州、玉林、北海、钦州、贵港	13.34	13.67	15.44
桂中	桂林、柳州、南宁	21.9	41.97	20.26
桂西	河池、百色	2.14	2.15	2.46

资料来源：根据《广西统计年鉴》（以1989年数据进行计算）。

另外，在沿海开放、发展战略中，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广西南部沿海尤其北部湾港口群的地位和作用。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北海被列为享受特区政策的中国沿海14个开放口岸之一，并决定修建以北部湾港口群（北海—钦州—防城）为进出口指向的、贯通中国整个大西南的铁路大动脉——南宁至昆明铁路，该路已于1997年正式通车。1992年5月党中央的四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作出了“充分发挥广西作为西南地区出海通道的作用”的重大决策，1993年南宁被国务院列入享受沿海开放政策的城市。特别是最近，中国与东南亚联盟（成员国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将广西沿海地区推至更为凸显的主要通道和结合部的区位上，广西已处在中国—东盟自由区的中心位置，已成为双向沟通中国与东盟的主要国际大通道和基地。广西南部沿海的经济区位上升到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高度。未来，不仅广西全省，而且整个大西南包括西藏、云南、贵州、四川、湘西、鄂西诸省区，都将由南昆铁路构成主干的西南大通道所连接的北部湾港口群为重要出海口，（特别是工期较长的三峡工程切断川江出海口的情况下）。而且，湘桂铁路连通全国腹地的地位、作用将大大提升。这就意味着，北部湾钦、防、北诸港，不仅将要成为广西而且将会成为中国西南部最大的外贸中心城市群，成为整个中国对接东盟的最大的外贸中心城市群。若再通过湘桂

铁路、桂海高速公路南北相连通，全国腹地对接东盟的货物也会主要南下从北部湾港口群进出，广西将无疑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国际大通道。广西沿海未来的这种态势对广西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将是前所未有的，它将除去晚清民国时期广西沿海口岸等地有限能量发挥有限的病症，充分焕发出巨大优势，使广西成为南中国海利用海上通道、发掘利用海上资源，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进中国的主力省区之一。

### 三 全面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遵循和运用“无东不成市”区域经济规律的战略选择

然而，笔者这里特别指出，尽管到目前为止，广西域内城镇经济格局发生了上述重大的变化，但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从整个珠江流域和南海沿海地区来看，经济技术发展由东而西推移的梯度分布总体格局并没有改变。当今，广西经济发展的“无东不成市”规律作用，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大幅增强。原因有三：一是明代以来“无东不成市”格局，主要是由于市场张力下全国经济重心东南转移和东南部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重要性的显著上升所造成的，当今，这一格局基本未变；二是自19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位于世界东北方向的美国与日本作为世界第一、第二经济大国崛起（通常分别占世界经济份额的30%和15%以上，美国甚至一度达到50%）<sup>①</sup>，世界经济重心从过去的西欧地区转移至世界东北地区，这种来自东向的新的巨大市场引力，又使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趋东性空前增大，粤港澳对桂辐射，也因此添入新能量，大为增强；三是，当今地处中国东部的三大核心经济区中，大珠三角圈（指粤港澳）继续保持着第一核心区

---

<sup>①</sup> 王天玺：《多极世界和为贵——兼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求是》2003年第7期。

的地位，以2002年GDP计，其经济总量甚至大于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经济存量之和。广西作为接受这一最强大经济辐射的距离最近的地理空间系统，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区位优势更为前凸。三因相叠，使自14世纪以来启动的广西“无东不成市”经济成长的过程始终在运行，及至当代，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呈强势。前几年广西交通部门有一份统计，广西通往广东的东西走向的南梧二级公路上，日均车流量多达一万多辆，而作为广西出海大通道的南宁至北海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仅3000多辆，便是明证。

首先，香港首位度极高的最大经济增长极地位从未改变。19世纪5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功能日趋多元化，在始终保持转口贸易商埠巨市地位的同时，凭借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关系，香港大胆引进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产业，至70年代，又成为世界区域中有重要地位的制造业中心，如成衣、钟表、玩具等出口居世界第一位。从70年代末祖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它又凭借与祖国内陆固有的区域经济联系，与内陆尤其是与香港珠江三角洲地区联体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继续上升。如由于大陆急剧增加的转口贸易80%是通过香港进行的，使香港进出口贸易总额高居世界第10位（1991年进出口总值为1980.5亿美元），而按照人口平均计算，香港外贸人均值为3.4万美元，列世界第一位。今日香港已不再是晚清民国时期单纯消费性和经营转口贸易的商埠，而是一个工业、贸易、金融、航运、旅游高度发达的世界区域性中心城市<sup>①</sup>，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80年的3471美元增至1991年的14000多美元，居亚洲“四小龙”之首，甚至高出许多欧美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因此，香港在晚清

---

<sup>①</sup> 匡世平、张中华主编：《港澳台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1、55页。

民国时期即与上海合成的沪—港二元式全国经济总中心城市地位没有改变。随着 21 世纪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全面开放以及京九铁路贯通等因素，香港上述地位还会不断强化。很显然，无论广西区内城镇布局发生何种变化，都仍会如同历史上一样，香港对广西城镇经济整体仍将发挥总轴心的辐射作用和支配作用。

其次，港澳粤地区仍是全国从而也是珠江流域经济技术发展梯度水平最高的地区。广东是中国最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最先受惠的省区，深圳是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改革开放 26 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珠江三角洲则已与港澳形成前店后厂联体发展的态势。随着香港在国际竞争压力下工业产业升级和朝高科技转型，制造业中许多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大量内迁大陆，主要迁往珠江三角洲地区。到 1992 年底，香港企业界在珠江三角洲设立厂家达 2.5 万家，雇用员工 300 万人。以后几年，香港 25%—30% 的企业已内迁珠三角，其中部分行业如皮革、电子、塑料等内迁高达七八成，形成了广东生产、香港营销、“三来一补”、“前店后厂”的格局。改革开放 26 年来，香港是内地的最大投资者（香港对内地投资，占香港对港外投资的 80%），而投资又主要集中在广东，1979—1989 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 103.29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港澳。<sup>①</sup>

同时，作为中国第一大侨乡，改革开放以后广东侨资侨汇返乡再现辉煌，更为广东注入了其他省无法比拟的经济活力，重构了传统上广东与东南亚华人经济圈国家的经济循环。如据不完全统计，1989 年粤籍华侨、港澳同胞仅向家乡捐赠的实物和现款一项计合人

---

<sup>①</sup> 李小舰等：《启示与借鉴》，载张江垠等主编《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6 页。

民币 50 亿元以上。<sup>①</sup> 加之，美、日等外国企业也较多在广东投资。

这些都使晚清民国时期即已形成的广东经济发展梯度在全国最高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1989 年广东社会总产值 2757.2 亿元人民币，为全国第二位<sup>②</sup>，若计入港澳，无疑当为全国第一位。自然，它在珠江流域范围中的最高经济梯度地位更不会改变。1989 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广东为 3644 元，广西为 1299 元，贵州 1057 元，云南 1254 元<sup>③</sup>，在两广城镇经济等级分布中它自然总体上仍呈穗港为总中心的东高西低分布（参见总论表 2）。

总论表 2 粤桂两省区的增长极结构分级及相应数据表

能级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广 东		广 西	
		占全省工业 总产值比重	城 市	占全省工业 总产值比重	城 市
特强	100 亿元以上	7% 以上	广州、深圳	30% 以上	—
次强	40—100	2.8%—7%	佛山、汕头、 东莞、中山	12%—30%	南宁、柳州
中强	20—40	1.4%—2.8%	珠海、江门、 湛江、茂名、 潮州、韶关	6%—12%	桂林
中弱	5—20	0.3%—1.4%	肇庆、惠州、 阳江、清远、 梅州	1.5%—6%	梧州、玉 林、贵港、 百色
弱	5 亿元以下	0.3%	汕尾、河源	1.5% 以下	钦州、河 池、百色、 合山、凭祥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1991）；《广西统计年鉴》（1990），并据此推算（广东工业产值为 1990 年数据；广西工业总产值为 1989 年数据）。

① 李小舰等：《启示与借鉴》，载张江垠等主编《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6 页。

② 同上。

③ 张恒：《珠江流域区域经济协作探讨》，载张江垠等主编《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可见，两广经济技术发展梯度落差仍然巨大。前文已论，存在梯度系统分异就存在轴心支配和经济推移，粤港地区自然仍是商品经济最强烈辐射广西并且对桂具有总支配作用的地区。在交通上，西江仍是沟通广东、广西的大动脉。在商业上，广西仍是广东货销经西南的中转站，同样的，桂西、桂南的木材、粮食、土特产，大多数也是经过广州而销往各地的，直至今日，广州仍然是广西等腹地进行对外贸易的必经之地。<sup>①</sup> 1986年广东实现的50亿美元中，至少有十分之一产品是广西提供的。1988年广西出口总额5.4427亿美元，其中出口香港就占40.1%，澳门占1.2%。<sup>②</sup> 香港对广西总轴心作用尤其十分明显。据笔者调查，南宁银河大厦每年旅住的客商中，仍以广东流商为多。<sup>③</sup> 而在1992年中越边境广西段的边贸热中，生意做得较大宗的，大多是抵桂的广东厂家、客商。广东地区从寻求广西的区域分工、以促进自身经济更快增长的利益驱动出发，也较多将资金投向广西。如1991年与广西达成协议，向坐落在桂西的全国最大铝矿基地平果铝矿投资2亿元人民币。<sup>④</sup> 1989年7月，两广达成了全国省际合作项目规模最大的（计划工程静态总投资22.59亿元，动态总投资28.58亿元）项目——两广共同开发长洲水电枢纽的协议。按协议，广西内外资股份占10%，广东方面内外资股份共占90%。<sup>⑤</sup>

---

① 李蒲弥等：《广州经济中心与珠江流域腹地的关系》，载张江垠等主编《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张江垠等主编：《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348页。

③ 原南宁银河大厦营业部经理马月桂同志提供。

④ 张江垠等主编：《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⑤ 张江垠等主编：《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004年8月，广西区企业调查队对广西539家不同类型企业开展了“广西企业参与泛珠三角经济圈经贸合作”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广西企业与各省区均有贸易往来，但密切程度以粤港澳为最高。

首先最密切的是与广西山水相连、人文相通，长期以来以兄弟相称的广东省，有89.50%的广西企业与广东省有贸易往来，84.84%的广西企业有产品销往广东省，有91.80%的企业谋求进一步加强与广东的经济合作。

另外，与广西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的港澳地区，有23.21%的广西企业与港澳有贸易往来，13.12%的广西企业有产品销往港澳，有55.43%的企业打算进一步加强与港澳的经济合作。

第二是位于广西北上必经之路的湖南省，33.70%的广西企业与湖南省有贸易往来，30.90%的广西企业有产品销往湖南省，有25.28%的企业想进一步加强与湖南省的经济合作。

第三是与广西西向邻近的云、贵、川三省，分别有25.97%、21.82%、20.72%的广西企业与四川、云南、贵州有贸易往来，分别有21.73%、15.52%、17.29%的企业打算加强与四川、云南、贵州的经济合作。

第四是与广西同是沿海省区的福建省和与广西隔海相望的海南省，分别有17.40%、16.85%的广西企业与福建、海南有贸易往来，分别有15.45%、18.95%的广西企业有产品销往福建、海南省，分别有21.51%、21.73%的企业打算进一步加强与福建、海南的经济合作。

第五，与广西企业贸易往来较少的是江西省，仅有6.08%的企业与之有贸易往来，仅有4.66%的广西企业有产品销往江西，仅有3.33%的企业打算进一步加强与江西的经济合作。<sup>①</sup>

---

<sup>①</sup> 孔杰：《广西企业与泛珠三角关系密切》，《广西日报》2004年8月23日。

这些都说明，解放后，虽然由于交通设施和生产力的匀布以及建设重点转为桂南沿海和西南通道，“无东不成市”格局以及所致的“无市不趋东”结构的单一性，已经明显弱化，甚至城内城市的分布表征上已呈现中心归心趋向，但是，珠江流域经济发展总体上的东高西低梯度结构和港穗总轴心作用，仍然规定了现在乃至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东不成市”仍是广西最基本的区域经济格局，它所体现的珠江流域的基本的区域经济规律，仍是广西城镇经济发育所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区域规律，也只有遵循这一规律，才能给广西城镇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建设带来持续发展，创造长远的、最佳的整体效益。

应该看到，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思维影响，“无东不成市”规律一度被淡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广西狠抓中西部地区建设，尤其改革开放以后，重点狠抓了南昆铁路建设，狠抓了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对外开放龙头区域的建设，有效增强了广西经济自主成长能力，合理匀布了生产力。但是，也在不知不觉间出现了另一种“区域经济病”：作为承接粤港澳辐射第一梯度地区的桂东、桂东南地区项目建设和对接港澳的东部地区交通建设严重滞后，致使承传数百年、市场张力最强大的、以港澳为轴心的东西走向的开发轴线，呈趋弱状和凹陷状，没能在牵动全区经济发展全局中发挥出应有的更大作用。针对区域布局的这些严重缺陷，广西要遵循“无东不成市”规律，主动融入(9+2)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结合广西实际，具体应该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要正确认识与处理经济建设中的东南关系，将对接东盟与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有机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近年来，广西作为西南出海大通道区域，南部沿海城市建设得到了重点发展，南北钦防经济区作为广西经济发展的龙头，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建立经济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和主通道省区，作用日益



凸显，发展势头喜人。但是“无东不成市”规律告诉我们，还应该正确认识与处理广西的东南关系，在重点抓好南北钦防开放龙头的同时，还应该将东拓粤港澳、融入珠三角作为全区重要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之一。特别是自2003年以来广东倡导建立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实现粤、桂、闽、湘、赣、云、贵、川、琼、港、澳（9+2）区域大合作。这对广西遵循“无东不成市”规律，加快发展是个极好机遇。要摒弃那种把“东拓”与“南出”相割裂、相对立起来的观点。这是广西新一轮改革与发展能否取得新突破并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在广西区域经济格局中，南部沿海开放带动与东向联动港澳及整个东部发达区域同等重要，缺一不可，虽方位相异，却又相辅相成。其实，广西“南部”因素中，蕴含着大量“东部”基因，反之亦然。如秦汉以来，位于东部的漓江→桂江→西江→北流江→南流江商道，长期支撑着“南部”合浦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明清以来，南北钦防商业的初始繁荣，也都是广州府商人大量抵达而形成；即使当今，由于现代交通条件对河流走向式的区域经济格局不断超越，如南北钦防也因凭借铁路和高速公路为轴线，形成西南出海主通道区域，但现实中，粤港澳辐射仍是发达地区高梯度技术经济对该域辐射及产业转移的主源泉，要全面和正确理解党中央关于“充分发挥广西作为西南地区出海通道的作用”决策的含义。从广西的实际情况来看，南昆铁路修通以后，西南出海通道不仅是指往北部湾港群出海一路，而同时还包括黎湛路南下湛江港出海和贵港至梧州直下广州港澳出海两路。特别是不应把贵港梧州直下穗港路当做“明日黄花”，当做已属过时的、无足轻重的出海通道来对待。晚清民国时期连通两广、直指全国最大经济增长极香港、广州的西江“黄金水道”，实际上也担当了滇黔出粤港商路的作用。如前文所举的贵州榕江的杉木排就是由水路漂由梧州由穗港出海的，清季梧州有滇、黔会馆之设也为明

证。全方位地理解西南出海通道，有助于我们避免在交通、城镇布局建设项目安排、市场选择上的片面性，那种把大西南通道仅仅理解为南走北部湾的认识误区尤须克服。

第二，提升梧州、玉林、贺州、贵港四个东部城市的战略定位，采取优先发展举措，将四市打造成全广西乃至大西南承接和中转粤港澳经济技术辐射、势能强大的第一梯度区域。新中国成立以后，广西城市中心向铁路发达的桂中转移，偏在东端的梧州、玉林、贵港、贺州相应降低了它原在广西过分的倚重地位，这是很自然的。但是笔者认为，这四市所处位置对于整个广西乃至整个大西南具有特殊的关键意义，这不是桂中、桂南等各方位上任何一座城市所能够取代的。特别是梧州市，它位于珠江流域上下游交接处，为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两大板块结合部，是世界上最发达地区之一香港和全国经济梯度最高的广东向广西乃至大西南发放市场辐射、推移技术经济最为近捷、也最为关键的枢纽城市，可以说，梧州一市的兴衰，反映着整个广西毗邻粤港这一地缘优势发挥的大与小，攸关着包含新生产力因素最丰富的粤港商品经济对桂辐射进而对大西南辐射的强与弱。梧州这种位置是珠江流域客观的区域市场规律所规定的。从这一大范围审视，梧州当前在广西城镇地域体系中的地位确实严重偏低。多年来，梧州从一个首位度很高的广西总中心城市已降到仅为数县中心的三等城市（见前表），这种局面实际上又陷入了一种悖逆珠江流域市场发育固有规律的新的“区域经济病”状态之中。这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遵循“无东不成市”规律，要求广西要恢复西江经济走廊和梧州在历史上作为传导粤港澳辐射总核心区域和总枢纽城市的地位，将梧州、玉林、贵港、贺州从桂东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提高到广西一级经济中心城市及大西南地区承东启西最重要的桥头堡的地位。同样，要优先加大东部四市项目投资和建设的分量，优先加快其发展速度，优先加快西江

经济走廊建设；尽快缩小桂东四市与广东邻近地区的差距，尽快改变历史上经济发达的桂东经济区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位反在全广西偏后、与所处区位极不相称的状况。

第三，要大大增加东部地区的重大经济项目建设力度，对已规划的项目，要根据“泛珠三角”启动新形势，适当调整规划，优先或提前实施。在广西，桂东经济区经济发展条件最好，历史上曾经是广西交通业、工业的发源地和主要分布地，但是，现在反而成为现代交通最不发达地区。南梧二级公路迟至1994年才建成，对接广东的高速公路至今几无里程；铁路干线甚至是空白，现代交通发展远不如桂西、桂南、桂中、桂北，在全国货运主要依赖铁路公路的今天，它仍主靠西江航运——这是近几十年桂东经济严重滞后的基本原因。水运虽然价格便宜，但耗时长、货损多，运输成本并不低。以梧州为例，目前客商弃水走陆（铁路）、弃梧走衡更是普遍现象。如据有关资料，衡（阳）广（州）复线于1988年7月建成通车后，原走贵港、梧州到广州的大西南的煤炭、磷矿、钢材等物资基本都舍近求远，宁可北上绕道近300公里改道走衡广线，而不愿再走水路。此形之下，梧州更是每况愈下。<sup>①</sup> 玉林市、贵港市、贺州市也缺乏高速公路和直抵珠三角的铁路，同样陷于发展徘徊。笔者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毗邻港澳粤的广西经济发展速度仍然长期滞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珠江流域缺乏一条东西横贯的铁路大动脉、高速公路大动脉；缺乏一座能级足够强大的大城市及时地充分地播散粤港辐射。粤港经济技术向广西和西南推移，由于遇到珠江中游城市发展的凹陷而遭至断裂耗减或另移他向，而由于缺乏强劲轴心的牵带，整个广西经济的发展就难以出现整

---

<sup>①</sup> 张江垠等主编：《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体化、大面积和较高效益的良好局面，从而多次丧失直接从发达的粤港摄取活力，促进自身加速发展的大好机遇。为此，笔者呼吁，应该把贵梧铁路的修建，南宁、柳州、桂林分别与梧州之间高速公路的修建和重振桂东的重要性上升到实施大西南出海通道战略、对接东盟战略和按照珠江流域区域客观规律办事的高度加以认识。修建这些交通道路有诸多有利条件：（1）广东的广肇铁路现已通到肇庆市，广东主动提出了9+2泛珠三角大合作。（2）广西铁路也已通到贵港市，贵肇之间不过400—500公里距离；沿河谷平原筑路，地势较平，成本不高；西江两岸物产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人口稠密，如在桂东南集中了广西近40%的人口及农户，运输市场条件优越。路跨两广，无论是铁路还是高速公路，都容易赢得广东乃至港澳雄厚资金的支持。现在广西各地及西南诸省都有许多很好的发展构想，构想中一个潜在的主题就是要通过梧州摄取港澳广东的市场能量并推动自身的发展，如桂、滇、黔三省都纷纷提出要通过南昆铁路实现“西能东输”“西电东送”“西煤东送”，供应电力严重缺乏、能源需求量大的广东。桂林市则提出“广东是桂林旅游业的重点开发市场”<sup>①</sup>。冷梧（湖南冷水滩至梧州）铁路也在湘桂人士的酝酿中，但这些期望要变成现实，都必须建立在西江沿河拥有一条横贯两广、直抵港穗的铁路大动脉基础上。只要该路建成，恢复梧州在全广西经济中心之一的地位，有意识地诊治新中国成立后新出现的前述突出的新“区域经济病”，广西毗邻澳港的区位优势就会进一步优化，“西江经济走廊”“西江工业走廊”才会真正形成。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商品经济辐射全面入桂并进拓大西南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面便会再度出现，

---

<sup>①</sup> 张江垠等主编：《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3页。

粤港又将径直地面向广西乃至西南输入各项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如资金、人员、技术、生产资料、先进的经营管理、市场信息等，并不断在最强的港粤经济增长极的刺激下，形成和扩大广西及西南各自的产业优势，这既可直接提高广西及西南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可为西南出海通道其他路径的建设积累和引来宝贵的资金。

为此，广西在西南大通道交通框架基本建成之后，今后一段时间，应该尽快将交通建设重心转向桂东经济区。如可将岑溪至兴业、岑溪至广东罗定高速公路、贺州—灵峰通往广东怀集高速公路等，由原计划“十一五”开工提前至2005年前开工建设；优先加快广州至南宁的高速公路对接。要争取国家支持，大大加快桂东经济区铁路建设步伐，如要加快争取落实国家对未来15年初步规划中连接两广的铁路网络建设项目立项；今后一段时间，广西要争取尽早启动玉林往岑溪往梧州往广东、柳州往梧州往广东、贺州往梧州往广东、桂林往贺州往广东、北海往广东等各个方位的粤桂铁路建设。水运方面，也要相应于广东实施以25亿元打通西江干道的计划，加快广西段西江航道建设。从而从交通体系上，尽快实现广西与粤港澳全面对接，以现代程度最高的交通体系将广西通往粤港澳的大通道装备起来。

第四，打造强势的南北钦防综合经济区域也要积极主动融入“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并扮演重要角色。建设南下北部湾港群出海通道，无疑是整个广西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主体工程，广西的“南（宁）北（海）钦（州）防（港）”当然是中国大西南与世界、中国与东盟接轨的重要的战略桥头堡。在该主体工程建设过程中，——广西当然必须与西南诸省——加强联合建设、共同开发的力度。但是，如前所论，对接东盟通道、西南出海通道的雏形，是在近代广西“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卵翼培植下形成的，我们还应看到历史上形成的城镇经济

“无东不成市”格局和“无市不趋东”分布结构，同样也是广西南部沿海地区城镇经济今天发展的基本区域格局。从港澳经湛江到钦州、防城港、北海，同样存在着经济技术推移发展的梯度演进、市场辐射的关系。作为远东和全国最大的经济总中心城市之一，香港始终对钦州、防城港、北海乃至整个西南出海的南路地区起着总体支配的作用。如西南出海物资除径直出走东南亚、西欧以外，远销美、日及中国香港、台湾、大陆沿海诸省的物资仍需经香港、广州、湛江或该诸地来船中转，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大国美国和日本，它们的包含强劲市场辐射和技术经济推移的工业产品由钦、防、北群港进入中国大西南，也必先中经香港转口，这一区域格局决定了大西南也是港澳、广东巨大的市场新腹地。建设中国西南出海和对接东盟的大通道，港澳、广东显然是中转贸易的受益大户如 2003 年广东对东盟贸易额占中国对东盟贸易额 37%，列全国第一位<sup>①</sup>，通过对此项巨大工程的投资，这些地区可以为自己和对接东盟带来相应的效益。因此，应该明确一条思路：在区域合作伙伴群中，要优先添入广东省和香港、澳门地区。要形成相应的优惠、倾斜、让利等政策，激发港澳、广东对通道建设投资的利益驱动，充分利用它们巨大的资金技术实力，发挥它们的市场总轴心作用，吸引它们的生产要素向西充分流布，克服中央投资有限、西南各省实力不强的瓶颈的制约。可以预见：与港穗为轴心的“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实现有机结合的西南出海大通道和中国对接东盟大通道建设，从粤港摄取自身发展的能量之后，一定会取得更快的发展速度。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这四个坐落在西南径直出海通道上联轴运转的城市，一定会以更为高强的能极，成为牵带整个大西南和中国内陆省区更快发展的龙头城市。

---

<sup>①</sup> 数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协作办公室区域经济合作处提供。

第五，要大力转变观念，清醒意识到“无东不成市”是广西区域经济特有的规律，同时也是一种区位优势，然而，规律不运用，它不会自动回馈；优势不发挥，也会丧失殆尽。“泛珠三角”是9+2，这意味着承接粤港澳辐射也面临多元的市场竞争。环顾“泛珠三角圈”，广东的其他邻省主动承接粤港辐射势头迅猛，步伐惊人，而且硬件条件许多方面已领先广西。如过江西的京九铁路，过湖南的京广铁路早已贯通广东，原定于2008年通车的赣粤高速公路早于2001年提前建成通车。福建也正在大力实施打通包括西拓粤港澳的“三线”战略。此外，粤港澳还积极在“泛珠三角”之外的全国各地广求“飞地式”腹地，如开拓东北市场等。可见，广西虽然有“无东不成市”优势，但粤港澳辐射却可以有东、西、北多个走向，优势不发挥最终也会丧失。

从多年建设实践看，广西解决上述思路问题，关键在于解放思想，掌握科学的辩证法，特别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转变观念，祛除痼疾：

之一，在经济建设中要摒弃畛域之见，代之以市场经济的区域观、科学统筹的谋划观。广西要打破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打破以行政区划地为牢的观念，按照市场经济的联系性，跳出广西看广西、跳出广西谋广西。广西、广东，尽管各据西东，区省相分，但从地理上看，水系相同，相互连接，是同一自然地理单元。从历史上看，“两广”并称，人民同俗，明代以来，更是货物同流、人流同向、信息同源、市场同根。“无东不成市”其实包含两层含义，一则是广西市场发展，离不开先进的东向的粤港澳辐射带动；另一方面，粤港澳特别是广东的更快发展，需要内源开拓，也离不开“第一腹地”广西的支撑，彼此都要从各自的外域寻找自身域内经济成长的基因。这对于尚处欠发展状态、封闭的自然经济比重仍比较大、封闭惰性仍比较强的广西，尤为

重要。我们要善于按照市场的指向，遵循区域经济的规律，打破行政区界，进行大范围比较审视，正确认识与处理广西与周边省区和地域的关系，把握广西与周边区域客观存在的内在统一联系，从而既科学地把准广西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向，又相应地调整域内生产力发展布局，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朝向的对外联系及区域功能，合理安排战略重点，把区外特别是发达地域的发展动力充分引入区内，也将区内产业开发充分纳入区外特别是发达地域的辐射牵动体系当中，整个提升广西区域地位。这是两广“分”与“合”的辩证法。

之二，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要树立正确的、现代型的利益观，摒弃狭隘守旧的利益观。首先，要正确对待与发达地区合作中的利益差问题。合作是互利的，但市场经济法则下共同利益的具体份额又是不均等的。历史上，广西“无东不成市”格局的利流表现通常是“大利皆趋广东”。如 20 世纪上半叶，融水县大苗山杉木开发由广东商人与当地人民共同进行，但大头利润归广东商人所有。当地人民在融水镇售卖，杉木价格每根仅 1.2 元，而经广东人转到柳州则卖到 2 元，卖到广州出口又更翻若干倍。当代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广西仍会面临同样问题。过去对广西与广东合作，一些同志就有过“怕吃亏”“怕被攆走大利”的心理，甚至自觉不自觉加以排拒，或者对已来投资者多方伸手。有的论者则尽量回避广西东通道问题，以为游离粤港澳，广西也可以自己发展起来，何必让利于人。至今，这些观念阴影还时常作祟。应该认识到，大利趋归合作中处于经济、技术优势的一方，这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正常现象和一般法则，也是外来投资合作实体衡量一个意向投资地域环境是优还是劣的基本标准。应摒弃上述种种狭隘的利益观，代之以目光远大、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利益观。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解放思想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当时我们自身敢不敢打破束缚、



理直气壮发展社会生产力、谋求自身应有的经济利益的问题，那么现在广西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解决能否按照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承认地域差别，承认利差，大胆让利，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投资经营实体、力量，为我们赢取更根本、更长远、更大宗的经济利益的问题。

广西还要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科学的利益观，与发达的粤港澳合作，直接经济流程中比较大利流固然会流向粤港澳，但我们也会在合作中得到的最根本的利益，这种利益有时往往表现得比较间接、抽象，却又是最实在的。如粤港澳在全国范围内，拥有着巨大的经济总量、经济实力、市场资源，也拥有着最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和理念。融入珠三角机制一旦成熟，粤港澳业一旦就近充分涌入广西，广西产业发展一旦就近充分纳入粤港澳体系，广西经济总量、经济实力将会大幅度提高，广西在国内外的市场空间将会大为拓宽，广西经济成长能力由于获得全国最大经济增长极直接支撑将会大获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将获得较大提高，广西的经济区位在全国乃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范围将进一步整体提升。尽管表面上看，直接经营的利益大宗是聚往粤港澳的，广西似乎总是“小头”，但广西已实实在在获得了自身条件下的最大利益。这是赢“小利”与赢“大利”的辩证法。

之三，在与粤港澳合作中，广西还应该树立“甘当配角”的意识。广西要扮演好西南出海大通道、中国与东盟对接主通道的主角地位，要充分巩固自身经济成长的主格地位。但是，在主动融入“泛珠三角”、与粤港澳合作中，却还要经常“甘当配角”。“无东不成市”规律告诉我们，粤港澳与广西，前者是辐射主体，后者是承接体和中转体，这规定了中国南部以西江干道和南部沿海为框架、东西走向的开发轴线上，广西对于粤港澳始终处于“配角”的位置。而当好了这一“配角”，让粤港澳充分

发挥其全国最大增长极的区域功能，广西就可以大大加大作为西南出海大通道的战略纵深，加大作为中国与东盟对接战略区域的战略纵深，也可以由于中转粤港澳的经济技术而获得次辐射主体的地位，从而大大巩固自身类如前述的特有的“主角”地位。这是当好“配角”与当好“主角”的辩证法。

之四，广西学广东，不能再停留在表面上的学广东，而要着重建立广西学广东的内在自动的机制。学习广东，解放思想，广西倡导了多年，但收效有限。关键在于没有建立自动的区域内需机制。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把东拓粤港澳、融入泛珠三角也作为全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要认真研究和摸透大珠三角的产业体系细情，从中把握广西自身产业调整的相应定位，为其产业充分转入拓出广大空间。要大力加强和优先进行桂东经济区的大项目建设，当前尤为紧迫的是要大大加快解决呈瓶颈状态的邻接广东的桂东区方位上的现代交通体系建设，尽快实现交通、产业等各方面广西与粤港澳的全面对接。仔细考察不难发现，“无东不成市”的历史进程，其实就是一个源于市场客观需要的广西学广东的自然的过程。如清代咸丰年间，优越的河运条件，使广东商人大量深入到桂西南宁明县，而宁明县壮族人民，在售卖八角的交易中大量接触广东商人以后，也学会了广东技术，自己开坊“蒸作茴油”，结果使该县茴油制作成为“州中贸易”大宗，远销海外，获利甚厚。又如清末民国时期，广西玉林五属商人迅速崛起为辐射桂中、桂西广大地域的有力的本地商帮，即得益于他们与广东人有着最密切的贸易交流，与广东经济发展高度联体和联动，能从广东人那里大量而直接地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和思想理念，解放了思想。而当今，也只有广西与粤港澳经济发展高度联体联动，学习广东、解放思想才不会停留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号召，而是真正成为广西各行业各部门及全体人民源于市场的巨大的内在需要而形成强大的自动机制。这是

“学里”与“学表”的辩证法。

之五，能否充分按照“无东不成市”规律发展本域经济，政府政策导向至为关键。明清、民国时期，“无东不城市”规律明显带动了广西经济发展，这固然是由于整个中国经济格局发展大势和两广间水系交通极其便利而致，但当时政府政策导向主动顺应了珠三角作为商品经济辐射源地崛起、经济性移民大举西移的趋势，也至为关键。清代，朝廷在相对荒芜的广西，基本都实行招徕移民开垦无主田和荒地的政策，为发达的广东转移过荷的农业、商业移民（现在占人口相当份额的广西区内客家人、广府话人、土白话人、潮汕话人、闽话人、莆门话人等为其后裔），向广西充分辐射其先进的经济与技术，提供了政策保障。如康熙至道光的近200年间，清代广西当局一直实行一条政策：招集流亡（即广东等省农商移民）；对无主荒田，永准为业；新垦荒田，永免田赋，对无力垦荒者，借以牛种。清廷还以劝垦的多寡，督催的勤惰作为衡量道以下各级官员的标准。当时，数以百万计的广东移民正是得益于此政策，而源源人居广西并安身立业的。此外，从明至清至民国，从政治上，当时的朝廷或当局在广西逐步实行“改土（官）归流（官）”政策，这当然是加强中央政治集权统治，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需要，但也是顺应中国东部与西部、华南的广东与广西初步形成区域统一市场这一大势的有效举措。这一措施，利于先进的中原汉族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利于沟通和协调汉族人民与广西原住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民族团结与融合，同时也为广东等省移民源源人桂并入居少数民族地区，为发达的珠三角经济区向广西渗透，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广西成为全国受东部发达省区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程度最深的少数民族省区之一。历史深刻地表明：“无东不成市”是广西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是独到优势，但只有政府清醒地认识这一规律，并根据时代的变化，努力创造条件，充分运用和发挥

这一优势，才能够切切实实地实现广西经济建设应有的较快的发展。这是对客观规律的遵循“自动”与“自然”的辩证法。

总之，从区域经济角度看，晚清民国时期广西城镇经济的“无东不成市”格局，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它是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珠江流域和南海沿海城镇地域体系，按照市场规律长期演绎发展的结果。在历史上，这一格局对于推动广西社会经济的进步曾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尽管此种以水系分布自然形状为构架的格局也有着自身的“区域经济病”，但是，它毕竟主要地体现了珠江流域市场发育地域演化、传动的客观的基本规律，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仍然构成着当代广西区域经济的基本格局。在经过铁路布网对其缺陷进行弥补之后，它在当代乃至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然蕴藏着巨大的区域经济价值。它所隐含的诸多特殊的区域经济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当前建设广西西南出海和中国对接东盟国际大通道的宏伟工程中，自觉充分地认识、遵从和运用这些规律，我们将会得到它所给予的慷慨馈赠：广西将会达到一种状态——用不太长的时间，从一个经济欠发达省区成长为中国一个中等发达省区。

## 参 考 文 献

### 一 广西旧志类

#### 通志类

万历《广西通志》，（明）苏浚纂修，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刻本。

雍正《广西通志》，（清）金拱修，钱元昌、陆纶纂，清雍正十一年（1733）刻本。

嘉庆《广西通志》，（清）谢启昆修，胡虔纂，清嘉庆六年（1801）刻本。

民国《广西通志稿》，蒙起鹏、黄诚沅等纂修，1949年广西省通志馆油印本。

#### 府、州、县志（含乡土志）类

南宁地区（南宁地区现已改为崇左市，这里仍按查阅资料当年的地市范围分类——以下同）

嘉靖《南宁府志》，（明）郭楠纂修，明嘉靖十七年（1538）刻本。

乾隆《南宁府志》，（清）苏士俊纂修，清乾隆八年（1743）刻本区图（复印本）。

《邕宁一览》，邕宁县政府编，1935年铅印本。

民国《邕宁县志》，谢祖莘修，莫炳奎纂，1937年铅印本。

乾隆《武缘县志》，（清）耿昭需纂修，清乾隆六年（1741）

刻本。

民国《武鸣县志》，温德溥修，曾唯儒纂，1915年铅印本。

《凭祥土州乡土志》，佚名编，抄本。

道光《白山司志》，（清）王言纪修，朱锦纂，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三册。

《那马县志草略》，林锦臣纂修，1933年修，民国稿本。

民国《隆山县志》，吴克宽修，陆庆祥纂，1938年修抄本。

道光《上林志稿》，（清）黄金声纂修，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书成，清道光二年（1822）刻本。

光绪《上林县志》，（清）徐衡绅修，周世德纂，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

民国《上林县志》，杨盟等修，黄诚沅纂，1934年铅印本。

光绪《宾州志》，（清）耿省修、张鹏展原本，杨椿增修，陆生兰增纂，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民国《宾阳县志》，胡学林、陈学人等修，朱昌奎等纂，1948年稿本，196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铅印本。

光绪《永淳县志》，（清）杨怀震纂修，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稿本。

民国《横县志》，王文效修，谢凤训等纂，1943年稿本。

光绪《新宁州志》，（清）戴焕南修，张灿奎纂，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

民国《同正县志》，曾瓶山、杨北岑等纂修，1933年铅印本。

康熙《左州志》，（清）李铨纂修，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

民国《崇善县志》，吴龙辉、张景星等纂修，1937年修抄本。

光绪《宁明州志》，（清）王炳绅修，黎申产纂，清光绪八

年（1882）修，1914年铅印本。

民国《思乐县志》，李文雄、覃辉修，曾竹繁纂，1948年石印本。

嘉庆《龙州纪略》，（清）黄誉纂修，清嘉庆八年（1803）刻本。

民国《龙州县志》，区震汉等修，叶茂茎等纂，1927年修，1936年铅印本。

民国《龙津县志》，李文雄修，陈必明纂，1946年修，196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铅印本。

民国《雷平县志》，邓赞枢修，梁明伦等纂，1946年油印本。

民国《隆安县志》，刘振西纂修，1934年铅印本。

河池地区

光绪《河池州志》，（清）李佑元辑，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抄本。

民国《河池县志》，黄祖瑜、黎德宣纂修，1919年铅印本。

民国《思恩县志》，梁杓修，吴瑜纂，1935年铅印本。

民国《宜北县志》，李志修，覃玉成纂，1937年铅印本。

《天河县乡土志》，（清）杨家珍编，清宣统间编，民国抄本。

道光《罗城县志》，（清）万文芳、阮正惠修，李化人、朱家修纂，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民国《罗城县志》，江碧秋修，潘宝篆纂，1937年铅印本。

民国《宜山县志》，陈赞舜修，覃祖烈纂，1918年铅印本。

民国《凤山县志》，谢次颜、潘鼎新修，黄文观等纂，1946年修，1957年广西博物馆油印本1册。

《东兰县政纪要》，蒋晃纂修，1947年铅印本。

《都安县概况》，张文杰纂修，1946年石印本。

#### 柳州地区

乾隆《马平县志》，（清）舒启修，吴光升纂，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民国《柳城县志》，何其英修，谢嗣农纂，1940年铅印本。

道光《融县志》，（清）刘斯誉修，路顺德、吴建勋纂，清道光十一年（1831）修，民国抄本。

民国《融县志》，黄志勋修，龙泰任纂，1936年铅印本。

民国《三江县志》，唐文佐修，覃卓吾等纂，魏任重续修，姜玉笙续纂，1946年铅印本。

民国《容县志》，藏进巧修，唐本心纂，1934年铅印本。

民国《榴江县志》，况思渊等修，肖殿元等纂，1937年铅印本。

同治《象州志》，（清）李世椿修，郑献甫纂，清同治九年（1870）。

民国《象县志》，苏瀚涛纂修，1938年修抄本。

民国《武宣县志》，唐朝绳修，覃先澄纂，1914年铅印本。

民国《来宾县志》，翟富文纂修，1937年铅印本。

民国《迁江县志》，黎祥品、韦可德修，刘宗尧纂，1935年铅印本。

#### 桂林地区

光绪《临桂县志》，（清）吴征鳌修，黄泌、曹驯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

乾隆《灵川县志》，（清）郑采宜原本，杨德麟续修，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增刻本。

民国《灵川县志》，陈美文修，李繁滋纂，1929年石印本。

乾隆《兴安县志》，（清）黄海修，蒋若渊纂，清乾隆五年（1740）刻本。

康熙《全州志》，（清）黄志璋纂修，清康熙二十八年



(1689) 刻本。

嘉庆《全州志》，(清)温之诚修，曹文深等纂，清嘉庆四年(1799)刻本。

民国《全县县志》，黄昆山、虞世熙修，唐载生、廖藻纂，1935年铅印本。

光绪《灌阳县志》，(清)肖煊原本，翁绶琪续纂修，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续修。

民国《灌阳县志》，林芾楨修，蒋良术纂，1914年刻本。

光绪《恭城县志》，(清)陶增修，陆履中、常静仁纂，清光绪十五年(1889)凤岩书院刻本。

民国《恭城县志》，蒋毅夫修，骆少鹤纂，1937年铅印本。

光绪《平乐县志》，(清)全文炳修，伍嘉猷、罗正宗纂，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

民国《平乐县志》，蒋庆蕃、郭春田修，张智林纂，1937年修，1940年铅印本。

道光《阳朔县志》，(清)吴德徵修，唐作砺等纂，清道光十八年(1838)刻本。

民国《阳朔县志》，张岳灵等修，黎启勋等纂，1936年修，1943年石印本。

民国《荔浦县志》，顾英明修，曹骏纂，1914年刻本。

光绪《修仁县志》，(清)佚名纂，清光绪间稿本。

光绪《永宁州志》，(清)李重发原修，联丰续修，刘汉镇续纂，清光绪十一年(1885)桂林杨鸿堂刻本。

民国《永福县志》，(清)林光棣原本，(民国)刘兴增修，李骥增纂，1917年刻本。

道光《龙胜厅志》，(清)周诚之纂，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好古堂刻本。

民国《龙胜县志》，廖鸿飞纂修，1933年稿本1册。

《龙胜县志稿》，（民国）陈远坤等纂修，1948年修抄本。

梧州地区

崇祯《梧州府志》，（明）谢君惠修，王尚贤纂，明崇祯四年（1631）刻本。

乾隆《梧州府志》，（清）吴九龄修，史鸣皋等纂，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雍正《苍梧县志》，（清）佚名纂，清雍正间修，清乾隆间增刻本。

同治《苍梧县志》，（清）蒯光煥、李百龄原修，罗勋、严寅恭原纂，黄玉柱续修，王栋续纂，清咸丰元年（1851）修，清同治十三年（1874）续修刻本。

民国《苍梧县志》，李衡宙纂，1941年原稿，1958年李家泂整理本。

民国《钟山县志》，卢世标总纂，1938年稿本。

光绪《富川县志》，（清）顾国诰、柴照修，刘树贤等纂，清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

光绪《贺县志》，（清）全文炳修，苏煜坡、李熙骏纂，清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

民国《贺县志》，韦冠英修，梁培煥、龙玉珏纂，1934年铅印本。

民国《信都县志》，罗春芳修，玉昆山纂，1936年铅印本。

同治《藤县志》，（清）边其晋修，胡毓璠纂，清同治七年（1868）刻本。

民国《藤县志》，梁丕功修，何亮辅纂，1947年稿本。

光绪《永安州志》，（清）李常霖、邓文渊修，吴赞周等纂，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民国《昭平县志》，李树楠修，吴寿崧、梁材鸿纂，1928年修，1934年铅印本。

#### 玉林地区

光绪《玉林州志》，（清）冯德才、全文炳修，文德馨、牟懋圻纂，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民国《兴业县志》，封高万纂修，民国间本。

同治《浔州府志》，（清）魏笃修，王俊臣纂，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光绪《浔州府志》，（清）夏敬颐、褚兴周纂修，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

民国《桂平县志》，黄占梅等修，程大璋等纂，1920年粤东编译公司铅印本。

光绪《平南县志》，（清）裘彬、江有灿修，周寿祺纂，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

光绪《容县志》，（清）易绍德、王永贞修，封祝唐、黄玉年纂，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

光绪《北流县志》，（清）徐作梅等修，李士琨等纂，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

民国《北流县志》，关锡琨修，李仲郭纂，1937年铅印本。

《北流县乡土志》，梁士械编，民国年间稿本。

民国《陆川县志》，古济勋修，吕浚坤、范晋藩纂，1924年刻本。

道光《博白县志》，（清）任士廉等修，朱德华等纂，清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

光绪《贵县志》，（清）王仁钟修，梁吉祥纂，清光绪二十年（1894）紫泉书院刻本。

民国《贵县志》，欧仰羲修，梁崇鼎等纂，1935年铅印本。

#### 钦州地区

嘉靖《钦州志》，（明）林希元纂修，明嘉靖十八年（1539）刻本。

道光《钦州志》，（清）朱椿年等修，杜以宽、叶轮纂，清道光十四年（1834）刻本。

民国《钦县县志》，陈公佩修，陈德周等纂，1947年石印本。

嘉庆《灵山县志》，（清）张孝诗修，梁炅纂，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

民国《灵山县志》，刘运熙纂修，1914年铅印本。

崇祯《廉州府志》，（明）张国经修，郑抱素纂，明崇祯十年（1637）刻本。

康熙《廉州府志》，（清）徐成栋纂修，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刻本。

道光《廉州府志》，（清）张埴春修，陈治昌纂，清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

民国《合浦县志》，廖国器修，刘润纲、许瑞棠纂，1932年修，1942年铅印本。

《防城县小志》，李燕伯纂修，抄本（记事至清光绪十五年）。

民国《防城县志》，黄知元等纂修，1945年稿本。

民国《上思县志》，黄大受修，黄步青纂，1915年铅印本。

#### 百色地区

光绪《百色厅志》，（清）陈如金等修，华本松等纂，清光绪八年（1882）修成，光绪十七年（1891）校刊刻本。

《百色志略》，（清）华本松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第七帙。

光绪《恩阳州判志》，（清）佚名纂，清光绪十四年（1888）抄本。

民国《奉议县志》，佚名纂修，1932年稿本。

民国《田阳县志》，佚名纂修，1948年稿本。

光绪《镇安府志》，（清）羊复礼纂修，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

光绪《归顺直隶州志》，（清）颜嗣徽纂修，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本。

民国《靖西县志》，封赫鲁修，黄福海纂，1948年油印1册。

光绪《镇边县志》，（清）程恩沛修，杨象震纂，许克襄续修，张志远续纂，民国年间抄本。

民国《西林县志书》，杭汝珖编，1923年抄本。

民国《田西县志》，叶鸣平、罗建邦修，岑启沃纂，1938年铅印本。

民国《凌云县志》，蒙启光、何景熙修，林其椿、罗增麒纂，1942年油印本。

民国《乐业县志》，岑伯峯修，岑启沃纂，1936年修抄本。

#### 杂志类

《岭表录异》，（唐）刘恂撰，清武英殿聚珍版本。

《桂海虞衡志》，（宋）范成大撰，清康熙七年（1668）新安汪氏据《古今逸史》刊版重编印本。

《岭外代答》，（宋）周去非撰，民国影印《知不足斋丛书》本。

《支那别省全志》第二卷（广西），日本乐亚同文会编，日本大正六年（1917）日文版。

《粤述》，（清）闵叙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桂林风土记》，（唐）莫休符撰，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岭南风物记》，（清）吴绮撰，宋俊增补，《四库全书》本。

《广西省志书概况》，广西统计局编，1934年铅印本。

## 二 广西及各地文史资料类

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1—38辑（1961—1993年）

南宁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南宁文史资料》1—17辑

柳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柳州文史资料》1—9辑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桂林文史资料》1—24辑

梧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梧州文史资料》1—15辑

北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海文史资料》1—7辑

南宁市邕宁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邕宁文史资料》1—5辑

桂林市阳朔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阳朔文史资料》1—5辑

柳州市柳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柳城文史资料》1—5辑

柳州市柳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柳江文史资料》1—6辑

梧州市苍梧县政协编《苍梧文史资料》1—9辑

北海市合浦县政协编《合浦文史资料》1—6辑

宾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宾阳文史资料》1—9辑

横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横县文史资料》1—7辑

扶绥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扶绥文史资料》1—3辑

上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林文史资料》1—6辑

崇左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崇左文史资料》1—4辑

大新县政协编《大新文史资料》1—4辑

天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等文史资料》1—4辑

凭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凭祥文史资料》1—2辑

龙州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龙州文史资料》1—11辑

合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合山文史资料》1辑  
融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融水文史资料》1—6辑  
鹿寨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鹿寨文史资料》1—6辑  
金秀县政协编《金秀文史资料》1—6辑  
来宾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来宾文史资料》1—5辑  
忻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忻城文史资料》1—3辑  
三江县政协编《三江文史资料》1—3辑  
融安县政协办公室编《融安文史资料》1—3辑  
武宣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武宣文史资料》1—3辑  
象州县政协编《象州文史资料》1—3辑  
资源县政协编《资源文史资料》1—2辑  
灵川县政协编《灵川文史》1—6辑  
兴安县政协编《兴安文史资料》1—3辑  
灌阳县政协编《灌阳文史资料》1辑  
全州县政协编《全州文史》1—4辑  
龙胜各族自治县政协编《龙胜文史资料》1—7辑  
永福县政协编《永福文史》1—3辑  
荔浦县政协编《荔浦文史资料》1—6辑  
平乐县政协编《平乐文史资料》1—4辑  
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玉林文史资料》1—26辑  
博白县政协等编《博白史志》1—10辑  
桂平市（原桂平县）政协编《桂平文史资料》1—8辑  
贵港市（原贵县）政协编《贵港文史资料》1—20辑  
平南县政协编《平南文史资料》1—8辑  
北流市（原北流县）政协编《北流文史资料》1—7辑  
陆川县政协编《陆川文史资料》1—8辑  
藤县政协编《藤县文史资料》1—9辑  
蒙山县政协编《蒙山文史资料》1—8辑

- 昭平县政协编《昭平文史资料》1—8辑
- 贺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贺县文史资料》1—9辑
- 钟山县政协编《钟山文史资料》1—4辑
- 富川县政协编《富川文史资料》1—7辑
- 钦州市政协编《钦州文史资料》1—6辑
- 浦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浦北文史资料》1—5辑
- 灵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灵山文史资料》1—6辑
- 百色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百色史志》1—4辑
- 田林县政协编《田林文史资料》1辑
- 凌云县政协编《凌云文史资料》1—4辑
- 乐业县政协编《乐业文史资料》1辑
- 德保县政协编《德保文史资料》1辑
- 西林县政协编《西林文史资料》1辑
- 那坡县政协编《那坡文史资料》1辑
- 靖西县政协编《靖西文史资料》1—3辑
- 田阳县政协编《田阳文史》1—2辑
- 田东县政协编《田东文史资料》1—5辑
- 河池市政协编《河池文史》1—4辑
- 宜州市（原宜山县）政协编《宜山文史》1—9辑
- 罗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罗城文史资料》1—9辑
- 环江县政协等编《环江史志》1—3辑
- 南丹县政协等编《南丹史志》1—4辑
- 东兰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东兰文史资料》1—3辑
- 都安县政协编《都安文史》1—4辑
- 凤山县政协等编《凤山史志》1—4辑
- 天峨县政协编《天峨文史》1—6辑
- 巴马县政协编《巴马文史资料》1辑



### 三 广西旧文献、报刊、专刊、专题研调类

广西省政府编：《桂政纪实》，1934年编印。

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年鉴》第一回，1933年编印。

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年鉴》第二回，1935年编印。

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年鉴》第三回，1948年编印。

龙家骧：《广西经济问题纲要》，1934年版。

曾宪章等：《广西经济出路讨论集》，广西省工商局所订，1934年版。

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张禹九：《省的经济建设与广西》。

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广西之生产力及其在全国之地位》，1949年版。

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印行。

省政府统计处编：《广西统计数字提要》，1941年版。

广西实业院编：《广西实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第一部柳江区），1928年10月石印本。

桂林市政府统计室编：《桂林市统计季刊》1942年第1期。

玉林县政府编印：《玉林县统计提要》，1947年版。

黄弘超等编：《广西实业调查团专刊》，1933年广西实业调查团印行。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广西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雷殷讲述《广西农村经济概况》。

薛暮桥：《广西农村经济状况调查报告》，1934年版。

金逸农编：《柳州榴江荔浦平乐八步调查报告书》，（农村经济）油印本。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广西临时分处昭平县民众自卫工作

委员会经济部合编：《昭平农村经济及手工业概况》，1945年版。

广西省政府统计局编：《广西农村》，1936年版。

方光汉：《广西农产物》。

雷雨：《西隆县甫冲纪闻》，据1933年版本复写。

张培刚：《广西粮食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林刚：《广西肉桂之栽培及其改进意见》，《农报》1943年4月8卷13—18期。

吴尊任等编：《广西特产物品志略》，1937年印行。

莫一庸主编：《广西地理》（农业部分），（民国）。

蒲壁编辑：《广西农业地理》。

黄弘超等编：《广西实业调查团专刊》，1933年广西实业调查团印行。

吴尊任编：《广西矿产纪要》，梧州文化印刷局，1936年梧州文化印刷局印行。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主办两广实业考察团编：《两广实业考察团报告》，1934年上海大众印书馆印行。

《广西企业季刊》第1卷1—4期（1943年），第2卷1—2期（1944年）。

黄旭初：《桂林工业概况》，1943年印行。

广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编抄本《广西各县工业概况》。

[日]乃信：《南支那矿产资源调查报告——广东省、海南省、广西省、福建省》，满铁调查部第四调查室昭和十五年印。

广西工商局编：《南宁染织厂概况》，1934年印行。

国民经济研究所编：《柳州之机器厂》、《柳州之织布业》（均为油印本）。

赵祖康：《梧州市政工程概况》，1928年印行。

《交通史航政编》（广西资料辑要），1936年10月广西通志馆抄本。

《交通史路政编》（广西资料辑要），1936年10月广西通志馆抄本。

陈晖：《广西交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叶平天、蒙一民编辑：《广西全省商车概况》，广西省汽车商业同业公会1944年印行。

邓耀坤：《兴筑邕宾公路报告书》，1937年印行。

《平乐至梧州、柳沿河邕梧航线沿岸村镇调查表》（广西甸捐局航务科制表）。

罗国瑞：《滇桂勘路记》，湘桂铁路南镇段路工管理处等编。《广西动员百万协筑湘黔桂铁路纪实》，黔桂铁路转路工管理处1944年发行。

湘桂铁路理事会总经理处经济调查室编：《湘桂铁路衡桂段经济调查报告书》。

广西工商局编印：《泉通号半年营业报告》，1934年印行。

工商部广州商辅导处编纂委员会编印：《两广工商经济特辑》，1948年印行。

韦云淞讲述《广西工商概要》。

广西工商局编：《广西省工商业团体概况》，1934年印行。

孔繁琨编：《广西谷米运销》，广西省政府1934年印行。

谢裕光：《广西桐油产销概况》，《农业通讯》1947年8月1卷8期。

广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编：《广西各县商业概况》（1—2），抄本。

广西省统计局编：《广西大宗出口贸易调查报告》，1934年印行。

广西统计局编印：《广西省各县出口入境大宗货物概况》，1934年版。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湘桂办事处：《广西外销农产》。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编：《两个圩市的调查》，1935年印行。

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印：《百色县基本国势调查总报告》，1947年印行。

广西统计局编印：《广西省对外贷借估计》，1934年印行。

《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第11期，1907年第4卷第10期，1908年第5卷第5期。

《商业概况》，《广西民政视察报告汇编》1932年下期。

《调查全省商业资本》，《民国日报》（南宁）1933.3.20（6）。

《各商市商业情况》，《广西财政考察报告汇编》，1933年。

黎民兴：《广西农工商业之前瞻后顾》，《广西大学周刊》1933年第5卷第11期。

《广西振兴土货后影响本港洋货极大》，《工商日报》（香港）1934.3.10第3张1版。

《广西全省商店分类统计》，《统计月报》1934年第3、4号。

傅无闷：《工商业》，《星州日报第六周年纪念刊“新广西”》。

《两广实业考察团计划沪粤工商业合作》，《实业部月刊》1936年第1卷第3期。

《广西工商业》，《两广实业考察团报告》1936年。

《工商建设概述》，《建设汇刊》1937年第1期。

《广西省桂林等三十县市商业家数及资本总额统计表》，《广西经济建设统计提要》1943年。

《（广西）商业》，《广西统计年报》1947年。

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和广西统计局1933年、1935年、1947年编印的《广西年鉴》。

《民船商货请示管制准予废止》，《中央日报》（南宁）1947.5.28（3）。

《两广工商经济调查纲要》，《两广工商经济特辑》1948年。

《广西省各大城市商店家数及资本额》，《广西统计季刊》1948年第11期。

《商业》，《广西省政府工作报告》1948年。

《商业》，《广西省统计摘要》1947—1949年第1—4号。

《梧州市商业状况概略》，《梧州经济策进会月刊》1929年第1卷第3期。

《梧州商业概况》，《商业半月刊》1929年第1卷第13号。

《梧州商业概况》，《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1卷第13期。

朱朝炎：《广西梧州商业之调查》，《商业杂志》1931年第5卷第9期。

《梧州市二十一年四月份屠兽数统计表》，《梧州市政公报》1932年第9期。

桂兴烟草公司：《广西省经济概况》（1933年）。

《各地商况消长要览》（梧州），《中国商业循环录》1933年第9号。

梁寂溪：《贵县农村中底资本和高利借贷》，《师专校刊》1933年第2卷第2、3期合刊。

《一年来之梧州商业》，《民国日报》（南宁）1933.3.17（8），3.18（8），3.21（8），3.21（8）。

《柳州之商业资本统计册》，《民国日报》（南宁）1933.3.26（3）。

《南宁一百一十一街》，《民国日报》（南宁）1933.4.13（6）。

《去年梧州商业概况》（一一五）26（6），1.27（6），1.28（3），1.29（6），1.30（6），2.3，2.7，2.23，2.25，3.7。

《南宁商业概况》（1934年），《统计月报》1935年第56号

合刊。

黎国焘：《梧州市全年木材贸易总表》，《广西农林专刊》1935年第2期。

韦风纪、梁胤奎：《百色市木材贸易》（总表，民国23年11月调查），《广西农林专刊》1935年第2期。

《桂林工商概况》，《广西日报》（桂林）1937.4.27（7）。

《南宁各额商店家统计数》，《南宁警察局复局周年特刊》1946年。

《上林商业繁荣》，《中央日报》（南宁）1946.1.12（3）。

《盛极而衰的黄金业——南宁工商业速写之三》，《中央日报》（南宁）1946.11.23（3）。

《触目惊心 USA 国货打入冷门中——桂林的百货商店》，《桂林晚报》1947.7.2（4）。

《谈桂林的布匹商店》，《桂林晚报》1947.7.12（4）。

《今非昔比的桂林杂货业》，《桂林晚报》1947.7.20（4）。

《闲谈桂林的布匹绸缎店》，《桂林晚报》1947.7.22（4）。

《杂谈桂林市金号》，《桂林晚报》1947.8.20（4）。

《梧棉纱火油涨邕棉纱亦涨桐油跌》，《中央日报》（桂林）1947.12.11（4）。

《穗梧百货挺秀》，《中央日报》（桂林）1947.12.11（4）。

广西省政府总务处统计室编：《民国二十五年广西全省及八大城市（梧、邕、柳、郁、贵、桂、融、宜）出入口贸易概况》，1937年。

#### 四 广东古籍、旧志类

（明）屈大均《广东新语》

宣统《东莞县志》

嘉庆《龙山乡志》

光绪《四会县志》  
民国《叶氏族谱》  
同治《番禺县志》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  
宣统《番禺县续志》  
道光《南海县志》  
民国《开平县志》  
道光《广东省通志》  
光绪《南海乡土志》  
同治《南海县志》  
宣统《南海县志》  
宣统《顺德县志》  
民国《龙山乡志稿》  
民国《顺德县志》  
宣统《番禺县志》  
《广东通志初稿》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  
光绪《南海县志》  
东莞《茶山乡志》  
咸丰《顺德县志》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印行

## 五 当代出版的书刊、文献类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

[美]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历程》，三联书店 1993 年版。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

书馆 1996 年版。

培植主编：《中国集市大观》，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张文奎主编：《人文地理学概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许学强、任宗唐等：《中国小市镇的发展》，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张纯元主编：《人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张魁峰编著：《商业经济学概论》，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4 年版。

贺名伦：《中国市场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何国栋编著：《商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刘再兴、祝诚、周起业等编著：《生产布局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罗志如、范家骧、厉以宁等：《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刘再兴主编：《中国区域经济：数量分析与对比研究》，中国地理出版社 1993 年版。

夏日云、张仁勋主编：《文化地理学》，北京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总论》，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韩渊丰等主编：《区域地理论与方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编：《中国分省概况手册》，北京出版社 1990 年版。

国家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总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农民收入、消费调查研究资料汇编》(上、下),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5 年版。

《历史地理》第 9 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吕一燃:《中国边疆史地论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李毅夫、赵锦元主编:《世界民族常识》,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8 年版。

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林金枝、庄为玠:《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建卷),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梁志明主编:《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龙川主编:《加快大西南出海通道建设研究》,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钟文典主编:《近代广西圩镇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方志远:《明清湘赣地区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许凤岐:《市场学词典》,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年版。

陈锦光主编:《北海交通史》,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吕孟禧等:《广西圩镇手册》,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曾庆洪等:《桂林简史》,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资料丛刊》(广西系列全 20 册),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5—1988 年间出版。

饶任坤、陈仁华:《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钟文典、唐凌、朱从兵主编：《北洋〈政府公报〉中的广西资料》I、II、III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广西统计局编：《晚清民国时期广西统计史料摘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

李炳东等：《广西农业经济史稿》，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梁庭望：《壮族文化概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云南省经济研究所：《云南近代经济史文集》，经济问题探索杂志社1988年2月印行。

钟文典主编：《近代广西社会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雷坚编著：《广西建置沿革考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黄国安等编：《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上、中、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贵州师大学报编辑部编：《贵州史论文集》。

黄铮主编：《广西对外开放港口》，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陈华新：《近代广东对外贸易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70辑。

丁戴维·莱思布里奇：《香港的营业环境》，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湛江市政协编：《湛江文史资料》第1—15辑。

程浩编：《广州港史》（近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

丁罗兹·里菲：《上海——近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张明园：《中国区域现代化研究——湖南省》（台湾版）。

丁又：《香港初期史话》，三联书店1958年版。

广东省政协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150辑。

《广东省银行月刊》1947年第3卷。

广州市政协编：《广州文史资料》，第1—77辑。

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赵和曼编：《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广西通志馆编：《中法战争调查实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1—12期（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国世平等主编：《港澳台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张维持编著：《广东石湾陶器》，广州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黄滋生等：《战后东南亚华人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汪宇明：《合理布局与持续发展》，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张江垠等编：《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郑家度：《广西金融史稿》（上、下），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柳州市人民政府：《调查研究》工商专辑，1950年12月。

庞智声：《广西商业史料》，广西商业厅铅印本。

广西通志馆编：《广西方志物产资料选编》（上、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张海鹏等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 1993 年版。

昆明市志编委会：《昆明市志长编》卷之十二，近代之七，1983 年 12 月印。

李迪主编《通史卷》（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广西科技出版社 1996 年版。

陈炳应主编《纺织卷》（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广西科技出版社 1996 年版。

李炳东、俞德华主编《农业卷》（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广西科技出版社 1996 年版。

许锡斌主编：《地学·水利·航运卷》（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广西科技出版社 1996 年版。

朱小舟主编：《商都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9 年版。

唐凌等：《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陈学文：《明清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广西交通厅编：《广西公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1 年版。

广西交通厅编：《广西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1 年版。

陈雄章：《交往与世界历史变迁——18 世纪历史横向发展透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陈才主编：《世界经济地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佛山市志办编：《佛山史话》，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李会刚：《湖南工业经济发展历史及展望》，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孙可庸主编：《西南交通运输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广西科

技出版社 1988 年版。

余绳武、刘有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 1994 年版。

刘泱泱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湖南出版社 1994 年版。

宋斐夫主编：《湖南通史·现代卷》，湖南出版社 1994 年版。

[瑞典]龙恩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初版于 1832 年）。

《珠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宋则行、樊元主编：《世界经济史》（上、中、下），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李甫春等：《千年等一回——广西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理论构想》，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版。

广西地方志编委会：《广西通志·侨务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黄体荣：《广西历史地理》，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

广西通志馆、广西图书馆编：《〈清实录〉广西资料辑录》（全六册），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谢立雄主编：《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地理》，新华出版社 1988 年版。

广西五大经济区规划组编制：《广西沿海、桂东、桂中、桂北、桂西经济区发展规划纲要》（全五册），1999 年 9 月打印稿本。

王鼎昌：《二〇一〇年的广东——规划及战略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广西党刊杂志社：《入世，中国将融入整个世界经济体系》，1999 年 12 月印行。

郭晓合等：《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

刘佐泉：《太平天国与客家》，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卢斯飞主编：《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 16—20 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

## 六 有关论文

罗一星：《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国史研究》

1985年第3期。

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圩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吴振兴：《近代珠江三角洲机器缫丝业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王水：《二十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87年第3期。

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说》，《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罗一星：《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广东社会科学》第6期。

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白银的输入》。

陈明铨：《近代香港与广州的比较》，《学术研究》1988年第3期。

王锦长：《近代华侨对汕头经济和海运贸易的贡献》，《汕头侨史》1986年第1期。

邱捷：《辛亥革命前资本主义在广东的发展》，《学术研究》1983年第4期。

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业》，《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洞庭湖流域商品生产的分析》，《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马克垚：《西欧封建城市初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85年第1期。

刘敏：《时论清代商业资本的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经济史》（厦门大学）1984年第4期。

聂宝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外国在华洋行势力的扩张》，《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叶显恩：《明清广东疍民的生活习俗与地缘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厦门大学）1991年第1期。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林文益：《明清之际的国内市场》，《商业经济研究》1985年第3期。

童家洲：《试论宋元泉州港繁盛的原因》，《文史哲》1980年第4期。

李灼荣：《广西经济地理特点及加速开发的战略意义》，《经济地理》1988年第3期。

万家佩：《广西区域开发点轴布局模式研究》，《经济地理》1994年第1期。

曾菊新：《中国区域增长的比较研究》，《经济地理》1994年第1期。

赵晓斌：《广东省80年代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经济地理》1994年第3期。

魏清泉：《广东省城市体系状况与发展趋势》，《经济地理》1995年第2期。

陈烈：《珠江三角洲城镇可持续发展研究》，《经济地理》1998年第4期。

阎小培：《广东省产业结构变动趋向时空差异分析》，《经济地理》1998年第3期。

王发曾：《市场经济与经济地理学理论更新》，《经济地理》1993年第3期。

郭振淮：《论产业密集带》，《经济地理》1995年第1期。

方一平：《西江流域经济走廊及其区段划分》，《经济地理》1994年第4期。

阎小培：《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城市发展与城市地理学》，



《经济地理》1994年第4期。

胡兆量：《中国七个经济区域评价》，《经济地理》1997年第1期。

汪宇明：《广西乡村—城市转型与乡村协调发展研究》，《经济地理》1997年第1期。

樊卫国：《晚清移民与上海近代城市经济的兴起》，《上海经济研究》1992年第2期。

宾长初：《近代西江航运的发展及其对广西社会经济的影响》，《桂海论丛》1991年第6期。

曾伟：《六十年前的广东大米市场》，《商业经济荟萃》1992年第2期。

杨仁飞：《明清之际澳门海上丝路贸易述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朱秀琴：《略论近代中外贸易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南开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黄宗炎：《论民国时期广西的公路建设》，《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姜守鹏：《15—16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小商品经济的发展》，《长白论丛》1993年第3期。

王新生：《广东与长野器械缫丝业比较研究——兼论两地原始工业化》，《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吴景平：《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区域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竺菊英：《论近代宁波经济与上海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孙善根：《试论近代宁波籍工商人才群体的形成》，《宁波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日]白井佐知子：《徽商及其网络》，译文载《安徽史学》

1991 年第 4 期。

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史学理论研究》1994 年第 3 期。

郭小东：《19 世纪前期澳门经济特征论略》，《中山大学学报》1994 年第 4 期。

王振忠：《从祖籍地缘到新的社会圈——关于明清时期侨寓徽商土著化的三个问题》，《原学》第 2 辑，1995 年 1 月。

万振凡：《江西近代农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江西社会科学》1993 年第 6 期。

## 附

### 作者完成本课题的相关成果索引

《近代广西圩镇研究》(合著),本人完成《广东商人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珠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概论》(合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传统文化与粤西社会》(合著),本人承写《清代客家人在广西的经济开发》子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合著),本人承写《清代广西客家人口分布及客家人的开发贡献》,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明清时期粤商人人桂与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明清时期广西“无东不成市”布局研究》,载《广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92年第5期全文转载。

《近代滇黔鸦片与广西烟土商路》,载《学术论坛》1992年第5期。

《近代广东商人与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载《桂海论丛》1992年第3期。

《清代广西段的中越贸易》,载《东南亚纵横》1992年第4期。

《唐代广西雏形的市场网点研究》,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1992年第4期。

《论近代广西“无东不成市”格局》，载《广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历史上珠江流域人口移动的主流变迁初探》，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地理》1995年第7期全文转载。

《明清民国时期广东商品经济辐射与广西的社会经济进步》，载《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明清民国广东商品经济辐射对广西积极影响概观》，载《广西首届青年学术大会优秀论文集》，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晚清民国广东城镇行业的现代化发展与粤港客商对广西城镇现代性行业的营造》，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明清时期珠江流域的市场对流走向研究》，载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中科院地理所经济地理部、中国科协经济地理所合办的《经济地理》（国家级期刊，中国经济类核心期刊）1996年第1期。

《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行业的发育》，载《学术论坛》1997年第5期。

《“无东不成市”：广西区域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关于香港、澳门、广东与广西之间区域经济关系的若干思考》，载区委办公厅主办《领导广角》（国内外公开出版刊物）1997年第8期。

《晚清民国时期珠江流域物资市场对流走向研究》，载《广西商业经济》1998年第2期。

《近代粤港客商的地域来源、身份来源初探》，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广东商人与广西典当行业》，载《广西地方志通讯》1998年第2期。

《历史上珠江流域物资交流走向研究》（合著），载《广西地方志通讯》2000年第1期。

《撑起广西的东大门——访梧州市委书记文子忠》（合著），载广西区党委机关半月刊《广西工作》2000年第1期。

《历史上南宁地区段的中越贸易》，载中共南宁地委机关刊物《南地工作》2000年第1期。

《粤港澳辐射：南宁地区经济成长的重要基因》（上篇），载中共南宁地委机关月刊《南地工作》2000年第7期。

《粤港澳辐射：南宁地区经济成长的重要基因》（下篇），载中共南宁地委机关月刊《南地工作》2000年第8期。

《明清时期广东城镇行业的发展与粤商对广西城镇行业的缔造》，载《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

《广西“无东不成市”格局研究》，载《梧州日报》1997年10月20日。

《梧州市战略发展研究报告》（合著），项目由广西社会科学院联合会主持。

《关于梧州市城市功能定位几点思考》，载《梧州日报》2000年4月22日。

《粤港澳经济技术辐射与广西经济社会发展》，载张正铀、黎明智主编《知识的源泉与创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明清时期广东城镇行业的发展与粤商对广西城镇行业的缔造》，载《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

《晚清民国广东商人与广西城镇农林土特产收购行》（上），载广西通志馆、广西地方志协会主办《广西地方志》2002年第1期。

《晚清民国广东商人与广西城镇农林土特产收购行》（下），载广西通志馆、广西地方志协会主办《广西地方志》2002年第2期。

《两广交往源远流长》，载广西区党委机关半月刊《当代广西》2004年第5期。

《“无东不成市”格局独成广西原因》，载《学术论坛》2004年第5期。

《广东商人与近代广西百货行、洋货行、土洋杂货行的发育》，载《广西地方志研究》2004年第16期。

《“无东不成市”的历史考察之一——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现象》，《“无东不成市”的历史考察之二——粤港澳商品经济辐射源的形成和发展》，《“无东不成市”的历史考察之三——粤港澳商品经济对广西的辐射》，《“无东不成市”的历史考察之四——晚清民国时期粤商对广西城镇主干行业的营造》，《“无东不成市”的历史考察之五——明清时期广东农业移民对广西经济的影响》，《“无东不成市”的历史考察之六——近代粤商人桂的地理分布》，《“无东不成市”的历史考察之七——“无东不成市”独成广西的原因透视》，《“无东不成市”的历史考察之八——泛珠三角经济区中广西区域经济布局思考》，上述文章，《广西日报》理论版于2004年4月27日至6月初连续登载。

## 后 记

早在明清时代，广西民间就流传着“无东不成市”的民谚，意思是说：在广西，没有广东商人，广西就成不了买卖，形成不了市场。而到了民国时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千家驹、韩德章、吴半农几位著名学者在对广西经济进行深入研究后，惊异地发现：广西商业经济是受粤港支配的，广西是广东人的商业“殖民地”，并将其列为广西经济的特点之一。（参见千家驹等著《广西省经济概况》，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印行）稍晚，另一位经济地理学者张先辰先生也在 40 年代的研究中发现：“广西过去（指 1938 年湘桂铁路通车以前——笔者注）在商业上属于珠江系统，不啻粤港二地之附庸。与长江流域（自然含湘赣两省——笔者注）及中原之隔膜，无殊异国。故广西之商业以及重心，乃在于粤港接近之梧州一带。”（参见张先辰著《广西经济地理》，桂林文化供应社 1941 年版本）

前辈学者这些论识，给予笔者极大的启发。笔者进而认为：

从广西范围观之，广西“无东不成市”的历史场面，是邻近发达省区对广西城镇经济发展总促进过程最主要、最典型的部分。粤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关系问题，是关系到数百年间广西城镇经济乃至整个市场经济发育过程总特点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从珠江流域范围观之，则“无东不成市”局面深含着该域

作为同一的地理单元古而有之并延贯至今的诸多重要的区域经济规律。

而从全国范围瞰视，两广地区位处祖国雄鸡状版图的腹底地带，在最小、最集中的地域内浓缩了中国东部沿海、中部沿江、西部山地或高原三大经济梯度地带的所有特征，无论是汉族人民经济区向少数民族经济区自东而西的空间演变或是经济发展、城镇发育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自东而西的空间推移，以香港、广州为龙头的“无东不成市”格局所内含的经济发展的梯度转移规律，在全国范围也具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

从海内外相关区域观之，在粤港轴心辐射的巨大环圈中，“无东不成市”格局不仅仅限于广西一地，它是一个远大于广西全域面积的、由东而西再由西折南的绵长的地带，它包括广西大部、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并向中国境外奔突，包括东南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具体包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呈一个连省跨国的巨大的弯月带，具有丰富和重要的东南亚经济史、中外交通史、中外经济区域关系史等重大的和未知的学术价值。

因此，笔者深信，对晚清民国时期粤港商人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关系作系统、翔实、全方位的探索，对其组合的历史场面进行全景式的还原，对其长时间积淀形成的特有的结构及其功能进行精细入微的论析，对其粤港的经济源头进行对应的揭示，对环广西的海内外相关地区的经济发展梯度推移的宏观比较与环视，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

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未能沿着前述学界前辈的重要论识继续把这一有重大价值的问题系统深入地研究下去。直至目前，对这一专题的研究论文寥寥，著述更是尚未出现。很大程度上，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



一次意想不到的调查，使笔者产生了对这一问题的强烈的探求欲。那是1985年7月的一天，正在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的我，追溯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军队在广西的进军路线，寻找太平军的踪迹。到了桂平县的江口镇，我看到一堆形制雄伟的大青石砖和精美的石雕令人痛心地点散乱在杂草间。从一位热心的当地百姓口中我得知，这是“粤东会馆”——广东商人在江口的同乡会馆址，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是从广东来做生意的商人在清代建立的。他还告诉我，江口这地方，90%以上是广东商人的后代，他也是广东商人的子孙。下午，我与当地老人座谈，采集口碑资料。在回答我提出的“江口有多少人参加太平军”的问题时，一位80多岁老者的回答又一次震撼了我：“一个都没有。因为我们江口人都是从广东上来做生意的，生活都过得去，所以，没有哪个想参加太平军的。”他告诉我们：他年轻时还到过南宁、百色做生意，其实南宁、百色的繁荣，过去都是靠广东人做生意热闹起来的，古话讲就是“无东不成市”。

当晚，回味着白天当地老乡的叙说，望着滔滔东去的西江水，我的问题一串一串不断产生：广东是发达地方，为什么广东人却舍“富”就“穷”地大量涌入广西？既然偏僻的桂西城镇百色、桂西南的重镇南宁都是广东人做生意而“热闹”起来的，那么，其他地区的城镇是不是也都是这样的情形？如果与广东同属珠江水系、大部水路都通达广东的广西真的整体上呈现出“无东不成市”的格局，那么，广东与广西之间，香港、澳门与广西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地域经济关系？历史上两广曾同属“蛮荒”落后地区，广东何时开始拉大了与广西的差距，从而形成广东人进桂经商的推动力？广东人大量进入广西经商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注意力完全转到在广西的广东商人问题上来。

我的想法，首先得到了我的硕士导师、广西师大历史系钟文典教授的充分肯定。他要求我：逐地逐县逐圩地收集资料，特别要通过大量社会调查，收集到丰富的第一手实地资料和口碑资料，产生对课题内容的现场感受和实事感悟；系统研读广西所有旧志和民国时期反映广西经济的重要书刊文献，并丝丝入扣地进行严格实证；要跳出单一思维，不仅对广东商人，而且要对湘、赣、闽及广西本地商人作深入细致的研究，逐一与粤商进行令人信服的特点和能量的比较；要跳出表面化，不要就商人论商人，而要把粤商研究与城镇经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逐个逐个对广西城镇经济行业，逐块逐块对广西农村较大的商品生产基地，逐类逐类对广西各种行业或各个地域来源的各种移民群体进行研究；要跳出广西局部，从两广和桂港的广阔空间整体地把握这一问题；要跳出近代百年，从明清至民国500年这一纵长时段，着眼于把握区域关系的规律，统一地思考这一问题。在他的指导下，我完成了题为《从明清到民国：广东商人与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的硕士论文，并在1990年以同题申请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课题（见《1990年中国历史学年鉴》）。

在硕士论文答辩过程中，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陈伟芳教授、林茂高教授也对论文的进一步修改提出了中肯的指导意见。陈伟芳教授指出：不要忽略了广西是沿海省区的特点，研究粤港澳向广西的经济辐射，不仅要考察西江水系一路，而且要增加考察粤商沿南海岸线在北海、钦州、防城港登陆一路，并揭示江海两路与粤港辐射的空间关系。林茂高教授则提醒我，要注意对广西全区性的“无东不成市”格局，由东而中而西，分成若干推进层次，以尽可能可比的计量作为基础，揭示粤商聚集量和抵达时差与广西各方位城镇经济规模发育的数量递减和时序先后关系，从而把握整个广西城镇经济网络体系趋东和总城市中心归宿东端的

重大特点。

1993年秋，我考上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点，攻读博士课程。我的博士导师谭双泉教授指导我继续以这一选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要求我在拓宽、拓深、拓精方面狠下工夫。课程导师韦杰廷教授要求我要强化理性分析和理论运用，学习和了解各种现代化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并选择加以运用，避免史实堆积，提高研究档次和学术深度，把粤商研究与早期现代化进程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与以欧美为代表的世界现代文明东渐进程结合起来。谭双泉教授要求我，要限短时段，暂时割舍明清部分，集中篇幅钻深钻细近代百年部分；同时要再扩大俯视空间，不仅要从两广和桂港，还可扩及整个环广西的海内外相关地区如湘、赣、滇、黔、闽、沪及东南亚各个国家和地区，整体地审视、研究这一问题。特别要充分利用在湖南求学的条件，进一步掌握湖南省资料，对湖南、江西辐射广西的源泉及内容作进一步的了解、把握，以更好地比衬出粤港对桂辐射的能量和作用；还要进一步深化香港问题研究，精确把握这一现代化新型巨大港市的崛起对粤商人桂的能量与作用，注意将香港与同时崛起的上海进行比较研究，并揭示两者分工合作关系；还要把广西“无东不成市”格局置于全国范围的社会经济发展“东高西低”“东快西慢”不平衡发展的格局中，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理论加以驾驭。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并同时完成了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课题（1996年10月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发来验收结项通知）。

到广西区党委办公厅和广西区党委当代广西杂志社工作以后，我有机会大量接触实践层面的区域经济工作者——党委和政府各级各部门的同志。十分惊喜的是，我的这一纯粹的史学课题，竟常常能勾起他们浓浓的兴致，他们更多的从他们丰富的亲

身经历或正在做的工作实践感受来讨论现实中粤港辐射问题，接受珠三角等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问题，向粤港招商引资或组织输出劳务问题，广西建设项目东西、南北布局方向问题等，这又给予我莫大的鞭策与启发。于是，我又结合工作中掌握的现实建设中的大量材料，把历史学的这一问题研究的视角推入到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当中，以期对广西当代区域经济的若干重要的基本规律进行科学的揭示和描述，对广西的区域生产力布局政策进行深入的研讨。现在，这一项研究还在继续进行。

我深知，此书稿是包含着几代学者、几辈恩师和许多党政岗位上领导与同仁辛勤思考和传播智慧的成果。在此书稿完成之际，我对我的导师——广西师范大学钟文典教授、湖南师范大学谭双泉教授和韦杰廷教授长年栽培之恩，表示深深的感谢！向对我的研究提出重要指导意见的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陈伟芳教授、林茂高教授致以深深的谢意！同时，对给我的书稿提出宝贵意见的上海复旦大学邹逸麟教授致以深深的谢意！对给我的研究予以充分理解、创造条件支持并给予许多指点与启示的各位领导和同仁表达诚挚的谢意；对管理本项国家课题的广西区党委宣传部理论处、广西师范学院科研处的同仁，也一并谨申谢忱。

长期以来，我的家人对我的研究工作一直给予默默的理解、支持和奉献，我对我的父亲黄祥续、母亲甘映玉、妻子张斌怀着至深的感激！

黄 滨

2004年10月28日

## CONTENTS

**Abstract**

**Preface**

**Chapter On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Businessmen of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Entering into Guangxi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Minguo Period—A General Survey to the Patterns of “No Markets without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Part I    The Businessmen of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Entering into Guangxi; Their Historical Origin, the Expansion of Modern Scale and the Resources of Regions and Identities**

**Part II    The Basic Commercial Route Circle and Business Contents of the Businessmen Entering into Guangxi**

**Part III    The Position of the Guangdong Businessmen’s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Guangxi —A Brief Survey to the Patterns of “No Markets without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Chapter Two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and the Growth of the Main Industries in the Economy of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Guangxi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Minguo Period— A Micro Analysis to the Patterns of “No Markets without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 Part I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and the Growth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Firms and Brokers' Firms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Guangxi
- Part II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and the Growth of General Merchandise Firms, Specific Foreign Goods Firms and Local-Foreign Grocery Firms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Guangxi
- Part III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and the Growth of the Purchasing Firms for Local Specialities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Guangxi
- Part IV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and the Growth of the Privately-owned Financial Firms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Guangxi
- Part V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and the Growth of the Latest Industry and Mining of the National Capitalists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Guangxi
- Part VI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and the Growth of the Commercial Handicraft Industry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Guangxi
- Part VII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and the Growth of the Latest Traffic and Transport Trade and other Trades in the

## Cities and Towns of Guangxi

### **Chapter Three The Patterns of “No Markets without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Minguo Period and the Grading Distribution System of the Economic Network of “No Markets without Directing towards Guangdong”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Guangxi—A Structural Dialysis to the Patterns of “No Market without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Part I** The Distributing Areas and Their Grading Differences of the Patterns of “No Markets without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in Guangxi

**Part II** The Grading Differences of “No Markets without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and the Grading Distribution System of the Economic Network of “No Markets without Directing towards Guangdong”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Guangxi

**Part III**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rading Distribution System in the Economy of the Cities and Towns Characterized by the Patterns of “No Markets without Directing towards Guangdong”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of Guangxi

### **Chapter Four A Research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and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y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Guangxi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Minguo Period—A Macro Comparison to the**

## **Grading Proces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levant Regions at Home and Abroad**

- Part I**    The Strongest Radiation of the Commercial Economy from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Other Parts of China to Guangxi and the Main Position of the Commercial Business of the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in Guangxi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Minguo Period
- Part II**    The Relatively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i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and the Construction by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to the Main Economic Industries of the Cities and Towns in Guangxi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Minguo Period
- Part III**    The Vast Circle Radiating around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Economically Geographic Reasons Forming the Patterns of “No Markets without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in the Whole Guangxi
- Part IV**    The Chief Central Position Occupied by Guangzhou and Hong Kong, the Nuclear Cities in the Zhujiang Delta, in the Economic Network of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Grading Distribution Systems of “No Markets without Directing towards Guangdong” in the Economy of the Cities and Towns in Guangxi

**General Review**    **Historical Comment and Contemporary Reflection to the Patterns of “No Markets without Businessmen from Guangdong”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Guangxi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Minguo Period**

**Bibliography**

**Postscript**

